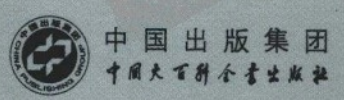


智利史

约翰·L.雷克特 著 郝名玮 译



A History of Chi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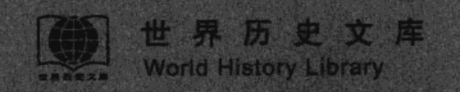


A History of Chile

ISBN 978-7-5000-8230-9



定价：40.00元



智利史

约翰·L.雷克特 著　郝名玮 译

A History of Chile



图字:01 - 2009 - 5509

First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Palgrave Macmillan,

a division of St. Martin's Press,

LLC, under the title The History of Chile by John L. Rector.

This edition has been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under licence fromPalgrave Macmillan.

The author has asserted his right to be identified as the author of this Work.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智利史/雷克特著;郝名玮译. -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9

ISBN 978 - 7 - 5000 - 8230 - 9

(世界历史文库)

Ⅰ.智… Ⅱ.①雷…②郝… Ⅲ.智利 - 历史 Ⅳ.K7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65267 号

责任编辑　李玉莲

责任印制　张新民

装帧设计　海马书装

出版发行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　　话　010 - 88390635

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40 × 960　1/16

印　　张　22.5

字　　数　300 千字

印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0.00 元

《世界历史文库》出版前言

在全球化时代,关注世界各国各地区文明发展的源流、现实和未来,不仅仅是新世纪人文学科的一个重点课题,也是许多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强烈兴趣所在。甚至,关注别国热点,不亚于关注自身状况,也已经成为心态开放、视野开阔的许许多多当代中国人的一种精神生活方式。然而,至今我国尚未出版过一套相对完备的世界国别史及地区史丛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业虽然陆续推出过一些国别史、地区史,但既无规划,也很分散,而且主要集中在英、法、美、俄、日、德等大国,覆盖面过于狭小,更遑论完备与权威了。为此,中国出版集团公司通过深入调研,邀约史学界专家进行多方论证,精心策划组织出版这套《世界历史文库》。

《世界历史文库》主要选收国别史、地区史的通史性著作,以国别史为主体,适当辅以地区史。计划共出版80种,2年内出齐。文库编辑委员会特邀我国世界史学界著名学者专家担任学术顾问,精心遴选著作。编选者和学术顾问一致认为,每个国家、地区的历史只选一种著作,因而要求此一种应是在学界已获得广泛定评的上乘之作,且最好是最新成果,作者应为著名史学专家,原出版者也应是知名的出版机构。原著使用的语种主要是英语、德语、法语、俄语、日语等,中文译者应基本上是史学专业人士或具有较高史学修养的翻译家。总之,学术性、权威性、完备性、可资借鉴性以及可读性,是《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所追求的目标。

显而易见,入选《世界历史文库》的著作,只是给读者们提供了关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历史一种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在史学领域里,治史者所拥有的材料、眼光、立场以及才学识见的不同,必然导致历史研究结论与叙述状态的迥异,相信读者们会在阅读研究时注意加以辨别。上下数千年,人类一直在探寻自己的历史,寻找"信史",追求"良史",以期获得历史的真相和启悟。正如清代著名思

想家龚自珍所说:"出乎史,如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治史、读史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并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是人类认识自身与寻求发展的需要。因而,寻找"信史"——要求史家叙述历史时具有很高的可信度,是其正当的要求。而追求"良史"——希望史家叙述历史时,在可信的基础上能正确揭示历史的内在真相与内在规律,达到"知兴替"而经世致用的目的,则是其最高的要求。宋代曾巩在《南齐书目录序》中曾提出"良史"的标准:"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就是要坚持提供"信史"的原则,努力追求"良史"的境界,竭诚为我国史学研究者提供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并满足各界读者了解世界各国各地区历史的需要,增进国际文化交流,为我国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贡献。这是编辑委员会和各位学术顾问的共同心愿和追求。

编辑出版工作不周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批评指正!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

前言与致谢

智利是一个盛产历史学家和诗人的国度。没有专门为历史学家设立的诺贝尔奖，如果有，许多智利史学家都应被列入候选名单。两位智利诗人——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和巴勃罗·聂鲁达——已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智利人在以诗文描绘他们国家的独特之处方面，成就斐然。

萨尔瓦多·阿连德的社会主义尝试和奥古斯托·皮诺切特的军事统治使世界的注意力聚焦于智利。这些引起矛盾冲突的历史事件使智利人相互争斗，使利益攸关国为了这一党或那一派的利益插手进行干预。随着1990年民主的复归，相互争斗的党派之间有了某种程度的和解，但仍然是互不信任。然而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巨大的物质进步，促使各方就未来政策达成了某种程度上的一致。

智利是个放眼全球的国家，其民众关注着周围世界所发生的一切。智利人不仅密切关注国际新闻，而且阅读广泛、游行四方。他们为了弥补其地理位置偏于一隅这一缺憾，养成了一种全球观。而将他们自己的传统与其他国家人民的传统联系起来的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就是研究他们自己的历史。

智利人要编写他们自己的历史，首先就得鉴别出并保存好其原始资料。19世纪以来，他们已从西班牙的一些档案馆、不列颠博物馆和

美国的一些档案馆收集到了不少有关本国的资料。像何塞·托里比奥·梅迪纳和吉列尔莫·费利乌·克鲁斯这样的一些多产书志学家在指导刊行原始资料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迭戈·巴罗斯·阿拉纳、阿穆纳特吉兄弟和本哈明·比库尼亚·马肯纳根据这些资料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又启迪了智利后辈历史学家。现在公众可以在智利国家图书馆和国家档案馆查阅到这些资料和历史著作。

智利的历史是一部物质、社会和思想发展进步的历史，也是一部危机时现、论争不断的历史。保守派史学家、自由派史学家和激进派史学家用图书馆和档案馆里的资料证明各自的观点，又根据各自的观点对历史事件进行阐释。像我这样的外国学者要感谢这些史学家和该国的研究环境。

我第一次到智利从事研究工作时，就得到了里卡多·多诺索、胡利奥· 海斯·贡萨莱斯和欧亨尼奥·佩雷拉·萨拉斯等学者的指点。后来我作为客座教授在天主教大学、智利大学和圣地亚哥大学任教时，奥拉西奥·阿朗基斯、胡利乌斯·卡卡里埃卡、阿尔曼多·德·拉蒙、胡安·里卡多·库尤姆健、胡安·爱德华多·瓦加斯、罗兰多·梅利亚菲、克里斯蒂安·加斯穆里、卢斯·马丽亚·门德斯、贝尔特兰·雷内·米利亚尔、尼科拉斯·克鲁斯、阿尔瓦罗·哈拉、何塞·马努埃尔·拉腊因、塞尔希奥·比利亚洛博斯、里卡多·克雷布斯、贡萨洛·伊斯基埃尔多、索尼娅·平托、克里斯蒂安·格雷罗、奥斯瓦尔多·席尔瓦、胡利奥·雷塔马尔和吉列尔莫·布拉沃等教授跟我谈了他们各自的历史观。我在同富布赖特委员会的塞尔希奥·图特利埃和天主教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的埃米利奥·梅内塞斯一道工作时也学到了不少东西。爱德华多·卡维埃雷斯、哈罗德·布莱克莫尔、拉里·斯蒂克尔、彼得·德夏索、西蒙·科利埃尔、安·约翰逊、马科斯·马马拉基斯、保罗·E. 西格蒙德、阿诺德·鲍尔、约翰·马约和玛丽·马约等人均参加过经常举办的圣地亚哥午餐研讨会，每次会议的时间都拖得很长。

最早是查尔斯·博克塞竭力主张我研究殖民地时期的智利历史，

并向我表达了他对何塞·托里比奥·梅迪纳研究成果的推崇之情。詹姆斯·斯科比、罗伯特·柯克、约翰·伦巴迪、约翰·戴森、布赖恩·洛弗曼、莎伦·洛弗曼和罗杰·伯巴克——他们起初都在印第安纳大学任教——作了重要评论。彼得·塞林格不仅介绍我跟一些智利史学家相识，而且鼓励我撰写此书。我在西俄勒冈大学历史系的同事们——纳拉辛哈·西尔、金伯利·詹森、保罗·布拉西尔、马克斯·盖厄、谢保华和贝内迪克特·洛——支持我的这项研究工作。苏·佩顿的地图绘制技术加上马克·范斯蒂特在地理方面提供的资料，使智利地图得以绘成。还要感谢西俄勒冈大学，校方给了我自由支配的时间、并向我提供了资助。

没有丛书编辑弗兰克·W. 萨克雷和约翰·E. 法因德林的帮助，本书难以面世。绿林出版社的执行编辑芭芭拉·A. 雷德首先支持我的这一研究项目，而资深编辑凯文·欧希则校阅了各章并提出了重要修改意见。我之所以掌握了许多有关智利的评述，皆受惠于苏珊娜·戈登、圣地亚哥·戈登、吉米·邓肯、玛丽亚·安赫利卡·邓肯、里戈·托伊伯、加夫列拉·托伊伯、佐伊拉·卢恩戈、恩里克·卢恩戈、塞贡多·卢恩戈、沃纳·布拉茨、埃利亚纳·布拉茨、塞贡多·纳韦尔、阿丰索·维加、特奥多罗·马蒂格、埃迪丝·马蒂格、路易斯·蒙特、马努埃尔·蒙特和伊内斯·蒙特。我还要感激我家人自始至终的支持。

缩写词和首字母组合词

AFPs	Administradoras de Fondos de Pensiones（养老基金管理公司）——利用养老金从事投资活动的私人公司。
CCU	Compañía Cervecerías Unidas（联合啤酒酿造公司）
CEMA	Centro de Madres（母亲中心）——弗雷·蒙塔尔瓦政府时期创建。
CEPAL	Comisión Económica para América Latina（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20 世纪 60 年代，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的经济理论倡导工业化。
CODE	Confederación Democrática（民主联盟）——由民族主义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组建，反对人民团结阵线。
CODELCO	Corporación del Cobre（铜业公司）——国营公司。
CONAMA	Comisión Nacional del Medio Ambiente（国家环境保护委员会）
CONICYT	Comisión Nacional de Investigación Científica Y Tecnológica（全国科学技术研究委员会）——为学术研究提供资助的主要机构。
CORA	Corporación de la Reforma Agraria（土地改革协

	会）——经管被没收的大地产。
CORFO	Corporación de Fomento（发展协会）——促进工业发展和其他经济活动的政府组织。
CRAC	Confederación Republicana de Acción Cívica（公民行动共和联盟）——伊瓦涅斯为控制劳工政治活动而成立的组织。
CTC	Compañía de Teléfonos de Chile（智利电话公司）
CTCH	Confederación de Trabajadores de Chile（智利工人联合会）——或立于 1939 年。
CUT	Central Unica de Trabajadores（工人统一工会）——从 1953 年成立到 1973 年遭禁一直是举足轻重的工人组织。
DINA	Dirección de Inteligencia Nacional（国家情报局）——皮诺切特政府时期从事暗杀、酷刑审讯活动。
ENAP	Empresa Nacional de Petróleo（国家石油公司）
ENDESA	Empresa Nacional de Electricidad（国家电力公司）
ENU	Escuela Nacional Unificada（全国统一教学体制）——人民团结阵线提出的引起争议的建议。
FACH	Fuerza Aérea del Chile（智利空军）
FECH	Federación de Estudiantes Chilenos（智利大学生联合会）——智利大学的学生创建于 1906 年。
FLACSO	Facultad Latinoamericana de Ciencias Sociales（拉丁美洲社会科学院）
FOCH	Federación de Obreros de Chile（智利工人联盟）——成立于 1909 年，后来受共产党控制。
FONASA	Fondo Nacional de Salud（国家公共医疗保健基金会）——人们只要向这一政府设立的医疗保健机构捐款，就可以挑医生为自己看病。

FTAA Free Trade Area of the Americas（美洲自由贸易区）——设立包括西半球所有国家在内的共同市场的建议。

GDP Gross Domestic Product（国内生产总值）——年生产值计量标准。

INDAP Instituto de Desarrollo Agropecuario（农牧业发展协会）——政府为小农牧主设立的农业发展和信贷机构。

ISAPRE Instituto de Salud y Prevension（保健预防协会）——非强制性的私人医疗保健保险公司；参保人大多为非体力劳动者。

JAP Juntas de Abastecimiento y Precios（供应、物价委员会）——人民团结阵线通过这一委员会组织分发食品。

MAPU Movimiento de Acción Popular Unitaria（人民行动统一运动）——基督教民主党青年成员建立的分裂组织，后来参加了人民团结阵线。

MERCOSUR Mercado Común de Cono Sur（南锥体共同市场）——由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乌拉圭组成；智利为其非正式成员。

MIR Movimiento de Izquierda Revolucionario（左派革命运动）——主张直接行动，反对选举政治。

PDC Partido Demócrata Cristiano（基督教民主党）

PPD Partido por la Democracia（争取民主党）——社会党分支组织。

PROCHILE Instituto de Promoción de Exportaciones（出口促进会）——皮诺切特政府组建。

ODEPLAN Oficina de Planificación Nacional（国家规划署）

RN Renovación Nacional（国家复兴党）——温和保守政

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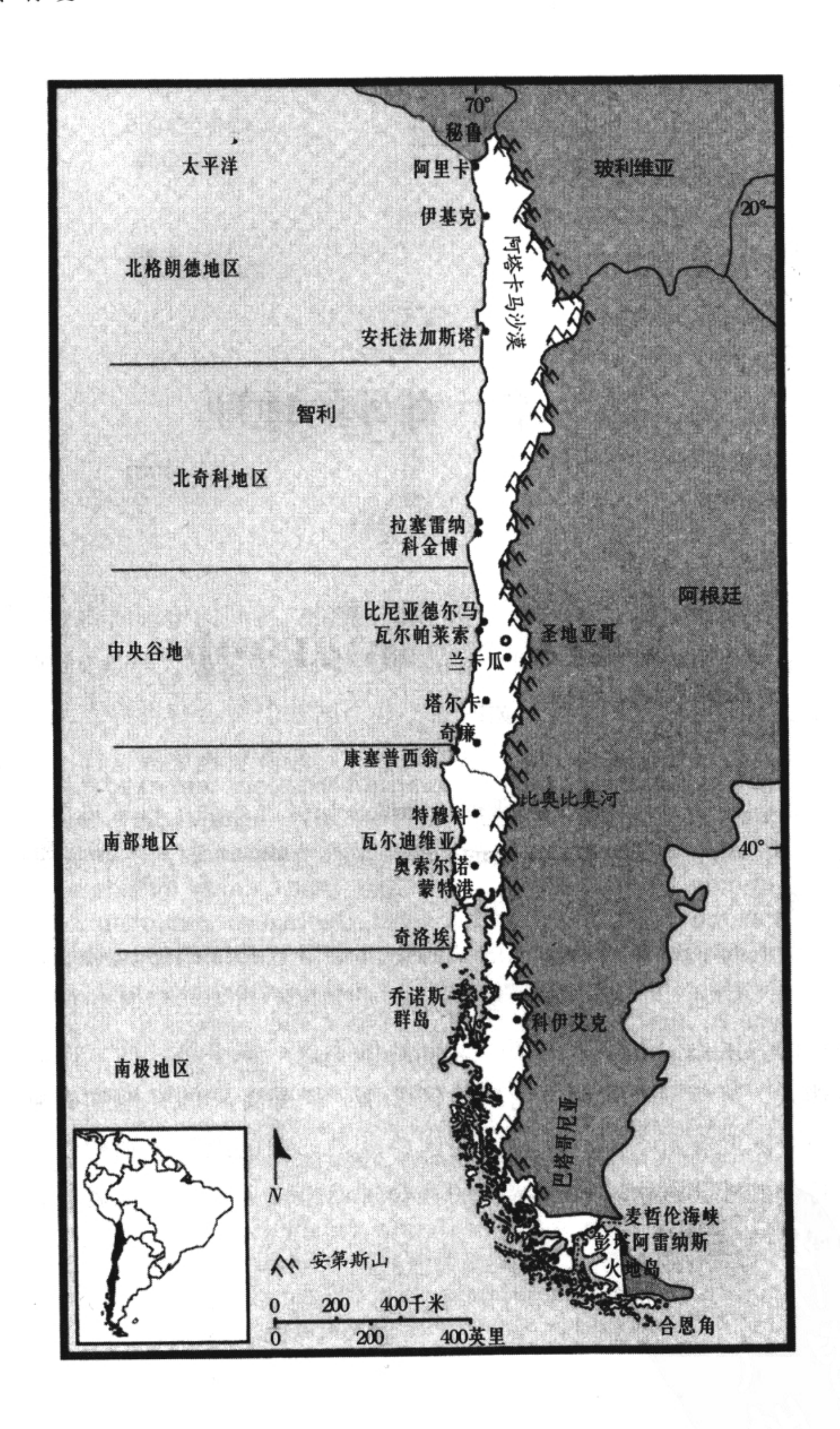
SAG	Servicio Agrícola y Ganadera（农牧业服务局）——促进大土地占有者使用现代农牧业技术。
SFF	Sociedad de Fomento Fabril（工业发展协会）——工业雇主组织；亦简称 SOFOFA（工发会）。
TFP	Sociedad Chilena de la Tradición，Familia y Propiedad（智利传统、家庭、财产协会）——天主教保守教徒组织，反对弗雷·蒙塔尔瓦和阿连德的改革。
UDI	Unión Democrática Independiente（独立民主联盟）——保守政党：起初与皮诺切特政府有联系。
UECH	Unión de Empleados de Chile（智利雇员工会）——1925 年组建，旨在统一各非体力劳动者组织；1949 年更名为智利雇员联合会（Confederacion de Empleados de Chile，CEPCH）。
UP	Unidad Popular（人民团结阵线）——1970—1973 年统治智利的左派政党联盟组织。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奇妙的地理

半个多世纪前，本哈明·苏贝尔卡索说：智利的地理真奇妙。智利的地理确实有着一些不同寻常的特征。一个国家怎么会是2 600余英里长而平均只有110英里宽的呢？这个国家怎么会有世界上最干旱的沙漠、西半球最高的山脉、温带雨林和一段南极地块等这样一些非同寻常的特点的呢？而相互碰撞的地质板块又怎么会不可避免地使地震和火山喷发成了智利人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呢？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得研究一下智利的地理和历史。

紧盯智利这奇妙的地理的同时，也要留意其如画的风景和丰饶的资源。例如，几乎没有什么地方比大多数智利人生活其间的中央谷地的气候更温和宜人的了。北部地区不仅矿藏丰富，而且海滨景色迷人，终年阳光普照。南部地区多雨，但那青翠的谷地和巍峨的火山令湿度有所下降。智利人在这些风景如画的地带分别构建了各具特色的社会，这些各具特色的社会进而组成了一个生机勃勃、活力四射的国家。



70°
秘鲁
太平洋
阿里卡
玻利维亚
伊基克
20°
北格朗德地区
阿塔卡马沙漠
安托法加斯塔
智利
北奇科地区
拉塞雷纳
科金博
阿根廷
比尼亚德尔马
瓦尔帕莱索
圣地亚哥
中央谷地
兰卡瓜
塔尔卡
奇廉
康塞普西翁
比奥比奥河
特穆科
南部地区
瓦尔迪维亚
40°
奥索尔诺
蒙特港
奇洛埃
乔诺斯
群岛
科伊艾克
南极地区
巴塔哥尼亚
N
麦哲伦海峡
彭塔阿雷纳斯
安第斯山
火地岛
0
200
400千米
0
200
400英里
合恩角

一、国土成形

1. 疆界划定

智利现在的疆界大体上依安第斯山和太平洋而定。但先前并非如此，它的疆界曾经是经常变动的。历史同地理一样决定着智利的奇妙形状。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不同的形状。

如果西班牙人起初欲从大西洋岸在新大陆开拓殖民地的尝试成功了的话，智利可能就成了阿根廷的一个组成部分了。然而两度尝试均告失败。结果是到智利探险、从事征服活动的人均来自北方。他们降伏了马普切人后，将其开拓的殖民地并入秘鲁总督区。双方的关系起初还是可以的，但距离和相左的利益最终导致了冲突。

智利不久即成了向东扩张的基地。16 世纪 50 年代，智利的征服者们越过安第斯山，在称之为库约的地区建起了 3 座市镇。这一地区并入后，智利的疆土比现在宽出了一倍多。安第斯山并未妨碍两个地区间经济、社会的密切接触。在西班牙国王 1776 年调整行政疆界、将库约地区划归布宜诺斯艾利斯管辖前，智利都统一直治理着库约地区。传统习惯上的联系依然存在于智利和库约这两个地区，贸易和人员往来一直不断。

殖民地时期，智利北起科皮亚波、南与马普切人的领地毗邻。19 世界智利的经济发展，使政府得以将其疆界向北、向南推移。19 世纪 40—50 年代，政府主使了在彭塔阿雷纳斯和南部湖区的拓殖活动。硝石矿的开采和争夺阿塔卡马沙漠地区的活动，向北推移了疆界，智利在太平洋战争中打败秘鲁和玻利维亚后，又兼并了两国的一些疆土。后经国际谈判确定智利和秘鲁的疆界位于阿里卡以北。这就是现在的疆界。1881 年智利—阿根廷条约划定智利东部边界为安第斯山峰及其分水岭。太平洋战争结束后，智利军队占领马普切人的领地，又向南推移了疆界。20 世纪初，智利政府又促使国人在巴塔哥尼亚西部地区进行拓殖活动。上述一系列活动奠定了智利的现行国土。然而 20 世纪 80 年代对麦哲伦海峡的归属之争，差点儿引发智利和阿根廷的战争。幸好这一争端通过仲裁而不是枪炮得到了解决。智利的疆土还包括两

组太平洋上的群岛——胡安·费尔南德斯群岛和复活节岛，以及南极洲的一块地段——军队在那儿设有一座永久性基地。

2. 统一

4

要统一疆土这么长的国家，得有相当强烈的政治意愿才行。在19和20世纪里，智利应用类似于美国用于西部地区的奖励办法，对移居南部地区者给予补贴。智利在其最南端和最北端设立了免税港口，给愿意到艰苦地区工作的政府雇员加薪，用联邦基金资助通信网络，19世纪修筑了一条贯通南北的铁路，20世纪又修了泛美公路，向通往北部和南部与外界隔绝的地区以及复活节岛的空中运输提供补助，还资助筹建了全国电视网和互联网系统。

二、陆地

智利西濒太平洋，东界安第斯山。许多地区有绵亘在太平洋岸边的海岸山脉将太平洋与内陆谷地隔离。海岸山脉与安第斯山脉之间是经长期侵蚀形成的陷落谷地。巴塔哥尼亚地区没有海岸山脉，只有陆棚将太平洋与安第斯山隔开。而这陆棚也很窄，有些地段还没有。北部沙漠地区则与之相反，海岸线以东是盆地，再向东是海拔在1万英尺以上的高原，这一高度致使那里昼夜温差颇大。此间有着丰富的铜矿藏。再往东，安第斯山抬高至2.2万英尺。高耸的山峰从干燥的大气中凝聚大量湿气形成了雪，雪又形成了大片雪原，融化的雪水则不断补进这一地区为数不多的河流。

1. 气候与地理区域

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考量智利的各个地区：其一是根据气候；其二是根据传统习惯。智利人通常将其国家分为下列五个地区：北格朗德地区、北奇科地区、中央谷地、南部地区和南极地区。从北向南行，头800英里是沙漠；进入北奇科地区后，植被、雨水逐渐增多。大约从圣地亚哥以北70英里处开始，进入中央谷地肥沃的农业区。这一区段向南延伸300余英里，抵达称之为南方地区的潮湿地段。这一

地段淫雨连绵，南面的南极地区也是这样。巴塔哥尼亚地区有两处例外：一处是科伊艾克；另一处是火地岛的大西洋沿岸。这两处受雨影[1]影响雨量减少，生成了天然草场。彭塔阿雷纳斯的平均降雨量只有 18 英寸。再往南没有了雨影，麦哲伦海峡的降雨量达到 200 英寸。

智利的大地难得消停一段时间。无论谁只要在智利待上个一年半载，就会有震感。强烈地震虽不多见，而一旦发生强震，则生灵必遭涂炭。查尔斯·达尔文 1835 年 2 月在瓦尔迪维亚调研时，那儿正好发生了一次持续两分钟的大地震。他回忆道：想站又站不稳，就像是在一条遭遇白浪掀天的小船上。他说大地摇晃得就“像是一片薄板晃荡在水面上”。数周后他游历到康塞普西翁时，看到的是一片废墟和邻近的塔尔卡瓦诺所受到的破坏痕迹。一场海啸将塔尔卡瓦诺夷为平地。他断定：一次地震足以使整个国家繁荣不再，万户萧疏。

不幸的是，智利自打建立以来，每个世纪都要遭受 12 次以上的强烈地震。就在旧金山惨遭地震破坏的 1906 年，瓦尔帕莱索也被地震摧毁。1939 年的一次地震将奇廉城夷为平地，并严重地危及了整个南方地区。1960 年瓦尔迪维亚地震毁坏了整座城池，并使数百英亩农田上出现了无数大小不一的浅湖、水塘。山区的人们眼瞅着树就像多米诺骨牌那样挨个倒地，那条条道路则成了波光粼粼的小河。

智利还有 30 多座活火山。北方的火山口喷出大量石块和岩浆，造成了大片无人区。南方的人们则生活在火山坡上，利用他们在那儿所能利用的一切资源。例如，在比利亚里卡火山坡上有伐木活动、牧牛场、三个旅游中心和一处滑雪胜地。20 世纪 60 年代的一次火山喷发毁了山南的科尼亚里佩镇。十年后的再次喷发又毁了山北的道路和桥梁。现在夜间犹能看到火山口有火红的强光闪烁。但当地人更关注火山口冒出的烟柱，视其为有情况的信号。

有一股以地理学家亚历山大·洪堡的名字命名的洋流沿智利海岸由南流向北，过了南极地区后使远至厄瓜多尔的太平洋岸海水冷却，

① rain shadow，指山脉等背风坡上雨量比向风坡要小的区域。——译者注

并夹带着大量海洋生物，其中包括小型甲壳类动物。这些小型甲壳类动物处于食物链末端，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鱼类、乃至鲸鱼的饵料。处于食物链中段的是鳀鱼。鳀鱼是全国各渔场大量捕捞的对象。智利人极爱食海产品，海胆啊，鲍鱼啊，海鲈鱼啊，都爱吃。全国各鱼市——不管是海边的还是内陆的——均出售各种各样的海产品，供当地人制作一道道的美味佳肴。

2. 气候

位于智利最北端的阿里卡，年平均气温为华氏 64 度；以南 350 英里处的安托法加斯塔为华氏 61 度；圣地亚哥华氏 57 度；蒙特港华氏 52 度；彭塔阿雷纳则为华氏 43 度。北部沿海清晨通常是浓雾迷漫，直到中午过后才会被阳光驱散。雨水稀少。北部地区内陆白天气温比沿海高，一年到头很少见云彩。高原沙漠地带日落后气温急剧下降，日夜温差高达华氏 40 度。

12 月至来年 3 月为干旱的夏季，中央谷地的白天气温通常为华氏 80 度，夜间降至华氏 50 度。由于雨水稀少，这一时期只有灌溉区仍是绿莹莹一片。6 月至 9 月为冬季，这一地区降雨量适中，白天气温降至华氏 50 度—60 度，夜间温度鲜达冰点。圣地亚哥以东的山麓丘陵地带偶有雪花飞舞，但很少有真正的降雪。而高山上则覆盖着白雪，1.5 万英尺处为冰盖奇观。虽然当地居民感到寒气逼人，但倒无碍于作物的生长。柑橘、鳄梨和棕榈树茁壮繁茂；只是这寒气凛凛的环境不利于芒果、木瓜和香蕉树的成长。智利没有潮湿闷热的热带气候。安第斯山从南到北终年积雪。南部山脉高度下降，冰线亦下移。因此，像约 9 000 英尺高的雅伊马和比利亚里卡这类较低的火山与俄勒冈和华盛顿州境内的喀斯喀特山脉十分相似，终年覆盖着冰川。这就为冬季冰雪运动和夏季丰水期湖、河水上运动创造了条件。

南部地区和南极地区沿海的云雾夏天通常会自行消散，而冬季则存在数月，造成暴雨连连，难得有晴天，只有在暴雨间歇期才能一见阳光。奇洛埃以南地区，就是夏天也不热，冬季地势较低的地方还经常下雪。

3. 行政区划

区域的划分不仅有气候因素，也考虑到了行政管理的因素。据此，智利划分为 12 个大区，外加一个圣地亚哥首都联邦区。每个大区下辖一个或数个省。20 世纪里有多届政府曾变更过这一区划。各大区最高行政长官区长由总统任命，对公共工程和其他服务性事业进行财务监督。大区没有立法机构。行政区的划分影响着政府资金的分配，所以每当准备重新划分行政区时，形形色色的社会团体就会千方百计对划分工作施加影响。

三、人民

1. 民族认同

智利人具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智利的史学家们认为这一情感源自该国的军事、政治、求知好学和文化传统。军事传统突出表现在智利在摆脱西班牙统治解放南美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和在 19 世纪的两次战争中战胜秘鲁和玻利维亚上。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军事统治期间，批评军政权的人担心国家的形象被打上过深的军事烙印。然而许多智利人更担心秘鲁和玻利维亚会试图收复其所失去的疆土、阿根廷会兼并巴塔哥尼亚地区。20 世纪 80 年代还真在这两方面出现了一些不祥的征兆，这一形势更激发了智利人的民族主义情绪。

军事传统往往成为智利民族主义的象征，而政治则是人们构想其未来的常态行为。智利人传统上不担心政治讨论会引起激烈的冲突，但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人们谨慎多了。然而许多智利人还是认为政治而非足球才是其真正的全国性运动。他们爱提出雄心勃勃的建议，以解决国家重大问题，也爱议论国际大事。

智利往往根据政治需求进行重大的全国性改革。20 世纪 20 年代，中产阶级的改革运动力图解决阶级分歧。40 年代，人民阵线运动制定了促进经济发展的革新纲领。60 年代和 70 年代初，智利人拥护谋求进行全面改革的政党。1973 年军队推翻阿连德政府后，试图铲除腐败

8 政治、变革经济制度，以证实自己的合法地位。历次改革运动期间，智利人总是支持某一政党，用该党的观点辩论问题。不管属于何党何派，参与辩论就是一种爱国主义的表现，证明自己是智利人。

求知好学传统使得民众颇有见地。95%的识字率表明大多数智利人在学校里学习过国家的历史和文学。人们可以接触到各种各样的报纸、杂志和书籍，从而形成了一种全民阅读的风气。诸如迭戈·巴罗斯·阿拉纳、本哈明·比库尼亚·马肯纳、弗朗西斯科·恩西纳、里卡多·多诺索和胡利奥·海斯·贡萨莱斯这样的一些历史学家为不同政治派别的智利人描绘了共同的历史。诸如阿隆索·德·埃尔西利亚、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巴勃罗·聂鲁达、豪尔赫·爱德华兹和伊莎贝尔·阿连德这样的一些文人学士赞颂了祖国大地的美丽，描述了祖国人民的斗争。

工人们广泛流传着种种传奇故事，这些故事使他们团结在一起。他们一再复述着考波利坎的故事。考波利坎是马普切人的首领，据说能够肩扛一根长长的粗圆木，一连坚持好多天。他们声称来自智利工人阶级的士兵在太平洋战争中向秘鲁和玻利维亚部队进攻前要喝一种红葡萄酒加火药的混合饮料。工人们传说着《智利工人》故事。讲述主人公胆识非凡、英勇无畏，能够克服任何艰难险阻。故事的现代版《小秃鹰》中的主人公是勇敢的秃鹰，以智谋而不是蛮力打败了许多“巨人”。9月18日是智利独立日，智利人在《18日》中直抒胸臆，诚坦爱国主义情怀，朴实且略嫌粗俗地高呼“智利真他妈的万岁！”

2. 教育

智利长期来一直保有一套极具学术标准的公共教育体制。1920年政府做出了普及初等教育的规定，但政府没有财力实施这一规定，特别是在乡村地区。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爱德华多·弗雷·M.总统和萨尔瓦多·阿连德总统拨款修建校舍、落实供膳计划和举办师资培训班，成功地使全部学龄儿童进入了小学。其结果是识字率上升到了95%，为拉丁美洲之最。20世纪90年代，学前、初等、中等教育注册人数超过200万，高等教育注册人数则逾35万。

3. 人口

西班牙人到来之前，印第安人生活在小村镇和乡间小村子里。智利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定居在中央谷地和南部地区。16 世纪里，西班牙人很快即从北到南先后建起了若干市镇，最南的一个市镇是瓦尔迪维亚；然而这些市镇发展很慢。而到 1610 年，马普切人又毁掉了其一半。就连殖民地时期的首府也发展缓慢。时至 1700 年，首府城市兴建已逾 150 年，人口才有 1.2 万。18 世纪贸易增长、政府人员增多，1800 年时首府人口增至 4 万。其他城市地区要小好多，康塞普西翁有 1 万人，瓦尔帕莱索是 4 000 人，而拉塞雷纳则为 3 500 人。包括其余 15 个小市镇的人在内，殖民地城市人口仅为总人口 65 万的 10%。殖民地一半以上的人口仍是马普切人，他们一直生活在其原先的土地上，然而已开始慢慢向中央谷地和城市地区迁移。以现在的标准衡量，城市人口不算多，但在当时仍属正常。比较起来当时美国只有 4% 的城市人口。

独立后的智利更重视国际贸易和掌控贸易往来的贸易中心。圣地亚哥和瓦尔帕莱索港是最大的得益者，其人口增速大大超过全国的增速。

	瓦尔帕莱索—比尼亚德尔马	圣地亚哥
1800 年	4 000	40 000
1820 年	10 000	50 000
1865 年	70 000	115 000
1885 年	120 000	250 000
1900 年	150 000	300 000
1930 年	200 000	700 000
1950 年	330 000	1 400 000
1960 年	500 000	1 900 000
2000 年	625 000	5 000 000

时至 1900 年，智利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 20%，1960 年为 50%，2000 年达到 84%。十分惹人注目的是，2000 年城市化的程度超过了

墨西哥（75%）和美国（77%）。现在全国有一半人口生活在圣地亚哥、瓦尔帕莱索—比尼亚德尔马和康塞普西翁—塔尔卡瓦诺这三个都会地区。20 世纪里国家首都的吸引力大大超过其他城市地区。1900 年只有 10% 的智利人生活在那里，而到 20 世纪末则达到 40%。首都人口 100 年间从 30 万增加到了 500 万。在 19 世纪中叶短暂的时期里，瓦尔帕莱索港堪与首都相媲美。而后北部的硝石和铜的出口港城市兴起，与瓦尔帕莱索相竞争，而圣地亚哥则迅速增加了制造业和政府部门的就业机会。企业感到靠近政治权力比靠近港口设施更重要。20 世纪 80 年代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理论上不再重视政府的作用，但并未扭转这一势头。如果下一代不能改变圣地亚哥人口负荷过重的形势，智利人可能就要决定迁都他处、发展其他城市中心了。

向较为偏远地区移民的计划难以阻止人们大批向三大都会地区流动。只有另外三座城市人口超过 20 万。这三座城市提供了贸易和服务业方面的就业机会，但在政府部门和工业方面就业机会很少。因此，人们离开农村地区寻找工作时，通常会绕过地区中心城市，径直前往国家首都、康塞普西翁或瓦尔帕莱索。除比奥比奥地区外，圣地亚哥以南的农业区仍有 50% 以上的农村人口。而北格朗德地区和北奇科地区则是智利最为城市化的两个地区，90% 的人口生活在港口城市和矿业市镇。

虽说智利的城市化水平比起拉丁美洲其他国家来要高，但其人口增长率则比较低，20 世纪里一直保持在 2% 以下。按照当前的增长率计算，智利得花上 50 年才能使人口增加一倍；而与之相比，一些中美国家每过 25 年，人口就要增加一倍。历史上的移民使智利种族构成呈多样性，但一直不是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除了来自农村地区的德国移民定居在南部地区外，人数不多的英国、法国、意大利、瑞士、南斯拉夫和阿拉伯移民大多定居在城市地区，从事贸易和工业活动。当今人数较多的移民来自邻国玻利维亚和秘鲁，他们大多在北部地区从事无需特殊技能的工作和在圣地亚哥干家务。

四、经济

1. 北格朗德地区

北格朗德地区地处北部干旱地带，除几处港口和一些矿业中心外，乡间几乎是空无一人。主要问题是缺水，因为难得有雨。河槽纵横遍布北部沙漠地区，但一年里大部分时间干涸无水。安第斯山上融化的雪水淌入河槽，然而水量太少，根本就流不到海岸边。这儿尽管缺水，但却是智利矿藏最丰富的地区。智利的硝石财富就源自这一地区。20世纪30年代硝石业开始衰落，铜不久就成了最重要的资源；先后开发了丘基卡马塔矿、拉埃斯孔迪达矿、波特雷里略斯矿和埃尔萨尔瓦多矿等大型矿场；而各大矿场均发展起了公司城镇（company town）。为了给这些矿区供水，各公司和政府部门为重要河流洛阿河的使用权而争吵不休。

大部分铜都从安托法加斯塔港出口。穿越安第斯山进入玻利维亚的铁路也起自该港口城市。除矿业外，捕鳀业也是北部地区的一种重要产业，使智利成了世界上捕鱼量最大的国家之一。伊基克港和安托法加斯塔港是捕鱼船队进出的集散中心。海滨城市终年气候温和、海滩迷人，已开始大力发展旅游业，但至今成绩平平。

2. 北奇科地区

北奇科地区的降雨和融雪是四条河流域灌溉用水的长期保障。历史上这一地区生产谷物供应矿工，辟有牧场放养役畜。然而随着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土地渐次成了葡萄种植园。虽说阿克罗斯银矿和塔马亚铜矿对智利19世纪财富的增长做出过重要贡献，但20世纪里矿业中心北移了。智利的皮斯科酒多半产在北奇科地区；皮斯科酒是一种纯葡萄白兰地酒，掺加柠檬汁和一些其他配料后就混合成了独特的酸味皮斯科酒。

3. 中央谷地

通常称之为中央谷地的地区北起圣地亚哥以北约70英里处的阿空

加瓜谷地，南至圣地亚哥以南约 250 英里处的康塞普西翁。降雨量由北向南显著增加，圣地亚哥年均仅为 13 英寸，而康塞普西翁则为 52 英寸。前殖民地时期沿海地带和安第斯山地区密林遍布，西班牙人伐木开辟了连片牧场。在沿海地带造林和在安第斯山地区保护本土物种计划已恢复了一些林地，珍贵木材、纸浆和造纸业遂有了发展。

两条山脉间的谷地历来是智利的粮仓。西班牙人起初利用这一地区放牧牛群。牛群通常冬季在低地放养，春天牧草干枯后牧牛人将牛群赶往高地。殖民者们发现此处也适宜种植谷物。种植谷物不仅供全境消费，还出口到太平洋沿岸的一些港口城市。起初的委托监护制和土地赏赐制导致了大庄园的产生。18 世纪西班牙国王鼓励富有的土地所有者将其地产限嗣继承，以形成一种实质上的土地世袭制。这就是说，土地实际上将永远不会出售，将一直留在家中。虽说 19 世纪废止了这一制度，但智利人却又建立起了他们自己的、类似于英国封建庄园的土地制度。富有的矿主和企业家占有大片土地，对之加以修整，用于接待贵客。20 世纪中叶许多智利人指责这类庄园使农民一贫如洗、使农业生产率下降。20 世纪 60、70 年代，土地改革加上工人的反抗分解了大多数庄园。

这一肥沃的地区，也是栽种葡萄、蔬菜和果树的好地界。逛一逛圣地亚哥的一些新鲜农产品市场——特别是马波乔市场，就能看到品种繁多、数量充足的产品了。20 世纪 70 年代初，智利开始向世界各地运送大量新鲜水果和葡萄酒。出口导向型的新兴商业农场发展起来。城市投资人成了主要的土地占有者，他们雇用专业农艺师经管其业务。先前用以放牧和种植谷物的土地如今成了葡萄园和果园，邻近处则建起了包装工场。

这一地区不仅是最重要的农业区，也有许多重要的工业企业。其中一些是利用自然资源的工业企业，如两大铜矿（埃尔特尼恩特矿和安迪纳矿）和孔孔炼油厂。工厂带环绕圣地亚哥南北，计有食品加工厂、化工厂、纺织厂、耐用消费品厂和建筑材料厂等。港口城市瓦尔帕莱索和圣安东尼奥也有一些工业企业。

旅游业，特别是沿海地区的旅游业，对中央谷地非常重要。许多智利人一二月份前往海滨休假。就连安第斯山地区的阿根廷人也觉得前往智利海滨比去阿根廷大西洋海滨近得多。中、上阶层的智利人会在比尼亚德尔马或其他别具风姿的海滨市镇拥有一座海滨别墅。这些市镇分布在沿海地段，诺贝尔奖获得者诗人巴勃罗·聂鲁达就曾生活在海滨小岛内格拉岛上的一座别墅里。他家里收藏着世界各地的手工艺品，并对公众开放。圣地亚哥有国家档案馆和国家美术馆这样一些令国内外游客向往的历史博物馆；还有许多剧院和高档饭店，同样吸引游客。位于圣地亚哥以东的波蒂略、法雷约内斯和内瓦多谷地等滑雪胜地每年 6—9 月积雪深厚，是滑雪爱好者们的好去处。这期间，北半球国家山坡上无雪，于是一些国家的滑雪队便移师此处进行滑雪和雪橇训练。

虽说这一地区没有可通航的河流，但阿空加瓜河、迈波河、拉佩尔河、毛莱河以及伊塔塔河，在每年冬天的雨季和春天的融雪期间还是有大量水资源的，在最重要的河流上则筑有用以灌溉和发电的大坝。智利没有内河港口，瓦尔帕莱索和圣安东尼奥两个海港的出口量占智利总出口量的 36%、总进口量的 65%。

4. 南部地区

这一地区的气候和地形与北美西北部太平洋沿海地区很相似。沿海地区雨量充沛，瓦尔迪维亚市镇的年降水量达 90 英寸，蒙特港为 70 多英寸；而由于雨云向东飘移时受安第斯山阻截，所以越向东雨量越大。虽说沿海地区年均气温为华氏 50 度，但内陆谷地夏季的白天气温可达华氏 70 度。冬季白天的气温为华氏 40 度—50 度，只有山区下雪。南部地区原先多半是林木丛生，浓荫遮蔽；但后来低地的丛林被清除，辟为牧场和农田；而刀耕火种式的农业又毁了许多山林。如今造林和限制毁林措施已使林区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使这一地区成了主要木材产地。

这一地区的西北角为康塞普西翁—塔尔卡瓦诺大都会区，是智利的第二大市区，约有 70 万人。这儿不仅有着智利最优良的天然港湾，

14

而且还是重要的重工业基地。智利唯一的一家钢铁厂瓦奇帕托钢铁厂就建在这里；还有一家炼油厂、几家化工厂和一些纸浆厂及造纸厂。向南150英里处是疾速发展起来的特穆科市——一座贸易、农业和林业中心城市。再向南是这一地区的贸易中心瓦尔迪维亚、奥索尔诺和蒙特港。这三座城市早在19世纪50年代就开始深受德国文化的影响。德国移民后裔虽然现在都讲用西班牙语，但仍坚持保存着他们祖先的语言、职业道德和土地。他们那爱干净的日耳曼习惯随处可见，这充分表现在其住宅和乳牛场的一尘不染上。他们的企业家精神导致了旅游业、谷物加工业、酿酒业和木材业的重大发展。

这一地区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众多湖泊。这些湖泊是古安第斯山冰川留下的洼地积水形成的。智利民歌《众湖之歌》历数了人们钟爱的湖泊皮里维科、潘希普利、扬基维、朗科和里尼维。每年一二月份天气晴朗，比利亚里卡、普孔和弗鲁蒂利亚尔等湖边小镇挤满了游客。这是牧人竞技表演的季节，骑手们炫耀各自的骑术和双人舞《奎卡舞》的舞姿，并伴以表现雄鸡向母鸡求偶的民间音乐。而在雨季，就只有那些不畏严寒的当地人活动的身影了，他们在烧木材的火炉前取暖，讲故事，喝马黛茶。

19世纪80年代之前，南部地区是马普切人的土地，他们曾先后反抗过西班牙人和智利人的征服活动。这一地区随处可见马普切人的身影。他们有近50万人。他们在特穆科市的商业中心区出售他们自己制作的纺织品、木雕工艺品和首饰。许多人生活在居留地上，放羊、种植马铃薯、织毛毯。老年人仍说马普切话，但年轻人爱讲西班牙语。年轻的马普切人通常移居圣地亚哥，女青年一般从事家务劳动，男青年找无需特殊技能的活干。他们一进城，就很快被同化了。除了一些像纳韦尔、莱菲尼安科和科利佩这样的姓氏外，他们与其他智利人没有什么区别了。

蒙特港以南有智利第一大岛奇洛埃岛，面积达4 755平方英里，与美国康涅狄克州差不多。主要市镇是安库德市，人口2.3万。奇洛埃人是岛上的主要族群。由于缺少经济机会，他们通常前往阿根廷巴

塔哥尼亚地区找活干。岛上大部分地区曾经密布常绿树木，但后来许多树木被伐，改种马铃薯和放牧牛群了。四周海洋环绕，海产资源十分丰富，许多人主要靠鱼、虾、蟹、螺、贝等海产品为生。奇洛埃人只用贮热岩烧烤捕获到的海产品，他们制作的风味食品有烤蟹、烤蛤肉、烤贝肉、烤鱼。

5. 南极地区

这一地区正好起自奇洛埃岛南端。从那儿往南，大陆架消失，安第斯山径直扎入太平洋。有几段大陆架和伸入太平洋的海岸山脉露出水面，形成岛屿，水道交织其间，乔诺斯群岛海域的景象就是这样。20 世纪初移民刚到时，交通十分不便，所以他们开辟牧场时，决定烧树而不是伐木。火势失控，毁了大面积树林，至今仍见遗迹。20 世纪 70 年代，军队修建了一条通途大道，在此之前，巴塔哥尼亚地区的居民必须驾车经过阿根廷走陆路前往智利其他地区。现在有一条尚未完全铺就然而景色迷人的公路连接着蒙特港及其以南 660 英里处的普埃尔托—永瓜伊村。空中交通比较快捷，乃为出行之最佳选择，但风、雨和浓云一直给飞机起降制造麻烦。

大多数市镇都很小，只有科伊艾克镇（人口 3.6 万）和彭塔阿雷纳斯（人口 12.5 万）稍大点儿。从某些方面看，这一地区似乎还停留在 19 世纪。不仅是那些原木搭建的房屋透着另一时代的气息，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亦非 21 世纪的样子。人们都显得清闲安逸，谈话聊天，社交往来，不惜时间，任凭光阴流逝。飞机、南极公路和互联网也许会引起变化，使南极地区不再那么与世隔绝。现在网站引导外面人到这一地区旅游、了解这一地区的历史、体验这一地区的文化。

6. 经济变革

智利人就经济变革所进行的辩论和实验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多。萨尔瓦多·阿连德 20 世纪 70 年代初实施过社会主义经济政策，而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则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强行实施了新自由主义改革。20 世纪 90 年代基督教民主党领导人决定实施旨在减少贫困的税

收福利计划。20 世纪期间，智利一会儿着重实施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一会儿实施旨在改进收入分配的政策。保守派政党强调前者，中间派和左派政党则强调后者。

16

政府的作用是经济政策辩论的主要问题。政府提供农业信贷，修筑并管理铁路。世界经济大萧条期间，政府将工作重心转移至工业化的实施。政府保护私营企业应对外国企业的竞争，并投资钢铁工业、石油工业、电力工业和航空业。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初，政府开始实行土地改革，对财富进行再分配。政府没收外国控制的铜矿和其他工业，并盖建公共住房、分配食品、普及教育和提供免费医疗保健服务。

1975 年军政府将经济政策交由一批新自由主义派经济学家处理，他们对大多数政府企业和包括医疗保健、退休体制和教育在内的服务行业实施了私有化。除铜业公司外，政府出售了大多数被前政权收并的企业。政府大力鼓励外国投资，强调出口贸易的重要性。这样做虽然社会代价高了点儿，但却获得了罕见的经济高增长、物价稳定和外国投资。

1990 年民主恢复，“各党一致否决联盟”政府决定向智利最贫困的人群提供服务，同时又继续实施私企这一基本模式。政府鼓励建房、修筑乡间道路、铺设自来水管道、普及教育。私营经济持续发展，使税收增加，从而改进了对穷人的服务。20 世纪 80、90 年代智利经济的成就，使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纷纷效法，进行类似的改革。1998 年开始的经济衰退，一直持续到 2003 年，对这一模式的切实可行性是个严峻的考验。

7. 增长

20 世纪 80、90 年代智利的经济增长率在拉丁美洲为最高者，而之前的 60、70 年代则是最低者。1990—1995 年，智利的国内生产总值，从 300 亿美元增加到 650 亿美元，增加了一倍多。而 1997 年则达到了 730 亿美元。2000 年智利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已超 5 000 美元，在拉丁美洲仅次于阿根廷，居第二位。20 世纪 80 年代智利外债数与年

度国内生产总值相等；90 年代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快于外债，外债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降到 1：0.5。这一增长主要源自新自由主义对出口的重视。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初，智利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2%，1996 年则占到了 20%。最引人注目的大概要算是领导者们使出口多样化的本领了。就在 20 世纪 70 年代，铜独占了智利出口的 80%。而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矿产品的出口额已降至总额的 45% 以下，而包括鱼粉、水果、纸浆、纸和化工产品等在内的其他货物上升到了 55% 以上。智利最大的贸易伙伴是欧盟，其后依次是美国、日本、阿根廷和巴西。这一着重出口的做法有其消极面：脆弱的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其他经济体 1998 年和 1999 年抑制了智利的经济增长，而 2001—2003 年美国和欧盟的经济衰退亦同样影响了智利经济的增长。

8. 就业与工资

智利同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一样，存在着就业问题。30 年来，就业人数与工资升降同步发展。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和 80 年代初就业人数减少时，工资亦随之下降。而 20 世纪 90 年代就业人数增加时，工资亦随之上升。另一重要的就业动向是女工所占比例上升。妇女占了工人总数的 1/3；但同大多数国家的实际情况一样，她们的平均工资要低于男性工人。尽管工资在性别和其他方面存在着差异，但 20 世纪 90 年代人均收入还是超过了 5 000 美元，家庭收入则逾 1.3 万美元。然而收入分配状况很糟，10% 收入最低的人口的收入仅占家庭总收入的 1.2%，而 10% 收入最高的人口的收入则占到了 41.3%。这一收入差距的结果是 20% 的智利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9. 交通运输

智利的交通和电网在拉丁美洲算是先进的，而过去的 10 年里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全国铁路网包括从阿里卡到蒙特港的大动脉以及北部地区为矿山服务、南方地区为农场服务的许多纵横交叉的支线。然而政府对铁路部门的补贴减少后，一些亏本的客车和支线停止了运营。例如，瓦尔帕莱索—门多萨客车不再运营了，再也不能乘坐从智利开

17
18

往阿根廷的火车观赏安第斯山的美景了。公路网代替了这条铁路和其他一些支线。完善的公交系统覆盖全国，公共汽车定时开往全国各地；城市公交系统常年为数百万乘客提供服务。圣地亚哥的现代化地铁各站点均装饰有艺术作品。地铁为前往城市许多地点的人们提供最为快捷的服务。空中交通中心是圣地亚哥的国内机场和国际机场，飞机定期飞往智利的其他22个机场。

10. 媒体

智利人渴望了解重大事件。每个街角都有报刊亭，人们驻足浏览最新事件报道的标题或买本喜爱的杂志。智利人乘坐公共汽车、地铁、飞机时爱看书。智利有多种全国性的日报，但大多是拉丁美洲发行最早的日报《信使报》出版发行的。中等城市有自己的报纸，像特穆科每天清晨都有《南方日报》面世。其他媒体也很重要。在这人口1 500万的国度里有500万台收音机、300万台电视机。有三家全国性电视广播网，各大城市还有有线电视，广播西班牙语和英语节目。风靡世界的手机同样也在智利盛行，1996年就有20万步手机在使用。电脑教育和使用十分普及，已列入学校基础课程。许多家庭和大多数企业已接上互联网。朋友间交换电子邮件地址就像交换电话号码那样方便。大学课程和图书馆目录等相关资料都可以在网上查到。智利大企业和政府部门均有网址，最近并装上了视频器。

11. 通货膨胀

可惜的是，智利的通货膨胀率是世界上最高者之一。19世纪末至1940年期间，通货膨胀率一直在5%和8%之间波动；20世纪50年代，平均近20%，1956年高达86%。20世纪60年代初采取了保守的货币政策，使通货膨胀率降了下来；可到60年代末又增至35%以上。阿连德执政的最后一年和军政府上台后的头几年里，通货膨胀率平均逾300%，1973年则猛增至600%以上。1975年采取了严厉的财政措施，使通货膨胀率降了下来；但其代价是20%的失业率和经济的急剧

19

紧缩。时至 1978 年，通货膨胀率降至 30%，其后的十年间一直在 20% 和 30% 之间波动。20 世纪 90 年代通货膨胀率跌至 4% 以下。智利终于控制住了通货膨胀，然而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对研究智利与通货膨胀较量状况感兴趣的人，可以参阅一些西班牙文和英文版的优秀学术著作。

五、政府

1. 1980 年宪法

军人上台后靠政令进行统治，直到 1980 年才实施新宪法。新宪法规定逐步向文官治国过渡，并规定军政府为过渡性的政权。奥古斯托 · 皮诺切特执政，军事执政委员会为顾问性的立法团体。1988 年皮诺切特在为其计划执政至 1997 年而举行的一次全民公决中败北。根据宪法规定，1989 年举行议会选举。议会未按传统惯例在圣地亚哥那新古典主义式的大厅里召开，而是改在了瓦尔帕莱索的一栋大楼里。由于行政和司法部门仍在首都，1980 年宪法也就真正体现了“分权”这一概念。

全国议会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参议院有 49 席：其中有 38 席是由直接选举产生的，任期 8 年，9 席是指定的，还有两个席位归前总统。众议院 120 个席位全部直接选举产生，任期 4 年。总统任期 6 年。里卡多 · 拉戈斯总统的任期从 2000—2006 年。总统设一内阁，由 19 名部长、总审计长和国家能源委员会主任组成。根据新宪法选出的第一位总统是帕特里西奥 · 艾尔文。他是基督教民主党的一位杰出领袖，总统任期 4 年，1990—1994 年。宪法规定总统任命各市市长和市议会成员，但不能撤换司法、军队和行政系统的成员。帕特里西奥 · 艾尔文曾想要修改宪法，但保守派封杀了他的计划。他的继任者爱德华多 · 弗雷 · R. 的修宪计划同样受挫，但却成功地对市政府和司法系统进行了变革。

宪法还规定组建全国安全委员会，由海、陆、空三军和警察部队司令以及总统和参、众两院议长组成。这一机构可以就安全问题向任

20

何一个政府部门提供建议，形成了一种强势机构，许多人认为这犹如实施军事监督。

2. 政党

智利像大多数欧洲国家一样，有着多党制传统。1980 年宪法用“赢者通吃”选举制取代先前的比例代表制。因此，大多数政党结成联盟提出为数不多的候选人与反对党竞选。那些没有参加联盟的政党身处极其不利的地位。然而在一些地区的竞选中，某人（他或她）如果特别有名，偶尔会击败联盟候选人。

现在六个政党和两个独立党派有代表任议员。另外两个政党——共产党和人道主义党——曾提出候选人参选，但未获成功。独立民主联盟在 2001 年的议会选举中赢得 25% 的选票，成了第一大党。这一保守政党原本与皮诺切特政府结成紧密同盟。同一次选举中的第二大党是基督教民主党。这一政党是持中间路线的自由主义政党，赢得了差不多 19% 的选票。这一百分比大大低于其 1993 年获得的 27% 和 1997 年的 23% 。

第三大党是温和的保守政党国家复兴党，2001 年赢得了 13.8% 的选票。国家复兴党原本强于比它更为保守的独立民主联盟，然而 1997 年以后则大为衰落了。第四大党争取民主党是从社会党分裂出来的一个派别，2001 年赢得 12.7% 的选票，与前两次议会选举的成绩差不多。而社会党则相反，2001 年赢得 10% 的选票，1993 年以来减少了差不多 2.5% 。共产党没有参加任何一个政党联盟，虽然获得了 5%—7% 的选票，但自 1989 年以来从未有党员当选进入议会。根据选举结果，激进社会民主党 2001 年只获得 4% 的选票，比共产党还少；但它参加了“各党一致否决联盟”，所以得到了 6 个议席。

2002 年智利议会以联盟和政党为基础组成的情况如下：

	参议院	众议院
“各党一致否决联盟”：总议席	20	62
基督教民主党（中间路线的自由主义政党）	12	23
争取民主党（自由主义左派政党）	3	20
社会党（自由主义左派政党）	5	10
激进社会民主党（自由主义政党）	0	6
独立派（自由主义派别）	0	3
“保卫智利同盟”：总议席	18	57
国家复兴党（保守政党）	6	18
独立民主联盟（保守政党）	9	31
独立派（保守派别）	3	8
“被指定者”：总议席	10	0
曾任公职者	9	0
终身议员	1	0
总计	48	120

3. 选举

“各党一致否决联盟”候选人里卡多·拉戈斯在1999年12月举行的总统选举中赢得了首轮选举，获得48%的选票，胜过获得47.5%选票的“保卫智利同盟”候选人华金·拉文。共产党候选人格拉迪斯·马林得票率仅为3.2%。第二次预选时，拉戈斯赢得51.3%的选票，超过得到48.7%选票的拉文，从而当选为总统。拉戈斯的险胜和保守政党联盟的强势表现与六年前的总统选举明显不同。1993年获胜的“各党一致否决联盟”候选人爱德华多·弗雷·R. 赢得58%的选票，而保守政党联盟候选人阿图罗·亚历山德里·B. 只得到24%的选票。凭借拉文1999年的强势表现和独立民主联盟2001年议会选举的好成绩，保守政党相信这一发展势头将使它们2006年赢得总统选举。由于1998年至2003年智利经济疲软，“各党一致否决联盟”要想挫败保守政党的挑战，就得在2006年之前使经济形势大大好转。

4. 联邦制

智利独立后不久曾想实行联邦制，但未能如愿。20 世纪 80 年代皮诺切特当政前，一直没有再认真考虑过联邦制。皮诺切特政权想实行私有化和权力分散，遂决定设立地区顾问委员会，由政府代表和私营企业代表组成。但皮特切特仍保留任命各大区最高行政长官区长的权力，他还指定各市市长和市议会成员；但艾尔文总统政府对宪法进行了修订，规定这些职位均由选举产生。1927 年全国警察与国民卫队合并，打那以后就没有了地方警察系统。而国民卫队 1973 年又成了武装部队的一个组成部分。

六、文化

1. 语言

智利人为了表达其爱国爱乡情怀，创造了自己的语言。他们用一种西班牙语和印第安语相混合的语言陈述和描绘他们所居住的那片土地。征服者们用西班牙的名字为他们在中央谷地建立的市镇命名，但也沿用了已有的马普切语的河名和山名。而南部地区的市镇通常使用马普切语命名，例如特穆科、隆科切。智利最著名的诗人巴勃罗·聂鲁达就生长在特穆科。他在日常会话中听、说这两种语言。这种语言的融合给了智利人创作上的自由，使他们有了自身的文学传统。

2. 音乐

智利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个诗、歌之乡。诗与歌的结合常见于乡村民间歌手的演唱；他们边拨弄吉他边随兴唱出抒情歌曲。“民乐会”是这一传统的变体。从这一音乐环境中兴起了由维奥莱塔·帕拉领导的新歌运动。她的许多歌曲，如《感谢生活》等在国内外被广为传唱。她的儿子安赫尔·帕拉和女儿伊莎贝尔·帕拉同维克托·哈拉一道用歌声对智利矿工、农民和渔民的生活和劳作境状提出抗议。他们的歌声激励着阿连德的支持者们，但他们在军政府时期受到了死亡威胁而流亡国外。帕拉斯、基拉帕伊云和印蒂伊利马尼等民乐队也流亡

他乡，他们在国外动员国际力量反对皮诺切特政权，而比较守旧的瓦索斯金切罗斯民乐队则留在智利竭力制造一种和谐假象。

智利的民间音乐传统虽然深厚，但古典音乐也有许多支持者。圣地亚哥有两家广播电台拥有一批本地区的爱好者，专门广播古典音乐。爱好声乐的传统凭借许多地区合唱团的演出和音乐节的举办，扶持着古典音乐的生存。圣地亚哥市剧院是国家交响乐团、歌剧团和芭蕾舞团的大本营。外国指挥和乐团的演出与国内乐团的上佳演出相辅相行。爱上剧院看演出的人有 20 多个剧团供选择。这些剧团演出先锋派戏剧和传统戏剧。

3. 博物馆

圣地亚哥和一些重要的地区中心城市均有历史博物馆。前哥伦布艺术博物馆、国家历史博物馆和圣地亚哥博物馆都陈列着展现智利过去景象的展品。圣弗朗西斯科教堂和国家大教堂都有陈列着智利宗教遗物的博物馆。国家档案馆和国家图书馆是国内外学者研究智利史的中心。美术馆以及许多私人画廊陈列着智利绘画和雕塑的精品之作。许多古玩店也使人们得以愉快地看到一些殖民地时期和 19 世纪的艺术品和装饰物。

4. 宗教

近 75% 的智利人是罗马天主教教徒，但并非都经常参加弥撒。然而，尽管许多教区礼拜日要举行两三次弥撒，一些参加者还是进不了教堂。智利有 5 个大主教区和 17 个主教区。红衣主教弗朗西斯科·哈维尔·埃拉苏里斯现在统领着圣地亚哥大主教辖区。在阿连德政府和皮诺切特政府时期那分化对立的年代里，教会内部也发生了分歧。像神工会和智利维护传统、家庭和财产协会这样的一些天主教保守团体批评教会对阿连德改革的明确支持。这些团体的代表人物欢迎军人统治，甚至担任了重要的政府职务。而教会内自由主义派则赞许阿连德的改革计划。阿连德被推翻后，他们支持红衣主教劳尔·席尔瓦·恩里克斯全力通过“教区牧师团结会”从事维护

人权活动。恢复民主前，教会一直在努力弥合保守派与自由主义派之间的分歧。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天主教一直是艺术和建筑的保护者。包括哥特式、罗马式、巴罗克式、新古典主义式、罗曼蒂克式和现代主义式等在内的欧洲风格均见诸智利的宗教艺术和建筑。北部地区罗马式的土坯建筑立于沙漠地带，犹如座座微型堡垒。移民社会从北到南修建了一些哥特式建筑，多为北欧风格，鲜见地中海风格。而中央谷地则多为文艺复兴时期风格和新古典主义风格，但在圣地亚哥郊区和各地区首府则常见现代主义式的宗教建筑，至为引人注目。

智利独立后，大批商人涌入瓦尔帕莱索，随之而至的是一些传统的新教教会团体。最先到达智利的是英国圣公会，后来在马普切人中从事传教活动。跟随德国移民而来的是路德派教会，他们在南部地区扎下了根。卫理会和浸礼会先后在圣地亚哥和特穆科办学，主要目的是使智利人皈依本会，而不是为移民提供服务。近数十年来，五旬节派教会和摩门教教会积极在智利全境传播其教义，在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中吸收到了许多皈依者。圣地亚哥有少数犹太教教徒、俄罗斯正教教徒和阿拉伯正教教徒。居住在彭塔阿雷纳斯的斯拉夫人也信奉正教。中东移民通常大多是天主教教徒和正教教徒，而不是伊斯兰教信徒。

5. 手工艺传统

近数十年来，智利发扬了其手工艺传统。圣地亚哥多明我会修道院前、阿拉梅达大街和奥希金斯公园里的露天集市展销着各色各样的珠宝首饰、陶瓷制品、金属制品、编织品和木制品。有兴趣可以走访一下圣地亚哥和特穆科的大众市场，那儿有实用工艺品和专为游客制作的工艺品一同出售。圣地亚哥以西的小镇波马伊雷是个陶工之乡，制造、销售实用陶制器皿和装饰用陶器制品。智利境内到处都可以买到铜器制品，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这种浅红色的金属可以制成形形色色的工艺品。

6. 休闲娱乐

智利人喜欢周末和夏日旅游时实地欣赏一下祖国大地。有钱人在海滨建有别墅或在南部湖区建有孟加拉式小平房。钱少的人租用海滩小木屋，使自己逃离城市喧嚣。夏季水上运动深受人们喜爱，冬天滑雪胜地吸引着智利人和外国游客。安第斯山森林公园最适合徒步旅行、登山运动。许多族群和专业团体均有运动俱乐部，提供场地打网球、游泳、踢足球和跑步。智利的世界级网球运动员均出身于这些俱乐部。大城市有职业足球队和业余足球队。在全国各街头巷尾都可看到一些未来的球星在表演其带球、射门的技艺。每当世界杯足球赛有智利队出场，全国一切活动暂停，人人静心观战。

第二章　智利人的来源（500—1750）

27　诗人巴勃罗·聂鲁达说过，智利人是“宇宙族”人。正如吸力和斥力构成了宇宙那样，相同的力道将来自不同大陆的人们融和进了智利社会。然而人们要找到智利也并非易事。智利坐落在南美西海岸太平洋与安第斯山之间的一条狭长地带。诚如智利人所言，那是个“偏远荒凉的地方”。人类起初沿海岸南下，穿越阿塔卡马沙漠这一世界上最为干旱的地方。他们逐水而居，形成群落。群落发展成村庄后，引来了外地人。首先是印卡人，他们15世纪到了这里；而后是西班牙人，他们16世纪接踵而至。这两拨儿人马先后征服了这些村庄，实行强制劳役制，征召当地劳力。然而南边的村民们进行了顽强抵抗，迫使征服者们不得不认可他们的独立地位。

英国史学家查尔斯·博克塞说：殖民地时期智利是“西班牙帝国的穷乡僻壤”。那些长途跋涉抵达智利的西班牙人通常不是为了征服而来，而是为了开发一片庄园或一座矿山。智利独立后，新来了一批移民，他们为贸易和工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数百年来不断有外乡人移居智利，他们共同缔造了智利这一“宇宙族”。这一族群虽然28　冲突不断，但在不断的冲突中又逐渐形成了一种谦恭礼让的传统。这一传统现如今已成为民主社会的基础。

一、原始居民

智利历史上，人类及其文化多半是由北向南迁移扩散的。考古学家们难以确定人类最早沿南美西海岸向南迁移的时间，他们没有发现什么能够用以证实古代人类迁移的旧石器时代遗址。用碳—14 年代测定法测定的一些年代推断，人类早在 3.3 万年前即在智利南部从事狩猎采集活动，然而这一推断颇具争议。比较可靠的年代得自瓦尔迪维亚附近的蒙特维尔德遗址。用碳—14 年代测定法对那里出土的乳齿象骨、武器和灶床所做的检测表明，1.3 万年前那儿曾有人居住过。考古学家们在经过仔细认真的调查研究后证实：大约 1 500 年前已有相当数量的人口活动在智利大地上。

同厄瓜多尔和秘鲁的人口定居方式类似，智利北部的原始居民集群定居在河流盆地，安第斯山上积雪融化后注入河流。一些人定居在海产品丰盛的太平洋沿岸地区，而其他人则在内陆地区过着狩猎采集生活。这些人起初居无定所，追逐羊驼，采集野果；秘鲁传来农耕文化后，他们开始定居下来。他们用石块搭建房舍，有时也建筑防御堡垒。大约公元 600—1000 年间，蒂亚瓦纳科文明在秘鲁高原地区兴起，通过交易和征服活动将制陶、纺织和建筑技术传给了智利北部的迪亚吉塔人。蒂亚瓦纳科人还带来了马铃薯、玉米、菜豆、辣椒和棉花。这一高度发达的秘鲁文明衰落后，过了 400 余年，印卡帝国才扩张至智利境内。

二、马普切人

印卡人第一次想要征服智利时，马普切人居住在中央谷地和智利南部地区。他们也被称为阿劳坎人，生活在类似于加利福尼亚北部和西北部太平洋沿岸地区的自然环境里。长达九个月的雨季，加上凉飕飕的气温，致使河谷地带森林密布、湿地沼泽面积广阔。马普切人虽然生活在一个地形和气候方面均类似于俄勒冈、华盛顿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地区，但有着 50 万—70 万的人口，差不多是西北部太平洋

沿岸地区人口的五倍。[1] 由于猎物为数有限，务农而非狩猎成了首选职业。马普切人通常种植马铃薯、菜豆、葫芦、辣椒和玉米。他们用这些原料熬玉米粥、烙玉米饼、制作各种各样的菜肴和食品。他们还酿造奇恰酒（用野果或玉米发酵酿制的汁儿）。沿海地区的马普切人以捕鱼为生，而生活在安第斯山区的马普切人则采集大量阿劳坎松果。他们饲养羊驼，主要是要用羊驼毛。生活在安第斯山西边的马普切人猎捕野兔和小鹿；而安第斯山东边干旱，生活在那里的马普切人用套索[2]猎捕野羊驼和美洲鸵鸟。他们搭建茅草屋，睡在羊驼皮上，在另一称之为“灶屋”的茅舍里做饭烧菜。在那漫长的雨季里，家人和朋友围坐在“灶屋”内聊天、吃松果。他们在迎接种植季节和欢庆战斗胜利时，在“灶屋”里奏乐、跳舞、畅饮奇恰酒。

马普切人组成氏族或部落，战时结盟。生活在毛莱河地区的北部诸氏族，统称为皮昆切人。维利切人生活在毛莱河南岸至瓦尔迪维亚地区，佩文切人生活在安第斯山西边，普埃尔切人则生活在安第斯山东边。[3] 氏族相互进行交易，但也相互偷袭。这些氏族由于居住在不同地区，各自为政，似乎难以团结一致抗击共同的敌人。然而他们却像北美的易洛魁人那样团结一致抗击了共同的敌人。印卡人两次出击均未打垮马普切人。西班牙人虽然一时制服了他们，但他们不断反抗，成功地捍卫了本身的自治权，长达 250 余年。西班牙殖民统治期间与

---

① 对智利美洲土著人口数的估计大多是根据西班牙人的观察报告；而由于种种原因，西班牙的观察家们往往言过其实。例如，佩德罗·德·瓦尔迪维亚写道：他在墨西哥的朋友们就认为智利的印第安人比较多。诚然，马普切人广泛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也的确是供养了比西北部太平洋沿岸地区要多的人口。

② 从秘鲁到巴塔哥尼亚最南端的美洲土著都使用这种武器。这种武器为一条粗皮带上绑着两根或三根细皮条，每根细皮条系块磨制的石子。猎人将石子举过头旋转连带整个皮带抛向逃跑的猎物腿部；猎物若被击中，皮带即缠住其腿，令其止步不前；猎人随后可将其赶回家或当场将其宰杀。西班牙人将养牛业引入阿根廷后，高乔人借用了这一武器，放弃了原先的绳索。而智利的牛仔却不再使用这一武器，大概是怕抛得不好会重伤牛只。

③ 马普切语中的“切”是“人”的意思。“切”的前缀意思如下：“马普” = 土地，“皮昆” = 北方，“维利” = 南方，“佩文” = 松树，“普埃尔” = 东方。这些词有时用着引申义，如“普埃尔切”一词原意“东方人”，但也有“东风”的意思；这同西北部太平洋地区的“奇努克”一词含有“人”和“风”这两重意思一样。

氏族的结盟时断时续。某一氏族可能与西班牙人结盟，在某一特定的军事行动中为西班牙人而战。过后爆发全民总起义时，这些“友好的印第安人”又会参加起义行动。鉴于这种结盟的不稳定性，一些西班牙都统认为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实行绝对统治；而另外一些人则想通过谈判签订和平协定解决问题。

巴塔哥尼亚地区南端生活着另外四个族群，即乔诺人、阿拉卡卢夫人、雅甘人和奥纳人。前三个族群生活在近海地区，食物多半为海产品。他们用树皮制成小船，可以乘坐五六个人和他们的狗。而奥纳人则主要在火地岛地区猎捕各种动物。这四个族群的人都用兽皮制衣裹体。早期的一些欧洲评论家们认为这种兽皮成衣似乎很难御寒。他们人口很少，地广人稀。欧洲人来到这里以后，他们极易受欧洲习俗影响、感染欧洲疾病，以至于生存成了大问题。

30

1470 年前后，印卡人开始侵吞并征服了智利北部河谷地带的各族群。中央谷地的各氏族也落入他们之手，但他们在毛莱河以南遇到了顽强的抵抗。茂密的丛林、马普切人的团结善战，使他们未能得逞。马普切人发展了与印卡人的贸易关系，用黄金和原材料交换印卡人的手工制品。他们也学会了印卡人的手工技艺（特别是纺织技术）。

毛莱河以北被征服的人们有了与其毛莱河以南独立的同胞极为不同的社会制度。印卡人强制推行官僚行政等级制。他们迁移来秘鲁阿雷基帕地方的人，而易地重新安置当地人。他们强迫当地人种地、开矿。这种统治手段使当地人适应了新的劳动制度，一个世纪后西班牙人又将这一劳动制度强加于他们。

三、欧洲人的早期探险活动

西班牙人 16 世纪开始在南美探险时，从南方和北方同时向智利进发。费迪南·麦哲伦从最南端向智利靠近，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海峡一带进行探险活动。他开始在美洲探险时勘察了巴西和阿根廷海岸，1520 年 11 月进入美洲大陆南端变化莫测、充满危险的狂风洋流地带。他是第一个见到火地岛和安第斯山冰流直泻进太平洋情景的欧洲人。

然而他关注的是亚洲，而不是智利海岸。他如果知道有个印卡帝国的话，肯定要更加关注西海岸的。可他认为美洲大陆妨碍了享用亚洲财富的机会，而不知道美洲本身所具有的价值。麦哲伦解决了美洲与亚洲间的距离难题，给他带来了荣誉。他完成了哥伦布的未竟之业，发现了向西前往亚洲的通道。然而西班牙人并没有利用他发现的海峡，认为那儿太危险。他们选择走陆路途经墨西哥和巴拿马运输来自亚洲和太平洋沿岸的货物。

第二个到智利进行活动的探险队来自北方，由迭戈·德·阿尔马格罗率领。他曾协助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征服了印卡帝国，从而开始了其探险生涯。他听说庞大的印卡帝国还包括智利这一属地时，就决定前往探险并将其征服。他率领的探险队里有一些皮萨罗没有授予其委托监护权和印卡仆役的西班牙人和两名充当派往附属部落使者的印卡贵族。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支持这一探险活动，下诏特许阿尔马格罗到称之为新托莱多的领地——从秘鲁南部地区延伸至智利中部地区——进行探险活动、将其征服并对之进行治理。

印卡人劝阿尔马格罗不要走智利北部极其荒凉的沙漠地带，对他说那儿没有什么食物可供其人、马。因此他决定穿过今玻利维亚和今阿根廷北部地区，而后翻越安第斯山进入智利，到达现在的科皮亚波地界。一路走来麻烦不断，损失惨重。印第安人心怀敌意，山洪暴发，白雪盖地，探险队的人员伤亡十之八九。许多印第安人背夫逃离，还有一些人冻、饿而亡。他和一些活下来的人历经千难万险到了科皮亚波，再往南都是河谷地带，沿途不时遇到印第安人村寨，走起来就容易多了。他到印第安人村寨抢吃的，强迫印第安人替他干活，此种行径为后来的西班牙探险者们种下了仇恨。他发现阿空卡瓜河谷和马波乔河谷地带的自然环境堪比西班牙最好的地界，便派人继续往南探察。可这些人倒霉透了，碰上了暴风骤雨和怀有敌意的马普切人。他们被迫回头，未能见到伊塔塔河以南的肥沃土地。

阿尔马格罗在智利没有发现他在秘鲁见到过的镀金庙宇。一些马普切人为了向印卡人纳贡曾开采过金矿。历史学家们认为阿尔马格罗

可能没有到过这些矿区。[①] 然而智利那肥美的河谷地带给了阿尔马格罗深刻的印象。他想在此建立殖民地，但他的手下人却急于寻找贵金属，想要带财宝回家，不想在这遥远的南美地区定居。阿尔马格罗迫于他们的压力决定向北返回。他没有走原路，而是决定冒险穿越阿塔卡马沙漠地带。他和手下人一路上再次历尽磨难，回到秘鲁时两手空空，不禁深自怨艾。他和手下人向皮萨罗提出分享印卡帝国财富的要求，被皮萨罗一口回绝，内战随之爆发。皮萨罗在佩德罗·德·瓦尔迪维亚的协助下，打败了阿尔马格罗，并将其处决。

现在看来，阿尔马格罗智利之行的意义是多方面的。他提供了有关安第斯山两边地理状况的第一手资料。他记录了印第安人定居谷地的情况、他们生产的东西、他们可以为西班牙人殖民时提供的物品和劳力。不幸的是，他强抢食物、强征劳力的行为向智利原住民传递了一种残暴信息。他还发现：从科皮亚波向南草木渐次繁茂、增多；阿空卡瓜谷地和马波乔谷地可以发展农业和养牛业。虽然当时大多数西班牙人不愿在智利扎根，但后来其他一些西班牙人认识到了智利的潜在价值。 32

四、佩德罗·德·瓦尔迪维亚

由于阿尔马格罗犯上，皮萨罗宣称他的子嗣已失去承继新托莱多的权利。而为了报答他忠实的朋友佩德罗·德·瓦尔迪维亚，皮萨罗在没有征得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同意的情况下，就下达特许状让其征服智利，开拓殖民地。由于阿尔马格罗的探险活动历经磨难，瓦尔迪维亚很难招到志愿入伙者，最后只有为数不多的人跟他一起上路。他们没有走玻利维亚那一路，而是沿海岸向南进发。印第安人对他们很冷漠，甚至怀有敌意，这是可以理解的。

瓦尔迪维亚选定马波乔谷地为建立第一个定居点的地址，命名为

---

① 许多历史学家着重叙述了阿尔马格罗及其手下人没有在智利找到黄金时的失望情绪；然而肯定有某些可靠的信息使佩德罗·德·瓦尔迪维亚认为：智利拥有十分可观的财富，值得再次进行探险活动。而索托和科罗纳多两人的远征由于未发现黄金，就没有使征服者们再次到他们探察过的地方走一走。

圣地亚哥—德—新埃斯特雷马杜拉[①]。马波乔河里有淡水可供饮用，河边有天然形成的悬崖可设了望哨。他举行了奠基仪式，表明西班牙和他本人对这块土地拥有合法的所有权。而后他沿用其他西班牙人为了使自己的权力更具合法性而实行过的程序，先选人组成市政会，市政会再选举他为都统。

瓦尔迪维亚根据西班牙国王的规定，将城市规划成棋盘状。他将中心广场设在离河数街区远的地方，大教堂设在广场西侧，政府大楼设在广场北侧。他将城中各街区划分成四份房地产，后来又分成八份。殖民者们接着开始建造临时住房，土坯垒墙，茅草盖顶，十分简陋。早先受过虐待的印第安人不断对他们进行骚扰。当地印第安族群不愿看到外人入侵他们的土地，数月后对这一尚未安排就绪的殖民点发动攻击，差点儿将其完全摧毁。殖民者们誓死为生存而战，就连瓦尔迪维亚的老婆也操剑投入了战斗。战斗平息后，殖民者们一天 24 小时处于戒备状态。他们第二年种植小麦、燕麦和玉米时，也在田间地头来回守卫。

瓦尔迪维亚开始进一步的探险活动。他要搜寻印卡人从智利弄到的财宝：黄金和印第安人劳动力。由于西班牙人已征服了秘鲁，瓦尔迪维亚及其一伙认为他们有权享有这两种财宝。在瓦尔帕莱索以北离海岸不远的地方有个印第安人向他指出了马加马加金矿所在的位置，马普切人曾为印卡人开采过这一金矿。瓦尔迪维亚实施委托监护制，征调印第安人开采金矿，不出数月就生产出了价值 7 000 比索的黄金，其后的六年间生产出的黄金价值达 23 万比索。瓦尔迪维亚不久又发现了其他一些金矿，根据委托监护制征调更多的印第安人从事开采活动。即使在冬季，他也不分男女强迫印第安人用淘选盘在河里淘金。失却自由的印第安人，受苦受累，不断有人死亡，从而在所有印第安族群里引起了强烈的怨恨情绪。瓦尔迪维亚偏爱黄金，使他忽略了农业商品化的潜在价值。他引进了谷物和牛，专供西班牙人食用，却没有开发其潜在的商业价值。而他的后继者们则发现了智利农业的潜在价值。

① 即今圣地亚哥。——译者注

五、征服马普切人

瓦尔迪维亚志在进入马普切人的领地开采黄金。16 世纪 50 年代初，他率队进入毛莱河以南地区。他不清楚印卡人先前在这一类似的行动中被打败的原因。他以为凭借西班牙人在军事上的优势可以轻易地打败马普切人，而他的确是未费多大的劲儿就征服了马普切人，这似乎又证实了他的想法。他在这一丛林密布、湿地连片的地区兴建了一些设防的城镇，各城镇间距一天多路程。[①] 而后他推行委托监护制，强行将印第安人委托给他的部下进行监护，以此作为对手下的奖赏。他的部下发现黄金矿藏后，就役使委托给他们监护的印第安人开采。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规定印第安人的贡赋是实物而不是劳动。瓦尔迪维亚的做法显然是违背了国王的旨意，他的部下就更不管那一套了。

马普切人务农、尚武，不习惯干这种采矿苦差事，加之殖民者对马普切妇女的性侵扰和虐待，激起了他们的愤怒。他们用心学习西班牙人的战术行动，伺机作乱。一些年轻的马普切人充当西班牙人的马夫，学会了骑马，有些人甚至敢于盗马走人。马普切人从而开始组建他们自己的骑兵队，不久即成了身手矫捷的骑手。他们尽管穿戴的是皮盔甲而不是铁盔甲，可依然是令人生畏的敌手。他们精湛的骑术，加上对丛林地形的有效利用，使他们得以成功伏击西班牙人的巡逻队和殖民点。

六、马普切人的反抗

瓦尔迪维亚原来的一个名叫劳塔罗的小听差，领导他的人民举行总起义。1553 年 12 月，他指挥部队袭击图卡佩尔要塞，将其烧毁夷为平地，杀了要塞里所有的西班牙士兵。瓦尔迪维亚听到这一屠杀消息后，立即带兵征讨作乱者，但他那一小队骑兵不是劳塔罗部队的对

34

① 他兴建了下列城镇：康塞普西翁（1550）、因佩里亚尔（1551）、瓦尔迪维亚（1552）、比利亚里卡（1552）和安戈尔（1553）。他在同一时期还在阿劳科、图卡佩尔和普伦修筑了要塞。

手。马普切军队逮住了瓦尔迪维亚，并将其处死。幸免于难的西班牙人没有留下有关那次大灾难的任何文字，却衍生出了智利民间传说中的一些广为流传的传奇故事。这些故事往往着重描述处死瓦尔迪维亚的令人发指而未必真实的方式方法。一种说法是：逮住他的人用熔化了的黄金灌入他的喉咙，以消除他对贵金属的渴求；另一种说法是：瓦尔迪维亚落得了以命抵命的下场。这一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说：逮住他的人砍下他的双臂，当着他的面将其生啖。讲述这些故事的人很少表示对受害人的怜悯之情。他们视马普切人而非瓦尔迪维亚为受害者，将复仇等同于社会正义。

劳塔罗领导的起义使马普切各族群团结一致为将西班牙人逐出其家园而战。殖民者们很快意识到他们的生命受到了威胁，随即放弃了一些南方的城镇和要塞。与此同时，殖民军的将领们明争暗斗，都想坐上都统交椅、弗朗西斯科·德·比利亚格拉临时出头主事。他组织发起反攻，打死了劳塔罗，从而保住了圣地亚哥，或者可以说挽救了整个殖民地。马普切人的首领死后，起义队伍瓦解，西班牙殖民者重又回到他们原来的城镇。他们很快就召回受委托监护的印第安人，让其重新干活，他们认为自己又重新控制了马普切人的领地。

七、新领导

弗朗西斯科·德·比利亚格拉认为国王应该对他保住殖民地表示谢意，任命他为都统。但他错了。就殖民地政府官职而言，功劳的重要性比起政治影响和家族关系来要小得多。秘鲁总督任命他的儿子加西亚·乌尔塔多·德·门多萨为智利都统。乌尔塔多·德·门多萨的社会出身与征服者们完全不同。征服者们是平民出身，凭着顽强的意志力赢得了荣誉；而他属于西班牙贵族阶层。他除了这一贵族身份的影响外，还带有一批律师、教士和忠实的士兵。他一到智利就逮捕了比利亚格拉和另一名征服者弗朗西斯科·德·阿吉雷，为其新政权抹上了一层严酷色彩。他要求瓦尔迪维亚的老部下必须在言谈举止上像西班牙贵族那样听从命令。这些老兵以为他们征服了智利并享有委托

监护权，社会地位已然上升；然而新都统却提醒他们别忘了自己卑微的社会出身。

加西亚·乌尔塔多·德·门多萨也带来了一种崭新的征服和扩张理念。首先，他鼓励西班牙人到安第斯山东边去开拓殖民地。他的助手在库约地区兴建了门多萨和圣胡安。18 世纪 70 年代以前，库约地区一直归智利管辖。其次，他挥师向南挺进，兴建奥索尔诺镇，勘察了奇洛埃岛。他的行动未受到印第安人的强烈反对，自以为西班牙人又控制住了马普切人。再次，他推动对智利海岸线的勘察，向南一直到麦哲伦海峡。他为了奖赏自己的追随者，褫夺了许多早期征服者享有的委托监护权，分配给其下属。这会儿决定委托监护权的归属和社会地位的，是政治影响而非早先的功绩。

这位都统制订了一系列条例，规定善待印第安人，以示自己的公正。他意欲执行西班牙国王抑制委托监护制弊端的谕旨，要他的法律顾问埃尔南多·德·桑蒂延起草一份劳动禁令条例。1559 年宣布的这份条例禁止使用女工、童工，规定向所有劳工提供食物、发放工资、然而委托监护主们很少在意这些规定。20 年后的都统马丁·鲁伊斯·德·甘博亚采取激进措施，根除强迫劳动，代之以纳税。这一改革同先前的条例一样，难以实现西班牙人实行自由人的劳动和使马普切人免受虐待的愿望。17、18 世纪期间，历任都统在解决这一问题时面临着同样的难题。

就在乌尔塔多·德·门多萨不断向马普切人的领地推进的时候，马普切人的新领袖考波利坎在康塞普西翁附近发动了起义。起初他获得了胜利，但西班牙人在一次突袭中逮住了他，将他钉在尖桩上，为被杀害的西班牙人报仇。考波利坎的战斗虽然失败了，但他的名字却因一部智利史诗《阿劳坎之战》而永垂不朽。史诗作者阿隆索·德·埃尔西利亚是一位士兵诗人，他参加过与马普切人的战斗，决定用诗赞颂马普切人的领袖。埃尔西利亚视西班牙—马普切之战为新大陆式的特洛伊战争。他认为佩德罗·德·瓦尔迪维亚、乌尔塔多·德·门多萨与劳塔罗和考波利坎就好比是《伊利亚特》中的英雄人物。他的

诗作并未真实地描绘西班牙人和马普切人，但他所描绘的冲突场面激动人心，诗意盎然，使得诗作成了智利特性形成的重要源泉。

加西亚·乌尔塔多·德·门多萨执政期间在谋求其自身利益和西班牙国王利益时的所作所为并不高尚。失去委托监护权和其他特权的老一辈征服者们忿忿不平，向西班牙国王和西印度院提出控告。他们一面递诉状，一面派人提申诉。值得注意的是：西班牙国王精于利用这些联络方式了解情况、维护其自身在这方领地上的利益。控告乌尔塔多·德·门多萨的诉状和人员越来越多，西班牙国王于是将他免职，任命老一辈征服者弗朗西斯科·德·比利亚格拉为都统。比利亚格拉上任时正赶上又爆发了新一轮的马普切人大起义。两年后比利亚格拉自然死亡，起义的马普切人依然活跃，开始了一段政治不稳定的时期。1567年，西班牙国王创设了一个新统治机构“检审庭”，行使司法职权，试图解决问题。

西班牙国王为了确保自己的影响力，挑选任命不同类型的行政官员，以防一方独揽大权。马普切人的起义造成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即殖民地的领导层平民化起来。在像秘鲁和墨西哥这样一些风平浪静的殖民地，西班牙国王喜欢从西班牙贵族中挑选官员；而在智利，他通常挑选军人担任行政官员。这些老兵虽然社会地位低下，但西班牙国王认为他们更有击败马普切人的能力。

马普切人起义造成的另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悲剧性结果是：他们的起义成了殖民者奴役印第安人的口实，成了殖民军收入的重要来源。西班牙国王起初是禁止奴役印第安人的，而马普切人猛烈而长久的反抗使他修改了政策。1608年，他下诏准许奴役智利的印第安人叛逆者。这一诏书为此后两个世纪里对印第安人施虐开了方便之门。诏书虽然禁止奴役妇女和儿童，但被奴役的大部分印第安人却正是妇女和儿童，因为他们更容易被抓获。西班牙士兵出击的目的往往就是为了抓俘虏，而不是要打败马普切人。由于逮住一个印第安人可以得到300比索的奖赏，每次突袭马普切人领地的行动差不多都要赏出数千比索。这种营生在后来发展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有位名叫罗德里

戈·德·基罗加的都统为了抓俘虏，甚至攻击那些反对闹事的印第安人。他及其继任者们将俘虏卖给庄园主和矿主——为他们服劳役的印第安人已死亡或已逃跑。有些都统甚至将俘虏卖到秘鲁。猎奴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军事行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就连那些“友好的”印第安人也捕捉其他印第安人而将其卖为奴隶。一些马普切人被卖身为奴后会逃跑，设法跑回家。为防止奴隶逃跑，奴隶主甚至会割断其一条腿的脚筋，使其只能一瘸一拐地走路，再也不能跑了。当然，比这更为残忍的虐待手段也不鲜见。

八、新冲突

16 世纪末，马普切人极欲将西班牙人赶出其领地。1598 年，他们伏击并杀死了正在南部地区巡视的都统马丁·加西亚·奥涅斯·德·洛约拉和 50 名西班牙士兵。在其后的 5 年里，他们在整个南部地区发动了起义。他们也侵扰与占领城镇，有时是西班牙人因惊恐而弃城逃亡。他们在占领城镇后，往往处死所有男丁，而将妇女和儿童分给各家各户。有种估计认为：仅在两年的时间里，马普切人就杀死了 700 名西班牙士兵，抓走了 300 名妇女和儿童，掠走了 1 万匹马、50 万头牛。马普切斗士视西班牙妇女为战利品，教她们马普切语及其习俗。西班牙人如果无法将她们救出，就会发现她们已习惯于马普切人的生活方式，许多人不愿再回家了。

37

马普切人不仅壮大了他们的骑兵队伍，也完全掌握了打伏击的战术。他们将西班牙人诱至山坡，往往只留一条逃生之路。马普切人的步兵用绳套套住西班牙人的脖子，将其拉下马并在他们爬起来前对他们进行攻击。马普切军队的第一梯队如果被打退，预备队就会不断发起攻击，直至西班牙人被打垮。另一战术是在西班牙人必经之路挖坑，将削尖的木棍插入坑内，伪装好。西班牙人的马匹一脚踏空，栽倒在地，非死即伤，骑手措手不及，极易被马普切斗士捕获。马普切斗士也将缴获来的西班牙武器同他们的长矛和木棒一起使用。为了进一步引起西班牙人的恐慌，他们用被打死的西班牙士兵的骨头制成风笛和

鼓槌，进攻时制造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嘈杂喧闹刺耳声浪。他们往往处死俘虏，啖其心，将其头颅制成酒碗。

这种心理战加上创新的战术手段，使马普切人彻底消除了西班牙人的军事优势。17 世纪，西班牙人眼看自己由胜利走向了失败，羞愧难当，于是恳求西班牙国王派军队增援。整个殖民地一片恐慌，人们都准备离开智利奔走他乡了。为了稳定人心，都统阿隆索·德·里贝拉在比奥比奥河北岸构筑了防御工事，但他企图重新征服南部地区时惨遭失败。智利的失败消息传到西班牙的西印度院时，引起人们对殖民地的担忧。

除马普切人的起义外，欧洲敌国也攻击智利。英国海盗理查德·霍金斯和巴塞洛缪·夏普突袭海滨城镇瓦尔帕莱索和拉塞雷纳。与此同时，荷兰人又试图在智利南部地区建立永久性殖民地，这是荷兰西印度公司欲在其已于巴西北部地区和哈得孙河流域建立了殖民地的同时再到智利建立殖民地的总体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为实现这一目标，1643 年荷兰人劫持航行在智利沿海的船只，占领奇洛埃岛，通过谈判同马普切人结盟。然而健康问题和食品短缺使他们放弃了在智利建立殖民地的计划。

38

为应付这来自多方面的威胁，西班牙国王决定组建一支正规军。跟在大多数殖民地的做法一样，西班牙国王以往在智利靠的是比较省钱的当地民团。有了正规雇用军，庄园主和矿主们就解脱了，再也不用出人、出钱了。然而智利的税收难以支撑这笔新开支，因此西班牙国王不得不每年从秘鲁调拨 12 万杜卡多的特殊补助金，用以供养这 1 500人的部队。这支部队人数似乎不多，但对殖民地智利来说就不少了。像秘鲁和新西班牙这样的一些比较富庶的殖民地，也全都是靠民团自卫的。几年下来，这支部队也未能降伏马普切人，致使西班牙国王不得不寻求其他解决问题的办法。

九、传教活动

天主教会提出了自己的解决办法。教会也关注马普切人的起义，

但关注的原因不同。从在加勒比海岛屿进行殖民活动开始，教会就确定了其在美洲的使命是使土著皈依基督教。教士们跟随征服者到了墨西哥和秘鲁，为数百万刚被征服的土著施行了洗礼。教士们亲眼目睹了这些新教徒所遭受的残酷剥削，因此向那些征服者和委托监护主发出威胁，要将其逐出教会。像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神父这样的一些极力保卫印第安人的宗教人士将这一情况向西班牙国王作了报告，恳求他对使用土著劳力严加管束。

其实，到智利的第一批教士不赞同拉斯卡萨斯的正义观、体恤情，因而并不反对佩德罗·德·瓦尔迪维亚对印第安人的征服和虐待。直到瓦尔迪维亚死后，多明我会的希尔·贡萨莱斯神父才宣称，瓦尔迪维亚向印第安人发动了一场非正义的战争。他说那些追随瓦尔迪维亚行事的士兵们将万劫不复，将受罚下地狱。智利南部地区的第一位主教方济各会的安东尼奥·德·圣米格尔神父支持这一说法。他拒绝听取与印第安人作战的西班牙士兵的忏悔，拒绝赦免他们的罪过。这种说法和做法显然有违军事首领和委托监护主们的意愿的，因为他们的财富得靠对印第安劳力的剥削。结果是他们成功地制止了教士们维护社会正义的运动。

十、“防御战”

1593年耶稣会到智利后，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耶稣会最重要的领导人是一位名叫路易斯·德·瓦尔迪维亚、但与佩德罗·德·瓦尔迪维亚没有亲戚关系的神父。他认为马普切人的起义完全是他们受剥削的结果。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实行一种称之为“防御战”的极端政策，即要所有的西班牙人撤出马普切人的领地。他提出，只允许负责使马普切人皈依基督教的耶稣会士进入那一地区。军人和委托监护主们坚决反对他的政策，但路易斯·德·瓦尔迪维亚和耶稣会对西班牙国王进行游说，成功地使他批准了这一政策。

39

耶稣会曾说服西班牙国王在巴拉圭实施相同的政策，开始时事情进行得很顺利。智利的情况则不一样。耶稣会士们所面对的，不仅是

智利半个世纪以来的战争状态和互不信任，还有那从战争中获利的既定集团。军事首领们靠出售俘获的印第安人奴隶增加自己的收入，而庄园主和矿主则想得到更多的劳工。一些马普切人也从偷盗西班牙人庄园的东西中得到好处。耶稣会士们怎么能改变这一状况呢？这场防御战尚未开展，就发生了一场大悲剧。有种说法是：马普切人酋长安加纳蒙的妻子皈依基督教后住进传教区，不想再回到她丈夫身边了。这位愤怒的酋长和一些斗士出于报复攻击当时正在埃利库拉附近布道的三名耶稣会传教士。他们杀了传教士后，策马向北越过瓦尔迪维亚设置的防线，劫掠西班牙人的殖民点。

大多数西班牙人都反对防御战，因此对他们说来，埃利库拉惨案就是耶稣会士的政策根本行不通的明证。他们恳求西班牙国王让军队来解决印第安人问题。其他教派和在俗教士也以不同的理由宣布反对防御政策。他们反对由耶稣会一家垄断马普切人地区的传教活动。在防御战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的情况下，路易斯·德·瓦尔迪维亚认为他得回西班牙进行辩护。然而他未能如愿。两年后上任的新都统佩德罗·奥索雷斯·德·乌略亚与马普切人全面开战。乌略亚为自己采取行动提出的理由是，马普切人杀害了400个西班牙人、偷盗了2 500匹马、放跑了1 500名劳工。他还声称，有46名西班牙士兵开小差逃到马普切人那里正向他们提供帮助。为了提高部队的士气和向庄园主和矿主提供更多的劳力，乌略亚决定让士兵们迫使所有在战斗中被俘的马普切人成为奴隶，并可以出手倒卖。

17世纪20年代提出的耶稣会和平计划似乎已无效用，然而这一计划的一些精神仍不时有所体现。例如，17世纪40年代，白德斯侯爵出任都统伊始即承认马普切人在南部地区的自主权。他邀请他们的首领到基林会谈，并做出了友好姿态，向每位与会者赠送了礼品。双方达成和平协议，并用葡萄酒和奇恰酒共同举杯庆贺，而后举行了一次烤肉野餐，以歌、舞助兴。遗憾的是这一和平协议跟前几次一样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但开创了举行议事会、互赠礼品和举行庆祝活动这一传统做法，领袖人物以此通过谈判解决敌对问题。

40

十一、被俘者的生活

马普切战争产生了许多历史故事，其中就有被俘的西班牙军官弗朗西斯科·努涅斯·德·皮内达·伊·巴斯库尼安的故事。他1629年被俘，成了一名马普切人酋长的仆人。后来他在《被俘生活与智利长期战争的原由》一书中讲述了他的经历。他的经历与1607—1609年弗吉尼亚殖民地初期的约翰·史密斯船长的经历有相似之处，也有相异之点。同史密斯与波卡洪塔斯①的关系一样，也有一位印第安公主护卫着皮内达·伊·巴斯库尼安，只是她没有提出释放他的问题。这两位经历的其他相异点也令人关注。皮内达·伊·巴斯库尼安赞赏马普切文化。例如，他认为自己之所以受到人道待遇和最终获释是由于马普切人与西班牙人具有共同的尊崇军人这一准则。皮内达·伊·巴斯库尼安视马普切人为文明人而非野蛮人。他的书中还有一项政治议题，即请求重新实施瓦尔迪维亚神父的防御战政策。作者曾受过耶稣会士的教育，要求再给防御战政策一次机会。

由于智利人与马普切人之间的贸易往来日趋活跃，双方敌意渐消。马普切人用牛、手织斗篷、羽毛和篮子交换西班牙人的纺织品、铁制品、谷物和葡萄酒。与军人怀疑马普切人的承诺相反，商人们对他们相当信任。他们将货物分送给马普切人后，马普切人会及时换给他们所需的物品。由于这种贸易获利增多，军事首领力图加以垄断。他们自己抢过生意，禁止任何人同马普切人进行贸易往来。他们竭力抬高物价，强迫印第安人购买不需要的物品。时有发生的反抗事件，多半系这一暴虐行径所致。

十二、修建教堂

在军方和商人同马普切人搞新型关系的同时，教会则集中精力对西班牙控制的智利地区不断增加的人口行使牧师职责。教会需要牧区教堂，但由于殖民地比较穷，教堂修建工作进展缓慢。佩德罗·德· 41

① 北美波瓦坦印第安人部落联盟首领波瓦坦之女，曾搭救过史密斯。——译者注

瓦尔迪维亚将圣地亚哥中心广场以东的整个地块划归教会，但一直等到殖民者们自己出资才开始兴建教堂。在教堂未建成前，神父们在瓦尔迪维亚家的门口过道上主持弥撒。第一座小教堂土坯垒墙，茅草盖顶，建得太差，数年后即垮塌。后来懂建筑、有资金的一些神父主持了大教堂、圣弗朗西斯科教堂和多明我会修道院的营造工作。这些教堂、修道院至今依然是圣地亚哥的标志性建筑物。奥古斯丁修会的会士们、施恩会士们和耶稣会士们也在圣地亚哥市中心修建了自己的牧区教堂。这些教堂的重要性反映在以它们的名称命名的街道名上。这些教堂虽说没有新西班牙和秘鲁的教堂那样富丽堂皇，但随着智利财富的不断积累，教士们也用瓷砖、镀金圣坛和雕刻画面对其教堂进行了装点。基督、圣母和圣徒们的画像和木雕像令人肃然起敬。

牧区富裕的教徒捐赠或抵押土地支持教会，还鼓励子女从事教士工作。宗教节日庆祝活动期间，他们参加队列行进吟唱赞美诗。斋戒、节日前夕祈祷、闭关静思和朝圣是常事。权贵家的人死后，先行守夜和举行葬礼，再葬入教堂内的地下，并将死者的名字刻在石板上。而平民百姓则埋葬在普普通通的公墓里。教会除了建牧区教堂外，还兴办医院、孤儿院和学校。教会从事这方面的活动通常不用自己掏钱，所需花费来自其他方面的收入——包括政府征收、而后划拨给教会的税款。

在没有钟表的时代，教堂的钟声按时报点。钟声通知弥撒时间到，钟声示意某人已去世，钟声宣告新国王加冕。智利人认为，必须用像洗礼、婚礼、忏悔和圣餐这样的一些圣礼来确保自己的今生和来世。教会通常是受人崇敬的，但人们有时也嘲笑教士们的一些怪癖。政教结合使殖民地容不得非天主教教徒。教会防范异教信仰的流传，凭借其保有的开除教籍和宗教裁判权，强行信仰一致。教会在很大程度上认可个人行为的自由。罪可赦，反教会不可恕。

教会随着自身财富的增加开始投资土地，还以最低为6%的利息向庄园主和矿主贷款，从而成了殖民地的银行。教士们对金融和土地的经营管理在殖民地是最先进的。他们为了发展自己的庄园，改良了

耕作和放牧的方法。耶稣会士们修筑灌溉系统、播种苜蓿和养牛育肥，使他们的庄园成了智利最有价值的庄园。庄园的收入用以资助他们办的学校和牧区教堂。他们的学校既教育平民百姓，也培训教士。因此，殖民地的领导人大多受过耶稣会的教育就不足为奇了。

智利乡间富裕的庄园主在自己的庄园里建有小教堂，教士一年只去几次。教士不在时，乡民们就得自行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了。许多贫困夫妇没有举行过婚礼，他们的孩子也没有举行过洗礼就不奇怪了；而某人死后，乡民们为他（或她）守夜还是有的。由于乡间缺医少药、平日生活清贫，他们每当遇到健康问题或发生家庭危机时，就求圣徒或圣母马利亚出手拯救自己。他们则报之以保证采取某种表达虔诚的行动（如朝圣）。在智利遥远的北部地区举行民歌节期间，印第安人献上他们的传统舞蹈以表达其宗教信仰。教士们通常不反对民间的宗教习俗，但他们心中有数：哪些习俗可行，哪些习俗不可取。

十三、乡村传统

西班牙人除了保持传统的宗教习俗外，还力求延续老家的乡村生活。西班牙大部分地区的乡村生活是以养牛业为中心的。尽管采矿业不久就成了智利商品经济的支柱，但就是矿主也要拥有一片牧场。他们除了以此显示其身份外，还在牧场上饲养马骡，用以驮运和碾磨矿石。殖民地在引进第一批马、牛、羊时花了很多钱，但这些动物繁殖快，不出数十年，即成群出没，价钱也降了下来。

夏季牧场依惯例由牧牛人将牛群赶拢，屠宰膘肥体壮的牛只，剥皮，剔下脂肪熬成油倒入容器。而后各家用其制作各种各样的食品（如一种传统食品油炸面包）。冬季多雨，全家人围站在火塘边，油炸面包一出锅，就拿着大口大口地咬嚼起来。智利人还将牛脂制成脂油，用于制造蜡烛。脂油用不完时，他们就用船运送到北方太平洋沿岸港口。他们还制作牛肉干，一部分供出口。牛肉干是当地食品的主要原料，特别是在冬天，将其剁成丁与切碎的菜一起炒制成肉干丁。由于主要是农业经济，没有什么市场出售牛肉，所以剔下脂肪后，一部分

肉就归秃鹫食用了。

西班牙人出于需要将一些马普切人的食品添加进了自己的食谱。43 最主要的就是玉米。他们食用鲜嫩的玉米，将其磨成粉熬制玉米糊糊、做成“乌米塔”。[①] 玉米尽管很多，但玉米饼一直没有列入他们的食谱。成为他们的常用食品的其他美洲土特产还有马铃薯、西红柿、辣椒和菜豆。榛子和松子也被广为食用。

西班牙人发现小麦和其他谷物很适宜在智利种植，因此面包就成了智利人最重要的食品。他们每天在砖砌的烤炉里烘面包，现烘现吃。贫穷的农业工人没有烤炉，便将生面团埋在柴灰里，在火盆里烘焙。[②] 欧洲干果、水果和蔬菜——特别是杏仁、核桃、苹果、梨、柑橘、鹰嘴豆、扁豆在智利生长得很好。另外一种在智利生长茂盛的欧洲植物是葡萄树。教士们在其庄园里酿造葡萄酒，私人庄园而后跟进。然而质量是个问题，智利人当时用未经烧制的陶罐发酵、储存葡萄酒。这种陶罐渗水，几个月后葡萄酒就变成醋了。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有人用蜡打在陶罐内壁上，但蜡融化后，使酒发出阵阵恶臭。然而早点喝，没有什么问题。智利人也爱上了一种新酿制的酒，即奇恰酒，味甜、含酒精，令人爱喝上一口。马普切人原本酿制自己的奇恰酒，但很快就爱上了西班牙的酒——这种酒通常用于交换贸易及和平谈判。

西班牙人引进了马、牛、驴、山羊、绵羊、猪和鸡等家畜、家禽。马普切人很快就收养了这些动物，并拥有了自己的畜群——这些牲畜有交换来的，也有偷盗来的。马普切人以往通常饲养、利用羊驼，但这会儿不再重视羊驼却偏爱欧洲动物了。就连妇女也不再用羊驼毛、而改用羊毛纺织斗篷和毯子了。牛肉成了马普切人的主要食品。牛是重要猎获品，也是重要交易品。例如，佩文切人甚至骑马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猎捕牛只，赶至智利与那里的商人进行交易。

---

① humita，嫩玉米面加上辣椒、西红柿、糖、牛油等原料混合在一起，用玉米棒子皮包裹煮熟，冷却后再烤热食用。——译者注

② 这一传统当今在智利的乡村依然流行。例如，周日傍晚圣地亚哥人从海滩或山区度完周末回家时停在路边摊头享用乡民出售的这种炭火烘焙的面包。

十四、人口动态

西班牙人无意中也将旧世界的各种疾病带到了智利。麻疹、天花和流感病毒袭击了对欧洲疾病没有免疫力的人们。委托监护主们抱怨干活的人相继死亡，因此他们需要补充劳动力。人口研究表明，西班牙人进行征服活动的50年间，前哥伦布时期的智利人口减少了40%以上，此后直至18世纪之前，人口数一直稳定在这一水平，进入18世纪才开始稍有增长。比较而言，墨西哥、秘鲁和北美土著人口的减少量要大得多。学者们至今也不清楚战争不断造成伤亡，而马普切人口数却没有像上述土著人口那样大幅减少的原因。

44

非马普切人口在逐渐增加。1600年，西班牙人为1万；下一世纪缓慢增长至2.5万。还大量增加了梅斯蒂索人[①]、穆拉托人[②]和黑人。1600年人口总数大约4万，1700年到了10万。这时，与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利马的非洲奴隶贸易已影响了圣地亚哥人口的成分：约14%为穆拉托人、6%为黑人、19%为印第安人、只有4%的梅斯蒂索人、56%为西班牙人。就整个殖民地而言，1700年有不到一半的美洲土著（21.5万）生活在西班牙人统治下，而其余的人（23.5万）则在马普切人的领地上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

十五、贸易

不断增加的人口导致了农产品和矿产品出口的增加，转而又导致了进口品的增加。进口品来自遥远的地方。丝织品来自中国，而其他各类纺织品、铁器制品和水银则来自欧洲一些国家。秘鲁和厄瓜多尔运送的是优质毛料。来自南美的蔗糖、巧克力和马黛茶（即著名的巴拉圭茶）等热带产品也是特别受到喜爱的东西。

法定的贸易路线是从西班牙到智利，起初是从塞维利亚出发，后来改为加的斯。商人们将货物装船，在护航舰的护卫下，一年一趟，

① 白人与印第安人的混血种人。——译者注
② 白人与黑人的混血种人。——译者注

驶往巴拿马。船到巴拿马后，他们将货御下装驮，由骡队驮运，穿过巴拿马地峡，到达太平洋岸再次将货装船。这些船通常直接开往秘鲁，有时也会在瓜亚基尔停一下。货物一到利马，秘鲁商人就挑选一些商品到智利的市场出售。他们将商品运至瓦尔帕莱索。殖民地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西班牙国王禁止智利通过麦哲伦海峡与西班牙进行直接贸易。他在某种程度上是担心航道危险，而在更大程度上则是要确保对货物流通的控制。固定的巴拿马路线便于税收与确保商会的贸易垄45断。商会会员向国王支付进口税、出口税和销售税。国王则禁止其他人染指殖民地的贸易。这一互惠措施可能使商会会员和国王得到好处，但却害苦了智利的消费者和生产者。智利人高价进，低价出，从对外贸易中获利少之又少。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激励了那些想避开垄断制度的人。

17 世纪通过拉普拉塔河开辟了一条较为直接而非法的贸易路线。荷兰和英国的商船在科洛尼亚多萨克拉门托与河对岸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进行走私贸易活动。外国商人走私运进货物，当地商人将货物装上牛车，结队穿越潘帕大草原。一些牛车转而向北前往查尔卡斯（今玻利维亚）各银矿区，其他牛车向西前往门多萨镇。巴拉圭的耶稣会士们也每年途径潘帕大草原运送价值 30 万比索以上的成百上千袋马黛茶到位于安第斯山脚下的门多萨。赶骡人在这儿将所有货物捆上驮畜，赶骡上路，沿一条充满危险的羊肠小道向上攀登，翻越高达 1. 25 万英尺的山口，到达智利。货物最终运到圣地亚哥时，海关官员对其进行检查，确定关税额。头脑灵活的商人会买通关结、找借口，使关税额低于官方的报价。由于法国、英国和美国商人的冒险活动，18 世纪里与欧洲的直接贸易开始活跃。他们的商船驶经麦哲伦海峡，停靠智利岸边；他们冒着整船货物被没收的危险，与智利的代理人联手免税卸货。[①]

对外贸易尽管额度小、周期长，但对智利来说还是极其重要

① 最后一任智利都督弗朗西斯科·加西亚·卡拉斯科谋害了英国商船“天蝎号”的船长，没收了商船和货物，充作战利品。他虽然获得了很大一笔财富，但智利人认为他的行为不道德。殖民地有种不成文的行为规则，其中一条是尊重生命和财产——哪怕是走私的财产。

的。殖民地的城区市场不大，庄园主因而需要境外市场出售他们的牛脂、牛皮、谷物和葡萄酒。此外，由于信贷有限，商人用分期付款的办法出售进口商品以弥补这一不足。采矿业需要对外贸易，因为需要用进口的铁制品和水银挖掘和提炼矿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改善贸易条件和促使庄园主和矿主增加生产的却是走私贸易的发展。直到 18 世纪末，境内市场扩展了，才与重要的境外市场相竞争。

十六、官僚政治

西班牙官员们赖以获得财富和特权的政治制度在 18 世纪也遭到了质疑。庄园主、矿主和商人原先是靠着政府的支持获得土地、劳力和特权的。但私人经济发展起来后，政府又对之加以阻碍、而不是促进。国王严格地控制着贸易往来和采矿业，以便对其征税。官方定的税负沉重，但税收率却很低。有近半数的农业和矿业生产逃税。政府最获利的收入来源是对销售烟草、酒类和纸牌的垄断。绝大多数智利人因为不从事商品经济活动，所以不交纳直接税。

46

从理论上讲，智利作为西班牙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官员隶属于秘鲁总督。智利都统若死在任上，由秘鲁总督指派临时代理。而正式任命则直接来自西班牙国王。通常由西印度院代表国王行事；国王授予西印度院广泛的行政、立法和司法大权。西班牙国王先后在各总督区首府和智利设立了称之为“检审庭”的司法机构。这一机构着力解决有关委托监护权、采矿权、土地和行政当局决议的争议。雇得起律师的人可以对检审庭的决议或都统的决定向西印度院提出上诉。智利当局往往同其秘鲁上司意见不合，所以常常使用这一上诉权。

智利远离秘鲁和西班牙，这使智利官员有了相当大的自主权。这一状况又导致了另一令人注目的结果。官员们明白：他们当政需要当地权贵的支持。没有克里奥约人（在智利出生的西班牙人）的合作，官员收不到税、执不了法。矿主和地主知道如何影响政府首脑和教会领袖才对自己有利。从未有过克利奥约人出任都统一职，但的确有些

克利奥约人当过主教、市政会成员、政府官员以及顾问。他们利用这些职务推动实施一些有利于其亲属（庄园主、矿主和商人）的政策。

十七、社会地位

大多数智利人生活在乡村，很少同政府官员接触。支配他们生活的人是他们的主人——委托监护主、庄园主或矿主。北部地区和中央谷地的印第安人除了顺从地认可其主人的权能外别无选择。而南部地区的印第安人则起而反对这种权能。梅斯蒂索人有一定程度的择业自由，但通常固定在某个矿山或庄园从事劳作。在矿山干活者领的工资是他们每天所采矿石的一小部分。在庄园干活者被称为佃农，分得些许土地作为其劳动报酬。另外一些无地的农村人口有时在收获或赶拢牲口季节受雇于庄园主；他们被称为“外地人”。佃农和外地人因为得不到政府的保护，所以不得不听任其雇主的摆布。

47

然而对某些人说来，智利是个重新起步的地方。早期进入智利的西班牙人大多是穷人，他们借钱买武器和马匹参加征服活动。征服智利后，西班牙国王授予他们委托监护权、土地或采矿权作为补偿，他们的境况遂大为改观：他们的财富大为增加，社会地位大大提高。他们在西班牙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然而这种财富是不那么牢靠的。佩德罗·德·瓦尔迪维亚分配过委托监护权；但后来由于印第安人太少，又撤销了一些。心怀不满的前委托监护主们有的控告瓦尔迪维亚、有的起事反对他，但他们都被打败、处决了。后来的一些都统们也没收委托监护权，用以犒赏自己人。蒙受损失的当事人提起诉讼和请愿。他们除了由于政治原因丧失委托监护权外，还遭到了马普切人起义的毁灭性打击。一贫如洗的前委托监护主们及其子嗣形成了殖民地社会的下层，处于印第安人、奴隶和梅斯蒂索人之上，但远低于委托监护主和商人。

除了控制印第安人劳力外，还有其他一些提高社会地位的门路。有钱的人与征服者合伙行动；征服者如果获得成功的话，有钱人则分享他们的收获。16 世纪以后，从商成了提高社会地位特别受重视的门

路。商人们通常将其商业利润投资于矿山和庄园。因此，18 世纪里的许多显赫家族均有商人而非征服者背景。

获利较少而又需要的职业是铁匠、鞋匠、裁缝、蜡烛制造匠和木匠。随着城镇的发展，殖民地社会趋于多元化，又有了屠夫、面包师和店主。然而大多数智利人终身在庄园或矿山劳作。他们的社会和种族出身使他们只能在家里、朋友间和例行宗教仪式上自娱自乐，而难以得到社会地位的提高。

妇女同大多数男人一样很少有摆脱其社会等级者。印第安妇女很少和西班牙男人结婚，但有可能与他同居。印第安妇女从这种关系中得不到什么好处，但其混血女儿的父亲如果给嫁妆，就能同克里奥约人结婚。西班牙男人通常同西班牙妇女结婚，但也有一些人对混血女人有好感。对有亲属在西班牙的智利人家庭说来，鼓励其亲属移居智利就意味着有了新的机会。女移民们特别受欢迎，可以成为单身克里奥约人或单身西班牙人的妻子。至于已婚妇女，她们的丈夫控制着全部家产。丈夫死后，妻子继承一半遗产，另一半由子女们平分。有些寡妇要自己掌管财产，但大多数寡妇不愿操心、宁愿再婚。 48

殖民地时期智利出现了种族和文化的融和，有时是强制进行的，有时则是自愿使然。被迫成为智利社会组成部分的马普切人为梅斯蒂索文化打下了基础。他们的语言、饮食和习俗与西班牙的语言、饮食和习俗相融合。权贵社会西班牙味重，而劳工社会则马普切色彩浓，但双方一直在持续不断地交相感应、相互影响着。不同于西班牙的智利特性在渐次形成。智利成为殖民地 250 年后，一场欧洲危机促使智利人下定决心试一试，看这一特性是否足以创建一个新国家。

第三章　独立（1750—1830）

51　没有多少智利人能够想到，18 世纪围绕他们所发生的变化会导致独立。移民的增多、教育的发展和财富的增长使社会大为改观。移民们为贸易、矿业和农业注入了新鲜活力和理念。他们发展起了一种不那么依靠政府援助而较多依靠与其他地区进行贸易的市场经济。他们在矿业和农业方面扩大了生产、开拓了市场。他们若遇到官方的钳制，就搞走私活动，而后干脆就造反。

教育方面也发生了变化。兴办了多所学校和一所大学，培养出了一些专业人才和教士，他们走上了殖民地政府和教会的领导岗位。智利人通过马普切战争还积累了战斗经验。18 世纪下半叶，一些在殖民地政府和教会领导岗位上的领袖人物逐渐意识到他们已具备治理国家、管理经济的能力。

一、殖民统治末期

52　### 1. 波旁王朝的改革措施

1700 年新王朝——波旁王朝接过西班牙帝国的王权后，帝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先后登基的新国王们实施了一系列旨在使帝国现代化、增加岁入的改革措施。他们重组了政府，使贸易往来自由化，并支持一定程度的社会变革。他们首次允许西班牙北部地区的巴斯克人和东

北部地区的加泰罗尼亚人与美洲殖民地直接通商。这两个地区的商人们利用这一改革措施在各殖民地设立了商业机构，不久即在智利控制了贸易，而后进军矿业和农业。当西班牙国王给他们买贵族头衔并永远保有其资产的机会时，那些买得起这社会地位象征的人们随即出手急捞。与巴斯克人和加泰罗尼亚人相反，许多征服者的后代则陷入了经济困境。移民家族的兴旺和传统家族的衰败导致社会局势趋于紧张。

殖民地时期官方是禁止非西班牙人进入智利的，但 18 世纪里还是有些外国人定居在智利了。他们或他们的下一代还有人在智利争取独立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安布罗西奥·奥希金斯和胡安·马肯纳为爱尔兰移民。奥希金斯官至智利都督和秘鲁总督，而更为重要的是他儿子贝尔纳多领导了智利的独立斗争、后来又成了智利独立后的首任最高执政官。马肯纳为智利独立而战的时间不长，因同另一领导人发生口角决斗而亡。一些法国人移居康塞普西翁，而一些葡萄牙人则移民圣地亚哥。甚至有少数英国人（如豪尔赫·爱德华兹等）也定居在了智利。豪尔赫·爱德华兹及其后裔在采矿业、银行业和政治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

西班牙国王同欧洲其他国家的国王一样，担心如果把殖民地的人提到领导岗位，这些人就会谋求当地的而非国王的利益。因此，他们从未选拔过智利人出任都统一职，并规定西班牙官员未获国王批准不得与智利女子结婚。然而 18 世纪里，波旁王朝的国王们给了智利人日益增多的担任领导职务的机会。国王曾任命过两名智利人到检审庭（殖民地最高司法机构）任职，任命另一位智利人为海关总署署长，还指派一名智利人掌管铸币厂。许多智利人在军队和民团中担任重要军职。当地教士在教会中获得的领导职位之多出人意外，18 世纪里 17 名主教中有 13 名为智利人。

2. *教育与政府*

53

然而智利人具有的最大影响体现在担任都统、都督和郡守的顾问职位上。担任都统、都督和郡守的西班牙军官没有什么民政经验，也没有受过法律教育。到 18 世纪 60 年代，他们可以在 1758 年开办的圣费利佩大学法律专业毕业生中找到有才干的顾问人选。这些顾

问与显贵家族有关系，影响都统或都督支持这些家族的权益。杰出律师胡安·马丁内斯·德·罗萨斯在都督安布罗西奥·奥希金斯擢升为秘鲁总督前一直是他的顾问，并因此左右了这位都督的继任者的选拔工作。

智利人尽管直接获得了有关行政系统如何运转的经验，但没有机会接触到立法机构的工作情况。西班牙没有设立一个像殖民地议会那样的机构，好让智利人辩论有关税收、预算和防卫的法规。国王们颁布所有的民法和刑法。然而有一种集体解决当地问题的机构，称之为“市政会”。市政会授予特许经营权，调节物价，维护地方治安。市政会成员通常不是由选举产生的，其中有西班牙人，也有智利人。当地的一些领袖人物通过市政会获得了处理市政事务的经验。

3. 教会改革

波旁王朝的国王们允许有更多的智利教士进入教会领导层，而同时又攻击他们视之为的教会过度自治状况。18 世纪欧洲各天主教君主国竭力使教会接受国王的控制。西班牙波旁王朝的国王们注意到：教士人数超过了行政官员，各教派拥有大面积的免税地产，教会的岁入赶上了政府的岁入。智利的政府官员同帝国其他地区的政府官员一样都清楚：教会对所有农业生产征收什一税，还接受许多私人地产的抵押权。除了这些财力来源外，教会还凭借对几乎所有学校的控制显示其影响力。

使波旁王朝诸位国王不安的各教派中，耶稣会最具威胁性。这一教派系由原来的一名西班牙军人伊格纳蒂乌斯·德·洛约拉[①]创立，其誓约之一为服从教皇。波旁王朝的国王们认为，这一誓约意味着耶稣会对教皇的忠诚要高于其对国王的忠诚。1767 年卡洛斯三世决定采取断然措施消除这种对教皇的忠诚，于是下诏将所有耶稣会士赶出帝国范围。智利都统安东尼奥·德·基尔·伊·贡萨加受命执行这一谕旨。他虽与耶稣会士私交甚笃，但也不得不违心地将所有耶稣会士软禁起来，关闭其学校和修道院，没收其财产。后来他将他们驱逐到了

54

① 旧译罗耀拉。——译者注

意大利，出售或出租了他们所拥有的60处庄园。

各教派因为相互之间的争斗，一些教士赞同国王卡洛斯三世的举动。他们和国王卡洛斯三世均未估计到这一举动将对教会和国家会有何种程度的影响。半个世纪后，独立运动开始，耶稣会士们从此不再支持旧政权。耶稣会士们曾反对约翰·洛克、让·雅克·卢梭和托马斯·杰斐逊等人的现世思想，卫护西班牙帝国；此前他们还反对过马丁·路德的思想，卫护南欧国家。他们被驱逐后，一些怨愤的耶稣会士即使远离故土亦全力支持独立运动。

波旁王朝国王们的改革措施很少有像驱逐耶稣会士这样决绝的。例如，他们进行贸易改革时并未放弃重商主义，而是使其现代化，即通过补贴、保护和公共工程的建设对其进行改革，以此刺激私人企业的发展。这一点在智利尤为明显，波旁王朝的历届都统和都督都修路、开水银矿、建火药厂、实行征税新方法。其中有些措施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增加了政府的收入，但殖民地发展的原因多半是由于商人和矿主越来越多地从事了西班牙经济体制外的活动。这些企业家悄悄地谋求更大的自由，公开宣告独立的时机即将来到。

4. *采矿业*

用淘洗盘淘金这一非常传统的方式逐渐被淘汰了。时至17世纪，含金的砂砾大为减少，矿主们不得不挖井开矿。智利人还逐渐开采出了铜和银。这些矿中通常有十来个或更少的工人沿着矿脉刨挖，形成了弯弯曲曲的坑道。他们采矿的方法很简单，只挖富矿石，而遗弃其他所有的矿石，即使坑道和矿井狭窄，劳动条件危险，也是这么干。一组工人用长铁棍捣凿下矿石，另一组工人将其铲进皮袋，而后背负装满矿石的皮袋匆匆爬上摇摇欲坠的绳梯上到地面。赶骡人将皮袋装上骡背，运至矿石粉碎场。粉碎场设在河边，用水力驱动粉碎机。粉碎后，工人们将含金或含银的矿石用水银及盐混合提取贵金属。这一加工方法称之为汞齐法。其后的数月间定时进行搅和。数月的定时搅和后，工人们再淘洗矿石，分离出水银；接着熔炼矿石，而后将液态金或银倒入条形铸模。水银是种稀有、昂贵的原料，所以熔炼时工人

55

要尽可能多地回收以备再利用。然而工人们不知道水银有毒，因此他们中的许多人出现了严重的健康问题。铜完全不同于贵金属，熔炼时不用那种费时的汞齐法。矿主们不管何种矿物，熔炼后通统装驮由骡队将其运至港口。商人们再将其装船运至秘鲁，贵金属铸成硬币，铜锻造成青铜。商人们还非法地将这些金属卖给非西班牙商人。

西班牙人一到智利就寻找廉价的矿工。他们首先利用委托监护制强迫马普切人干活。然而到 17 世纪，高死亡率和马普切人的起义致使用印第安劳力已不再可行。因此矿主们建立了一种吸引梅斯蒂索人的劳动制度。他们由于没有现钱付给工人，就用工人每天所挖矿石的一部分作为劳动补偿。通常是每天息工前从矿里弄出的最后一袋矿石归工人。工人们然后用他们的矿石同矿石粉碎场主或商人换取生活必需品。

18 世纪黄金增产，圣地亚哥市政会请求国王卡洛斯三世开办铸币厂。智利矿主如果能够就地、而不是运往秘鲁铸造金币的话，就能降低成本，而自己的货币必将惠及智利。野心勃勃的企业家弗朗西斯科·加西亚·维多夫罗心气更高，要求自己开办一家私人铸币厂，且不用国王花一分钱。国王觉得这一要求可行，因为皇家对铸币厂征收的铸币税可以抵消所失去的秘鲁铸币厂的铸币税。再者，他相信：当地有家铸币厂，就会减少走私活动。因此，他授予了加西亚·维多夫罗所请求的特许经营权。1749 年铸币厂开工，年均生产价值 4 万至 6 万美元的金币。

铸币厂的业绩促使国王要完全控制这一行当，遂撤销了所授予的特许经营权。这对加西亚·维多夫罗说来，是件倒霉的事。由于当地白银增产，政府 1772 年接管铸币厂的经营时也开始了银币的铸造。因此，走私活动暂时减少了。但由于铸币和铸币厂的其他费用高，加上矿石的定价只及实际价值的大约 30%，所以矿主和商人们急欲从事走私活动。与布宜诺斯艾利斯进行贸易的机会和开往西班牙、英国及美国的商船日益增多，方便了贵金属的走私活动。控制着贵金属贸易的商人凭借走私活动持续获利。

56

显然，采矿业是智利殖民地时期贸易的主轴。18 世纪 70 年代，智利每年出口价值 65 万美元的黄金。30 年后，出口的黄金价值至少增加到了 85 万美元。黄金是所有出口矿物总价值的两倍多。大量水银的供应，使矿主们得以提炼含银量低的矿石，因此增加了白银的出口。秘鲁增加向智利的水银运送量，而智利当地的一些水银矿也开始了生产。18 世纪 70 年代年均白银出口价值 13 万美元，19 世纪头 10 年则为 40 万美元，增加了三倍多。至于铜嘛，有利的铜价和运费的下降使这一矿物的利润在 18 世纪下半叶持续增长。因此，18 世纪 70 年代年均出口的铜价值 12 万美元，19 世纪头 10 年增至 20 万美元。

虽说采矿业是智利最具活力的产业，但大多数矿都不大。像墨西哥和秘鲁那儿的大规模采矿活动压根儿就没有过。政府和矿主同业工会都想办法要使智利的采矿业现代化。为了改进汞齐法，都督安布罗西奥·奥希金斯立约雇用一名德国冶金学家工作五年。其他都督也同私人投资者联手开发了三家水银矿。为了增加炸药的供应，奥希金斯同意开办了一家公营火药厂。该厂虽然一会儿生产，一会儿停产，但还是保证了本地的供应，还有剩余以供出口。尽管有这么一些发展进步，但北欧的其他一些在排除矿井积水、设计坑道和熔炼夹杂硫化物矿石等方面的革新技术未能传到智利，委实遗憾。

矿主们经常抱怨没处贷款，只好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将矿石卖给商人。这些被称之为“给矿上提供资金者”的商人预先提交货物，矿主则限期以矿石还债。为了同这些提供资金者进行竞争，政府设立了一家政府收购处和一家政府贷款处。可惜的是，政府没有那么多资金提供给这两个机构。有限的资金给了一些极有影响的矿主。拿到贷款的矿主并不总是将这些资金用于采矿活动。而旧债迟迟不还又影响了新贷款的提供。

为了对采矿加以限制和管理，西班牙在其采矿业最发达的殖民地设立了采矿同业公会和矿事仲裁法庭。一直到 18 世纪智利的采矿业大繁荣时，波旁王朝才在智利设立了同业公会和仲裁法庭。同业公会使矿主们得以解决许多有关其所有权和契约的争端，而国王则希望能得

57

到矿主们的支持。然而同业公会的成员们觉得税太重，往往违背国王的意愿，将他们的矿物投入非法交易网。1802 年以后同业公会领导层的成员虽然是国王任命的，但一些受命任职的杰出的克里奥约人领袖还是在处理矿业问题时获得了经验。

5. 农业

采矿业的风险要比农业大得多，所以一些获得成功的矿主通常都购买土地。他们一般都是购买北部地区河谷地带的庄园，放牧骡、驴，用于运输。他们的土地如果面积大的话，也会用于种植小麦和养牛，供出口。许多同矿主进行交易而发家的商人也购买土地。他们购买中央谷地的地产，用以养牛、种小麦、建果园、种葡萄。一部分产品在当地出售，其余供出口。

土地价格依其水源和离市场之远近而定。邻近城镇和港口的灌溉地价格最高。这种土地用以育肥牛只或种庄稼。而售价最低的土地则是沿海山脉和安第斯山麓地带干旱、贫瘠的放牧地。有钱人购买庄园后，田产就倒手了。17 世纪初，特别是波旁王朝统治后，国王为了捞钱，授权贵族实施长子继承制，并向他们提供购买贵族头衔的机会。由于长子继承的地产不能出售或分割、只能由长子继承，所以庄园主买得这一特权就确保了家庭财产长期完整在手。由于定价太高，只有 18 家购买了长子继承权，而其中又只有 10 家购买了贵族头衔。拥有长子继承权的家庭虽然有限，但大地产依然在殖民地时期的智利占有首要地位。虽说土地所有者有一万人，但占有全境大部分土地者为两千最大的庄园。

外来访客都说智利乡村地广人稀。分散生活在乡村的人分为数类：15% 的小土地所有者，他们大多是自耕农；30% 的佃农，他们生活、劳动在大庄园上。他们一般为大庄园主干活，所得回报是获准在庄园上自建茅屋、开辟一片园地、放牧几头牛。乡村人口中的另一 30% 为短工“外地人”，他们受雇从事耕种、收获和赶拢牛群。仆役和奴隶劳动力分别为 10% 和 5%，他们在家里和庄园的土地上干活。乡村妇女不算正式的田间劳力，但平日里要在自家的园地上劳动、收获季节

要帮庄园主干活。

那些耕种邻近城镇的土地者种植马铃薯、玉米和蔬菜，将其拿到镇上销售，而其他人则种植其他作物，主要供家庭食用。主要作物是小麦。农民们秋天耕地播种。他们用牛耕地、运输，很像中世纪欧洲农民所为。初夏，他们用长柄大镰刀割麦，然后将其扎成捆，再装上牛车。将麦捆散铺到场院上，用马来脱粒；最后用手把麦粒脱净。这种传统方法已经程式化了，就是18世纪末的移民也未做出什么改变。

6. 贸易

虽然大多数农产品是在智利消费的，但境内市场有限。因此，出口对庄园主来说很重要。农产品占总出口额的35%—40%。利马和瓜亚基尔的智利产品承销商收购了绝大部分运到的智利产品，销往西海岸各市场。秘鲁是智利商品的最大买主，年均购买20万法内加（1.56万吨）小麦以及牛脂、皮革、葡萄酒、绳索和木材。除从巴拉圭进口马黛茶外，智利同安第斯山东边的各殖民地很少有农牧产品交易。西海岸市场容量有限，而翻越安第斯山的运输成本又太高，这就限制了农牧产品的输出。庄园主们需要新市场，但在殖民主义的贸易制度下是找不到的。

西班牙人喜欢这一现行的贸易制度，因为这一制度保护他们免遭外来的竞争。贸易是最吸引西班牙移民的职业之一。殖民地末期，西班牙人控制了70%的重要公司，而克里奥约人所控制的数目不足18%。克里奥约人控制的小公司数量有所增加，但也未超过50%。克里奥约人缺少海外关系和贸易技能。拥有商船者几乎为零；经常提及的船主何塞·德·门迪布鲁是唯一的克里奥约人。即使是西班牙的贸易保护制也保护不了商人，他们仍要冒很大的风险。贸易法庭的档案证明破产的案例不少。但成功的商人跟智利豪门攀婚、购置大地产并融入智利社会。

1700年波旁家族的成员登上西班牙王位，西班牙的官方贸易网随之开裂。费利佩五世当上西班牙国王后，准许法国南海公司到南美西海岸活动，但禁止公司的船只从事贸易活动，可十余年间他及其官员 59

们并未采取措施加以防范。1701 年至 1724 年间，公司有 153 艘船绕行合恩角到智利、秘鲁及其以北的一些港口进行贸易活动。通常只要打通都统这一关节即可进行贸易。都统得益，法国商人获利，智利的生产者亦获利，受损者自然就是西班牙商人和西班牙国库了。在亏损开始危及西班牙国库时，费利佩五世不干了，下令海军舰只和特许的海盗船将南海公司的船只赶出太平洋。

走私活动还有其他一些源头，其结果是西班牙的船队制失效。1720 年西班牙国王实施商船注册制，力图重新控制南美贸易。商船不再按传统的船队制列队集体行驶，而是单独行动。国王将这一改革首先落实在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贸易上，而后用在与秘鲁的贸易上。1743 年至 1761 年共有 56 艘商船驶抵利马的港口卡亚俄，在其回程中往往停靠一下瓦尔帕莱索。按规定，注册的商船只能在与秘鲁进行交易后同智利做生意。不管怎么说吧，从 18 世纪 40 年代到世纪末这些商船在西海岸销售了价值数百万比索的制成品，换回了铜、贵金属和皮革。

然而国际冲突时常阻碍西班牙商船驶往美洲。美国独立战争和拿破仑战争期间，注册的商船很少光临智利。因此来自西班牙的进口物品锐减，迫使智利另觅他途。殖民地智利发现拉普拉塔地区（包括今阿根廷、巴拉圭和乌拉圭等国）是最好的新市场。18 世纪 70 年代从这一地区进口的货物只占 15%，到 19 世纪头十年差不多有 60% 的进口货来自这一地区，包括 30 万比索来自巴拉圭的马黛茶、10 万比索的阿根廷产品和 100 万比索的欧洲布匹、五金制品和其他各种物品。而从智利的传统市场秘鲁和厄瓜多尔进口的商品则下降到了 40 万比索的土布、50 万比索的热带农产品和 10 万比索的欧洲货物。

18 世纪 70 年代美国船只驶抵智利，这使西班牙更难实施其垄断政策。西班牙在一系列的条约中授权美国船只可以到太平洋沿岸水域捕鱼，但不能搞贸易。然而许多捕鲸船和海豹捕猎船都违犯了这一限制规定。船长们以修船和供应淡水为借口，请求让船驶进智利港口。如果获准，他们就进行贸易活动了。有些人遭到逮捕，但大多数人还

60

是求得了当地商人和官员的通融。1788 年至 1809 年有 250 多艘美国船只进入智利水域捕鱼和从事贸易活动，这使美国的船长们得以获利，并熟悉了当地的港口、商人和习俗。

受殖民主义贸易影响很小的一批人是从事制衣、建筑和制造运输工具活计的工匠们。制鞋匠、制帽匠和裁缝们制作殖民地的人们穿戴的各式各样的鞋帽和服装。木匠、石匠和建材制造者们活动在建筑行业里，而马具师、造车匠和造船匠则活动在交通运输行业中。大多数工作都没有引进什么新技术，特别是在乡村地区零零星星从事手艺活动（诸如砌房盖屋、酿造葡萄酒、纺线、织布和制革等）的人们很少改变其传统的手艺。

7. 公共工程和赋税

波旁王朝的国王们认为变革必须从上而下地进行。他们爱任命有能力、有革新精神的人而不是任命贵族为都统或都督。这些人大多热衷公共工程。例如，为了发展贸易，他们修筑了一条从圣地亚哥到瓦尔帕莱索的新大道，改善了通往门多萨的山间道路。为了突出首府，他们修堤筑坝防洪水，雇请建筑师设计、建造铸币厂、贸易法庭、市政会、海关、检审庭和圣博尔哈医院。这些简约的新古典主义建筑正好反映出了殖民地当局的革新精神。工作在这些建筑物中的政府官员们对财政进行了新式管理，改革了市政会、警察和民团。康塞普西翁来了一位新郡守，他也要在这一地区实现现代化。

与英国美洲殖民地的赋税比起来，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赋税似乎重了点儿，但同其他欧洲帝国比起来就不算重了。波旁王朝的国王们在像智利这样的一些殖民地里实施小政府政策。慈善事业、医院、邮政和一些执法行动等服务性活动由教会和其他社会公共机构负责。政府特许私人代为收税，经营铸币厂，执行烟草、纸牌专卖权。为了额外增加收入，政府还出卖官职。为了应对马普切人起义所造成的威胁，西班牙国王建有一支正规军，由国库提供军费，同时还支持组建了一支约 1.6 万人的民团，由志愿人员组成。发生暴乱时，私人提供兵力、武器和资金，以补充政府之所需。

61

考查一下智利社会各不同人群的税负情况表明，税负最重者是矿主。1801 年至 1810 年，他们的总体税负年均约 15 万比索，为矿产品出口总值的 10% 左右。税负次重者是农牧业经营者。农业的主要赋税是什一税。这一税收归教会，不归政府；而政府则通过拍卖招人承包征税工作。18 世纪 90 年代，税收约 12.5 万比索。农业生产年均收入约 200 万比索，税收为 6%，而不是名义上的 10%。在计算矿主和农牧业经营者税负时，还必须考虑到他们的产品出口时要交纳的出口税。交纳出口税者虽然是商人，但其影响却是降低了农牧、矿产品的出口价格，进而又使各利益攸关方都减少了收益。

西班牙殖民地的人们从未参与过赋税问题的讨论。他们如果对赋税有异议，没有一个立法辩论的地方让他们提出异议。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想方设法偷、漏税。因此智利并未像英国的美洲殖民地那样，把没有代表权也要纳税这一问题作为争取独立的主要原因。然而独立运动开展后，一些经济问题（如同其他国家进行贸易）就起着实实在在的重要作用了。

二、独立运动

智利的权贵们熟悉美国独立和法国大革命。一些克里奥约人支持美国独立，但几乎所有的人都畏惧法国大革命，因为法国大革命反对特权。一些克里奥约人抱怨西班牙偏袒半岛人（出生在西班牙的人）。然而我们也明白，克里奥约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是建立在西班牙的一套制度之上的。他们对实践法国式的革命变革一点也不感兴趣。殖民地的权贵们对根据社会地位分成不同阶级这一点深为满意，阶级的划分使大土地所有者、民团成员和教士们享有了特权。

19 世纪初，拿破仑·波拿巴窃取法国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使欧洲开始发生变化。他废黜国王，推翻旧帝国，建立新帝国。1807 年，他入侵葡萄牙，迫使其国王逃往巴西。而后，1808 年他又进军西班牙，胁迫国王卡洛斯四世和他的儿子费尔南多七世退位。他让自己的哥哥约瑟夫登上西班牙王位，并派使臣前往各殖民地敦促其承认新王朝。

62

西班牙殖民地拒不接受法国人的统治，坚持忠于被软禁在法国的费尔南多七世。智利的殖民者们当时面临着这么一个实际的法律问题：谁有统治权？西班牙官员们声称，国王虽然已退位，但他们的当权地位依然具有法律效力。他们想要继续留在自己的职位上，至少待到费尔南多七世回归王位。而殖民者们却在这一问题上发生了分歧。一些人支持当政的官员，另外一些人则应用宗教法理论断言，合法政府终止活动后，权力回归于民。根据这一理论，许多殖民地里的当地权贵聚集在市政会公开会议上辩论决定统治权应该归谁。

1. 领导权危机

智利的情况是，都督路易斯·穆尼奥斯·德·古斯曼去世时正好是拿破仑入侵西班牙。检审庭没有意识到这一事件的严重性，仍按常规办事，选定了一位临时代理都督。康塞普西翁的律师胡安·马丁内斯·德·罗萨斯不同意检审庭指定的人选，推荐西班牙军队司令弗朗西斯科·加西亚·卡拉斯科并为之进行游说活动。一番商量后，检审庭推翻自己的决定，任命加西亚·卡拉斯科为临时都督。马丁内斯·德·罗萨斯——一个克里奥约人也就很自然地成了他的顾问。

倒霉的是，加西亚·卡拉斯科不久就卷入了一场有关圣费利佩大学校长人选的学界纷争。他刚从这一问题脱身，就又在“天蝎”号事件中败坏了自己的名声。这一事件始于马丁内斯·德·罗萨斯和他的一些朋友获悉英国商船“天蝎”号正在智利沿海进行走私贸易。加西亚·卡拉斯科不是逮捕船长、没收船只了事，而是设计暗杀了船长特里斯坦·邦克，私吞了全船货物。参与行动者每人分得 25 万左右比索。

这一可耻的勾当毁了加西亚·卡拉斯科的名声。这不仅是因为暗杀一名英国船长而引起了大多数智利人的反感，而且是因为智利的权贵们都赞同与英国人进行走私贸易。加西亚·卡拉斯科在“天蝎”号事件中损害了圣地亚哥权贵集团中权势极大的一名成员何塞·托里比奥·拉腊因的商业利益。特里斯坦·邦克船长的联系人正是拉腊因——他拥有长子继承权和贵族头衔“拉腊因家族侯爵”。马丁内

斯·德·罗萨斯应该明白不能侵害圣地亚哥的这一显贵家族的利益，63 但他出身在康塞普西翁的一个富裕家庭，根本不把首府的权贵放在眼里。然而他的错误行径使他丢了加西亚·卡拉斯科的顾问一职，并败坏了他俩的名声。

加西亚·卡拉斯科对智利外部发生的事件所做出的反应进一步削弱了其权能。英国人两度入侵布宜诺斯艾利斯，但均被当地人赶了出去。而总督拉法埃尔·索布雷蒙特子爵却胆小如鼠地逃离布宜诺斯艾利斯，而不是领导抗英战斗。危机过后，他想回布宜诺斯艾利斯，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市民们不让他返回，而是成立了自己的政府。加西亚·卡拉斯科清楚布宜诺斯艾利斯与智利之间的联系，担心智利人会步阿根廷人后尘。他疑神疑鬼，逮捕了三位智利知名人士，指控他们密谋推翻政府。他下令将他们放逐到利马，从而引发了一场政治剧变。圣地亚哥市政会召开紧急会议，迫使加西亚·卡拉斯科取消放逐令，而后又逼他辞职，让高级军官智利人马特奥·托罗·德·桑布拉诺——以其头衔“征服伯爵”闻名——代替他。加西亚·卡拉斯科认识到没有国王做后盾的西班牙军官是敌不过智利贵族集团的，只是为时已晚。

2. 走向独立的步骤

开始时爱国者们并不清楚要把政府变成什么样子。1810 年 9 月 18 日，他们召集市政会公开会议，圣地亚哥最有影响的市民们参加了会议。市政会在听取了建立新秩序的强烈请求后，一致决定成立首届国民政府。那些提议这样做的人预见到新时代即将来临，但行事谨慎。他们组建执政委员会后，声明忠于费尔南多七世。他们绝口不提“独立”二字。为了避免引起一些公开反对独立者的敌视，那些支持独立的人假装忠于国王。就连那些豪情满怀的爱国者们也担心民族主义派和保王派之间会爆发敌对情绪。他们也担心秘鲁总督会采取军事行动。他们认为：如果能推迟冲突发生的时间，独立政府就更能立于不败之地。

3. 自由贸易

为了促进智利经济的发展，新政府认为必须废除西班牙封闭的贸易制度中的一些条条框框。西班牙本土人（被称之为半岛人）担心这样的变革将危及他们在智利的生计和存在。1810 年 11 月，国民执政委员会向贸易法庭建议开放国际贸易，而贸易法庭中的西班牙商人抨击这一建议。他们声称这一做法会引来外国移民和异教邪说，而不说这一做法会危及他们的生意，以此来掩盖他们的真实意图。12 月 4 日，同业公会理所当然地投票否决了这一建议。而执政委员会见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其他前殖民地都已开放了贸易，遂于 1811 年 2 月 11 日颁布《自由贸易法令》，宣布即日起开放智利四处港口进行国际贸易。这一改革措施击中了西班牙重商主义的要害。 64

《自由贸易法令》开篇声明执政委员会是以费尔南多七世的名义采取行动的，接着话锋一转，演义《美国独立宣言》道："……人人都被'造物主'赋予某些不可让渡的权利，有权获得幸福、财富和安康……"而后法令列出瓦尔迪维亚、塔尔卡瓦诺、瓦尔帕莱索和科金博这四处港口城市对"外国列强、西班牙的盟友，以及中立国"开放。境内其他口岸不对外开放，为的是留给本国商船进行沿岸贸易。为了促进智利零售业的发展，外国商人不得自行在瓦尔迪维亚、康塞普西翁、圣地亚哥和科金博这四座城市以外的地方出售货物。政府虽然许诺要对外国商人进行"照顾、保护和帮助"，但法令并未提及商人的财产权问题。除上述各点外，法令通篇重申了西班牙的贸易法规，因此也就保留了许多重商主义的条条框框。

智利的领袖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国际贸易将会带来财富。美国、法国和英国早在 1810 年市政会公开会议召开前就都已同智利有了贸易往来。如今法律障碍已经排除，不仅货物的流量将会增加，而且移民、新技术和外国资本的流入亦将会增加。一些领袖人物担心廉价进口货可能会严重打击本地工业的发展、外国船舶可能会损害本国的商船运输业，因此他们提高了关税，以保护本地的工业和运输业。执政委员会开放贸易的目的，并非是要搞垮西班牙商人，而是要谋求更大的智

利农业和矿业利益。

65

贸易改革后，变革的步伐加快，支持新政府的舆论亦随之开始分化。执政委员会宣布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希望借此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一开头就在地方代表人选问题上产生了争议，这一争议差点儿中断了大会筹备进程，最后还是各方的妥协才使国民代表大会得以在1811 年 7 月 4 日召开首次会议。可惜的是，激进派和保守派之间的争论不久就使这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止步不前了。性情急躁而又极具号召力的军官何塞·米格尔·卡雷拉决定解散国民代表大会而由他行使一切权力，以此解决问题。反对他的人则结合在前总督的儿子贝纳尔多·奥希金斯周围。两人各自组建军队，1812 年兵戎相见，对峙疆场，智利全境限于瘫痪状态，防御能力丧失殆尽，极易受到来自外界的武力攻击。

4. 智利被再度征服

在智利的西班牙商人比起秘鲁的商人来更顺应这些变革。秘鲁的商人认为直接输入智利的欧洲货物的价格使他们失去了市场。他们游说秘鲁总督何塞·费尔南多·阿巴斯卡尔采取行动，设法阻止智利的贸易改革。费尔南多·阿巴斯卡尔做出了积极响应，1812 年 12 月间派遣一支远征军重新征服智利。此外，他还准许海盗船截捕所有进入殖民地智利港口的外国船只。

智利遭到攻击，起而全力回击。经济战线上，智利政府禁止向秘鲁输出谷物。但保王派很快即攻占智利谷物主产区重镇康塞普西翁，使得这一禁运措施在那里不起作用。而其他地区的谷物生产者和商人虽然也因失去秘鲁市场而受损，但却未能说服政府重新开放贸易。

政治战线上，何塞·米格尔·卡雷拉和贝纳尔多·奥希金斯抛开歧见、政争，团结一致反对共同之敌。只可惜他们行动得太晚了，很快即告败北。英国人随后介入，在敌对双方之间进行斡旋。英国人想要保留像开放贸易这样的一些成命，这是可以理解的。英国海军上校詹姆斯·希利尔说服双方签署了一纸和平协议，其中有一条是确保中立国船只在智利进行贸易的权利，总督阿巴斯卡尔和利马商人觉得难

以接受此协议，这是毫不奇怪的。总督要重新开战，但因资金短缺难以行动。于是，他向有钱的利马商人求助，他们借给他 10 万美元。他任命马里亚诺·奥索里奥为新远征军司令。

智利的一些像何塞·米格尔·卡雷拉这样的独立派激进人士也反对这一和平协议。而一些像贝尔纳多·奥希金斯这样的稳健派起初是支持这一协议的，认为协议可使智利人有时间整顿一下内部事务。然而卡雷拉再次抢先下手，攫取了对政府的控制权。奥希金斯要用武力将他赶走，智利人内部两派因而再次兵戎相见。到他们认识到奥索里奥的远征军所造成的危险时，再联合抗敌已为时太晚。奥索里奥打败了他们联合起来的部队，但未能阻止他们逃过安第斯山。那些没有逃跑的人遭到逮捕，被囚禁在胡安·费尔南德斯群岛。

66

马里亚诺·奥索里奥在战场上赢得了胜利，但他的贸易和财政政策严重地危害了这一被再度征服的殖民地。为了防止智利的军事领导人潜入智利，他终止了与阿根廷的所有联系。这对安第斯山地区的贸易和关税收入的影响相当惊人。在他掌权的两年里，关税收入从 1813 年的 130 495 美元减少到差不多为零。根据奥索里奥的贸易政策，所有翻越安第斯山运出、运进的货物均被视为走私货。然而他的海运政策是比较宽松的。他重新开放了同秘鲁的贸易，并在一定程度上容许与中立国的贸易。这一政策惠及了关税收入，从 1814 年的 74 287 比索上升到了 1816 年的 139 000 比索。其他项目的财政收入大幅下降，特别是烟草专卖的收入下降的幅度更大。为了寻找其他收入来源，奥索里奥至少没收了价值 2.4 万比索的爱国者们的财产，又通过贷款和征税募集到约 6.4 万比索。即便如此，财政收入仍不及革命前的一半，而军费开支却几乎增加了一倍。1815 年 12 月，总督决定解除奥索里奥的统帅权，让弗朗西斯科·马尔科·德尔·庞特接替他。为了应对财政危机，这位新都督不顾后果地增加税收、扣押中立国商船。

5. *爱国者们的行动计划*

就在西班牙的前后两位都督于安第斯山这一边全力应对财政问题时，山那一边的智利流亡领导人一直在谋划推翻殖民统治政权事宜。

奥希金斯同阿根廷领导人何塞·德·圣马丁联手结盟，而何塞·米格尔·卡雷拉则前往美国购买武器。他返回阿根廷时，自行组建了一支部队，与奥希金斯—圣马丁联军发生冲突。他逃脱捕获，但他的两个兄弟被捕、遭枪决。这一悲剧性事件所引起的仇恨毒化了卡雷拉家族与奥希金斯的支持者之间的关系，并导致了长期的不和。

1817 年初，奥希金斯和圣马丁的部队突击翻越安第斯山，在查卡布科战役中打败保王军。一年后，他们在迈普战役中再次获胜。保王军连同至少 70 名西班牙大商人逃回秘鲁。这些商人从秘鲁致函费尔南多七世，请求他进行干预，保护他们在智利的财产。智利的爱国者们则从其流亡地阿根廷和囚禁地胡安·费尔南德斯群岛返回故里。智利的领导人拥戴圣马丁出任最高执政官，他拒绝任职，他们于是推举奥希金斯，他欣然接受。

67

奥希金斯亲眼目睹过早先的那争争吵吵，遂对设立立法机构有所保留。美国临时代办西奥多里克·布兰德敦促他设立立法机构时，他回应道，第一届国民大会上的争争吵吵削弱了爱国政府，导致了保王派的胜利。然而他还是设立了一个小型参议院，行使咨询职责。奥希金斯任职期间先后制定的两部宪法亦未有效地限制住其权力。

6. 解放秘鲁

奥希金斯关心的主要大事是协同圣马丁组织对秘鲁的进击，推翻总督华金·德拉·佩苏埃拉。他认为，在所有西班牙政府官员被赶出美洲大陆之前，智利的独立极易再次遭受保王派的攻击。圣马丁和奥希金斯鼓励在智利同他们并肩战斗的战士们参加攻打秘鲁的远征军。奥希金斯当时面临着向远征军提供资金的问题，而他自己的国库却空空如也。为了筹集资金，他没收保王分子的财产，向他们征税，同时也向爱国者们征税。从 1817 年至 1824 年，国库聚集了 90 余万比索的现金，这些钱系没收自敌对势力的财产；国库还征集了 40 余万比索，这些钱来自强制征税。奥希金斯还收到 15 万比索的赎金，这笔钱是两名保王派商人——他们试图向秘鲁总督的新一轮入侵智利提供资金，1818 年被捕——交纳的。

为了控制海洋，奥希金斯决定建设一支海军。他鼓励新近开业的外国商人购置船舶、装备海盗船，同时任命前英国海军军官科克伦勋爵为智利舰队司令，并委派几名美国有经验的军官辅佐他。1819 年 3 月初，科克伦宣布封锁秘鲁各港口，开始禁止西班牙商船活动。智利舰队还将圣马丁的部队运至秘鲁南部地区。他们从那儿向利马进军。圣马丁攻取利马城，宣布自己为秘鲁“护国公”，但他不愿追击撤退的总督部队。科克伦勋爵全歼了太平洋上的西班牙舰队，而后就圣马丁指挥战斗的方式同他发生了龃龉。他突然提交辞呈，并表示愿意帮助巴西赢得独立。委内瑞拉的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也准备在秘鲁作战；他说服圣马丁将指挥权交给了他自己。圣马丁出海流亡欧洲。玻利瓦尔的部队则在 1824 年的阿亚库乔战役中打败了总督。历时 14 年的战斗，南美终获解放。智利虽然没有一位司令官参与这最后的战斗，但在人力（士兵和海员）及财力上对这最终胜利做出了特大贡献。 68

7. 奥希金斯政府

奥希金斯在支持解放秘鲁的同时，也开始使智利成为一个自主的国家。他在制订经济政策时，对智利的贸易潜力有清醒的认识。为了实践他的这一认识，他将总海关从圣地亚哥迁至瓦尔帕莱索，并使这一口岸城市成为西海岸的销售中心。智利商人看到了贸易的迅速发展，但贸易大多控制在外国商行手里，因此他们对这明显的偏袒提出了抗议。他们说得对，早期的一些政策安排的确是偏袒外国人的，后来的政策安排又使他们中的很多人疏远了政府。例如，为了积聚收入，他对他们强制征税，制订严厉的反走私措施，并关闭政府货栈。他 1822 年修改基本贸易法时，同样不受外国商人和本国商人的欢迎，他们迫使他暂缓执行达半年之久。

奥希金斯想要创建一个比较平等的社会，但不是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他尽力废除某些排他性的特权制度，同时提高平民百姓的文化水平。他在一则政令中，废止贵族头衔、禁止悬挂盾徽，以打击一些权贵家族傲视万物的习性。他试图废除长子继承制，但未能如愿。他开辟了一家公共墓地，并在一定程度上允许新教徒的存在，以此削弱天

主教会的权力。为了教育公众，他创办了公共图书馆，重新开办了国民学院，赞助印刷业。他还支持一种英国式的教学方法。

奥希金斯严谨正直、好心一片，但他把许多变革强加给民众，得不到民众的支持。赞赏他的人认为，他是个开明的君主；反对他的人则认为，他是个独裁者。他动用军队维持秩序，甚至强制智利贵族服从他。他错误地认为：没有他们的配合，他就能使智利改天换地。然而时至1822年末，他失去了对其老部下拉蒙·弗莱雷指挥的康塞普西翁驻军的控制。圣地亚哥的权贵集团步弗莱雷之后尘，召集市政会公开会议，要求奥希金斯辞职。奥希金斯起初不信邪，拒绝了其要求。市政会执意要他交权，他别无选择，遂发表一个庄重的、富有爱国激情的引退声明，随后离开智利，终老秘鲁。

8. 新领导

奥希金斯引退后，由一临时执政委员会掌管智利，但时间不长。临时执政委员会颁布新贸易法，降低、简化关税，从而很快就博得了商人们的欢心。军队指挥官拉蒙·弗莱雷接替最高执政官一职。他同意召开国民代表大会，默认了代表人选，并批准了一部新宪法。遗憾的是，大会代表争吵不休，促使弗莱雷将其遣散，独揽大权。不过弗莱雷还是采取了一些自由主义措施的。他废除了奴隶制，解放近万名从事农业劳动和家务劳动的非洲人及马普切人。他还力排异议没收了教会财产。他的这一行动，加上与圣地亚哥主教的冲突，使到访的梵蒂冈使者开始持敌对态度，从而推迟了与罗马关系的正常化。

9. 财政问题

弗莱雷掌权不久，奥希金斯签约借贷的一笔英国贷款拨到智利。贷款总计近300万比索，智利政府将其中一半贷给秘鲁以敷军费开支。弗莱雷未将剩余的款项用于公共工程，而是将50多万比索拨为1823年预算款，将另一些用于攻打盘踞在奇洛埃岛上的西班牙人的战斗。余款下落不明。一年不到，贷款花光；而国家每年得向一家英国银行支付35万余比索。这个数目相当于政府年收入的20%。弗莱雷解决

财政问题的办法是跟一家私人公司立约，由该公司支付英国贷款，而报之以烟、酒专卖权。然而，获得专卖权的这家公司——波塔莱斯—塞亚公司——未能支付英国贷款，遂宣告破产，停业清理。政府亦深陷财政危机，停止支付英国贷款，20 年后才开始支付这笔贷款。

弗莱雷陷入财政危机的部分原因在于贸易的严重萎缩，而独立后贸易是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弗莱雷抛售被没收的教会财产，效果不佳，收入甚微。不光是经济形势困难，资金管理尤其杂乱无章。国库空虚，弗莱雷政府不得不停止支付自己的期票。弗莱雷政府后来寻求借贷时，其差劲儿的信誉封住了所有金融机构的大门。1826 年，长期的财政困境加上政治纷争，促使弗莱雷辞职下台。他梦想重掌政权，曾在军队中的朋友协同下多次图谋接管政府，但均告失败。

1826 年至 1831 年动荡不安，有数位领袖人物先后出任总统。弗朗西斯科・安东尼奥・平托最负盛名。他是一位律师、矿主、商人、将军和外交家，具有卓越的领导才能。他不是圣地亚哥人，他在拉塞雷纳经营矿业。他偏爱联邦制，因为联邦制能使他所在的富裕地区——该地区拥有智利全部出口额的一半以上——获得自主权。因此，他支持载入 1828 年自由主义宪法的联邦制，该宪法还废除了长子继承制。保守的圣地亚哥权贵们却反对这两条，四处活动，力挖平托政府的墙脚。

10. 独裁统治

1829 年 9 月举行的新选举中平托再次当选为总统，但副总统人选一时难以定夺。围绕副总统人选这一问题展开的斗争使国家失控，平托辞职。为支持平托的联邦制，康塞普西翁和拉塞雷纳撤销了对新国民政府的承认。圣地亚哥的保守派竭力劝说康塞普西翁的一批军官同他们联手。自由派军队与保守派军队在利尔卡伊战场交火。保守派获胜后，控制政府达 30 年之久。

19 世纪 20 年代，议会开了一届又一届，宪法换了一部又一部，但均未能在治国方略上求得一致。现在保守派用武力达到了这一目的。据史学家胡利奥・海斯所说：保守派恢复了殖民主义制度，废止公民

自由，取消宗教自由。然而他们在经济政策方面则极为开明。令人遗憾的是：武力成了使国家统一的唯一手段，这是因为当年的不和并不是社会阶级之间的分歧，而是权贵集团内部派别之间的意见分歧。政府严重的财政状况更加剧了争吵。

71

某领袖人物想要夺取政权，就得组成利益联盟，这其间通常包括军队中某个集团的利益。他一旦掌了权，就要冒险解散争吵不休的议会，强制实行独裁统治。虽然有些史学家认为奥希金斯行为如同独裁者，但是他在圣地亚哥的权贵们公然反对他时，却决定辞职而不是争斗。19 世纪 30 年代居统治地位的保守派要独裁得多。19 世纪 40 年代和 50 年代，这一派别在组织和思想上确实开放多了，但还是发生了一些严重的暴乱。保守派掌权期间，19 世纪 20 年代的自由主义思想并未被遗忘，反之，倒成了 19 世纪 60 年代实行议会统治的历史里程碑。

第四章　矿主、商人和庄园主（1830—1861）

一、秩序与自由

1830 至 1860 年期间，只有三位总统任职，各任职十年。参议员任期九年，众议员任期三年。总统亲自挑选议员候选人，因此他们一定能当选。总统还指定市政官员和地区官员。要镇压反对派，他就宣布戒严，通常控制司法部门、支持一派反对另一派。政体名义上为代议民主制；但受财产要求所限，参加选举的人很少。例如，1834 年参加投票的人数不足 7 000 人，而人口总数为 100 万以上。1849 年投票人数有所增加，达 1.8 万人，而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投票人数又降了下来。 73

19 世纪 50 年代发生过两次反独裁统治的重大反叛运动，其部分原因就是这种政治参与的欠缺。像本哈明·比库尼亚·马肯纳和马塔兄弟这样的一些自由派领导人要求更大程度的政治自由；自由派矿主佩德罗·莱昂·加略出资组建自己的军队，试图推翻独裁统治。1851 年和 1859 年两度反叛的领导人虽说是为自由主义的理想而战，但为其地方利益而战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他们大多是南方人和北方人，而不是中央谷地的人。在南方，军队对其待遇心怀不满，土地所有者因得不到政府的资助而不满。在北方，矿主们因纳税向政府提供资金却 74

得不到什么回报而心生怨怼。

1. 拉丁美洲的问题

必须将智利对政治自由的限制及其各地区间的紧张关系放到整个拉丁美洲这一大背景下进行考察。本半球的独裁者和革命践踏民众的权利，并往往危及其生命。独立和自治并未开创一个发展进步的新时代，却造成了停滞、甚或衰退。墨西哥——富足的前殖民地新西班牙——政治动荡不安，1860 年之前只有一位总统是任期届满下台的。独立后 50 年了，墨西哥的人均收入犹低于殖民地时期。巴西和阿根廷虽然取得了重大经济发展，但深受地区分离运动之苦。

拉丁美洲的政治环境十分险恶，反对派领导人和文化人往往逃至他国寻求安全栖身之所。安德烈斯·贝略是位杰出的委内瑞拉学者，为躲避自己国家的独裁政权，移居智利。他在该国成了智利大学校长，编纂了智利民法大典。多明戈·F. 萨米恩托——著名的阿根廷作家、未来的总统——移居智利，逃避胡安·马努埃尔·德·罗萨斯的暴虐统治。他在瓦尔帕莱索从事新闻工作，阐发其教育思想。异域来访者们认为智利和平有序，称之为“南美洲的英格兰”。许多科学考察队（诸如查尔斯·达尔文和克劳迪奥·盖伊率领的科学考察队）在智利到处受到护卫，从而得以对其自然、政治发展史进行充分研究。盖伊的研究及其多卷本著作的出版还得到了智利政府的资助。

西半球各新兴共和国赢得独立后，均全力创建可行的政治经济制度。早先美国曾经历过十年的政治经济动乱，直到十三州联邦宪法被废止、代之以现行宪法才解决问题。同样，智利也试行了多部宪法，力求协调秩序与自由之间的关系。1830 年至 1860 年，智利的种种制度最终得以确立，经济自由先行，随后实现政治自由。政府制定经济规则，市场负责确定物价、货物流通和财富分配。这一自由拓展了国外市场和国内市场。商人们积聚了财富后就提出参与政治决策的要求，这毫不奇怪。那些觉得其意愿无人理会的人发动了 1851 年和 1859 年的武装暴动。他们的目的不是要废止经济制度，而是要发展政治制度。

75

2. 经济变革

有限的政治参与并未妨碍智利人开创一个物质大发展的时代。这一点在瓦尔帕莱索表现得最为明显。商人们将该港口城市从一个死气沉沉的城镇变成了“太平洋的商业中心”。世界各地的商船前往亚洲、加利福尼亚和欧洲时都要在此停泊。许多总部在费城、利物浦、不来梅、马赛和加的斯等地的公司都在该港口城市从事经营活动。来自世界各地的捕鲸船都到南部港口城市康塞普西翁购买生活必需品。而铜则使北部的科金博成了一个国际性港口城市。

商人们促使经济政策从一个明显惠及特定集团的政策变成了一个私人企业确定市场规则的政策。政府原本试图保护本国的手艺人、制造商、商人和商船。而当利益冲突和实施困难使保护措施失效时，政府就逐渐废止了其中的许多措施。减税是另一个问题，各集团均为减税游说议会。而它们又都希望政府筑路、修码头、建仓库、修灌溉渠，但资金短缺，多数工程一时难以动工。私人资本渐渐承担了一些工程。投资者们开通了第一条轮船航线、修筑数条铁路、开挖了数条灌溉渠。

不幸的是：19 世纪 30 年代初智利国库空虚，国内外的放款人都吃不准借款是否会偿还。尽管国家形势危急，主要经济集团还是想要减税或干脆取消。因此财政部长马努埃尔·伦希福决定减税。减税是否使经济有了增长，现在说不准，但政府获得了更多的政治支持却是实情。19 世纪 30 年代银矿的发现成了经济增长和政府收入增加——从 1830 年的 160 多万比索增加到了 1860 年的 850 多万比索——的主要刺激因素。这笔财富最终使议会得以向公共工程和公用事业提供资金。除了公路和铁路的修筑外，议会还资助教育、增加军费。　76

二、采矿业

与其他各业比较起来，采矿业是智利经济发展的原动力。独立运动期间，采矿业没有受到什么影响，遭到破坏的是农业地区的庄园。传统的采矿方法使外国人望而却步，他们试图改进采矿方法。19 世纪 20 年代银矿的发现增加了矿物产量，矿石的价格也开始暴涨，这在一

定程度上是因为航运业和贸易的大发展。这一发展态势使外国人得以在19世纪30年代引进工业化采矿法，用上了蒸汽机，并使坑道得以加固、铁路得以增修、反射炉得以扩建。这些革新需要资金、技术人员以及政治支持。

1. 查尔斯·兰伯特

智利独立后，英国投资人组建了三家采矿公司，旨在购买智利的矿山、采用威尔士的采矿技术。智利采矿公司派遣查尔斯·兰伯特随同两名管理人员前往智利开展经营活动。兰伯特是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地质学家，他曾勘探过智利的矿产区。他们三人没有直接前往智利，而是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登陆，骑马穿越潘帕大草原，然后徒步翻越安第斯山，时令正值冬季。兰伯特一行于1825年9月抵达北奇科地区，随即开始对矿石进行试验、与矿主会晤、占有地产。他对生意的前景持谨慎乐观的态度。他在1826年2月写给管理人员查尔斯·多布森的信中说："……花上个20万左右的比索……不出几年，如果一切顺利，可以捞个数百万，我敢肯定。"然而伦敦股票市场崩盘时，公司宣告破产，美梦未能成真。多布森自尽，另一位管理人员则成了酒鬼。兰伯特以公司名义所作的投资血本无归，但他仍有足够的资金以自己的名义实施对采矿业的风险投资。

兰伯特最具价值的资产是他的矿物学知识和他适应当地文化的能力。他首先应用自己的才智从贝尔纳多·德尔·索拉尔手里收购了一堆硫化铜矿渣。索拉尔认为这些东西不值钱，智利的技术难以从中炼取铜。而兰伯特知道只要建一座反射炉，就可以获取熔炼这些矿渣所需的较高温度。他对索拉尔的矿渣进行了加工，对矿渣的开采未花一分钱，从而节省了一大笔开销。兰伯特还机敏地认识到，只要向其他矿主提供贷款，就能保证自己会有源源不断的矿渣供应；同时他还从海外售铜生意中得到佣金。

77

兰伯特知道政府的政策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自己的事业。他想减少自己出口铜的费用，大胆地向科金博地方政府贷款10万比索，以促使其降低关税。这一举动引起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但

兰伯特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然而就是兰伯特这样机敏的企业家也难以预测智利政治的风云变幻。1851 年拉塞雷纳发生叛乱，革命者们劫持了兰伯特的“萤火虫”号轮船。兰伯特支持政府。政府打败革命者们后，将轮船还给了他。兰伯特在这次事件中得罪了许多支持革命的当地矿主大佬，于是他决定移居南威尔士的斯旺西。他已与那儿的炼铜厂主建立了紧密的业务联系。他让他的儿子卡洛斯·塞贡多留在智利经营当地的一些业务。20 余年后的 1876 年，兰伯特在威尔士去世，留下价值大约 500 万比索的财产。

2. 白银

在兰伯特改进炼铜技术、增加生产的同时，其他人则发展起了白银生产。19 世纪 20 年代，探矿者们在科金博地区的阿克罗斯和特雷斯彭托斯发现了银矿。这些富矿增加了白银出口的数量，从 1820 年的价值 50 万比索增加到了 1830 年的价值 110 万比索，从而使衰退的经济得到了振兴。1832 年在北部城市科皮亚波附近的查尼亚尔西略发现了智利历史上最大的银矿。最先是一位贫穷的、名叫弗洛拉·诺尔米利亚的印第安妇女告诉她儿子胡安·戈多伊的，说查尼亚尔西略有许多银矿石。他们同地产主米格尔·加略一道注册了矿产所有权。这一矿藏同本地区的其他矿藏一道增加了白银的出口，从 1840 年的价值 160 万比索增加到了 1850 年的价值 410 万比索，1855 年的价值几达 800 万比索。不幸的是，从此往后，高纯度的矿石日益减少，生产随之逐渐下降。

3. 坎德拉里亚·戈耶内切亚和佩德罗·莱昂·加略

78

米格尔·加略去世后，他妻子坎德拉里亚·戈耶内切亚承担了矿山的经营管理重任。她认识到现代化交通对发展其矿山的重要性后，投资修建了智利的第一条铁路，连通科皮亚波和卡尔德拉港。她明白教育的重要性，因而送儿子佩德罗·莱昂·加略到一流的圣地亚哥国民学院接受教育。在此期间，莱昆·加略为一家报纸撰稿，并加入了国民卫队。1851 年爆发革命反对马努埃尔·蒙特为总统候选人时，加

略所在的国民卫队受命保卫政府。佩德罗为维护蒙特而战，然而科皮亚波的许多矿主却反对蒙特。

两年后加略返回家乡，在蒙特的支持下被遴选进了市政会。蒙特后来又撤了他的职，因为他拒不执行一项行政命令。加略不久即开始同蒙特的对手合作，要求修改1833年宪法。当政府围捕他的政治同情者、并将他们押上船送往利物浦时，加略决定组建自己的军队推翻蒙特。加略利用自己充裕的银、铜财富，招兵买马组建自己的军队，铸造自己的钱币，制造自己的枪、炮。1859年3月14日，他指挥一队1 200人的步兵、一支200人的骑兵和一队60人的炮兵在拉塞雷纳市郊的洛斯洛罗斯打败了政府军。然而一个月后，新近调来增援的政府军在塞罗格朗德打败了加略。加略被判死刑，但他逃到了阿根廷。在流亡期间，他一直受到他母亲坎德拉里亚的资助。坎德拉里亚在儿子流亡他乡时经管家族生意，她用自己的资财救助士兵家属。两年后，新总统何塞·华金·佩雷斯针对1859年的所有革命者批准了大赦法，允许加略和许多其他人英雄般地返回家乡。加略由此开始了一帆风顺的政治生涯，五次当选为众议员，一次当选为参议员。在他1877年去世时，他的母亲坎德拉里亚尚健在。她从事了多种社会活动，其中之一是在太平洋战争结束后帮助士兵们解决问题。

4. 何塞·托马斯·德·乌尔梅内塔和马蒂亚斯·库西尼奥

19世纪中叶白银曾极度繁荣，但而后的投资渐渐转向了采铜业。79 19世纪70年代，智利生产的铜占世界供应量的1/3强。何塞·托马斯·德·乌尔梅内塔是智利19世纪最有成就的铜业大王，历史学家里卡多·纳泽尔·阿乌马达在为他写的传记中述说了一切。乌尔梅内塔同他之前的兰伯特一样，知道要重视采矿技术。他在开发塔马亚矿时，就不再开挖那种传统的不合规范的矿井了，而是开凿坑道，并以坑木加固，使用铁轨和手推车运送矿石。他用蒸汽机带动矿上的水泵和碾磨机。他虽然雇用有技术的外国人在其冶炼厂中做机械工和木工，但大多数工人还是智利人。他那矿山上和冶炼厂中的工人总数超过一万人。1871年，他的冶炼厂炼出的铜占智利总量的一半以上；然而打那

之后，这一比例就下降了。他在科金博地区的瓜亚坎、通戈伊和托托拉利略建了几座冶炼厂和一些出口设施。采自他自己矿山的矿石在瓜亚坎冶炼，而其他矿主——通常都是一些向他贷款的人——则将矿石送到通戈伊和托托拉利略冶炼。他用一条铁路连接塔马亚矿和瓜亚坎冶炼厂。后来他又建立一家煤炭公司，为其冶炼厂生产燃料。

乌尔梅内塔还开拓其他业务。他最早开拓的业务之一是开办了一家圣地亚哥面粉厂。煤气照明普及后，他同他女婿马克西米亚诺·埃拉苏里斯联手拓展了这一公用事业。他在其他方面的投资还有智利国家银行、一家保险公司、一家信贷公司、一家建筑公司、铁路和轮船。此外，他还有闲暇供职议会，当了两届众议员和一届参议员。1870年，他以反对党候选人身份竞选总统；但选举受到操纵，所以他气愤地退出了竞选活动。

另一名具有革新精神的矿主是马蒂亚斯·库西尼奥。他原本着力于采铜业。同其他矿主一样，他用当地木材作燃料供应他的冶炼厂；但过度采伐致使木材供应断绝，所以他进口了英国煤炭。然而他认为智利能够生产自己的煤炭，所以在康塞普西翁地区他收购了几处生产难以维持的煤矿，开始扩展这些煤矿的生产。他不是将煤北运至他的炼铜厂，而是将铜矿砂船运至他的煤矿区。为了降低运输成本，他还投资兴建了两条铁路。不久他即成了智利最大的煤炭生产者之一，成了一位知名的谷物商。他的经济成就使他涉足政坛。1849 年至 1855 年任众议员，1855 年至 1864 年任参议员。他死后，他儿子又增多了家族财产。他在世时，在圣地亚哥建造了一座豪宅；他儿子学他的样，在首都遛马场附近建造了一所装饰华丽的宅第和壮观的大花园。后来他将其捐赠给了圣地亚哥市，市里又将其辟为公园，起名为“库西尼奥公园”。20 世纪 70 年代政府为表示爱国，将公园的名字改成了“奥希金斯公园”，捐赠者的姓氏不见了。

80

三、贸易

19 世纪 20 年代往后，关税率的下降促进了贸易的发展。各色各

样的欧洲产品涌入智利，其中以纺织品为主，其次为采矿设备和家具。纺织品包括供应工人的廉价布匹和供圣地亚哥权贵消费的高价织物。智利商人和来自许多国家的外国商人进口了种种货物。英国商人运进了毛料、棉花、纸张、乐器、酒类、陶器、刀具、机器、水银、帽子、玻璃和武器，主宰着市场。美国商人占次席，运进了源自法国、中国和印度的烟草、大米、海军补给品、蜡烛、鲸鱼油、家具、朗姆酒和制成品。开公司的还有来自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南美的商人。智利人为外国公司代销货物，也独立经商。商人们最欢迎用铜和白银支付进口品，但也用船装运小麦、牛皮、羊毛、牛肉干和新鲜农产品。

本国港口城市间的贸易和零售业由智利人操持。公民身份法虽然开明但实施不力，所以未能使移民商人积极参与其间。商人们用船从南方装运谷物和其他食品到北方矿区。例如，像胡安·安东尼奥·潘多和马蒂亚斯·库西尼奥这样一些粮商在毛莱河畔兴建面粉厂，将产品装船北运。加利福尼亚淘金热期间，他们还争相进入了旧金山市场。他们向庄园主提供贷款，以确保谷物供应。庄园主们开辟自己的渠道，向矿工供应鲜肉和牛肉干。他们的牧工从中央谷地驱赶羊群和牛群前往北部地区，并向商人们出售牛肉干；商人们用船将其大批量装运至北部地区。

1. 何塞·托马斯·拉莫斯·丰特

像何塞·托马斯·拉莫斯·丰特这样的一些商人专门大规模经销智利和南美的物产。他主要经销秘鲁、厄瓜多尔、巴拉圭、乌拉圭和巴西的农产品，同欧洲大型贸易公司相竞争。根据其传记作者胡安·爱德华多·瓦加斯所述，他以很少的资本起家，末了儿成了智利十大最最富有者之一。他父亲是个葡萄牙移民，开始时在圣地亚哥经营一家小小的零售店，瓦尔帕莱索贸易兴起后，他移居这一港口城市。独立战争开始后，他父亲送他到利马同叔叔一起生活，并继续求学。圣马丁占领秘鲁后，他往返于利马和瓦尔帕莱索之间了解政局和贸易情况。他的首批投资之一是在瓦尔帕莱索开办一家啤酒厂，同进口啤酒

81

相竞争。他还获得了一份政府税收合同。后来他到南方开辟天地，为美国商人奥古斯特·海门威收购羊毛，并在康塞普西翁投资兴建一座现代化面粉厂。

他的民族背景助他成了富裕的葡萄牙商人弗朗西斯科·阿尔瓦雷斯的搭档。此人有四艘船，他只有一艘。他们合伙在智利沿海和北至秘鲁、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经销谷物、面粉、牛肉干、葡萄酒、奶酪和木材。返程时，他们从这些北方国家运回蔗糖、大米和巴拿马草帽。同巴西交易时，他们运去帽子、小麦、铜、茴香和干果，运回蔗糖、马黛茶和咖啡。

加利福尼亚淘金热兴起后，似乎立马就会来财。旧金山的物价飞涨，拉莫斯乘机同其他人合伙船运粮食、酒类、木材和服装。起初，一打鸡蛋售价高达 4 美元；但一年后价格暴跌，合伙人们亏损了金钱。他们还向前往淘金地的智利矿工贷款，但矿工们没有还钱。价格下跌和赖账不还致使合伙人们在其加利福尼亚的生意中亏损了 1.7 万美元。

幸运的是，拉莫斯在其他方面的生意中收入颇丰。他根据自己与秘鲁进行蔗糖贸易的体验认为：生产蔗糖要比船运来钱多。1861 年他卖掉船，在秘鲁的奇克拉约购买了两处种植园。他花 13.6 万比索买了 4 858公顷种植甘蔗的良田和 7 702 公顷的撂荒地。炼糖厂需要进行现代化改造，所以他投资 20 余万比索从英国进口机器，并作了其他方面的改造。招工也是个问题。他从智利招来的工人回了家，而秘鲁政府又禁止他从波利尼西亚招的工人入境。他最后转向招雇自由华工和契约华工。时至 1874 年，他雇用了 1 600 多名工人在种植园和炼糖厂劳作。30 年间的蔗糖产量从每年不足 20 万千克上升到了 200 万千克，使种植园增值 4 倍，达 170 万比索。 82

拉莫斯向其他发迹的商人学习，1881 年花 30 万比索在圣地亚哥以北购买了一处 1.9 万公顷的庄园。他还在城市投资于煤气业、保险业和银行业。他 1891 年去世时，他的财富价值已达 400 多万比索。不幸的是，他的子女们都不具备他拥有的经营才能，最后卖了他所有的公司企业偿还债务。他的子女们都不像他那一代的其他有钱人家那样，

既没有成为政治、经济或文化显要，也没有同历史悠久的权贵家族联姻。

2. 迭戈·波塔莱斯

即使在那经济普遍繁荣的年代，也还是有许多商人未能发迹。例如，迭戈·波塔莱斯曾做过多种生意，但均告失败，后来他是在政治上、而不是在商业上出的名。他父亲圣地亚哥曾在殖民地时期任铸币厂厂长，是个积极支持独立的人。然而迭戈并未投身独立运动，而是专心从事与秘鲁的贸易活动。19 世纪 20 年代，他及其合伙人何塞·马努埃尔·塞亚瞅准机会，从政府手中接管烟草专卖生意，报之以替政府偿还英国贷款利息。然而专卖生意亏损，波塔莱斯的公司违约未能还债。在政府清理公司财务时，一些评论家认为：波塔莱斯和塞亚应该干得很好。这一事件把波塔莱斯推上了政治舞台，他为《饥饿者报》撰写讽刺性的评论文章。政敌们称他及其追随者为“专卖人”。

他权欲旺盛，不屑于干公务琐事。他在 1831 年将华金·普列托扶上总统宝座的活动中起了重大作用，但在先后担任了几个内阁职务后提请辞职，重又回到瓦尔帕莱索做起了他的生意。他不时利用自己对普列托政府的政治影响。例如，他帮威廉·惠尔赖特赢得往来于智利和秘鲁间的轮船运输特许经营权。而他自己的买卖却鲜有获利。他伙同另一人投资 5 400 美元将牛育肥，而后在瓦尔帕莱索这一港口城市上市。他已是债台高筑，还试图开办一家炼铜厂。他在难以向其朋友胡安·迭戈·巴尔纳德提供一份信用证时，拼命催促欠他钱的马努埃尔·塞亚还债。他 1837 年被处决时，其买卖仍无起色。如果不是因为他有着特殊的政治经历，史学家们是不会将其从众多碌碌无为的商人中单挑出来加以记述的。

83

3. 威廉·惠尔赖特

波塔莱斯的朋友威廉·惠尔赖特倒有着成就卓著的经商生涯。他虽说是出生在马萨诸塞州，但一生在南美从事贸易和运输活动。19 世纪 20 年代，他在瓜亚基尔主管一家贸易公司。19 世纪 30 年代瓦尔帕

莱索发展成为贸易中心后，他移居该港口城市。他很快就意识到新运输方式将会使贸易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这类事业的成功通常有赖于他同私人和政府之间建立起来的关系。他向政府进行游说，成功地为太平洋轮船航运公司赢得了特许经营权。他难以在智利和美国弄到投资资金，转向英国寻求起动金和政府合同。他做了许多工作后说服了一些英国投资人购买了一艘船，1840 年开始营业。头几年公司亏损，如果不是英国议会每年给予的现金支付的邮政特别津贴的话，公司就垮了。即使是私人从事经营活动，政府支持通常也是成功的关键。

轮船航行运营的同时，惠尔赖特又转向铁路和电报事业。他说服一些像坎德拉里亚·戈耶内切亚和马蒂亚斯·库西尼奥这样的知名矿主及其他一些人投资于他的铁路公司。公司于 1851 年开通智利的第一条铁路，从科皮亚波矿区到卡尔德拉港，因而获得殊荣。公司起初从英国进口煤，但在康塞普西翁附近发现了足够的煤后，惠尔赖特、库西尼奥和其他投资人开办了他们自己的煤矿。他们卖煤给铁路公司和炼铜厂。

商人们需要及时了解市场信息，以便降低他们的营业风险。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惠尔赖特 1852 年引进了电报，在瓦尔帕莱索与圣地亚哥之间架设了一条电缆。其他方面的智利企业经营状况不佳，所以他转向阿根廷，在那儿修筑了第一条铁路，从罗萨里奥穿越潘帕大草原直达科尔多瓦。他游说阿根廷政府，成功地获得了特许经营权，又在英国筹集到了所需的资金，从而再次显示了政府和企业这两方面支持的重要性。惠尔赖特游说智利、阿根廷和英国政府以及在南美和欧洲两地筹集资金的本领，是他获得成功的关键。其他一些未能将政府和投资方的利益结合起来的企业家，通常成功不了。

四、土地所有权的变化

许多发迹的商人将其收入——至少是一部分收入——投资于土地。84
其他东西的价格波动不定，唯有土地的价格持续上涨，故而土地成了稳当的投资对象。土地也意味着智利权贵访问欧洲时有了新身份。他

们的思想逐渐发生了变化，他们的理想不再是修建殖民地时期的乡村庄园住宅，而是兴建修饰清新的法国式或英国式庄园宅第。智利的企业家们向法国或英国庄园主学习，兴建富丽堂皇的乡间宅第，门前两旁植树修建林荫大道，并开辟有景色秀丽的花园。他们还对所购得的土地进行智力投资，修建灌溉渠、采购机器、试种新品种作物。

新土地权贵们千方百计通过儿女婚事与老式富裕家族联姻。他们重新确认了教育对企业的重要性。他们的后代如果是儿子，他们通常让其学习法律，从事房地产生意、银行业、投资和政治活动；如果是女儿，他们就让其学会主持大家庭事务、款待权贵和解决家庭问题的本领。

许多权贵都涉足政治。他们满怀激情地从事有关国家问题的写作，但并不仅仅是干新闻工作。他们当议员、担任内阁职务。他们如果自己经营庄园，就进行遥控，作有关作物、收购和出售的决定，靠一名总管操持日常事务。其他人情愿将土地出租给别人。夏季全家人在庄园度假，但全年其他时间都活动在城市。

1. 拉腊因家族

要了解有权有势的拥有土地的家庭的演变发展过程，就得研究一下最令人瞩目的家族，其中之一就是拉腊因家族。史学家阿诺德·鲍尔和玛丽·洛文瑟尔·费尔斯蒂纳的著作就拉腊因家族提出了重要而又深刻的见解。据他们所述，第一批移居智利的拉腊因家族成员是17世纪到的。他们致力于教育事业和政府工作，担任圣费利佩大学校长、圣地亚哥市市长和民团司令。与此同时，拉腊因家族占有了大面积的土地。1878年，何塞·托里比奥已拥有足够的资本用以经营庄园了，从而赢得了“拉腊因家族侯爵”称号。他积极从事贸易活动，包括同英国商船“天蝎”号进行的走私贸易——这一走私活动导致加西亚·卡拉斯科都督政府发生了一场危机。

85 拉腊因的妻子多洛雷斯·莫霍也出生于豪门。她和丈夫均出生在智利，但都拒不支持危及其地位的独立运动。而拉腊因家族的另一支没有贵族称号，则全力支持独立。何塞·托里比奥和多洛雷斯虽然站

在保王派一边，但还是设法保住了他们的财产，没有受到迫害。

1822 年，英国评论家马丽亚·格雷厄姆走访拉腊因家的庄园比卢科；庄园地处迈波河南岸，离圣地亚哥一天的路程。她对庄园，特别是果园、葡萄园和良田沃野之美赞叹不已。她估计，农作物和 9 000 头牛使每年的收入高达 2.5 万比索左右。大儿子拉法埃尔·拉腊因·莫霍生于 1813 年，后来继承了这座庄园、家族财产及其保守的政治立场。他接管庄园后，决定卖掉地处南面考克内斯的一处养牛场，以筹集资金提高比卢科的生产能力。他同另一土地占有者在全国农业协会共事，积极引进现代农业技术在智利推广。

拉法埃尔同他那个时代的许多富有的庄园主一样，特别关心政治。他与总统华金·普列托·比亚尔的女儿维克托里亚·普列托的婚姻并未妨碍他事业的发展。1849 年，他当选为众议员，干了九年，而后当选为参议员，从 1855 年干到 1882 年，曾担任过一届参议院议长。他的政治生涯使他得以结识一批投资人。他们创办智利银行，并推选他为银行的董事长。他还投资兴建从圣地亚哥到塔尔卡的铁路。这一工程受阻时，他支持政府插手其间。后来他儿子路易斯感到制造业是个发展的新领域；但为了筹集资金不得不变卖家族的一部分土地。他虽然使家族的经济权益多样化了，但仍忠于家族的保守政治信念。

2. 费尔南多·拉斯卡诺·穆希卡

另一个与政治关系密切的地主家族是费尔南多·拉斯卡诺·穆希卡家族。费尔南多同他的父亲一样是学法律的。1832 年他被任命为上诉法院秘书。1851 年，马努埃尔·蒙特总统任命他为司法、宗教及教育部部长。他根据其保守的宗教信条试图用教士顶替在国民学院任教的世俗老师时，激起了师生们的愤慨。蒙特明智地决定避免同学生对抗，将他调任临时财政部部长。那一年他当选为参议员，任期九年，后来任参议院议长。 86

他除了做律师和从事重要的政治活动外，还经营着埃尔瓜伊科庄园。该庄园位于圣地亚哥以南 100 英里处，是他和妻子多洛雷斯·埃乔伦·拉腊因购置的。为了提高土地的出产能力，他们修建灌溉渠，

浇灌着 4 000 多公顷的土地。19 世纪 80 年代时，这一措施使庄园升值高达 60 余万比索。不可思议的是：拉斯卡诺没有像拉法埃尔・拉腊因这样一些同僚那样广为分散投资。拉斯卡诺去世时，其家产价值达 150 余万比索，但其中只有 5% 投资于股票和债券。他的三个儿子继承了他对政治的酷爱，当过议员、部长和驻外大使。有个名叫费尔南多・拉斯卡诺・埃乔伦的儿子甚至还在 1906 年竞选过总统，但输给了佩德罗・蒙特。可惜的是，就在拉斯卡诺家族对政治的兴趣日益浓厚的同时，家族经济景况却每况愈下了。

3. 霍苏埃・瓦丁顿

除了拉腊因家族和拉斯卡诺家族外，购置庄园的移民有着极其不同的背景。例如，霍苏埃・瓦丁顿起初就是个商人。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为一家英国公司服务五年后，于 1871 年移民智利。他在瓦尔帕莱索开展寄售业务，沿南美西海岸分运英国货、出口农产品和金属。他为了生产自己的出口农产品，用三万比索购买了圣伊西德罗庄园；庄园位于瓦尔帕莱索西北约 25 英里处，就在利马切镇附近。

这一地区降雨有限，影响了他的养牛业和冬小麦的生产。他难以种植各种水果和蔬菜以应航运界之所需。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瓦丁顿大胆地开凿了一条全长 72 英里的灌溉渠，从阿空卡瓜河直达他家庄园。有人自己掏钱搞这么大一个工程着实震惊了其他庄园主。然而他们看到圣伊西德罗庄园增值后，也开筑了水渠，只是工程较小。数年后瓦丁顿的后人将圣伊西德罗庄园卖给阿古斯丁・爱德华兹时，圣伊西德罗是全国最有价值的庄园之一。

农业是瓦丁顿的许多经营业务之一。其他业务计有城市房地产、采矿业和铁路。例如，他 1833 年买下了圣奥古斯丁修道院在瓦尔帕莱索的土地，兴建起了自己的豪宅，又将其余土地划分成小块出售。在采矿业方面，他向矿主赊销货物，换取专购合同。他在拉塞雷纳附近拥有几座铜矿，但 1860 年以 1.5 万比索的价格卖给了乌尔梅内塔。他为了改善从其庄园到港口的货物运输条件，投资修筑了从瓦尔帕莱索到圣地亚哥的铁路。在智利与秘鲁—玻利维亚邦联交战期间，他为智

87

利政府筹措资金。不幸的是，在30年后的1866年那次短时的冲突中，西班牙炮击了瓦尔帕莱索，毁了瓦丁顿的货栈，致使他宣告破产。他四处奔走，努力挽回损失，不久获得了为瓦尔帕莱索这一港口城市修建自来水厂的合同。他虽说是瓦尔帕莱索最有影响的企业家之一，但从未担任过公职。而他的三个儿子则全都当选成了众议员。

对所研讨的这三位庄园主来说，农业是营业活动之一。他们都不生活在自己的庄园上，而是生活在城市里。他们的投资意识极强，应用多种方法提高土地的生产能力。但他们并不将其兴致限定在土地上，他们投资于铁路、银行业和城市房地产。上文研讨的矿主、商人和庄园主中，有六人担任过重要的政府职务。加略、乌尔梅内塔和库西尼奥是自由主义者，而拉腊因、拉斯卡诺和波塔莱斯则是保守主义者。拉莫斯是个异类。作为一个富有的智利人，他可以谋求政务，却决定一门心思做生意。三位移民兰伯特、惠尔赖特和瓦丁顿千方百计游说政府，以获得特许权，但不任公职。这些人全都从智利的市场经济和社会稳定中得到了好处。自由主义者们要求更多的政治自由，而保守主义者们则担心自由度增大可能会引起不安定。

五、职业与政治

诚如智利领导人就本国政治文化所说的那样，意见不合生帮派。起初谈不上什么真正的政党，结盟的基础是家族、宗派或政治信条。为了提高成员的忠诚度，对立的派别均以富有刺激性的名字称呼对方。保守派嘲笑所有主张联邦制、言论自由和世俗主义的人，称他们为“新派”。自由派则嘲笑那些主张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限制民权和政教合一的人，称他们为“老派”。然而只有富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和军人才能参政。他们所倡导的政治文化在一个时期内影响着政府的功能，其他群体后来才有权参政。

88

从事采矿和贸易活动的家族很可能成为新派，而经营庄园的家族则很可能成为老派。新派比较能吸引新富翁和有才干的人；而像马努埃尔·蒙特和马努埃尔·伦希福这样的少数人虽然具有这一背景，却

成了老派人物。这两派谁也没有想过要同农民和矿工打交道。智利宪法——不管是自由主义宪法还是保守主义宪法，只将选举权授予有产者。

虽说大多数政治家都出身于同一个社会阶级，但经济、地区和家族利益将他们分成了截然不同的营垒。1830 年至 1860 年，分歧得不到解决，争论陷入僵局，军方出面干预。政治领袖们都游说军事指挥官们，希望他们站在自己一边。这种事情一旦发生，军队往往分裂成对立的两拨儿，通常会兵戎相见。例如，自由派 1822 年唆使弗莱雷将军反抗其前司令官贝尔纳多·奥希金斯。1830 年，保守派如法炮制，怂恿华金·普列托反对其前司令官拉蒙·弗莱雷。更加不可思议的是两个表兄弟马努埃尔·布尔内斯和何塞·马丽亚·德拉·克鲁斯，前者是支持保守派的将军，后者为支持自由派的将军，竟在 1851 年内战期间兵戎相见，血战沙场。

军人原本就是导致共和国分裂、而不是使其安定的因素。1831 年至 1851 年间的历任总统均为职业军官，而后过了 40 年才有另一位军官登上总统宝座。马努埃尔·蒙特是第一任文人总统，他使军队听命于文官政府，这样做加强而不是削弱了政府。1830 年至 1861 年期间的历届政府也经常借口保卫国家暂时取消公民自由权；然而后来，国家领导人就允许各抒己见、靠辩论和政治活动而不是枪杆子解决分歧了。

1. 波塔莱斯时代

智利政坛上最具影响而又最令人捉摸不透的人物之一，就是迭戈·波塔莱斯。他善于指挥别人，而不精于公共行政管理之道。1829 年的一场政府危机使他第一次有机会将其保守派盟友推上台掌握政权。1830 年再次发生危机时，他控制了政府，但不是以总统而是以内阁部长的身份对政府进行掌控。他同时担任了所有内阁职务，对政府进行着一种奇特的掌控。全国形成了两大政对阵营，军队也分裂了。在保守派的支持下，华全·普列托将军了 1830 年 4 月 17 日在利尔卡伊战役中打败了前自由派总统拉蒙·弗莱雷。

89

这一胜利使波塔莱斯得以加强对政府的控制。首先，他取消地方

选举、放逐重要的自由派领袖，从而废止联邦制。而后，他开除 136 名曾经支持过弗莱雷的军官，并拒绝向他们发放退役补助金。他凭经验确知，军官们往往调动自己的军队推翻政府，所以他裁减军队、加强国民卫队。保守派执政期间，一旦发生民众骚乱，他都调动国民卫队去维护秩序。

波塔莱斯意识到保守派已牢牢控制住政府时，就回到瓦尔帕莱索进行商业投机买卖了。仍在掌权的保守派人士没有谋私利而是在全力拟定能长久应用、体现保守主义理念的制度，这给他们带来了荣誉。他们首先着手拟定新宪法。起草人马里亚诺·埃加尼亚和马努埃尔·何塞·甘达里利亚斯决定强化总统的权力、弱化立法机构的权力。1833 年正式生效的这部宪法允许总统连任两届，每届五年。这不仅使他得以控制议员选举，而且使他能够自行暂时停止实行宪法、宣布实行戒严。1830 年至 1861 年期间掌权的历届总统均认为这一条可用作遏制不同意见的有效手段。

保守派的政治制度排斥新思想，但他们的经济制度却倡导革新。财政部长马努埃尔·伦希福制订了贸易、税收和国家财政改革新策略。他发现政府档案一片混乱：不光是国库空虚，就是收入、支出和债务档案资料也乱七八糟。矿主、商人和庄园主原以为独立带来的彩金是减税，但战争花销加上管理不善却往往要增税。为赢得他们的支持，伦希福给了他们一些好处。为了矿主，伦希福提高了铸币厂付给他们的黄金收购价，并第一次允许他们出口未铸成钱币的银条。为了商人，伦希福拟定了 1833 年税则，实行浮动关税，这降低了大部分进口货的税率。他还修订了保税仓库条例，以鼓励商人们将销售到太平洋岸其他港口的货物先运到瓦尔帕莱索。他又在对运给本国商人的进口物品征收关税时打折，以促进智利商行的发展。而为了讨好庄园主，他降低农产品销售税，并暂停征收农业什一税。

伦希福像美国财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那样，也着力提高政府的信用度。1830 年，智利有外债 500 万比索、内债 200 万比索。国家一年的支出超过收入，信用度持续下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双管齐

90

下：缩减政府开支，同时调拨专款向贷款人偿还债款。他力求获得本国债权人的支持，故而首先全力清偿他们的债务。国家财政状况好转后，他开始向智利的外国债权人清偿债务。

保守派支持伦希福的改革，许多自由派人士也看好这一改革。1836 年总统大选临近时，一批被称之为“走极端者”的自由派人士开始支持伦希福竞选总统，反对普列托连任。迭戈·波塔莱斯注意到这一情况后，随即复出，迫使伦希福辞职，接手两个内阁部长职位，他同普列托一道操纵了后者的连任选举。

普列托第二届任期内，内政外交问题重重，导致智利与其北方邻国发生了战争。玻利维亚和秘鲁比起智利来国内更不安定。玻利维亚将军安德烈斯·德·圣克鲁斯先接管本国政府，而后又接管秘鲁政府，建立了新国家，他称之为秘鲁—玻利维亚邦联。智利与邦联间关系的紧张始于一场蔗糖、小麦关税战。1836 年圣克鲁斯支持以拉蒙·弗莱雷为首的一批自由派流亡者打回老家时，加剧了紧张关系。波塔莱斯与邦联断交，数月后智利派出的使者向邦联宣战。

大多数智利人觉得没有必要同秘鲁开战。外国商界也反对战争。然而波塔莱斯视这次冲突为争霸太平洋贸易的角斗，拒绝听取反对的意见。普列托宣布戒严，让持异议者噤声。不料有支部队举事哗变。1837 年 6 月波塔莱斯在检阅部队时，何塞·安东尼奥·比道雷上校突袭将他逮捕。次日，比道雷手下的一名士兵在瓦尔帕莱索以北的一座小山上将波塔莱斯处决。

2. 布尔内斯时期

政府很快就镇压了比道雷叛乱。波塔莱斯的受害使国人转而支持与秘鲁的战争，而外国商人则担心战争会使太平洋西海岸的贸易遭受损失，故而提心吊胆。战争爆发后，智利军队的第一次北伐遭到了失败，丢了面子。第二次出征在马努埃尔·布尔内斯将军的统率下大获全胜，1839 年 1 月 20 日永加伊一战彻底击溃圣克鲁斯的队伍。智利获胜的结果是：秘鲁—玻利维亚邦联解体；瓦尔帕莱索提升了对太平洋贸易的主导地位；布尔内斯成了民族英雄。民众就像当初获得独立

91

时那样欢天喜地，热烈庆祝。

布尔内斯成了延续保守派政治制度的理想人选，同时也开创了一个宽松的新时代。这不仅仅因为他是打了胜仗的将军，而且因为他同两任总统有着家族关系。即将卸任的总统华金·普列托是他舅舅，而前任总统弗朗西斯科·安东尼奥·平托则是他岳父。由于平托是个自由派，所以这一家族关系促使布尔内斯和缓了政府对反对派的敌对态度。普列托卸任前恢复了1830年被开除的一些军官的军阶，并健全了民权。布尔内斯1841年甫任总统，他的内阁部长马努埃尔·伦希福即通过议会推动大赦的实施。这一措施甚至还向被开除的已过世的军官遗孀发放了抚恤金。

智利各政治派别之间真挚和谐的关系为国家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显贵家庭不但坚持要其男孩到国民学院学习，而且送他们中的一些人到欧洲求学。政治家维森特·佩雷斯·罗萨莱斯回忆了同一批上层阶级的杰出青年一起乘船前往法国的情景。他和朋友们共同享受着巴黎的快乐时光，但对学业不那么感兴趣。尽管学习成绩不怎么样，但对上层阶级的青年说来法国文化的潜移默化却使他们的人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智利人发现欧洲的同时，欧洲人也发现了智利。一些欧洲教授和学者对智利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伊格纳西奥·多梅科来自立陶宛，先后在拉塞雷纳和圣地亚哥教授矿物学。他的影响还扩及了教育改革。他帮忙编制了六年制中等学校的课程，后来成了智利大学校长。多少有点争议的是法国经济学家让·古斯塔夫·库塞尔—塞纽伊；他在智利大学法学院任教。他在讲课时和在其所出版的书籍中，都强调了自由贸易的重要性，后来有些评论家将智利工业化发展迟缓归咎于这一学说。

转载的欧洲文章和当地人叙述欧洲动态的文章，越来越多地论述了智利现代化的经济与其落后的政治、社会制度间的不协调。自由派知识分子想要将政教分离、新闻自由、公正选举和更大程度上的社会平等这样一些思想移植到一个独裁专制的政治、社会环境。最有影响

的自由派领导人之一是何塞·维克托里诺·拉斯塔里亚。1844 年他在智利大学所作的一次公开演讲中将国家的落后归咎于殖民地时期的教会、政府和财产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正是老派尊崇的那种制度。

布尔内斯政府不声不响地开始转向自由主义。布尔内斯政府倡导国家世俗化、教会服从政府。为了扶持新教商界，布尔内斯认可了非天主教婚礼。为了废止教会享有的特权，他要教士遵守民法，控制宗教活动。这些措施无疑激怒了大主教拉法埃尔·瓦伦丁·瓦尔迪维埃索，此人鼓动保守派抗御对教权的进一步限制。这酝酿着日后更为激烈的冲突。

布尔内斯虽然明显倾心自由主义，但 1846 年谋求连任时又审查报刊、限制公民自由、竭力压制不同意见。1848 年革命运动遍及整个欧洲时，他盛赞海外的这一自由主义改革运动，却限制本土的自由主义改革运动。而他之所以公开赞扬欧洲的革命运动，是想要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自由主义改革的拥护者。两位年轻的理想主义者圣地亚哥·阿尔科斯和弗朗西斯科·比尔瓦奥把圣地亚哥的工匠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称之为“平等社”的改革运动组织。1850 年他们出版了一份报纸——《人民之友》，撰写文章，要求更充分的自由，其中一条是智利人有权挑选他们的下届总统。布尔内斯不为这些说辞所动，而是学他前任们的样，将他中意的候选人马努埃尔·蒙特强加给国人。平等社提出抗议时，布尔内斯遂将其取缔。而后他又关闭了自由派的其他报馆、放逐最坚定地反对他的一些人。尽管如此，北部矿业中心城市拉塞雷纳和南部港口城市康塞普西翁依然支持他的政敌何塞·马丽亚·德拉·克鲁斯。蒙特轻松获胜，而德拉·克鲁斯和抗议者们则拿起武器进行反抗。布尔内斯亲自奔赴战场，并打败了德拉·克鲁斯。与此同时，其他军事指挥官镇压了各自防区的叛乱。

3. 马努埃尔·蒙特

马努埃尔·蒙特虽说是保守派推选出来的，却体现了智利政治的重大变化。他出生在平民而不是军人家庭。他才智出众，年纪轻轻即享有盛名。他 1831 年在国民学院获得法学学位后，母校聘请他教授罗

马法，四年后被任命为院长。1837 年，普列托总统延请他首次入阁，先后担任过外交部长、司法和教育部长、国防和海军部长，后来出任最高法院院长、众议院议长。

蒙特开一代文人学士问政之风，日后大多数智利总统均系国立国民学院的毕业生。该学院计有中学部和大学部（包括法学院）。1843 年创办智利大学，但法学院仍留在国民学院，历数年之久。国民学院对所有达到入学要求的学生进行严格教育。虽说大多数学生出身权贵家庭，但也有许多学生家境并不那么富裕。像蒙特及其密友安东尼奥·巴拉斯这样一些有才干的人家境不那么富裕，而之所以能出人头地正是因为接受了国民学院的教育。

蒙特基于自己的经历认为，能够治理智利者，是有才干的人，而不是拥有土地的贵族。但他未能为新型的领导人打下政治基础。他没有发扬民主，却同老派结盟。他认为，要有工作效率高的政府和现代化，就必须确立一种凭资质、而不是凭金钱的传统。然而他没有认识到阶级在 19 世纪智利政治中正变得越来越重要而非相反。直到 20 世纪开展的社会运动才使中产阶级得以同上层阶级竞争政府官职。

蒙特的政策赢得了拥有土地的贵族们的积极支持。他免除了农田的销售税和农业什一税。他废除了长子继承制，此后，所有的后嗣都可以继承地产了。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土地可以上市交易了。为了使庄园主更方便地获得农业信贷，他成立了抵押贷款银行。为了改善乡村运输，他使政府成了圣地亚哥—瓦尔帕莱索和圣地亚哥—塔尔卡两条铁路最大的投资者。最后，他鼓励向南巴塔哥尼亚移民、力主智利对麦哲伦海峡的控制。

蒙特虽然为权贵的利益着想，但当他主张政府管辖教会时，许多老派人物还是反对他。最高法院受理了一起有关教会职务的争端案件，并行使了判决权，蒙特支持最高法院。大主教瓦尔迪维埃索做出了愤怒的反应，他煽动亲教会的老派分子反对蒙特，并竭力削弱蒙特在自己营垒中的影响。这一争端促成了一种奇特的结盟：极端保守派和极端自由派结成了反对蒙特的联盟，而两派的温和派则联手支持蒙特。

一批自由派分子认为他们能轻易地推翻这一被削弱了的政府，遂于1859年发动起义。然而他们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军队仍支持政府，打败了起义军。他们虽然没能将蒙特赶下台，但促使他不再坚持让自己的门生安东尼奥·巴拉斯继任总统。蒙特另外提名了一位比较温和的人物何塞·华金·佩雷斯，此人的自由主义政策改变了智利历史发展的方向。

94 佩雷斯的当选不仅开始了向自由主义的转变，而且开始了权力的变更。议会逐渐加强了对总统权力的制约，从而开启了议会时代。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激烈的对抗和政界的明争暗斗。这一时期政府尊重言论自由和不同的政治派别。飞黄腾达的议会领导人口若悬河，满嘴豪言壮语，玩弄手腕，大搞政治交易。出身于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智利人开始组建政党、挑战权贵时，一些保守的评论家们发表文章称赞前一时期的各位铁腕总统。国家财富增长的同时，议员们的财产亦随之增加。许多智利人认为：议会似乎成了一家富人俱乐部。他们赞美军人出身、凭功绩登上总统宝座的何塞·华金·普列托将军和马努埃尔·布尔内斯将军。评论家们也许不那么赞赏蒙特，但交口称赞他的才智及其对公职的献身精神。他们赞颂这三位总统忠于职守及其所实施的财政保守主义。然而他们却没有提及这些专制独裁的总统钳制不同意见、经常关押或放逐不同政见者这一事实。他们强行安排职务、从权贵中挑选议员候选人。即使总统本人并非出身于权贵家庭，他的政纲也是有利于权贵集团的。从1830年到1861年，智利是个不折不扣的专制共和国，其长处和短处均尽显无遗。

第五章　议会的胜利（1861—1891）

跟人们想象的相反，现代化往往不是一个和平进程。1861 年至 1891 年的智利历史不仅是经济大发展的时期，也是暴力多发的时期。采矿业和农业的发展加速了经济变革的步伐。新疆土和海洋运输扩大了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激增的矿产品和农产品的出口刺激了消费品和资本货的进口。首批民族工业兴起。而这一经济发展却导致了智利开采玻利维亚矿产问题的争端及同玻利维亚和秘鲁战争的爆发。 95

智利打赢了战争，获得了更多的矿物资源，特别是硝石矿。硝石税使国库充盈起来，而议会和总统却在这些钱财的使用问题上吵翻了。此外，总统权力大为削弱，难以再操纵议会选举了。一场有关预算拨发程序的争吵导致议会宣称总统违宪。内战爆发，议会同总统打了起来。议会获胜，恢复了秩序，然而国家却付出了沉重代价。

一、民族认同

在这一发展和冲突的年代，智利也逐渐萌生了明显的民族认同感。早期的一些文史学家们在这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第一部重要史学著作是法国博物学家克劳迪奥·盖伊的著作。19 世纪 30 年代期间，他收集动植物标本和历史文献，对智利的大自然和政治发展史进行了研究，撰写了 24 卷本的著作。他的成就激励了出生于 19 世纪 30 年代、在国 96

民学院求学的一代智利史学家。最多产的史学家是迭戈·巴罗斯·阿拉纳。他做过教授、议会议员、内阁部长和外交官。他撰写了一套15卷本的著作，叙述了智利300余年的历史。为此他精心从西班牙和智利收集了大量原始资料。另一位教授、议会议员和内阁部长是米格尔·路易斯·阿穆纳特吉。他集中研究并记述了独立运动时期，特别是诸如贝尔纳多·奥希金斯这样的一些领导人。他批评了奥希金斯，说他是个独裁者。

最引人注目的史学家是本哈明·比库尼亚·马肯纳。19世纪50年代，他因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两度遭放逐，过后又两次被赦免。第二次被赦免回国后，他当选为议会议员，后来就任圣地亚哥市长，而后又竞选总统，但未获成功。他撰写了几部传记体史学著作。为了吸引读者，他玩了一些花活儿，因此这些著作所引用的史料并不那么翔实可靠。当今人们认为他最重要的著作是瓦尔帕莱索史和智利矿业史。比第一代史学家晚20年出生的何塞·托里比奥·梅迪纳是智利杰出的书志学家。他特别关注殖民地时期的历史、文学、马普切人和宗教裁判。他收集整理了殖民地时期的档案资料，根据不同历史问题编纂了若干册文献目录；这些资料和目录至今依然对研究人员很有用。这些史学家均对天主教和殖民地时期持批判态度，而对自由贸易、世俗主义和公共教育等19世纪自由主义潮流则表示全力支持。他们完全支持现代化和发展进步。他们的学术和政治活动对自由主义压倒保守主义做出了重大贡献。

二、经济和社会变革

1. 白银

采矿业依然决定性地影响着智利的发展。采矿业吸引了成千上万个中央谷地的劳动者前往北奇科和北格朗德。采矿业为农产品提供了市场，为公共工程提供了资金来源。19世纪70、80年代的白银收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玻利维亚银矿的开发。1857至1878年间，智利白银年产量在7.5万与12.5万千克之间上下波动，但19世纪70年

97

代白银出口的激增，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玻利维亚的卡拉科莱斯银矿所生产的白银的出口，该矿十年间生产了近 90 万千克的白银。

卡拉科莱斯银矿的矿主和矿工主要是智利人，大部分白银也是通过智利的港口进行交易的。19 世纪 70 年代里有两年白银出口增至 30 万公斤，这一数字相当于世界白银产量的 15%。19 世纪 80 年代，卡拉科莱斯的矿藏渐次告罄，智利人开始开发位于奥鲁罗和万查卡的另外两处玻利维亚银矿。六年多的时间里，这两处银矿年产近 20 万千克的白银供出口。

铜的产量跟白银产量有着相似的升降情况。铜产量从 1861 年的 3.3 万公吨攀升至 1875 年的 5.2 万公吨。这一数字相当于世界产量的 1/3。然而打那以后产量就开始逐渐下降了，1890 年的产量下滑到了 2.6 万公吨，或者说接近世界产量的 15%。纯度高的矿石告罄，铜价下跌，因此企业家们寻找其他矿山进行投资。

2. *硝石*

硝石成了颇具吸引力的矿产。这种无机盐天然生成在阿塔卡马沙漠地带，氮含量很高，可用于合成化肥、制造火药。硝石矿大多在秘鲁和玻利维亚，智利公司获得了在这两个国家开采硝石的特许权。19 世纪 70 年代，各公司雇用的工人不到 3 000 人，生产的硝石不足 20 万公吨。而太平洋战争使智利于 1879 年兼并了玻利维亚和秘鲁的硝石矿区。19 世纪 80 年代末，近 1.2 万名工人生产出了 100 万公吨，其价值相当于 2 300 万美元，超过了全国出口量的一半。

在国际需求的推动下，现代技术使智利人得以从根本上革新了其传统的采矿方式。1857 年的一项法律鼓励组建合资公司采矿、建冶炼厂、修筑铁路。

企业家何塞·托马斯·德·乌尔梅内塔应用新型的合资方式和新技术开发塔马亚矿。为此，他需要以一种智利矿主从前没有过的规模运输矿物、煤炭、木材和生活必需品。例如，他 1856 年开始经营时采用的是传统方法，修了一条供牛车过往的道路。后来这种道路已承受不了他那大宗产品，于是他说服投资者们拿出 20 万比索购买计划从矿

98

区修到通戈伊港的铁路债券。1867 年铁路开始运营，年运输量超过 5 万公吨。

像乌尔梅内塔那样所采用的投资方式改变了所有参与采矿业者的生活。从事大规模经营活动的企业主通常不生活在矿区附近，而是雇请专业经理人指导日常经营活动。企业主们脱身在瓦尔帕莱索或圣地亚哥活动，经管贸易和金融业务。乌尔梅内塔雇请了一名总经理主管塔马亚矿的业务，一名工程师设计坑道、指导采矿工作，另一名工程师检验矿石。他的经理人员来自世界各地，其中有智利人、英国人、美国人和德国人。

矿工这会儿也专业化了，一组专事爆破，二组负责采集矿石，三组负责装车。蒸汽机将装运矿石的小车从矿井推进至用手分拣矿石的人们那里。乌尔梅内塔后来放弃了这种劳动密集型的工作方式，安装缆车将矿石直接从矿井运至火车车箱。

3. *矿工*

乌尔梅内塔在塔马亚矿雇用了 1 500 人。他雇用的劳动力大多是智利人，但也还引进了一些威尔士人。矿工及其家属集居形成了一种公司城镇，这些公司城镇要比庄园城镇（farm town）来得大。后来在 19 世纪 70 年代硝石繁荣时期，公司城镇还要大。雇主们通常用购物券支付给工人，工人们用购物券到公司店铺购买生活必需品。他们的住所是土坯垒墙、金属片盖顶。他们没有自来水，没有下水道。当然，大城市里的工人阶级同样没有自来水和下水道。肺结核病猖獗，时不时流行的天花和霍乱夺走了不少人的生命。

在采矿工作是个稳定职业这一错误观念的指导下，没有固定工作的农业工人移居北部地区。城市工人认为采矿工作所获报酬高，矿主们通常支付船费运送中央谷地的工人。每当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致使许多矿工失业而又找不到其他工作时，工人们就衣食无着了。为了与失业、恶劣的劳动条件和低工资作斗争，一些外籍工人（特别是西班牙人）发动群众建立劳工组织。1890 年他们的努力有了结果。严重衰退袭来时，矿工们促成了第一次全国性大罢工。

99

采煤业的劳动条件最恶劣。大多数煤矿位于南部沿海地区，有些坑道就在海底。矿工们劳动时往往要站在水里，冒着大水、爆炸和冒顶夺走生命的危险。他们领到的工资不是现金，而是要在公司店铺花销的购物券。他们日常的饮食主要是鱼类和其他海产品。附近的葡萄园和果园供给他们劣质葡萄酒和苹果酒。

他们同其家人居住在极其简陋的小木屋里。木屋搭建在山上，其间以泥土小道相连。巴尔多梅罗·利略在看到这些矿工的悲惨生活后，在其后来出版的小说《在地底下》中对之进行了描述。他的描述开创了一种社会抗议文学，使智利人认识到了矿工生活的严酷现实。

4. 疆界问题

智利公司和在智利经营的外国公司极欲投资于邻国的采矿业。由于疆界没有划定，遂产生了主权问题。1866 年，智利就其北部边界同玻利维亚达成协议：南纬 24 度线为两国正式分界线。之后不久，智利的一些探矿者就在边界线以北发现了银矿，没有遇到大麻烦，玻利维亚就给了他们特许经营权，让他们开发银矿了。但有其他矿主在玻利维亚境内发现硝石后洽谈特许经营权时，新问题出现了。

为了开采这些硝石，智利和英国一些投资者同智利的一些议会议员一起组建了安托法加斯塔硝石和铁路公司。该公司随后获得了玻利维亚的特许经营权。公司似乎并不在意该地区的主权，其目的只是控制税额。智利的外交官们 1874 年通过条约似乎解决了这一问题。根据条约，智利让出这一地区的所有权利，条件是不得对硝石课以新税。

智利人不仅投资于玻利维亚硝石矿，也投资于秘鲁的硝石矿。这两个国家担心智利的影响与日俱增，遂于 1873 年签订了攻守同盟秘密条约。两年后，秘鲁政府想要控制不稳定的国际市场上的硝石价格，遂对其领土上的所有矿场实行了国有化。政府向公司发放有息证券，以对其进行补偿。政府本想两年内就付钱给证券持有人，但无钱可付。100 其结果是证券的价值大缩水，投机者们以超低价进行收购。一些证券持有人认为改变主权也许能收回他们的矿场，遂说服智利政府进行干预，但智利政府没有采取行动。

智利在与北方的玻利维亚谈判时，与东方阿根廷的争端又起。智利和阿根廷都认为巴塔哥尼亚地区的大部分地段属于自己。1878 年，智利代表迭戈·巴罗斯·阿拉纳同阿根廷代表达成协议，同意沿安第斯山脊和大西洋与太平洋的分水岭划定两国边界。智利公众想要整个巴塔哥尼亚地区，公开反对这一协议，责之为出卖国家主权。但在北方与玻利维亚和秘鲁的紧张关系迫使智利政府接受了这一协议。

5. 太平洋战争

玻利维亚的政局动荡，致使它很快就跟智利发生了冲突。1878 年，玻利维亚将军达萨·伊拉里翁推翻政府。他拒不接受本国政府先前与智利达成的协议，对安托法加斯塔公司的硝石出口课以重税。公司拒绝交税，确信智利政府将会迫使达萨收回成命。玻利维亚征用公司的机器时，冲突迅速升级。智利进行反击，侵占阿托法加斯塔港。玻利维亚铤而走险，宣布战争，想把智利人全都驱逐出境。秘鲁开始时表示愿意调解两国纠纷；但智利发现秘鲁同玻利维亚已签有攻守同盟条约后，遂向秘鲁宣战。

定名为“太平洋战争”的这场冲突很快就在地球上最干旱的地方之一发生了。这一沙漠地带不见滚动的流沙，有的是悬崖、陡坡、干涸的河谷、大草原和盐滩地。由于战略要地多为港口城市，所以有支强大的海军就占有了决定性的优势。舰船在相距很远的沿岸战场间运送士兵，封锁、炮轰敌方的港口。这次冲突中，玻利维亚由于没有海军，所以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智利和秘鲁均有支小小的海军，秘鲁海军稍稍强那么一丁点儿。然而智利的商船队相当强大，在运送人员和物资方面起了重大作用。

秘鲁和玻利维亚的军队人数加起来是智利的四倍，然而这两个国家难以动员军队与向军队供应必需的物品。这两个国家均无真正意义上的国民经济。两国大多数土著人口没有怎么融入国家生活，不可能在国际冲突中提供多少帮助。而智利却有一支可快速调动的劳工大众，战时能够组织他们投军作战。智利的铁路和船舶运输网已使社会、经济一体化。民主政治制度状态稳定，能够调集物资供应军队。

101

很快，智利士兵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就占领了整个安托法加斯塔地区。安第斯山横亘在内陆和沿岸地区之间形成了一道天然屏障，玻利维亚难以发起反击。智利有效地控制了陆地后，1879 年的两次海战又决定性地控制了太平洋。5 月 21 日，伊基克海岸附近，秘鲁铁甲舰“瓦斯卡尔”号撞击智利的木制舰艇“埃斯梅拉达”号。智利舰艇沉没前，舰长阿图罗·普拉特跳上“瓦斯卡尔”号甲板，遭枪击身亡。他的殉难很快即成了爱国精神的象征，不仅在太平洋战争期间是这样，对世世代代的智利学童亦然。这次海战中秘鲁人遭受了重创，损失了铁甲舰“独立”号。10 月间的第二次海战中，智利人一通猛烈炮击后成功登上了敌舰“瓦斯卡尔”号和“皮尔科马约”号。这两艘军舰投降后，秘鲁人就没有海军了，智利得以在沿岸地区随意调动军队、封锁秘鲁港口，没有遇到什么抵抗。

11 月，智利军队 9 500 人在秘鲁皮萨瓜港登陆，战争向内陆推进。当时秘鲁有支部队在港口的南面，而玻利维亚有支部队在港口的北面；两支部队有机会夹击智利人，但它们没有把握住这一战机。时至 1880 年 7 月底，智利人节节胜利，迫使所有的秘鲁和玻利维亚军队撤退至塔克纳以北。在决定性的阿里卡战役中，智利军队对高度设防的山头要塞发动强攻，击退了 2 000 名秘鲁兵。这次胜利使智利完全征服了硝石产区，为智利学校教科书又增添了一页爱国主义内容。这次胜利也促使美国和英国提出调停建议；但当秘鲁获悉智利的领土要求后拒绝了调停建议。

智利的政治家们和公众虽然远离战线，但在战争中却起到了重要作用。各政治派别为了提高自身在下次大选中的声望，均想让自己的领导人担任司令官。这种政治阴谋导致了指挥的无能，然而智利胜利了。但赢得胜利的是智利普通老百姓，或者说是智利工人，而不是将军。虽然军队强迫工人入伍服役，并虐待他们，但他们本着一股爱国激情依然奋勇作战。据说，他们要在投身战斗前喝一种红葡萄酒加火药的混合饮料，以壮胆。

公众压力和扩张主义野心促使战争向北推进。智利总统阿尼巴 102

尔·平托命令司令官马努埃尔·巴格达诺占领利马。援军的到来使智利士兵的人数增加到了2.5万。秘鲁用以守卫首都的军队人数要多于智利的军队人数，但无济于事。1881年1月，智利人在乔里略斯战役和米拉弗洛雷斯战役中越过秘鲁防线，秘鲁军队撤出利马城。没有一个秘鲁人愿意割让国土，所以接下来的两年间全国上下从事游击活动，进行殊死保卫战。这期间，智利同阿根廷签署了协议，从而避免了同这一邻国发生战争的危险。两年后，秘鲁做出向智利割让领土的痛苦决定，以使占领军离境。1883年秘鲁签署了《安孔条约》。条约规定：秘鲁割让塔拉帕卡地区，并同意智利管辖塔克纳省和阿里卡省十年，期满后由公民投票决定这两个省的主权归属。玻利维亚这方面嘛，安托法加斯塔实际上已在智利控制下；数年后玻利维亚正式将安托法加斯塔地区割让给了智利。玻利维亚成了一个内陆国，委实可悲可叹。

太平洋战争不仅使智利的领土扩大了1/3，而且使智利有了一个向其提供巨额财富的地区。现在的问题是谁应占有这笔财富？智利政府完全可以接管国有化的秘鲁矿场、向证券持有人清偿债务、以国家垄断的形式经营矿场，然而出于种种原因没有这么干。智利的一些政治人物在安托法加斯塔硝石和铁路公司中有投资，不愿看到该公司要同一家国营公司相竞争。而政府也还有因战争而拖欠的债款要还，不愿负担硝石证券兑现的费用。此外，智利还要改变欧洲对其兼并玻利维亚和秘鲁领土所持的反对立场。智利政府向证券持有人返还硝石矿所有权的意愿赢得了强有力的支持，特别是在英、法投资人中获得的支持尤为强劲。虽说19世纪80年代做出的这一决定似乎蛮有理，但后来政治家和史学家们强烈地批评了当时领导层将硝石矿返还给私人业主、而不是将其国有化的决定。事后看来，开发硝石矿的大多是些外国公司；许多智利人认为他们好像是为了这些公司才打了那场太平洋战争。

6. 约翰·托马斯·诺思

英国公民约翰·托马斯·诺思很快就成了硝石大王。他在智利开始时的职业是工程师，后来在伊基克成了一名进口商、自来水厂老板

和船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损失了一条船，自来水厂也遭到破坏，但结交了一些好朋友。其中之一是智利海军将领帕特里西奥·林奇，此人后来资助他从事了一些商业活动。有两位英国公民也帮了他的忙。罗伯特·哈维曾在硝石业中为秘鲁政府效力，帮他选定塔拉帕卡的最佳硝石产地；约翰·道森是位银行家，向他提供了使用资金的便利条件。太平洋战争期间秘鲁的硝石证券价格下跌时，诺思利用哈维的知识和道森的银行业务关系贷款收购了这些证券。而这一投机买卖的成功全靠战后智利将硝石矿所有权返还给证券持有人的决定。也许他曾就这一决定的做出游说过一些有影响的智利朋友，实际情况不清楚。不管怎么说吧，他在预计到会有利好的政策出台的情况下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收购了塔拉帕卡的最佳硝石产地的证券。

诺思还需要购买机器、雇用工人、将硝石运往市场。他为此返回英国筹集资金。他说服一位以前认识的生意人帮他组建起“利物浦硝石公司”。他是在秘鲁正式将塔拉帕卡割让给智利前八个月采取的这一大胆行动。他用销售股票筹集到的资金购买了锅炉、蒸汽机和水泵。而后，罗伯特·哈维同其他立约受雇的几名英国工程师一道乘船到智利安装硝石加工机器，诺思则决定留在英国，经管公司的财务。1884年，一切准备就绪，开始生产，每个月生产3 000吨硝石。

公司业绩斐然，1886年度股息达20%以上。这一年诺思及其合伙人变卖公司，以成立其他几个公司。新公司的股价飞涨；诺思卖出自己持有的一些股票，投资于其他企业。其中之一是硝石铁路公司；该公司垄断塔拉帕卡的硝石铁路运输十年。诺思还垄断了伊基克城的用水供应。如果有别人要组建与之相竞争的公司，他就延聘律师到法院和议会进行游说封杀活动。诺思的手伸得太长了，就连智利总统马努埃尔·巴尔马塞达也出面公开对他进行了指摘。议会被迫革除弊病，采取措施中止诺思的垄断、恢复竞争。诺思在完全享有“硝石大王”这一美誉后，其投机生意实情最终在智利和英国曝了光。

7. *硝石生产和税收*

对硝石的需求持续上升，其产量亦随之上升，但需求与产量并非 104

总是那么步调一致。例如，1886 至 1889 年期间，硝石产量翻了一番，从 100 万公吨增加到了 200 万公吨。而后经济衰退袭来，硝石价格下降一半。这一衰退期间，硝石价格下跌，已无利可图。生产商们为了解决问题组成卡特尔限产、促使价格上涨。后来市场恢复常态、价格上涨时，卡特尔就解散了。

太平洋战争之后，硝石财富激增，智利政府亦随之暴富。1878 年至 1882 年，出口税从 1 公吨 400 比索增加到了 2 200 比索，关税收入因而从 600 万比索激增至 2 900 万比索。政府富了，遂减免了土地税和所得税，实际上免除了对农业所征收的大多数税种。然而硝石生产的周期性下降使政府领导层注意到了国家财政严重依靠一种产品的危险情况。硝石生产商力图减产，而政府要求增产，这就产生了尖锐的矛盾。由于是按出口量而不是按价格征税，所以每当卡特尔减产，政府就少了收入。政府无法解决这一问题，只得削减开支或加印钞票。而由于动不动就加印钞票，智利的比索与较为坚挺的货币兑换时持续贬值，通货膨胀成了脱缰野马控制不住了。

8. 南部地区的变化

除硝石产地外，太平洋战争还影响了国家生活的其他许多方面。马普切人生活在南部地区，离硝石产地很远；他们抵抗征服活动长达 300 余年，19 世纪 70 年代丧失了其自治地位。其实在此之前，他们就由于同外界的贸易往来日益频繁，与世隔绝的状态已然打破。他们向智利商人出售牛和手工纺织品，购买铁制用品、布匹和小装饰品。他们虽已与金钱和市场结缘，但其土地依然公有，全无占有土地和买卖地产的意识。

智利政府曾谋划占领马普切人的领地。19 世纪 50 年代，科尔内略·萨维德拉上校草拟了一个修建要塞、将政府的实际控制线向南推移、最终包围马普切人领地的计划。1862 年，萨维德拉建起三座要塞，成了智利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他邂逅了一个名叫奥雷利—安托万·德图芒的法国人；此公声称自己是“阿劳坎尼亚和巴塔哥尼亚国王”。他已说服几个当地的马普切部落认其为首领了，但萨

105

维德拉对其嗤之以鼻。他逮捕了这名私自闯入者，将其交给了智利官员；他们宣称此人是个疯子。为避免引起国际事件，他们将其转交给了法国外交代表。代表们十分尴尬，连表歉意，把他送上船回国了。但他妄自尊大，依然故我，并多次试图潜回智利。他去世时，还将他的国王头衔赐给了他的后裔。他的后裔们头脑比较清醒，不再纠缠这种事了。

法国妄想狂离开后，萨维德拉用要塞将阿劳科严严实实包围了起来。马普切人很快就在1868年发动了反击，但后来又同意了休战。他们的判断严重失误，太平洋战争期间再次起而造反。攻克利马后，智利官员决定派遣一些部队到南方完成萨维德拉的计划。1881年和1882年，军队在因佩里亚尔和比利亚里卡这两处马普切人于约300年前捣毁的要塞旧址上建起了新要塞，这些要塞同其他要塞一道控制了这一地区的战略要地。

同早年间不一样，现在有现代化交通线连结着这些要塞和中央谷地村镇和城市了。19世纪70年代，铁路修到了马普切人领地边。马莱科处的一道深谷暂时挡住了铁路向南延伸，但一座令人激动不已的大铁桥架设起来后，1893年铁路修到了马普切人领地的中心地带。电报线路随之开通，视察员、土地投资者和擅自占地者接踵而至。智利政府宣布所有马普切人领地的土地通统属于国家，从而引起了对土地的疯狂霸占。官员们将大部分土地分给了一些占有大庄园的人，但也确实将贫瘠地区的一些公有土地分给了中央谷地的一些无地农民。此外，政府还从欧洲招募了移民，有近万名德国人、瑞士人、意大利人和法国人到了这一地区。不知所措的马普切人还未来得及同视察员和公证人进行谈判，就失去了大部分土地。他们继续做买卖，但放牧牛群的土地大量被霸占，他们的牛只数量越来越少。

9. 农业发展

哄抢马普切人土地的一个重要诱因，是智利农产品海外市场的迅速扩展。19世纪60年代初年出口价值近400万比索，60年代末翻了一番。19世纪70年代，这一增长势头持续不减，1874年创下了一个

106 史无前例的记录1 600万比索。这一年农产品出口价值与矿产品的出口价值几乎相等，这在智利历史上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随后的十年里农产品出口下降，19世纪80年代稍稍上升了一点。19世纪80年代世界粮价下跌，只有那些靠技术降低成本的国家才有竞争力。可惜的是，当时还没有什么智利人有脱粒机和现代磨粉机。因此他们就只好越来越局限于国内市场了。

日益增加的城市消费者需要有更多的鲜肉供应。智利的庄园主们应势动手改良牛的品种，从阿根廷进口良种肉牛。庄园另一有利可图的活动是酿制葡萄酒和纯葡萄白兰地酒。酒的消费量从1875年到19世纪末增长了三倍，人均达90升。庄园主们原本是不交纳酒类生产税的，但在硝石收入下降期间，议会不那么情愿地对酒类征了税。就像美国农民曾怒而反对威士忌酒税那样，智利的庄园主们也做出了类似的反应。他们没有组织武装暴动，但还是有人想这么干的。爱德华多·巴里奥斯在其小说《大先生与穷光蛋》中有段引人注目的描述：庄园主何塞·佩德罗进行了一次单打独斗。税务官们踏上他家土地时，他没有交酒税，而是操起一柄斧头直奔酒厂、捣毁葡萄园、向税务官们开火。

10. 城市生活与乡村生活

庄园主们一个个放弃了其在庄园上的乡村生活，开始享受起圣地亚哥的国际性都市生活。城市不仅使庄园主们有了跟本阶级的人们更多的交往机会，也有了经济发展的机会。他们在圣地亚哥可以投资于城市房地产、银行、保险公司和矿业公司。庄园主们从事多种经营后，他们的地产就只是多种商业企业中的一种了，成了可资利用的资本。他们往往通过土地抵押从银行获得贷款，以投资于其他企业。农牧业的商业性越来越强，他们因而紧随谷物和牛肉价格的上涨尽可能地开发自家的庄园。铁路线延伸到了南方地区，导致了船运成本的下降，从而更推动了农牧业的商业化进程。

生活在圣地亚哥，使庄园主们得以监管其子女们的受教育情况。他们通常送子女到某一修道会办的小学和中学。只有儿子们继续上大

学，通常是到国民学院学习法律。圣地亚哥还有各种各样的招待会、舞会和戏剧演出，权贵们得以结交新朋友、找到心仪的对象。夏天全家人回庄园，进行骑术竞技表演，跳奎卡舞，招待亲朋好友。庄园主的家人们在与外界联系越来越广的同时，犹竭力维持其与乡村的联系。然而继承问题和财务困难使得一些子嗣卖掉了土地，成了完全在城市中从事特定职业活动的人。 107

庄园主的家人们同土地的联系断了，但在庄园里从事劳动的人们依然与土地紧密相连。他们没有真正享受到智利的现代化。铁路修通后，他们赶牛、运送谷物到终点站倒是近多了。他们多半忙于种植谷物、苜蓿和育肥肉牛，很少从事放牧活动。他们没有机会使用机器，因为没有哪家庄园购置这东西。劳动力工资很低，大多数庄园主都不想购买机器以节省人工资本。智利乡村的买卖方式变了，但大庄园上的日常生活依然如故。世世代代完全听凭庄园主或其管家的意愿行事。大庄园上连个小学都没有，劳动者的子女都是文盲。只有不到20%的智利儿童入学，而入学者通常又都生活在城市地区。

11. 工业的起步

农业地区变化缓慢，而城市则开始了工业的发展。工业从一开始就同进口货和本土的手工制品展开了竞争。工业加上原材料（诸如牛皮、谷物和水果等）的附加值，增加了国民收入。本国工业有时还进口外国原料自己进行加工生产。例如，胡利奥·伯恩斯坦就曾从秘鲁和巴西进口原糖，在他的比尼亚德尔马糖厂精炼加工，供应国内市场。

铁路的修建刺激了本国工业的发展。1860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期间，智利人修建的铁路长达1 000千米以上，其中一半是北部地区的私营矿用铁路，另一半是国营的客运和货运两用铁路。开始时铁轨和车辆全部是进口的，后来瓦尔帕莱索和圣地亚哥的工业企业也供应了一部分。不太有利的是，智利当时还没有自己的钢铁厂，得为此进口钢铁。本国木材工业生产了大批枕木，但也还从俄勒冈和华盛顿进口了一些。 108

智利工业的大部分机器是进口的。伯恩斯坦、乌尔梅内塔和诺思

从英国和美国进口了蒸汽机、锅炉和磨床。像亨利·梅格斯这样的一些铁路承包商即使是在为智利政府效力，也还是进口了大部分他们自己的铁轨和车辆。智利的确拥有各种铸造厂和机械加工厂，但尚难以生产出足以使本国成为一个工业国的机器来。主要从事采矿业、农业和商业活动的智利经济犹如汪洋大海，工业只是大海中一座从事现代化生产的小岛。

没有一种促进工业发展的官方政策，在决定经济发展方向上起主要作用的是公共利益准则。自由贸易是官方政策，并受到了访问学者法国经济学家让·古斯塔夫·库塞尔—塞纽伊的赞许，但这一政策执行起来有一些引人注目的例外。铁路、轮船和工业方面的企业家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请求政府授予其特许经营权，禁止在特定的时期内有竞争者存在。例如，约翰·诺思在伊基克享有两项政府准许的垄断权。胡利奥·伯恩斯坦同样为他的比尼亚德尔马制糖厂争得了垄断权。除了这一直接的政府支持外，还有另一间接的政府支持。据智利经济史学家加夫列尔·帕尔马所说，当政府印刷钞票解决预算困难时，国家货币贬值、进口货价格上涨。智利人由此感到国货比进口货便宜。决策者们有意无意地用使比索贬值的方式促进了工业化开始阶段的发展。

三、政治问题

1. 自由党与保守党

十分有趣的是，有关宗教问题的争论要比经济问题剧烈得多。自由党的政策是政教分离，特别是有关婚姻和出生登记问题。自由党的第三项主张是墓地世俗化。保守党中坚定地支持教会的人认为自由党人的提议是对神的亵渎，是对国家天主教认同的背离。

109 自由党人想要使其方案得以通过，就得在 19 世纪 60 年代形成的三党体制中组建联盟。激进党与共济会运动关系密切，是个天然盟友。激进党吸引着积极支持国家世俗化的专业人士、一些庄园主和新富们。在复杂的三党体制下，总统越来越难以控制自己党派的成员了。1874 年的选举改革允许所有能读会写的男丁参加选举，并加大地方上对选

举投票进行监控的力度，从而削弱了总统对议会的控制。这一选举改革法案通过后的四年间，选民人数增加了三倍，竞选议员的人数也有所增加。一个未曾料到的结果是，竞选者们为能当选花费大量个人钱财从事贿选活动。因此，竞选者即使属于总统的政党，也不将自己的当选归功于总统了。

政治联盟极不稳定。自由党分裂，一些成员与保守党人结盟，另外一些成员则与激进党人结盟。在争夺政治权益时，令人十分诧异的是，一些激进党人往往同保守党人建立策略联盟。尽管政党联盟变化多端，1881 年当选总统的自由党人多明戈·圣马利亚还是认为他能够拉到足够的票数使婚姻、出生登记和墓地世俗化。为了完成这一棘手的任务，他求助于其内政部长何塞·马努埃尔·巴尔马塞达。他实现了圣马利亚的意愿，但他操纵选举、滥施政治恩惠的行径冒犯了保守党人、激进党人以及一些自由党人。圣马利亚对他的成就进行了嘉奖，提名他为自由党总统候选人。然而巴尔马塞达当选后，不得不应付自己在上届政府任职时造成的敌对情绪。

2. 巴尔马塞达的烦心事

巴尔马塞达任总统前，曾做过 20 多年的议会议员，并担任过驻外使节代表国家从事外交活动。他还具有利用传媒和公开讨论推动改革的经验。他当选后同意了教会提名的大主教人选马里亚诺·卡萨诺瓦，意在化解保守党的一些敌意。他组建了一个使自由党和激进党团结一致的内阁，然而不到两个月，议会就对他的内阁百般责难，迫使他改组了内阁。这是他麻烦的开始。

巴尔马塞达上台时正值经济繁荣期，硝石出口，财源滚滚，政府收入从 1886 年的 3 700 万比索增加到了 1890 年的 5 300 万比索。政府的信誉高了，他决定向外国银行借贷 3 000 万比索、向本国投资人借贷 2 300 万比索，开始规模空前的建设活动。公共工程计有桥梁、高架桥、1 000 千米的铁路、电报线路、医院、学校、码头以及监狱。他使圣地亚哥面貌一新，建起了政府各部办公大楼、一所医学院、一所军事学院和一所艺术学院，并开挖了一条连通马波乔河的运河。为了 110

协调各项工程，于 1887 年他新设了一个公共工程部。他还搞政治贿赂，这引起了强烈的反对，削弱了他自己的领导地位。蝇营狗苟之辈的活动促使了与反对党的结盟、而非对党纪的遵守。

1890 年经济衰退发生时，议会使巴尔马塞达难有作为。议会指责他的内阁时，他怒而拒绝协商新内阁的任命问题。议会接着拒绝通过他的拨款法案。1891 年 1 月他发布公告宣称：如果议会拒不通过法案，他就要动用头年的预算了。议会还以颜色，宣布他违宪。议会接着又说服海军军官豪尔赫·蒙特接管了提供大部分国家收入的北部地区海关。巴尔马塞达并非等闲之辈，争取到陆军站在了他一边。武装部队的两个兵种兄弟阋墙，委实可悲可叹。海军对北部地区硝石收入的掌控，加上德国军事顾问埃米尔·科奈尔将军为维护议会权益而进行的干预，打败陆军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了。巴尔马塞达眼见大势已去，遂避难于阿根廷使馆。他在 1891 年 9 月 18 日任期届满的当天自杀。他的支持者们为他的去世而悲痛，认为他的举动是英雄行为。

巴尔马塞达的去世结束了一个时代。1861 年至 1891 年，智利政府从一个没有多少钱可花的小机构变成了一个殷实的行政当局，成了国家发展进步的火车头。当议会议员、部长或总统，不再只是作贡献，而是分享财富的机会了。政府薪金并不那么吸引人，吸引人的是承包合同、回扣和法定酬金。更为重要的是，在政府中供职者能够轻易得到投资信息，这就提供了许多致富的渠道。智利政府十分富裕，比起其他许多国家的政府来没有那么腐败，官员们分享唾手可得的商业机遇，是可以理解的。

111 发展中的智利国面临着许多挑战。各政党和政府部门间力量平衡的重心从总统转向了议会。这一权力变化向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领导人提供了赢得议会议席和解决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自身问题的机会。分享权力者的人数增多了，而国家财源却减少了。过分对硝石的依赖使整个国家易受单一产品需求的影响。摆在面前的一个问题是：智利能否扩大政治参与和增加国家财富。

第六章　新兴阶级与矛盾冲突（1891—1925）

113 议会打赢1891年的内战后，有了左右总统的影响力，从而巩固了自身的权力。权贵们利用议会谋求自身更多的权益，而又同新兴群体结盟，更多地参与社会活动。日益发达的经济提高了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地位，它们提出了对国家政府拥有发言权的要求。这两个阶级的领袖们成立了专业人员组织和劳工组织，组建了新政党，并推选代表任议会议员。由于反复发生的危机致使经济衰退、政府预算大幅削减，他们遂在受教育权和扩大选举权方面提出了一些大胆的政策主张。

各政党并不把心放在全面解决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上，而是经常为争权夺利吵闹不休。20世纪20年代，自由党领导层大兴变革之风，反对党则投票反对其改革方案。军方对政治家们的作为深感不满，遂采取行动关闭了议会。后来文官政府重新掌权时，总统强行通过新宪法，权力重心从议会转移到行政当局，正式结束了议会时代。属于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智利人希望新政治制度能够更多地满足他们的要求。下一个十年里的困难时期验证了这一制度是能够满足这些群体要求的。

一、社会变化

1. 人口动态

114 1891年至1925年间，智利人口增长了近61%，从260万增到了420万。然而这一增长是不平衡的。圣地亚哥的人口增加了一倍多，从1891年的27.5万增加到了1925年的65万。北格朗德地区的矿区城市有着类似的情况，从1891年的18万居民增加到了1925年的35万。城市人口所占比例从20%增加到了30%。而中央谷地大庄园所在的乡村地区人口没有什么增长。人口增加引人注目的乡村地区是新近移民定居的南部地区。而这一地区大部分城镇的人口也没有什么增长。就业机会很少，许多年轻人流向了城市。

城市的确有许多就业机会。这里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发展开始了同权贵的竞争。在中产阶级试图取权贵地位而代之的同时，劳工组织了起来，为增加权益开展谈判活动。智利史学家里卡多·克莱布斯认为：议会制的一大贡献是中产阶级未经革命就取得了政权。智利权贵集团为了强化自己的权力，开始时同中产阶级结盟。然而中产阶级跟工人阶级不同，不是一个有着单一意识形态团结一致的群体，其成员财富、职业和政治倾向各不相同。从一定程度上看，正由于存在着这样一种差异，权贵们才认为中产阶级中至少有些人可以成为盟友，希望他们支持而不是反对其政权。

工会出现后，中产阶级如果不愿再同权贵集团妥协行事，就可以同工人阶级结盟了。像阿图罗·亚历山德里这样的民众主义中产阶级政治家们就搞了这样的结盟。后来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中产阶级同劳工结成了称之为人民阵线的联盟。如果是中产阶级的领袖们领导联盟并处于主宰地位，联盟则兴；而如果劳工取得领导权并威胁到中产阶级的利益时，联盟则亡。

2. 中产阶级的兴起

智利中产阶级的形成与欧美不太一样。不那么富裕的店主和政府

雇员是独立后数十年间形成这一阶级的基础。发了财的商人和矿主被权贵集团吸收，而那些财力中等者则支持中产阶级。1850 年以后，工业企业家和专业人员的出现又壮大了这一阶级。而很少有农牧场主成为中产阶级成员的。只有南方地区的外国移民和分得政府公有地的定居移民才发迹为不十分富裕的农牧业中产阶级群体。太平洋战争之后政府机构的扩充使政府雇员这一重要群体加入了中产阶级行列。1875 年政府雇用 2 500 人，1900 年增至 5 500 人，到 1925 年则有了 26 500 人。这些雇员的收入虽然比商人和专业人员少得多，但——如果不说是全部的话——其中也还是有许多人支持中产阶级的。中产阶级成员出身各不相同，难以团结一致；但其认同程度不断提高，发生危机时还是能够联合起来统一行动的。

中产阶级的发展壮大有赖于教育事业的发展。1891 年，入学人数总共只有 8 万人，全国有读写能力者不足 30%。1900 年，入学人数增加了一倍多，共有 17 万人；到 1920 年，入学人数有了 40 万，这时几近 50% 的人口能读会写了。1920 年议会通过决议规定小学头四年为义务教育。入学人数增加较慢的是中学教育。1900 年中学入学人数不到总人数的 10%，到 1920 年也没有多大的增加。大学入学人数更少，这并不足为奇。1920 年只有 4 000 人上大学，只占上小学和中学人数的 1%。

这一时期读大学的机会多了。1888 年天主教会决定发展一种有别于世俗高等教育的高等教育，创办了智利天主教大学。1919 年政府开办康塞普西翁大学，这是在国家首都以外创办的第一所大学，南部地区的学生有了更多从事专业工作的机会。这所大学创建伊始，激进党和共济会会员们就控制了其行政、教务活动。这两个关系密切的群体使这所大学成了一个对现状的批评远较圣地亚哥那两所早已创办的大学严厉的场所。

中产阶级的子嗣上中学和大学的人数持续增加。1906 年，大学生们成立了智利大学生联合会，着重关注中产阶级问题。劳工行动主义强调国家社会问题后，智利大学生联合会越来越积极地同工人一道参

116 加了罢工和抗议活动。然而智利大学生联合会同政府雇员工会一样，有个阶级联盟问题。同越来越受共产党人影响的工会联合会还是同中产阶级结盟，抑或同权贵集团保持暧昧关系？主张不同的各党派均认识到了学生政治活动的重要性，都着力培养学生领袖、插手他们的竞选活动，以赢得对智利大学生联合会的控制。

中产阶级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使其得以在国家的思想理论和政治生活方面具有了决定性的影响。时至 1920 年，许多工程师、律师、作家、史学家和艺术家均出身于这一中产阶级。他们在其工作和著述中所表达的价值观正反映了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这些价值观有时公开反对权贵集团，但更多时候所表现的是迁就妥协。中产阶级虽然常常批评上层阶级施政不当，但信奉渐近式、而不是革命式的变革。

有许多中产阶级渐进主义的实例。最引人瞩目的实例之一是激进党领导权的演变。起初是矿主和商人领导党，但中产阶级的专业人士和政府雇员们逐渐改变了这一状况。权贵集团欢迎这些新成员，因为他们使党好运连连。1891 年，党在众议院只有 23 名议员，人数是最少的，到 1924 年成了议员人数最多者，拥有 42 席。即使党的领导权渐渐落入中产阶级之手，党内上层阶级成员对如此成就的取得也是高兴的。

激进党人信奉世俗的、严格的科学教育制度。他们不像工人阶级政党那样主张普及教育。他们对教育的热情支持吸引了许多教师。他们 1915 年组建了小学教师协会，1922 年又成立了教师总会；这些组织当时隶属于激进党。政府雇员看到教师们组织起来后，也认识到了组织工会的重要性。1925 年，政党的政治活动和军队所造成的政府用人混乱状况，导致政府雇员们成立了智利雇员工会；该组织同激进党结成松散联盟。他们努力争取雇用合同和社会保险金。他们还进行游说活动，争取八小时工作制和最低工资制。政府雇员们虽然同蓝领工人有着一些类似的问题，但还是认同于中产阶级，拒不参加受共产党影响的工会联合会。

在智利，隶属于某个党派既是个社会认同问题，也是个政治信仰

问题。激进党完全明白这一社会功能，故而在大多数城市地区开办了俱乐部。党员们可以在这些俱乐部里跟朋友把酒、进餐，同时从事政治活动。到 1920 年，中产阶级普通成员主导了俱乐部的社会活动。那一年激进党支持自由党总统候选人阿图罗·亚历山德里；此人十分了解并成功地利用了中产阶级的政治诉求。激进党的许多议会议员候选人都有着相似的出身背景，而保守党和自由党的候选人多半出自权贵集团。 117

经济方面，激进党理论上支持自由放任和私人企业，但实际上力图更大程度上发挥政府的作用。政府雇员们高度评价这一政治立场，往往支持该党。随着教师和政府雇员入党人数的增加，激进党的领导权转移到了中产阶级之手。

这一群体还加入了权贵集团控制的职业人员组织。例如，1888 年创建的智利工程师协会这一组织就既吸收了中产阶级的专业人士，也吸收了上层阶级的专业人士。该协会出的期刊虽然既关注技术问题也关心政治问题，但 20 世纪初有篇论述科学管理的文章将技术准则和政治准则结合在了一起。文章指出，要提高政府机构的工作效率，就得应用行政、而不是政治准则。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一些工程师竞选议会议员、入阁当部长或主持公共机构工作。1915 年有五位工程师当选为参议员、八位为众议员。米格尔·莱特列尔和弗朗西斯科·马尔多内斯这两位工程师领军人物从 1921 年至 1924 年担任了内阁部长。他们一旦大权在握，就应用技术专家治国论的方法对政府机关进行管理。

从事政治活动的智利工程师比起其他许多国家来要多得多，这是因为有许多工程师在为政府工作。雇用工程师最多的雇主是政府控制的国家铁路公司。工程师们为国家铁路公司非政治化、将其变为股份有限公司奔走游说。他们确信，他们能够消除浪费现象、使铁路经营获利。工程师们在公共工程部和军队里也很活跃，他们强调用以录用和晋升的准则应该是受教育程度、而不应该是政治忠诚度。

工程师们越来越想将其知识应用于社会和政治变革了。智利工程师协会理事会 1916 年急切地提出了政治诉求，敦促变革。八年后，军

队推翻文官政府，让工程师们担当了一些新的领导角色。弗朗西斯

118 科·马尔多内斯被任命为内政部长，这是最重要的内阁职务。两年后卡洛斯·伊瓦涅斯上校政府延请工程师们入阁起更为重大的作用。

除了中产阶级的工程师们在国家生活中的影响不断增大外，中产阶级的其他专业人员也以不同方式发挥着自身的影响。律师、医生、牙医、药剂师、会计师和建筑师们也成立了各自的专业组织。这些组织由于其成员隶属于不同党派，所以起初都避免介入政治。但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经济危机降临时，这些组织都在一些重大问题和候选人问题上表明了各自的立场。这些组织的立场虽然没有工会那样鲜明，但明显是比较倾向于权势集团的。

中产阶级在其中有影响的另一组织是共济会。意识到自己在国家政治中的作用、有抱负的领袖人物都参加了共济会。自由党和激进党的绝大多数成员都是共济会会员。一个不那么政治化、但在地方上很有影响的组织是消防队。大大小小的城镇都有一个消防组织，动员民众——通常都是中产阶级民众讨论有关的公共问题和政治问题。

全国农业协会是个中产阶级从未在其中有过多少影响的组织。这一组织是大庄园主的论坛，是为他们的利益而奔走的院外活动集团。城市里的工业发展协会起类似的作用。该组织由上层阶级制造商和中产阶级工厂主组成。其成员中有一多半是外国生人。包括商会在内的其他雇主协会均组建于20世纪20年代。这些组织为各自的特殊权益奔走游说政府，但也协调一致反对劳工的要求。这些组织的成员中很少有人可被视为上层阶级分子，许多人是中产阶级中的富裕分子；但他们不是名门望族出身，又没有土地，不能位列上层阶级。

这一时期上层阶级的妇女们成立了一些组织，不久其成员就多半来自中产阶级了。像妇女俱乐部这样的一些组织力主发展妇女教育文化事业，而像智利全国妇女行动这样的其他一些组织则强调妇女应享有的权利和选举权。还有一些像女士保护工人协会这样的组织向穷人提供服务和免费教育。这些组织大多是世俗性的，也有一些像民众使

119 徒协会和救世军妇女支部这样的妇女宗教组织。这些组织的社会活动

和传教活动均面向劳动妇女及其子女。

3. 工人阶级的兴起

中产阶级通过其职业社会组织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时，工人阶级也在竭力发挥其自身的影响。城市工匠组成互助会；他们自己和家人如果生病、遭遇意外事故或死亡，能得到互助会的资助。互助会也是一种合作性组织和社会组织。1900 年时有 200 多个互助组织，到 1925 年有了 700 多个。采矿业、建筑业和工业提供了新的就业岗位，1925 年有近 75% 的工人属于这三类行业。女工人数增加得很快，特别是在圣地亚哥和瓦尔帕莱索。到 1920 年，女工总数超过 6 万，占了这两个城市劳动力的 1/3 以上。她们大多从事家务劳动，也有人在工业部门就业。

智利的首批工会组织出现在采矿业、铁路、城市公共交通运输和印刷业。这些组织的观点深受工团主义思想影响；这工团主义思想是随移民和外国出版物传到智利的。西班牙强劲的工团主义运动扩展到了阿根廷、古巴、智利和拉丁美洲其他一些共和国。这一运动的成员认为政府、制度和法律都反映了权贵的价值观。工团主义者们坚信他们永远也改变不了政府，还不如将其废除为好。工团主义劳工组织根据这种认识，开始时拒绝参加政党、提名候选人和参与选举投票活动。

1887 年，创建民主党的领袖人物持有了一种极其不同的观点。劳工与中产阶级首次创建了一个与权贵集团没有关系的党。该党虽然没有其他政党所能享用的资金，但 1894 年有了第一个众议院议员。30 年缓慢发展后的 1924 年，该党有了十名众议员和四名参议员。就全国而言，该党仅赢得 8% 的选票，但在某些地区的成绩是令人注目的，在圣地亚哥获得 21% 的选票，在康塞普西翁为 37%，而在考廷则为 100%。该党还参加了“自由联盟”，支持阿图罗·亚历山德里；此人 1920 年当选为总统。然而该党兴旺后，就逐渐向右转，竭力促使劳工寄希望于较具代表性的政党。 120

1909 年，一些互助会联合成立了智利工人联盟，其宗旨比较保守。三年后，路易斯·埃米略·雷卡瓦伦组织激进的劳工政党社会主

义工人党。俄国十月革命后，雷卡瓦伦想使智利的这两个组织行动一致、团结战斗。他赢得了智利工人联盟的领导权，引导其左倾，争取对他 1921 年竞选议会议员的支持。1922 年，社会主义工人党在他的领导下改名为共产党。受该党影响的智利工人联盟开除了一些不支持共产党的成员，例如那些工团主义者，他们反对劳工参加政治活动。

劳工采取直接行动、而不是靠参加政治活动解决问题，这就迫使雇主们改善其劳动、生活条件。1890 年，北部地区的硝石和铜矿工人罢工，南部地区煤矿工人立即响应。虽说此前也有过多次罢工行动，但这次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罢工。政府调动军队要进行镇压，而雇主们则假装让步要满足罢工工人的要求。然而工人复工后，雇主们无耻地撕毁了协议。1903 年瓦尔帕莱索的码头工人罢工，1907 年再次罢工。1907 年，圣地亚哥的工人也举行了总罢工，但未获成功；而政府军又在北部港口城市残酷地杀害罢工工人及其家属。

这种镇压势头抑制了劳工达十年之久；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通货膨胀，工人的工资贬值、购买力下降，他们再次走上街头。政府担心发生暴力冲突，宣布了戒严令。数年后的 1921 年，一场经济衰退打击了硝石业，失业人数增加。政府除使用暴力镇压抗议的矿工外，还用船将他们中的两万人运送到了南方。

反复出现的罢工潮表明劳工的力量在日益增强。然而大多数工人尚未组织起来。硝石矿、铜矿和煤矿工人都组织了工会，但农业工人没有组织起来。而农业工人的人数是产业工人的三倍多。即使在有着 17.5 万多工人的圣地亚哥和瓦尔帕莱索，大多数工人也未加入工会组织。再者，不同的政治信仰和对立的工会组织又分裂了组织起来的工业和矿业工人队伍。想将劳工结合在一面大旗下，要有这么一位民众主义政治家：他既能动员劳工，又能淡化各派的分歧。1918 年，这样一位有号召力的政治家阿图罗·亚历山德里开始了其政治生涯，得到了许多劳工的支持。他在劳工的支持下，在北部地区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这使他获得了“塔拉帕卡雄狮”这一美名。

121

二、农业

新群体登上政治舞台后，庄园主们感到越来越难以主宰他们掌控了近一个世纪的体制了。他们在自己的议会选区里依然控制着工人们的选票；但随着城市和矿区的发展，他们在议会占有的议席减少了。从政治上看，现代化是种威胁，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对采矿业和工业的投资加速了现代化进程。

矿工和产业工人是对地主的政治威胁，但又构成了一大重要而又不稳定的市场。为了供应城市市场，庄园主们专门生产乳制品、种植蔬菜或烟草。由于世界农产品价格下降、而智利又难以同生产成本较低的国家进行竞争，地主们遂日益依赖国内市场了。然而唯一的例外是羊毛的出口；羊毛产自巴塔哥尼亚的大型牧羊场；这些牧羊场是英国移民开发建设的。

从 1900 年到 1930 年，地主们的耕地翻了一番，灌溉面积增加了 1/3，牛群增加到了 100 多万头。由于通货膨胀十分惊人，城市工人就食品涨价提出了抗议；而 19 世纪末粮食实际价格又迅速下跌，但 1900 年至 1930 年间又有所上涨。比起其他一些国家的人来，智利人还是较为易于享用某些农产品的。例如，智利人消费的肉比纽约人多一倍，消费的酒也多得多。

一些庄园主用机器犁地、播种和收割庄稼，从而提高了农场的生产率。但大多数庄园主还是宁可耕种更多的田地、扩大灌溉面积和榨取工人们的更多劳力以提高产量。20 世纪 20 年代，这些传统方法还是足以提高马铃薯、玉米、小麦和大麦产量 50% 以上的。由于劳动力便宜、机器又比较昂贵，地主们就不急着实现现代化了。他们的机械化率远远低于其他农产品出口国，委实不幸。

越来越多的庄园具有另一功能。庄园主们用庄园的资金投资于其他企业。地主出身的议会议员们立法创办了土地抵押银行；该银行成了智利最具声望的机构。1900 年至 1930 年期间，银行拨给农牧场主的货款从 9 400 万比索增加到了 14 710 万比索。土地抵押银行 122

并未规定货款必须用于改善农牧业，农牧场主往往用钱投资于城市房地产、矿山、银行和保险业；这些投资所得的回报比投资农牧业要高。因此，智利乡村资助了智利城市。此外，地主们用这贷款在圣地亚哥建筑富丽堂皇的宅第、到欧洲旅游、资助政治宣传运动。再者，通货膨胀使他们交了好运。他们还贷款时，所还欠款比所借的钱款时值缩水了。

土地仍高度集中在权贵手中，10% 的庄园主占有 80% 的土地。然而乡村权贵的组成发生了变化，这是一些家庭因继承问题和财富缩水而被迫出卖地产所致。土地上市后，富裕的矿主和商人出手购买。例如，铜业巨头阿古斯丁·爱德华兹·奥桑东就买了七处庄园，购价 60 多万比索。两处是抵押所得，其他五处系负债的地主公开拍卖时购得。爱德华兹的例子反映了新贵与老派相结合的状况。这些土地使他有了固定的收入来源、享用信贷的条件和抵御通货膨胀风险的屏障。这些土地也意味着爱德华兹已经成了权贵集团的一位名副其实的成员。为了巩固这一地位，他的遗孀胡安娜·罗斯和他们的儿子阿古斯丁·罗斯又收购了六处地产，购价 150 万比索。

大部分占有土地的智利人所占土地都在五公顷以下。六万自耕农占有不到 1/10 的智利农田；而不到 3 000 个庄园主却占有了一半以上的智利农田。还有一些中型农场，但贷款和销售问题又往往使这些农场受制于大庄园。1900 年，智利乡村人口近一百万，其中 90% 的人无立锥之地，有不到一半的人一年到头生活在大庄园上，其他人则游走于各庄园寻找工作。由于通货膨胀，他们的工钱多了，但比索的购买力则下降了。而铁路、采矿和工厂工作报酬高，促使工人们离开农场，也就不奇怪了。像保姆和洗衣工这样的一些城市家庭服务工作同样促使年轻妇女离开农场。青年男女向南迁移，旨在占有以前属于马普切人的土地。弄到土地的人可真是费老劲儿了。

三、工业发展

123

随着城市市场的发展，一些企业家瞅准时机将农产品加工成售价

更高的消费品。他们开办了大麦啤酒、小麦面粉、羊毛织物和木材等加工业。从1891年到1925年，这些加工业使智利的生产发生了重大变化。大多数工厂兴起在瓦尔帕莱索和圣地亚哥，但康塞普西翁和远在南方的瓦尔迪维亚也有一些。移民们在这方面起了关键性作用。

加工业需要的是消费者，而不是资本货。时至1925年，全国工业有近50%从事食品和啤酒生产。其次是纺织品、服装和鞋，约占25%。金属制品生产很少，不到全国工业生产的8%。虽然有一些为铁路和采矿业服务的稍有规模的铸造厂，但没有开拓出口市场，因而难以达到跟大型跨国公司竞争的程度。木材加工业同样弱小，占不到全国生产的6%，未能充分利用智利南部地区大面积的林木，农民们往往烧林造田。

许多工厂的产品供应了国内市场，而先前是由进口产品供给的。啤酒就是个好例子：殖民地时期根本无人知晓，独立后很快就进口到了瓦尔帕莱索；其后的20年间，该港口城市的一些商人试着开办了小规模的啤酒厂；19世纪50年代，德国移民卡洛斯·安旺特在南方的瓦尔迪维亚开了一家啤酒酿造厂，产品不仅供应当地市场，还船运到北部地区的采矿区销售。

1902年，圣地亚哥和利马切的主要啤酒厂合并，开始了啤酒酿造业的并购潮。库西尼奥家族和爱德华兹家族用在采煤和采铜业中获得的资金创建了联合啤酒酿造公司。1916年，该公司又收购了另外三家啤酒厂（包括卡洛斯·安旺特和安德雷斯·埃德内尔拥有的工厂）。公司收购这家工厂，委实发了一笔横财，这是因为这家工厂还生产多种软性饮料，而其中有些更持有外国专卖证。1923年至1932年间，联合啤酒酿造公司玩了一个疯狂扫购活动，在其他五个地区并购当地所有的啤酒厂。该公司还利用其主导市场的地位控制了智利玻璃器皿制造业，控制了国内唯一的一家玻璃瓶制造公司。

制糖、烟草、化工、造纸和水泥等其他一些工业的发展、市场控制状况亦如此。这些工业有许多是移民创建的，但拥有雄厚财力的权贵家族往往买断了这些公司。工业化使一些企业家成了经济权贵，而

124

在圣地亚哥和瓦尔帕莱索拥有宅第和办事处的农业和矿业权贵很快也就认识到了工业所提供的机遇；他们中的许多人非但没有排斥这一新兴经济活动，而且成了企业发展的领军人物。

工业领军人物很快就认识到了有利的政府政策的价值。他们组建了一个雇主组织工业发展协会，使他们可以成功地游说政府。例如，两家制糖厂在受到进口糖的竞争威胁时，同工业发展协会一道游说议会增加关税成功，使进口糖减少了75%。为了保护水泥、纺织及火柴业，工业发展协会也力促政府提高了相关的关税。议会关税委员会虽然在1928年抱怨说：高进口税导致了本国产品的垄断状态，但并未阻止工业发展协会坚持进一步提高关税的要求。

外国人参与智利工业化的作用，是个颇有争议的问题；这倒不是移民们所起的作用问题，而是总部设在欧洲和美国的外国公司所起的作用问题。英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和美国公司都早就参与了智利的工业化进程。19世纪时，瓦尔帕莱索和康塞普西翁的一些商人就开始加工农产品供出口或当地消费了，这要比进口来得便宜。这些产品包括毛织品、纸、金属制品、罐头食品、鞋、酒和家具。尽管他们恳请议会对他们的产品提供关税保护，外国公司仍力求打入这一有利可图的市场，有时同智利制造厂合资经营，有时独自建厂，成为完全自主经营的子公司，诸如西门子—舒克特电器设备公司、E. I. 杜邦德内穆尔火药公司和艾博特制药公司。这些公司十分强劲，1925年时已占有了智利工业的50%，其经营管理人员大多是外国人。

垄断是智利工业早期的一大特征，这不利于技术的革新和消费品价格的下跌，而在跨国公司想要进入智利市场时，这又成了讨价还价的有利条件。在那些智利公司已强势存在的领域，外国公司宁可合资经营、不愿与之相竞争。例如，在玻璃制造业领域，美国科宁玻璃公司就决定同智利玻璃器皿制造厂建立伙伴关系、而不是与之相竞争。瑞士火柴公司、美国钢铁公司和英美烟草公司也同样采用了跟智利企业合资经营的方式。

125

四、采矿业

从1890年到1925年，硝石在采矿业中占首要地位，但1910年后铜业生产的现代化为其惊人的复兴奠定了基础。1890年至1925年间硝石产量从100万吨增加到了250万吨，价格在每吨24美元至49美元间波动。第一次世界大战使需求猛增，而船舶运输又保证了供应。劳动力的需求则促使智利中部和南部地区的人们向北部地区流动。1890年北格朗德硝石产地的居民不到18万人，到1925年则超过了34.5万。伊基克成了全国第四大城市，安托法加斯塔则位居第七。北部地区几乎所有的人都生活在城镇和矿工村，以方便用水。因此，尽管北部地区幅员广大，然而居住在城市、而非乡村的人占绝大多数。

几家大硝石公司雇聘欧洲化学工程师掌管其加工厂。这些企业虽然很快就采用了较新加工技术，但却迟迟不引进新采矿手段。因此20世纪初之前，采矿技术一直是原始性的。硝石的采掘和运输仍是一种劳动密集型的、肮脏的、有害健康的工作。《伦敦时报》记者威廉·H. 拉塞尔19世纪20年代采访约翰·诺思的那原始性硝石采掘场时视察了矿工们的日常劳动情况。他观看了硝石采掘、运输、加工的全过程：爆破组刨开硬土层，掘进至硝石层，洞深约10至12英尺；而后一名年轻的爆破工爬下洞底，将一包炸药埋入硝石层，另一工人点燃导火索，硝石层被爆破成碎块，粉尘沾了工人们一身；接着工人们用手将碎块装上车，用骡子将车拉至加工厂，将碎块倒进碾碎机，碾成细盐粒；再由有轨机动车将细盐粒运送至沸水槽，倒入其中提纯；提纯后烘干、装袋出口。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古根海姆兄弟决定在智利投资，硝石采掘业开始了一个新时期。他们的公司已在科罗拉多和墨西哥拥有多处铜矿。公司也有大量资金可用以引进许多智利先前没有过的资本密集型生产方式。挖掘机、铁路和传送带替代了大部分的体力劳动。然而这些革新耗资高达1.3亿美元。 126

硝石业提供了巨额财富，然而周期性地受到了国际危机的冲击。

问题不在于外国人的所有权，在于对外国市场的依赖。19 世纪 90 年代，智利人的所有权只占 10%—15%，而到 1918 年实际上已占有了 60%。甚至在智利人的所有权扩大之前，出口税和工人工资加在一起就表明：50% 以上的产值是留在智利的。问题是欧洲和美国购买了几乎所有的硝石，这些国家的市场行情从而决定了价格和生产。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同盟国封锁德国使其难以弄到硝石时，德国科学家们竟在实验室里成功地合成出了硝石。战后德国禁止进口智利硝石，以保护本国的这一产业。后来其他国家也成功地生产出了人造硝石，这又进一步打击了智利的硝石业。

从 1890 年到 1910 年，智利硝石的命运与铜的命运差不多是相反的。硝石产量增加，而铜的产量则下降，从高达 5.2 万吨跌至 2.6 万吨。19 世纪 80 年代之前，智利的铜矿工人应用世界一流的技术开采纯度高的矿石。这些矿石枯竭后，保持竞争力的唯一办法是开发加工低纯度矿石的技术。但硝石的问世吸引了更多的投资。像爱德华兹这样的一些靠铜致富的家族，这会儿放弃了这一行业，改为投资硝石业和其他产业。

因此，采铜业的复兴就全靠外国投资人了。19 世纪末，美国发明了加工低纯度矿石的浮选法。1904 年，威廉·布雷登收购了位于圣地亚哥东南方安第斯山上高达一万英尺处的埃尔特尼恩特矿，将浮选法引进到了智利。大雪造成了交通问题，但并不影响地下深处坑道里的采掘矿石工作。布雷登感到自己已无力继续对该矿进行投资，遂于四年后将矿转卖给了古根海姆兄弟公司。1911 年，该公司增添了其在智利的投资，并购了安托法加斯塔地区的丘基卡马塔矿。与埃尔特尼恩特矿不同，这新购的矿为一露天矿。从空中往下看，该矿就像是一大型螺旋物体在向地球深处旋转。古根海姆兄弟公司以肯尼科特铜公司的名义向这两座矿投资了 1 亿美元。

127 另一大型美国公司安那康达铜公司并购了丘基卡马塔矿，而后又开发了一座名为波特雷里略的新矿。安那康达铜公司拥有这两座铜矿后，再加上其在蒙大拿州布特占有的一座铜矿，就试图控制世界大部

分的铜业生产了。智利人越来越反对外国控制铜的生产和销售。他们称这三座大型铜矿为“大矿”，称其他小型铜矿为“小矿”。大型矿是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智利出口的大部分铜；而那些小型矿则是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的铜很少供出口。

美国公司的投资开始使智利的铜业有了好转。20 世纪初智利生产的铜占世界生产的份额很低，只有 4%，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增加到了 7.5%。开始时由于公司进口了很多机器和必需品，所以智利人没有从这增长中看到什么好处。工人是智利人，但工程师和经营管理人员则是美国人。再者，政府没有很快征收铜出口税，所以财政收入很少。

五、贸易

这一时期有两件可怕的事打击了瓦尔帕莱索，损害了这一港口城市作为太平洋商业中心的形象。就在一场大地震袭击加利福尼亚的旧金山后过了四个月，1906 年 8 月 16 日又一次大地震摧毁了瓦尔帕莱索。死亡 2 000 多人，财产损失达数百万比索。虽然政府重建了其办公楼，但私家投资人则纷纷将其营业所从这座港口城市迁至圣地亚哥。另一件事虽说不那么带有毁灭性，但影响则更为深远。巴拿马运河的开通使船运公司得以不再绕道传统的合恩角一线而走这条近道，既省时间又省钱。瓦尔帕莱索失去了所有向过往船舶提供必需品的生意。瓦尔帕莱索成为太平洋沿岸的首选停靠港，已历时百年；1914 年后停靠该港的只是要在此进行交易的商船了。

瓦尔帕莱索的遭遇并未影响硝石和铜的出口，这些产品的出口大多经由北部的几处港口。从 1890 年到 1920 年，出口年增长率为 7%—9%，这主要得益于硝石的出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衰退使这一增长趋势一时逆转，但 1925 年之后其增长又有了短时间的回升。出口收入使智利人得以进口各类商品，从铁路设备到服装应有尽有。1914 年之前，英国是智利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后的年代里，美国取代了这一角色。下列统计数说明了这一发展趋势。 128

	英国	美国
1910 年	139 400 000 美元	64 400 000 美元
1920 年	113 100 000 美元	299 600 000 美元

智利没有使其出口产品多样化，也没有使与之进行贸易的国家多元化。从 1890 年到 1914 年，硝石占出口总额的 70%—80%。只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铜业开始兴旺、铜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 20% 时，才又有一种产品具有了重要性。1890 年之后，由于生产率落后于人口的增长，小麦出口下降了。这一下降又导致了矿产品出口的进一步增长。这确确实实是个"硝石时代"。

硝石出口税占了政府总收入的 50%。国家领导人用这些钱建设现代铁路系统、改善道路、教育青年和美化城市。虽说有些钱花得不值当，但大部分钱还是花得值的。交通的改善降低了运输成本。受过教育的民众更具创造性、能力更强。然而正是这政府体制限制了人们积极性的发挥。政府资助地主们的交通运输信贷体系，因而使他们"全体免费入局"①。想开发新矿的其他智利人却得不到这种信贷。要生产出具有竞争力的硝石和铜，就得拥有大量资金，然而只有少数智利人有钱。工业提供了一些机遇，但大企业已联手行动、将小企业排挤出了市场。因此硝石税的收入并未促进新企业的发展，而是资助了一些重大的公共工程项目，这制造了一种虚幻、而非实质性的发展景象。

智利经济发展不稳定的最明显的迹象要算是与通货膨胀所做的斗争了。智利首次通货膨胀发生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当时政府加印钞票支付开销。（美国内战期间，交战双方也都用了这种筹集资金的方法。）战争结束时，比索已贬值 30% 以上。接下来的两届政府竭力扭转比索下跌的势头，但 1891 年内战爆发后巴尔马塞达总统再次向印钞机求助。其结果是一年内比索贬值了 50%。

1891 年至 1925 年，世界经济的动荡局面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直接

① 即"无本获利"。——译者注

影响了智利经济。需求趋旺时，智利的出口和政府收入随之增加。在这形势大好的时候，国家领导人就尽力回笼纸币，恢复金本位。而在需求下降时，出口和政府收入亦随之减少。为了付债和救助银行及债权人，政府印刷了大量钞票，1898 年增加了一倍多，1907 年增加了 80% 以上，1914 年增加了 50%，从 1924 年到 1925 年又增加 75% 以上。政府对一些消费品、收入和财产开始征税，然而为时已晚，政府仍旧要十分严重地依赖硝石的出口。在其他经济部门没有纳税前，政府难以解决收入不稳定和长期通货膨胀问题。 129

由于有些人从通货膨胀中获益，所以难以求得与之作斗争的一致意见。比索贬值时，进口品价格上涨得比国产品快，因此国产品销售得多。债务人也从通货膨胀中得益。他们用以还贷款的钱几乎总是比所借的钱价值要低，这就形成了负利率。地主们是最大的债务人，发现这是一笔横财；但政策并不鼓励他们进行生产性投资。做资源或地产投机买卖似乎要比生产性投资所得到的回报要多。政府和私营部门均未能制定出促进国家发展的政策。

六、政治

1874 年和 1891 年的选举改革，为中产阶级和工人参政以及使权力向议会转移敞开了大门。政党间的竞争更趋激烈，而这种竞争则使议会具有了较为广泛的代表性。地方上对选举的控制增强了政治领袖们的势力，进而削弱了总统对选举的影响力。这些改革原本是要让权贵集团得利的，但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选民们断定改革可以让他们选出本阶级的人担任公职。

这些改革削弱了总统对选举的操控，却又招来了党派的操控。选举骗局屡见不鲜，委实令人遗憾。候选人为了打败竞争对手不惜花钱买选票。花销是不菲的。例如 1909 年议会选举时，爱德华多·查尔梅在选票上花了 40 万比索，而他的竞争对手则花了 30 万比索。查尔梅以多得 1 000 余张选票当选，但他在竞选当中抵押了个人的房地产。有时候选人会没有竞选对手，这也许是因为竞选对手接受了政府任命 130

的职位而退出竞选以施回报。选民们出卖选票已习以为常，而选举没有竞争对手，也就没有人买选票了，他们会愤懑不已。

候选人之所以肯自己掏钱投人选举，并非是想将来要谋求多少经济利益，而是要赢得担当议会议员的声誉。排他性的“协和会”成员资格证实了某人的权贵地位，而担当议会议员则又提高了地位。公民精英的最高典范是担当议会议员或出任内阁部长。这些人是他们时代的翘楚名流。

担当议会议员一任以上者，通常在其任职期间至少会出任一次内阁部长。紧张的党派对立关系迫使内阁不断改组。政党使用不信任权要求内阁改组。很少有部长干满一年的，干上几个月是常事。有时议会对某位部长的不信任，会断送其政治生涯；例如，议会免除总统巴尔马塞达的门生恩里克·萨尔瓦多·圣富恩特斯的职务后，也就断了他当总统的念头。

议会主宰时期，内阁改组是常事，平均每位总统任内有 20 次内阁改组。政府有可能会陷于瘫痪，但只要其下级机构照常运作，公共工程和服务业就不大会停顿。

挑选总统候选人是个复杂过程，这一过程促使政党签约结盟。一方结盟称为“联盟”，通常包括保守党人；另一方结盟称为“同盟”，通常包括激进党人。其他政党和党内的一些派别根据其选举策略或所得到的有关未来职位的许诺，参加“联盟”或“同盟”。自由党往往会分裂。然而有两次是各政党一致选定的候选人。1891 年海军中将豪尔赫·蒙特被各政党一致无异议地推选为总统；1910 年拉蒙·巴罗斯·卢科亦如此当选。然而 1896 年、1915 年和 1920 年的选举中各候选人势均力敌，由总统选举团以极少的票数之差决定了获胜者。

议会议员们虽然为谋划下次选举花费了大量精力，但对促进公共工程的发展还是相当卖力的。议会拨款用于修铁路、架桥梁、建港口；所拨款项超过私人资本。政府修建并经营着全国铁路线的 56% 。政府出资修建了从圣地亚哥到蒙特港的整条南方铁路，并出资修建了两条国际铁路线：一条通玻利维亚的拉巴斯，另一条到阿根廷的门多萨。

此外，政府还修建道路、提供公益服务，这些在其他许多国家都是私人出资的。智利早在20世纪初之前已用国家资金补充私人投资的不足了。随着20世纪的向前推移，国内投资越来越有赖于政府，而与此同时私人投资则越来越多地源自国外了。

议会没有批准过重要的社会法规。20世纪20年代之前，大多数议会议员均赞同自由放任原则。根据这一原则，解决人民需求的应是自由市场、而不是政府。如果世界性事件没有使智利陷入严重危机，政治景况可能还是因循守旧之风盛行。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欧洲的一系列革命从根本上震醒了智利。智利虽然没有直接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但战火也烧到了家门口。英国人跟德国人在康塞普西翁沿岸进行海战，而后是“德累斯顿”号军舰在胡安·费尔南德斯岛附近沉没。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危机还向智利人表明，他们在世界性事件面前是多么的无奈。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开始要求变革。一些政治家对其关心的社会问题做出了回应，以寻求对其支持。20世纪20年代，力量对比迅捷向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倾斜；在此之前，是权贵集团说了算。

1920年总统选举时，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发现了一个极具改革魅力的候选人，此人名叫阿图罗·亚历山德里，他以一种民众主义的——对智利说是种全新的——方式进行竞选活动。他及其“同盟”内的支持者们以极少的票数之差赢得了这场竞争激烈的选举。他的政治言词使权贵惊恐万状；而在他将其改革法规提交给议会后，保守的参议员们否决了他的提案。他受了四年的阻挠，一直动弹不得；1924年的议会选举使他有了争取在议会两院都得到多数支持的机会。他充满激情地为其“同盟”的支持者们竞选，使他们赢得了多数人的支持。然而在他使其诸事成为法律前，军人就挫败了他的计划。

9月初，一批下级军官闯进议会旁听席打断议员们的辩论。以路易斯·阿尔塔米拉诺为首的高级将领们担心下级军官们威胁其对武装部队的控制甚于他们对政府的伤害。因此阿尔塔米拉诺迫使亚历山德里让他及其他一些高级将领入阁。他们又利用其阁员身份强制议会立

法。亚历山德里起初认为自己能够控制局面；但当他发现错了时就辞去了总统职务。军人同意他离职6个月，所以他决定流亡欧洲。高级军官们组成执政委员会，并同保守的政治家们联手草拟了一份议事清单。然而思想进步的下级军官们感到被出卖了。所以他们于1925年1月23日在卡洛斯·伊瓦涅斯上校领导下打倒了他们的高级同僚，恢复了文官政府，让亚历山德里重登总统宝座。

132

亚历山德里使其新政权具有了一种独裁色彩，留下卡洛斯·伊瓦涅斯任国防部长，不让议会复会，而以政令进行统治。为了强化总统职权，他指定人员组成一委员会修订1833年宪法。该委员会草拟了一份文件，强化总统实施和否决法规的权力，但议会仍保留谴责并罢免内阁部长的权力。选举体制未使政党和结盟发生变化。亚历山德里对这部1925年宪法表示满意，遂提请全体选民投票公决，并得到了绝大多数选民的首肯。

亚历山德里不久即发现，向他的权威挑战的不是议会、而是他那权欲极大的国防部长。卡洛斯·伊瓦涅斯开始自己竞选总统的活动，同时要求亚历山德里就重大问题同他进行磋商。亚历山德里怒火中烧，又难以解除其国防部长的职务，遂再度引退。这正中伊瓦涅斯的意；他主持挑选亚历山德里的继任者的工作。伊瓦涅斯决定退出总统竞选活动，但要对获胜者进行操控。

军人这时成了智利政治活动中最主要的角色。军人虽然决定了1891年内战的结局，但并未强行对国家进行统治。海军中将豪尔赫·蒙特从1891年到1896年任总统，是经议会选举的。军人上次用武力夺取政权是1830年。而1924年引导政府变革的军官们则开创了军人权力的一个新时代；1925年宪法并未能抑制军人的权力。在受经济萧条打击的下一个十年里，军人进一步削弱了政治集团的力量，使其近乎瘫痪。

第七章　民主实验（1925—1958）

20 世纪 20 年代，智利的城市提供了一种任由中产阶级发展壮大、上升至领导地位的环境。中产阶级在远大抱负的驱动和所受教育的影响下，不仅在政治、而且在职业和艺术上向权贵集团提出了挑战。中产阶级对权贵体制表示不满的一个最明显的事例，就是 20 世纪 20 年代参与国家生活时给予军人的支持。然而 1930 年经济萧条降临时军人束手无策，中产阶级遂与之分道扬镳，重新谋求实施民主和文人体制。 133

1932 年到 1958 年统治智利的五位总统均出自中产阶级。1938 年到 1952 年的几届政府还有工人阶级政党作为盟友参政的情况。这些政府的政策虽然巩固了中产阶级的地位、增加了工人阶级的福利，但并未削弱权贵集团的经济实力。这些政府切实协调了智利各社会集团的关系，从而巩固了现行的政治制度。在独裁政权统治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的同时，这些政府却使智利成了一个开放、民主的社会，值得大书一笔。

中产阶级创建了一种政府应该为所有社会集团谋福祉的政治文化。中产阶级支持社会福利法、扩大教育面、平抑消费品价格，以使工人受益。中产阶级增设政府工作岗位、使公用事业现代化、通过协商求稳定，以使其自身受益。中产阶级保护农业和工业、禁止没收财产，以使权贵受益。 134

然而如此地普施恩惠，政府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些计划的实施需要增加税收，根据新税法征收到的税款不敷支出，政府因而靠向外国借贷和印刷钞票应付局面。结果是比索贬值，进而使人们生活水平下降、长期投资受影响。智利因而享受不到美国和欧洲消费者享有的那种富足。人们提出指摘时，通常归咎于执政党。这就导致了不断的政治对话，人们通常主张大政府统制法。

一、思想的影响力

智利的言论自由传统使得报刊繁多、出版业活跃、大学环境宽松。比起拉美国家的大多数人来，智利人更加关注欧洲知识和社会的发展动向。这一关注始于19世纪，而随着旅游人数的增加和通讯联络手段的改进，这一关注在20世纪里则更加密切。书店备有重要的欧洲和美国书籍（原著和译著）出售。受过教育的公众热切地阅读了解世界大事和新鲜思想，报纸因而扩大国际新闻版面，并增加了评介重要著作的文化和文学副刊。

美国和欧洲的电影发行商在智利找到了热切的观众。企业家们在大城市和小城镇建起了豪华的影剧院。中产阶级成员周末通常至少要看一场电影。电影明星同其在自己的国家一样，成了智利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正片前放映的新闻短片呈现了20世纪30年代欧洲和美国的群众运动及墨索里尼、希特勒、罗斯福和丘吉尔用以控制劳工和与经济萧条作斗争的不同方式的画面。

20世纪30年代无线电广播兴起后，也同样很快就被大部分城市家庭所接受。广播节目通常有流行音乐、肥皂剧、体育比赛、政治评论和新闻。电台通常明确支持某一特定政党，在新闻和评论中突出宣传它的观点。一些电台播放墨西哥民谣和阿根廷探戈舞曲，以吸引工人阶级，而另外一些电台则播放爵士乐曲和古典音乐，以迎合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节目内容有一半源自智利境外。

135 智利史学家和作家们对大众传媒上争论的一些社会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史学家们积极参与政治，委实有点儿令人感到意外。他

们对当代问题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受了他们对过去的看法的影响。作家和艺术家们通常很少担任政治职务，但有着强烈的政治责任感，这通常鲜明地表现在他们的作品中。他们自己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出身深深地影响着他们对社会问题的看法。

19世纪，智利以出史学家广受世人瞩目。20世纪，智利则以出诗人而深深为人称道。诗歌文化大普及，每个社区都有诗会。诗会出诗刊，定期举办诗歌朗诵会。列车员、零售商、学校教师，乃至政府官员均写诗。大多数诗人出自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但也有一些出自权贵集团。智利诗人尽管阶级出身不同，但均阅读广泛（包括拜伦勋爵、沃尔特·惠特曼和古斯塔沃·贝克尔等人的诗作）。20世纪智利最著名的三位诗人维森特·维多夫罗、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和巴勃罗·聂鲁达都曾长期生活在国外。他们虽然都受到了外国诗人的风格和主题的影响，但他们作品的主要内容还都是智利题材。维多夫罗避而不谈社会问题，而米斯特拉尔和聂鲁达则主要描绘社会问题，并突出反映了南、北美洲一体的、共同的土著印第安人传统，确认自己是印第安人的后代，宣扬土著主义（复兴美洲土著文化）。

维森特·维多夫罗的社会出身与其同时代大多数诗人不一样，他是殖民地时期贵族的后代。这也许就是他与同时代的人不一样、对商业和政治不那么感兴趣的原因吧。他刚上学就爱上了文学，十几岁就开始发表诗作，23岁时即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他称之为创造主义。他反对摹拟大自然的现代主义风格，力求创造他自己的、不存在于大自然的世界。1916年，他游历巴黎，不久即与那儿的先锋派诗人结伙，开始用法语写诗发表。后来他移居西班牙，他的诗风影响了许多诗人和作家。除了写诗，他还尝试着撰写小说和剧本。

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出生在一个教师家庭，家住北部地区小镇埃尔基。跟双亲一样，她亦开始从教，曾在不同的学校任教。从教头六年，她每年都要换个城镇学校教书，有的学校地处最北端，有的则在最南端。1922年，她在纽约出版了第一部诗集《孤寂》。诗中透露出了一种哀怨之情，但所呈现的自然之美又令人陶醉。她诗中所表述

136

的爱是种心灵之爱、而不是情欲之爱，这跟她同时代的大多数拉丁美洲诗人和作家不同。为表彰其才华、支持其创作，智利政府早早就向她发放了津贴。后来政府又委派她到意大利、西班牙和巴西担任外交职务。1945 年，她成了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讲西班牙语的诗人。

出身比米斯特拉尔更为卑微，而对西班牙语诗歌影响更大的诗人是巴勃罗·聂鲁达。虽说他父亲在铁路上劳作，但他从小就热爱文学。他 13 岁即发表诗作，当时还在读中学。他读的是师范，但由于在 20 岁和 24 岁时先后出版了《黄昏》及《20 首爱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而成名，所以一天书也没教过。像加夫列拉·米斯列特拉尔那样，他的才能也受到了智利政府的表彰，接连被派往几个国家担任外交职务。

聂鲁达很早就对工人表示了同情，而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做流亡者工作时又使他更趋激进，更加同情无产阶级事业。他的《诗歌总集》用社会主义观点对美洲作了全景式的描绘。他除了大量写作外，还从事政治活动。1969 年共产党提名他为总统候选人，但他退出了竞选，转而支持萨尔瓦多·阿连德。他的观点使他的一些诗作高度政治化，但也赢得了工人阶级的喜爱。与政治无关的作品是《风雨颂》，他像沃尔特·惠特曼那样赞颂大地的产物和耕种田地的人们。1970 年萨尔瓦多·阿连德当选为总统后，委任聂鲁达为智利驻法国大使。一年后，诺贝尔奖委员会授予他很有尊严的文学奖。

智利的小说家们不怎么吸引外国读者。他们对乡村风俗习惯和社会问题的关注没有像智利的诗歌那样引起广泛的兴趣。华金·爱德华兹·贝略长住瓦尔帕莱索，他的小说叙述了这一港口城市的阶级对抗状况，描绘了当地起伏的山峦、风势和海景。他对权贵集团和中产阶级进行了严厉的批判，然而他的好朋友却是智利最富有者之一。另一位富有创新精神的作家奥古斯托·达尔马形成了他自己的极富想象力的文学流派，他的作品《德乌斯托神父的受难和死亡》就反映了这一现象。他的创新精神导致他在圣地亚哥附近创办了一家艺术社团，但后来他又侨居西班牙和印度。

137

比较关注农业工人问题的是小说家佩德罗·普拉多。他在《阿尔西诺》中极富同情心地描述了生在贫困农民家的孩子们。作者没有直接从思想上、抑或实际上提出解决贫困的办法，但提出了改造人和大自然的构想。同时代的小说家爱德华多·巴里奥斯在国外广为游历后，决心从事公用事业和文学创作。卡洛斯·伊瓦涅斯执政时期，他出任国家图书馆馆长和教育部部长。他的小说（如《大先生与穷光蛋》）虽然质朴地描绘了智利的乡村社会，但他并未对传统的社会关系进行批判。

史学领域形成了不同思想倾向阐述历史的状况。右倾保守派否定19世纪自由主义的诠释。1929年，卡洛斯·伊瓦涅斯上校军政府的一位亲密合作者阿尔贝托·爱德华兹·比维斯出版了《贵族投石党》，这是一部迄今为止思想演绎最缜密的一部智利史。他将智利的许多成就归因于巴斯克—卡斯蒂利亚贵族的领导才能。弗朗西斯科·安东尼奥·恩西纳是位著作颇丰但不善分析的保守党人，他的《智利史》有20卷。他攻击自由党人使用有争议的心理描写法和讨普通民众欢心的带有民间风味的叙事法。然而他缺乏学术上的精确性，这使他很容易成为专业史学家们批评的对象。他最受好评的书《我们的经济劣势》对智利的经济问题作了令人信服的评论。海梅·艾萨吉雷是个学术水平比较高的保守派史学家。他在天主教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史。他在其许多历史著作中着重阐述了西班牙的价值观和天主教道德观。他撰写了一部批判性的贝尔纳多·奥希金斯传记，并动笔编写智利通史。他在课外也很活跃，他支持保守派工会运动，跟激进派工会唱对台戏。

自由主义史学传统在20世纪的智利仍有出色的继承人。长期担任智利历史地理学会会长的里卡多·多诺索热情地捍卫着为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提供机会的改革。他在诸如《智利政治思想》这样的一些著作中对智利的政治演变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另一位自由派史学家胡利奥·海斯·贡萨莱斯在智利大学法学院教授了多年的历史。他的两卷本《智利史，1861—1925年》详细地描述并捍卫了智利民主制度的发展进程，对具有专制独裁倾向的保守党人进行了批驳。一位不那么有 138

争议的文化史学家是欧亨尼奥·佩雷拉·萨拉斯；他研究了戏剧、体育和贸易这样一些课题。马里奥·贡戈拉这位史学家起初以劳工的观点诠释历史，但后来则全力维护西班牙的传统价值观了。他的那些描述殖民地时期劳动制度和智利大自然的作品有广泛的读者群，并被翻译成了外文。

左倾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批判资本主义和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埃尔南·拉米雷斯·内科切亚20世纪60年代任智利大学教育学院院长，除了从事著作外，还不知疲倦地投身大学改革运动。他的主要著作《帝国主义在智利的活动史》描述了英国和美国的贸易和投资统治智利的情况。另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智利进行阐述的著作是胡利奥·塞萨尔·霍贝特的书《智利经济社会发展评述》。他对权贵集团统治的评论促使大学生们质疑现行社会秩序。

这一时期智利的大多数作家和史学家虽然都出身于中产阶级，但不一定都认同这一阶级。他们大多对上层阶级持批判态度，对自己的阶级则怀有复杂暧昧的感情，而对工人阶级通常深表同情。中产阶级爱读批判上层阶级的著作，嘲笑本阶级的一些结交权贵向上爬的人。跟德国的忧惧时世和法国的存在主义不同，他们认为幽默是抵御现代化的一个比较好的手段。智利民族文化并非生存在真空中，往往以智利人的独特感受对国际问题进行阐释。

二、社会经济发展变化

1. 人口状况

1940年至1952年间，智利人口有了增长，但增长不平衡。城市人口增长了42%，而农村人口仅增长了3%。农村人口出生率同城市人口出生率一样高，可能比城市人口出生率还要高，但年轻人都到镇上和城里找工作了。圣地亚哥1930年拥有全国工业的37%，1952年达到65%，是提供工作机会的巨大中心，其人口增长率超过全国其他地区就不足为奇了。1930年圣地亚哥人口占智利全国人口的16%，1952年达到30%。全国城市人口从20世纪30年代的50%上升到了

1952 年的 60%，这表明智利人越来越想生活在城市了。

人口增长最快的社会群体是中产阶级和城市工人阶级。20 世纪 50 年代末根据收入计算，中产阶级占人口的 15%—20%。而根据受教育程度和自我认同情况统计，有近 33% 的智利人认为自己属中产阶级。收入与期望值之间的这种差异表明经济发展未能提供与个人所受教育相应的收入。中产阶级的收入虽说较低，但仍是农业工人收入的近七倍。农业工人占经济自立人口的 29%，但收入最低。城市工人占经济自立人口的 45%，所挣工资为农业工人工资的近三倍。然而他们的食宿费用较高，也宽裕不了多少。最小的社会群体是权贵集团，占全国人口 10% 以下，但拥有大型工商企业和大庄园。

20 世纪 20 年代末，智利人的生活水平曾有所提高。而 1930 年，智利人又深受经济萧条之害。经济形势够恶劣的了，政治局势又呈乱象。不过还好，政局竟很快就稳定下来了。为了跟经济萧条作斗争，政府促进工业发展、进行劳资仲裁、平抑物价。政府还监管国民收入的分配，使各社会群体所得相对公平合理。鉴于政府的作用巨大，各专业组织、工商社团和工会都竭力影响政府政策，这是可以理解的。

政府的负担重了，也就需要增加收入了。硝石税和铜业税占全部税款的 15%—25%，其他税款则主要源自消费者、商业和工业。庄园主们竭力使农业税维持一个很低的额度。政府虽然为了支付开销而增加了税收，但还是时不时加印钞票投入流通，这就使 20 世纪 30 年代 7% 的年通货膨胀率上升到了 1946 年的 15%、1951 年的 21%、1955 年则达到了令人沮丧的 84%。

为了跟通货膨胀作斗争，一些领导人指望靠控制工资这一不得人心的政策解决问题。这样的措施引起了劳工的抗议，也未能有效地抑制物价的上涨，这是因为政府没有增加收入，也没有削减开支。1932 年，军人领导的共和国试行了不同的方法，即冻结基本食品和服务性事业的价格而不是冻结工资。这一做法阻止不了通货膨胀，但却一时给消费者们造成了这一做法阻止了通货膨胀的假象。由于这一做法深得人心，所以后来的政府就越来越多地加以应用了。然而维持农产品

140

低价的政策阻碍了本国农业的发展，使国家越来越依赖食品的进口。政府未能抑制通货膨胀这一事实，没有使人们要求政府放松对经济的控制而是要求政府加紧对经济的控制。人们认为私人企业难以供应廉价、充足的食品，所以他们指望政府解决问题。

2. 工业

智利政府认为发展工业是通向富足之路，遂使其成了智利经济最具创新精神的部门。1939 年奇廉遭受地震重创后，总统佩德罗·阿吉雷·塞尔达创建了一个称之为发展协会的新机构。这一机构使政府和私人资本联手创办新型公司。发展协会为这些公司向美国进出口银行借贷了大量资金。发展协会在康塞普西翁附近开办了智利第一家钢铁厂，在南极地区勘探石油，在中央谷地修建水电站；发展协会还促进进口替代工业的发展，生产家用电器、水泥和蔗糖。这些工业使智利减少了对进口的依赖，同时又增加了工业就业人数近 20%。

智利的工业化仍有许多不足之处。缺少大型企业，只有 3% 的工厂雇用有 200 个以上的工人。比较常见的是雇用五名以下工人的小企业，这些企业雇用了 40% 以上的工业劳动力。虽然有 6 000 多家工业企业，但集中程度却很高，仅 20 家公司生产了近 40% 的工业品，并占有 50% 以上的固定资本。再者，大部分公司效率不高。如果政府不提高关税保护这些企业，这些企业就会因外国公司的竞争而倒闭。

3. 采铜业

1925 年至 1958 年间，采矿业发生了重大变化。硝石生产下降，铜生产上升。20 世纪 20 年代这一趋势还不明显，因为当时硝石出口是铜出口的近两倍。然而经济萧条大大降低了对硝石的需求，到 30 年代中期铜出口则是硝石出口的三倍，其出口量并在持续上升。硝石业的雇用人数减少了约一半。资本密集型的采铜业所雇用的工人比较少，所以只能向六万名硝石失业工人提供很少的劳动岗位。这些失去工作的人及其家属向南迁移，致使北格朗德地区的人口不断流失。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就业出现了一个新高潮，这是因为要满足世界各地的需求

141

就必需迅速扩大铜和铁的生产。

外国人对硝石矿的占有是个问题，而对铜矿说来问题尤为严重。早在1920年，智利人拥有的铜矿生产的铜只占全国铜产量的3%，而外国人占有的铜矿产量则达97%，其中美国公司又占了80%以上。安那康达和肯奈科特这两家美国公司占据着智利最大的铜矿，这些矿价值超过4亿美元，占有美国在智利的大部分投资。20世纪30年代玻利维亚和墨西哥将石油收归国有。但智利政府没有跟进，而是决定对铜公司的利润增加税额，20世纪50年代税率达80%。公司对扩大再生产没有了什么积极性，遂使生产陷于停顿状态。为了鼓舞新投资和生产，1955年政府将税率降低50%。然而这一政策没有产生预期的结果，左派政党开始要求将这些公司收归国有。

4. *农业危机*

为了鼓励农产品出口，智利政府向农业信贷和机器进口提供了资助，然而这一政策成效不佳。由于食品价格低廉和大庄园效率低下，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期间农业生产连续下滑。历任总统阻止农业工人组成工会，这有助于地主们控制工资、防止罢工。然而低工资促使了农业劳动人口加速流向城市。农业生产落后于人口的增长，这就要求智利进口越来越多的食品。20世纪50年代末，每年进口农产品的费用超过4 500万美元。由于政府控制物价，所以大地主们往往从其不太富裕的邻居那里收购粮食，囤积居奇，等政府提价时抛售。许多人发现，粮食投机买卖比从事粮食生产获利要高。

而南方地区、特别是马普切地区的中心地带的农业生产则呈上升趋势。20世纪30年代期间，这一地区生产的谷物约占全国产量的30%。1920年，这一地区饲养的牛只不到全国总数的10%，到20世纪50年代超过了40%。南部地区还生产了智利大部分乳制品。这些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移民的涌入。政府开放这片土地，招募移民定居，但安置他们时远非是公平合理的。自由获取土地的诺言吸引了大批佃农和农业工人从中央谷地向南涌进。这一时期移民大量涌进考廷省，人口从28万一下增加到了40多万，使该省成了全国第四大人口众多

142

的省份。美国地理学家乔治·麦克布赖德亲眼目睹了智利人将荒原变成小农场的情景。他说，他们使他想起了一个世纪前美国西部发生的那类似的一幕。

沿岸地区、河谷地带，湿地连片，而高地则常绿雨林密布。高地生长着名目繁多的高大粗壮的树木，有南方假山毛榉、栎树、高大假山毛榉、草皮树、心叶船形果树和月桂树等。一代又一代的马普切人隐蔽在树林中伏击西班牙骑兵队。古道穿越谷地，沿山梁延展。定居移民来到后，用木板铺垫湿地上的小道，加宽山路，以便他们的牛车能通过。为了清理土地，他们在树干上剥掉一圈树皮，待树叶枯萎后放火烧树。他们用烧剩下的焦树干做围栏和木柴。他们用这种刀耕火种的原始方法清除了上千英里的安第斯山森林。他们修建原木小屋居住，并在小屋旁边搭建厨房像马普切人先前那样在里面做饭、喝马黛茶、进食。

根据宅地法，定居的移民在从政府手里拿到永久所有证之前，所提出要求的土地必须先经土地测量员的测定。由于移民们的行动比有关政府部门和土地测量员的动作快，他们所提出要求的土地没有拿到所有权证。1927 年，有近 4.7 万移民没有所有权证。1928 年政府创建农业垦殖银行解决这一产权问题。政府做出决定后，有权有势的人们钻法律空子谋求私利。他们促使政府官员授予其大片被移民占据的土地。而后强行驱逐已定居的移民。1934 年国民卫队驱逐朗基尔地区定居的移民时，他们奋起反抗，接着发生了枪战，百余移民丧亡。

其他地方使用同样的方式和暴力时，农民们撤往较高的地段或较为贫瘠的土地，重新开始生活。他们要拼命养家糊口，遂在陡峭的山坡上砍伐林木，清理一片从未想到要用于耕种的土地。他们为了生存，喂养几头牛、种几亩地、砍削枕木、收集松果，有时还与邻国阿根廷搞点走私活动。他们的子嗣中有许多人为了摆脱贫困，也翻山越岭到内格罗河谷地带的果园或巴塔哥尼亚的煤矿找活干；另外一些人则加入移民大军流向工业城市圣地亚哥和康塞普西翁。

将智利和阿根廷分开的南部地区山脉不高，人们经常来来去去找

143

活干。例如，塞贡多·卢恩戈19世纪90年代出生在智利南部地区，后随父亲移居阿根廷，当时他还是个孩子。他在那儿长大成人，成了一名像高乔人那样的牧牛人，在巴塔哥尼亚地区放牧牛群。阿根廷大庄园开始在潘帕大草原筑栏圈地时，他返回智利希望找到一片土地。他1917年跟佐伊拉结婚，两人在昆科附近择地定居。一个富有的大地主将他们赶出占据的土地，他们只得迁入远处山区，落脚在卡布尔瓜湖附近一片景色迷人而岩石满布的土地上。他们在那儿同其兄弟一家各自开垦出了80公顷土地。

他们养牛、养羊（包括绵羊和山羊）、种马铃薯、照看果园。春季里，佐伊拉夫人挤牛奶、做奶酪。塞贡多偶尔受雇将大群牛只从阿根廷赶到智利。他自己还养了几十头牛，通常在秋季政府提高牛肉官价前卖给游商。他还栽种了苹果树、樱桃树和榅桲树。秋季里，他采摘苹果，将其送到当地一家压榨厂，装满六七桶苹果汁。生活艰苦，要去最近的城镇骑马也得走上三个小时，但他和佐伊拉全力抚育三个孩子。老大在家务农，老二在北部一铜矿区小镇教书，老三移民去了芝加哥。

跟卢恩戈家相反，附近的康普顿家拥有政府赠与的大片土地，达数千公顷，将庄园上平整肥沃的田地立约出租给佃户耕种。佃户中有德国移民；他们原先移居巴西，后来迁至气候温和的智利南部地区。他们虽然穷，但他们在耕作和机械方面的技能很快就使他们能够买地，并最终成为中产阶级农场主。同一地区还居住着马普切人，他们养牛、种菜、栽果树。有位名叫伊拉里奥·纳韦尔的马普切人族长被一位政府雇员霸占了一部分土地。他就土地被霸占一事向土著事务部投诉多年，但一直没有结果。他儿子塞贡多·纳韦尔认为他们家将永难收回土地，遂决定将其精力倾注在孩子们的受教育上。他认为孩子们受教育后移居圣地亚哥或阿根廷，就会出人头地。如果不受教育，他的女儿们就只能当女仆或者到水果包装厂干活，而他的儿子们就只能干一些工资菲薄的服务性工作。 144

20世纪50年代，一些社会、政治集团开始组织农民，保护他们

免遭庄园主的伤害。天主教神父、天主教行动集团、国家长枪党和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积极争取农民支持。1953 年，莫利纳地区的工人在神父和国家长枪党的支持下举行了一次成功的罢工。国家长枪党是个进步的天主教青年组织，成立于 1935 年，一直在农村地区争取支持。1957 年国家长枪党成为基督教民主党的一个组成部分后，其组织农民的经验有助于智利乡下人寻求问题的解决。

5. 工会

1925 年至 1958 年期间，经济自立人口从 130 万增长到了 230 万，但产业工人的比例一直未变，始终维持在近 20%。1925 年，28 万产业工人中有 19.8 万（或者说 70% 以上）为小公司干活。到 1958 年，虽然工业化有了发展，但小公司仍旧雇用着差不多 50% 的产业工人。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工厂工会人数不多，并不奇怪。1932 年平均为 130 人，1940 年减少到了不足 90 人。工会组织松散、力量十分薄弱，会员人数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政府的政策。政府如果实行敌视、打击镇压政策，会员人数就减少；而政府如果实行支持、赞助的政策，会员人数就增多。

1925 年，工会会员人数为 20.4 万，而 1927 年卡洛斯·伊瓦涅斯成为总统后攻击工会，会员人数遂减少。他不仅镇压共产党控制的工会，还镇压智利工人联盟。他成功地摧毁了共产党控制的工会，大大削弱了共产党。他试图创建由政府控制的工会，以取代左派工会。1931 年，他的政府颁布了一部劳工法，规定了工会组织准则、集体谈判和政府进行斡旋等事宜。他的劳工部组建了 300 个劳工组织，成员 5 万，这些劳工组织统一成立了称之为“公民行动共和联盟”的全国工会联合会。为了使公民行动共和联盟的领导人能起到积极的政治作用，他给他们安排了 19 个议会议席。伊瓦涅斯通过这些措施，使智利工人联盟的会员人数所剩无几，并开创了政府控制工会的先例。

145

到 1931 年 7 月伊瓦涅斯下台时，官方工会的会员人数只有 5.6 万。他的继任人、第二次任总统的阿图罗·亚历山德里决定改变这一形势。他利用 1931 年劳工法既支持又控制工会的发展。在他的支持

下，1938 年时工会会员人数增加到了 12.5 万人。与此同时，共产党人试图振兴智利工人联盟，但曾跟伊瓦涅斯合作的社会党人起初不同意。铁路员工罢工失败后，社会党人认识到了同共产党人合作的必要性，遂于 1936 年组建了智利工人联合会。

20 世纪 30 年代，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势头日盛。苏联试图遏止其扩展势头，遂敦促各国共产党结成广泛联盟。这一政策在智利引导共产党同其他左派政党联合组成人民阵线。1938 年这一联盟赢得了总统选举，后来虽然发生了分裂，但在 1952 年前一直帮左派占据着总统宝座。在人民阵线的影响下，工会会员人数迅速增加，1942 年增至 19.3 万人，1952 年达 28.4 万人。智利工人联合会虽然有了发展壮大，但还有两方面存在着不足：工人工资增幅不大，未能吸收农业工人。1952 年伊瓦涅斯第二次担任总统后，智利工人联合会被迫处于守势。伊瓦涅斯再次使工会会员人数减少，但不像他上次在任期间减少得那么厉害。

北部矿区和南方肉类加工及采矿区工会最强大。这两个地区虽然人口稀少，但人们在大公司劳动，比较容易组织起来。随着商业周期的反复、特别是硝石业的不景气，工会会员人数增减幅度很大。铜矿虽然雇用的工人相对较少，但他们很好地组织了起来，并成了劳工运动的中坚力量。这一时期两种关于工会政治活动的截然相反的思想相互冲突着。工团主义者们控制的工会所支持的非政治观拒绝从属于政党，决定直接跟雇主进行谈判。其他大多数工会支持的另一种观点谋求与政党建立关系。世界产业工人组织智利分部的成立，使非政治观占了上风。从属于世界产业工人组织的各工会 1919 年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但一年后，政府为了对付工人的抗议活动，逮捕了许多世界产业工人组织的领导人。伊瓦涅斯的镇压行动也打击了世界产业工人组织，所以到 20 世纪 30 年代工团主义的工会已然消失，分别加入了社会党和共产党。 146

因此，劳工运动与政党结合的观点占了上风。劳工运动组建自己的政党或参加现有的某个政党。劳工领袖路易斯·埃米略·雷卡瓦伦

带领一些工会加入民主党。他后来成立社会主义工人党——1922 年改组为共产党时，力图将所有工会组织全都并入该党。

成立于 1933 年的社会党组织工会，并竭力使会员们拥护党的路线，但成效没有其对手共产党那么大。社会党是个成分极其复杂的组织，其成员中有反对共产主义的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理想家、脱离激进党的进步人士，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和社会民主党人。党组织的这种复杂性是个弱点，同时也是个长处。1947 年加夫列尔・贡萨莱斯・魏地拉取缔共产党时，正因为这种复杂性，社会党人才没有遭到同样的镇压。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虽然都时常帮着加强工会组织，但也使工会比先前持非政治观时更易受到政府的镇压。

政党间的对立情绪使工会难以观点一致、立场相同。冷战加剧了这一对立情绪，美国劳工联合会怂恿拉丁美洲的非共产党工会与共产党断绝关系。此外，由于左派内部出现了分歧，苏联则怂恿共产党工会对社会党人持敌对态度。1947 年煤矿工人大罢工期间这种对立情绪更形突出。加夫列尔・贡萨莱斯・魏地拉总统为了打击试图延长冲突的共产党，敦促议会通过了取缔共产党的《长期维护民主法》。十年后，政府才废止该法。共产党处于非法状态，政府对工会进行干预就比较容易了。1953 年，非共产党的工会组建了工人统一工会。共产党合法化后，该组织在其领导下变得格外强大。

智利的工会未能影响整体工资水平的提高，这是有点出人意料的。20 世纪 30 年代产业工人的工资呈下降趋势，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期间稍有增加，20 世纪 50 年代末则大幅下降。铜矿工人工资最高，其次是城市里的制造业工人。女佣和农业工人工资最低。通货膨胀日益加剧（特别是 20 世纪 50 年代末的形势），工人的工资亦相应上涨。跟美国和欧洲的工人不同，智利工人身处消费社会的边缘。他们的工资仅敷其基本需求。

147

政府在改善医疗保健和教育条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工人们因此从中得到了好处。全国医疗保健服务局使婴儿死亡率下降了一半（从 1/4 降到了 1/8），使智利人的寿命延长了 20 年，男人平均年龄达 54

岁、女人达 60 岁。政府资助学校，使文盲率从 1925 年的近 30% 减少到了 1958 年的 17% 左右。因此，虽说工人们的可支配收入没有什么增加，但为他们及其家属提供服务的社会事业有了发展。

6. 中产阶级

工人阶级政党和组织的领导人实际上大多出身于中产阶级，权贵的农庄和工商企业的经理人员往往也大多来自中产阶级。中产阶级上层拥有中等规模的工业企业、商业和建筑公司；而不那么富裕的中产阶级则拥有小商店和小农场，在政府中供职或在学校教书。他们的收入往往比工人阶级高不了多少，但他们受过教育，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

不那么富裕的中产阶级特别依赖政府。欧洲和美国的私人企业为中产阶级提供了许多工作岗位，而智利则完全不是那样。因此，政府就成了中产阶级就业的主渠道。有鉴于此，就业承诺就在选举政治中具有了举足轻重的分量。各政党均竞相兑现承诺，这一历史时期政府就业岗位增加近 250%。为了支付薪水，税额也就增加了，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20%。销售税从占政府收入的不足 15% 上升到了近 25%。但最沉重的负担是通货膨胀。20 世纪 50 年代，通货膨胀使薪金严重缩水；而在此之前，中产阶级分子过得很好。20 世纪 40 年代，他们的收入增加了近 50%；蓝领工人则截然不同，他们的工资一直没有增加。

中产阶级的人大多生活在城市里，全心全意地为现代化效力。中产阶级选民并不死盯着一个政党，而是灵活地跟各政治派别联合，他们寻找最能代表自己权益的政党或政党联盟。20 世纪 20 年代，激进党强调教育和世俗化，这吸引了许多中产阶级选民。中产阶级的一些上层成员大力支持自由党和保守党的代表上层阶级利益的纲领，而中产阶级的政府雇员们则支持社会党和共产党的较能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纲领。伊瓦涅斯上校两度执政时，许多中产阶级选民都支持他，认为他根除传统政治后就会使国家很快面貌一新。然而他未能说到做到，他们也就不再支持他了。 148

三、政府

1. 卡洛斯·伊瓦涅斯上校

1925年至1952年间，一些强有力的人物控制着智利的政治。这一时期肇始于卡洛斯·伊瓦涅斯上校成为“总统选举幕后牵线人”，他迫使阿图罗·亚历山德里辞职，为温顺的埃米略·菲格罗亚随后当选为总统铺平了道路。菲格罗亚短暂的总统任内，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财政顾问埃德温·凯默勒访问智利时，建议智利政府更有效地管理经济。他的建议包括：成立中央银行和更为高效的税务机构、恢复金本位。智利议会批准这些措施后，凯默勒知会美国银行：智利是提供新贷款的首选地。

1927年初伊瓦涅斯接任内政部长这一强权职务后，菲格罗亚辞职，伊瓦涅斯安排自己进行竞选活动。他获得了空前的97%选票。为了恫吓议会，他放逐了许多政治领袖。他还取缔了共产党、镇压独立工会。他要的是工作效率而不是政治辩论，所以挑选了工程技术人员而不是律师担任内阁部长职务。他开始向美国银行家大量借钱，用这些钱进行大规模的公共工程建设。这些工程中有铁路主干道的支线、桥梁和港口设施。为了更好地控制财政，他任命了一名拥有查对政府各部门（特别是行政部门）账目全权的总审计长。

他还改组了武装部队，单独组建了智利空军。他将各警察部门统一编制为“国民卫队”。国民卫队的普通成员来自工人阶级，这使他们颇得民心。在外交关系方面，美国的仲裁帮智利和秘鲁解决了两国共同的边界问题，阿里卡永远归智利，塔克纳永远归秘鲁。

149

伊瓦涅斯开除了所有他认为与其政府为敌的政府雇员，并新增设了9 000个工作岗位。这些变革大多对中产阶级有利。尽管存在着迫害行为和审查制度，一时的繁荣景象还是令许多人十分乐观。其实有许多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人们都赞同他对效率的崇信和对传统政治家的批评。然而大萧条降临时，智利发现伊瓦涅斯的繁荣法失灵了。

跟赫伯特·胡佛及其他世界知名领导人一样，伊瓦涅斯也未预见

到大萧条的严重性和持续性。智利十分依赖硝石和铜的出口，所以当矿产品市场崩溃、价格暴跌时，就拿不出钱来购买进口产品和支付债务了。矿山停产后，失业矿工一贫如洗，随即向南迁移寻找工作。然而由于经济衰退时伊瓦涅斯采用了削减政府开支和就业岗位的传统保守政策，所以也没有什么工作好找。伊瓦涅斯墨守金本位；与此同时，美国则停止提供信贷，而先前的债务又到偿还的时候了。失业人数猛增，人们举行大规模抗议游行，反对伊瓦涅斯政府。伊瓦涅斯眼看无法控制这一危急局势，遂于1931年7月26日辞职逃往阿根廷。

2. 社会主义共和国

临时政府组织了新一轮大选，激进党领袖胡安·埃斯特万·蒙特罗获胜，致使阿图罗·亚历山德里想赢得第二次任期的尝试没有成功。蒙特罗尽力向失业者们提供食、宿，并计划降低租金和税额。不幸的是，他仅在职八个月，就被一军人密谋集团推翻了。集团领导人是空军军官马马杜克·格罗维、记者卡洛斯·达维拉和社会党人欧亨尼奥·马特。密谋者们宣告智利为“社会主义共和国”，然而他们并未对他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做出阐释。他们所说的社会主义肯定不是托洛茨基主义的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由于执政委员会内部的勾心斗角，在推选谁当主席一事上耗费了不少精力。军队认为格罗维和马特太激进，将他们放逐到了复活节岛。卡洛斯·达维拉于是自任主席，但难以应付大萧条所造成的极其严重的问题。社会主义共和国只存在了100天，但这已足以使许多上层阶级和中产阶级的智利人惊恐万状了，并进一步败坏了军队的名声。

3. 阿图罗·亚历山德里恢复民主

军队决定再次采取行动推翻达维拉，而后主持了新一轮选举，使阿图罗·亚历山德里再次上台执政。亚历山德里不仅使智利恢复了文官统治，而且强化了本国的民主传统。在其后的40年里，智利享有一个开放的、文官领导的政府，不像其他一些拉丁美洲国家那样深受独裁者之苦。从左到右的各政党乃至军队中形成了一个共识，即要为智 150

利谋求福祉，最好是民主政府，而不是独裁政府。

20世纪20年代，亚历山德里曾使保守派人士胆颤心惊，这时他使他们有了安全感。为了使保守派人士相信传统的经济制度不会改变，他选定富商古斯塔沃·罗斯当他的财政部长。他并不同情工人，但却以惊人的巧妙手腕重振了经济。他确信建筑业能够尽快提供就业机会，遂给了新开工项目为期十年的免税待遇。农业方面，他继续执行农产品低定价的政策。而为了促进农业的发展，他提供补贴以激励农业机械的进口和农产品的出口。工业方面，他提高关税、增加信贷。除了宽松的政府贷款外，他还以公共工程为依托将大量资金投入经济领域。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智利越来越可以自给自足了。由于限制从国外采购商品，所以国内开支的增加就提供了更多的工作岗位。将大量资金投入经济领域的消极面是疯狂的通货膨胀和工人购买力的下降。在智利外汇短缺的情况下，罗斯采用了一种极端的解决办法。他拖欠外债的行为令世界著名银行惊愕不已，而后他用铜和硝石收入以贴现价收购贷款。外国债券持有人高声叫骂“卑鄙”，但这一决定对智利是有利的。

为了使军队在营房里心无旁骛，亚历山德里令一些军官退役，并进行了体制上的改组。然而诚如他在处理劳工问题时所表现的那样，也有他自己专制的一面。1934年他下令国民卫队将移民定居者们驱逐出朗基尔，而后又根据1931年劳工法动用军队镇压了1936年的铁路员工大罢工。他接着还颁布了戒严令，防止工人进行抗议活动。他利用议员们对社会动荡的担忧，1937年敦促议会通过了国内安全法。这一法规使他有权关押任何一个政府认为对本国治安构成威胁的人。当一批纳粹青年计划发动一场政变并占领了社会保障局大楼时，他下令向他们开枪。他认为，如果民主政府不对暴力进行控制的话，国将不国。

151

4. 人民阵线

亚历山德里尽管暴虐，但他的决策还是使他深得人心。1938年，古斯塔沃·罗斯想接任总统，但他不像亚历山德里那样对工人阶级有

号召力，所以未能如愿。国际上发生的事件也使政党联盟发生了重大变化。智利共产党跟社会党和激进党联合组成人民阵线。激进党是三者中拥有议会议席最多者，所以该党推荐的佩德罗·阿吉雷·塞尔达成了人民阵线提名的1938年总统竞选候选人。

人民阵线的竞选运动由于强调土地改革、住房供给、医疗保健和教育，从而成功地吸引了选民。阿吉雷·塞尔达以微弱优势获胜，但人民阵线在议会中不占多数。为了威吓议会中的反对派，人民阵线发动工会进行抗议和罢工，但却徒劳无功。1939年军队里发生了两次密谋危机，但都被阿吉雷·塞尔达消除了。右派于是扬言要抵制1941年的议会选举，但其结果可谓事与愿违。选举前一个月，他们突然决定提名候选人参加竞选，然而选民们对这些人没有好感。他们的得票率比上次下降了34%，而左派政党的得票率则增加了一倍，激进党增加了差不多15%。人民阵线的不幸是，社会党跟共产党之间的对抗致使社会党退出了联盟。人民阵线得到了右派的大力支持，从而使改善住房和教育条件以及成立经济发展机构“发展协会”的法律得以通过。

1942年，卡洛斯·伊瓦涅斯再次竞选总统，这使四分五裂的左派不得不联手支持激进党提名的候选人胡安·安东尼奥·里奥斯。总体上看来，智利人对国家日益进步的形势是满意的，所以他们支持里奥斯。然而不牢靠的政治联盟使执政非常困难。但他还是规划了水力发电工程并成立了国家电力公司。他支持在南极地区进行石油勘探，1945年有了重大发现。他也开办了智利第一家钢铁厂太平洋钢铁公司。

他的政府还得应付内部分歧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引起的外交问题。许多德裔智利人同情轴心国，但里奥斯的左派支持者们则坚决反对轴心国。总统起初试图保持中立，尽量回避内部和外部冲突。在美国不断施压的情势下通过双边谈判后，他尽管担心德国海军会发动攻击，但还是于1943年断绝了同轴心国的关系。智利获得了美国的信贷和相当多的军援，但他的政府决定以低于世界市场价将铜卖给同盟国时在 152

国内引起了争论。然而同盟国则感谢他的支持。同盟国没有得到阿根廷的支持，因为阿根廷保持中立、以高价出售其农产品。

困扰着里奥斯政府的，是党争和劳工不满情绪的高涨。他自己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1946 年任期未满即撒手人世。智利人接着于同一年选出了第三位激进党人总统加夫列尔・贡萨莱斯・魏地拉。他是激进党的左派，而他的两位前任均是党的右派。他上任时正好冷战开始，来自左、右两派的压力使他的立场摇摆不定。他开始时支持农民协会，后来又表示反对。他延请共产党人入阁，但在煤矿工人长时间的罢工后又取缔了共产党。1949 年，他签署了妇女享有议会选举权法，但未能吸引多少妇女加入他的党。他创办了像国家石油公司和国家制糖公司这样的一些新的政府企业，但未能振兴日趋衰退的经济。

5. 卡洛斯・伊瓦涅斯再次当选总统

此等的摇摆不定、前后矛盾使智利人对激进党到底想干什么大惑不解。然而不幸的是，该党在运作过程中往往谋求私利，而且肆无忌惮、不计后果。卡洛斯・伊瓦涅斯利用激进党的受损形象，再次上阵竞选总统。他在竞选运动中宣称要使国家摆脱政党政治、稳定经济、控制铜矿业和跟通货膨胀作斗争。他虽然胜利当选总统，但一上任就发现 20 世纪 50 年代主政智利没有 30 年代那么容易了。

贡萨莱斯・魏地拉主政时期通货膨胀已在渐次上升，1952 年达到了 21%。政府虽然在定期提高工资以弥补购买力的不足，但智利人仍感到他们的工资在缩水。伊瓦涅斯答应要以税收改革来解决问题，但议会不支持他的提案。他否决了削减开支的议案。他积累了 25%—30% 的赤字，1954 年通货膨胀出人意料地超过了 50%。铜矿工人罢工了，他于是宣布戒严，强迫工人回去干活。他打算实行军事接管，但跟一些少壮派军官会晤时发现要得到他们支持的条件是难以接受的。他急欲尽快控制住日益恶化的局势，遂邀美国克莱因—萨克斯财政咨询公司派人审查问题。他们建议削减政府开支和信贷。他采纳了建议，削减调整工人的工资及其他方面的开支，以将赤字降至 20% 以下。美国金融机构向智利提供贷款 7 500 万美元，以作奖励。通货膨胀率有

153

所下降，但一直没有降至20%以下。

为了准备1957年的议会选举，社会党人、共产党人和民主党人组成了人民行动阵线。事实证明这步棋走对了，对社会党人说来尤其是如此，他们的议席翻了一番，从12席增加到了24席。除了那些支持伊瓦涅斯的政党外，其他大多数政党都取得了重大进展。第二年总统选举临近时，议会通过改革法案，实施智利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秘密投票。因此地主们再也不能监视他们家的农民如何投票了，但这并不妨碍政党领袖们免费将农民运送到投票站。智利的政治文化体现了高度竞争意识，所以政客们都千方百计讨好民众。

四、外交政策

智利面对涉外事件没有以前那样能够捭阖自如了，而这些涉外事件却对国内政策有着巨大影响。智利没有那么多资金用于其国家发展模式，所以得寻求外国贷款。这些贷款多半是美国进出口银行提供的信贷。条件是智利必须用这些钱购买美国的资本货物供应其钢铁厂、石油业和电气业。由于美国公司生产、销售着大部分智利的铜，而智利的外汇又大部分来自铜，所以美国对智利的政策有着双重影响。

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冷战时期，智利各种政治倾向的党派一般都支持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智利断绝了同轴心国的关系，而冷战时期又取缔共产党达十年之久。跟美国的这种热情友好关系避免了种种冲突，但智利想要实施独立的信贷和铜业政策就没有那么自由了。20世纪的一些重要时期里，智利跟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一样感到其外交政策选择的余地十分有限。

五、小结

智利的政治家们虽然对组织农业工人工会、私人入股国营公司及货币政策等问题存在着争议，但一致赞同政府主导的工业化模式。中产阶级政治家们开办了一家钢铁厂、一家国营石油公司、一家国营电 154

力公司和数家国营制糖厂。这些工厂和公司向所有阶级的人们提供投资机会和工作岗位。这些政治家利用关税限制进口保护本国产品，而中产阶级的消费者们可能更喜欢进口的外国产品。中产阶级支持组织工会，视之为对劳工进行控制的一种手段。然而中产阶级尚未找到构建欧美消费社会——人们通过媒体已熟知的欧美消费社会——的方式。这仍然是政治家们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第八章　改革转化为革命 (1958—1973)

要求改革的压力既来自智利国内也来自国外。肯尼迪政府提出以 155 改革换取经济援助后，就连保守的亚历山德里政府也在压力下实施了土地改革。而基督教民主党政府（1964—1970）和人民团结阵线政府（1970—1973）都在思想上笃信改革，不需要外人的敦促。这三届政府共同具有的信念是政府应该促进经济发展，但它们在私人资本于经济进程中应有的作用上存在着分歧。

右派政党联盟推选阿图罗的儿子豪尔赫·亚历山德里竞选总统。他以3.3万票勉强击败左派候选人萨尔瓦多·阿连德。基督教民主党人爱德华多·弗雷获得20%多的选票，激进党候选人路易斯·博萨伊获得不足16%的选票。这两个党在政治上都持中间立场，如果曾商定好共同推选一名候选人的话，中间派很可能就赢得了选举。在随后的两次总统选举中，各政党都得小心谨慎地决定其盟友，这是因为支持右、中、左的选票比例十分接近。各种思想倾向间的这一均势表明，智利的政治制度是健全的，但也存在着一种潜在的脆弱性。如果政治论坛上诸位发言人的观点比较一致，民主政治就稳定了；而如果有哪 156 个派别行事专横，那就威胁到了其他两派，冲突也就随之而起了。

一、权贵集团

这一时期上层阶级维护其特权地位的回旋余地在不断缩小。庄园、城市房地产和工业投资都受到了政府的严格控制。首先影响到庄园主们的变革是劳工法增加了工人的权益。而后的变革更为激进，中央谷地的庄园主们大多失去了土地。通货膨胀日益加剧，城市里的房地产主陷入困境，而法律又规定不得增加租金、不得驱赶房客。政府和工人没收企业后，企业主不再追加新投资。房地产主担心会失去其房产，并确信很快要发生变故，遂不再对之加以修缮。

有利可图的风险投资机会减少了，有钱的智利人遂将钱转移至国外。他们对美元的需求高涨，致使黑市兑换率猛升，远远超过了美元的实际价格。智利人在旅馆、饭店、甚至办公场所向外国人提出要换钱。代理人而后将资金带出智利到其所在国投资于股票和债券。因此，在海外投资的智利有钱人就越来越多了。

社会正义运动剥夺了有钱人的一些土地和企业，但政府未能防止资金外逃，这就是说大量资金流到了国外。这些资金在智利投资无利可图，却帮助了别国经济的发展。由于私人投资缩水，就得设法用政府投资来弥补差额。但由于私营部门发展停顿，本国的课税基础亦难以扩展了。政府投资越来越得从国外引进资金，这就意味着要寅吃卯粮，预先借用国家未来的出口收入了。

二、中产阶级

教育设施、社会服务部门和公营企业的发展大大增加了政府需雇用的人数，这主要对中产阶级有益。1958 年政府雇员近 8.5 万人，1968 年增至 12.8 万人，1972 年则达 36 万人。1970 年之前人数增加的原因主要是新工作岗位的设置，而 1970 年至 1973 年间人数增加的原因既有新工作岗位的设置，又有私人企业的国有化。政府公共部门就业人数的增加是跟高校和职业学校毕业生人数的增加同步的。例如，1960 年在校大学生为 2.7 万人、1970 年为 7 万多人、1973 年达 14.5

157

万人。由于私营部门发展停顿，毕业生们越来越视政府为其唯一的雇主了。由于控制政府公共部门就业的主要是行政部门，赢得总统职位的重要性就大大增加了。

中产阶级成员因遵循不同的政党路线而发生了分裂。那些与私营部门关系密切的人支持民族主义党或激进党或基督教民主党。在政府公共部门工作的人则支持激进党或基督教民主党，但公立学校的教师们通常支持社会党或共产党。中产阶级尽管具有许多共同的消费、教育和公民价值观，但政治上的分歧却使其难以作为一个统一体进行运作。对大多数中产阶级的人说来，重要的是财富的价值；而对一些收入较低的政府公共部门雇员（如公立学校的教师们）来说，优先考虑的是租金管制而不是财产权。

虽有改善医疗保健、住房和劳务市场条件的管理法规在，但政府还是对这些服务行业进行了控制，并用政治之手对之进行配置。弗雷执政时期和阿连德当政时期大力推行公共住房供给，但由于求远大于供，故而要得到一处住所党派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跟政府雇员的关系在优先取得服务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像“门路”、“后台”和“靠山”这样的一些词语是“权力关系”或“影响”的意思。因此，选举的意义要比意识形态上的论争深刻得多。选举影响着党员们得到服务、住房和工作的机会。

通货膨胀处于高位时期，中产阶级收入减少，盼望有个能振兴经济的党。中产阶级的人们希望币值能稳定、工资的购买力能上升、能有更多的工作岗位。20 世纪 50、60 年代，各政党在其竞选纲领中均承诺要达到这些目标。但事实证明，无论哪个党上台执政，均难以履行诺言。其结果是没有一个政党能连续两届赢得总统职位。中产阶级和一部分未加入工会的工人企盼有个既能提供安全保障又能振兴经济的党。1964 年，右派政党联盟为了阻碍萨尔瓦多·阿连德当选总统，决定投爱德华多·弗雷的票；除这次外，总统选举都是势均力敌的。例如，1958 年得票最多的候选人跟紧随其后的候选人得票相差 3.3 万张，而 1970 年也只相差 3.9 万张。因此，如果有 2 万张选票转投的 158

话，这两次选举的结果可能就不一样了。

三、工人阶级

在那疯狂的通货膨胀时期，工人阶级的工资同样也是不升反降的。消费社会刚在智利显现，工人们只有看的份儿，委实消费不起。工人的工资仅够养家糊口、支付房租。想买块地皮搭建住所，得几户人家凑钱才行。有工作的单身子女出钱帮父母购置家具或主要电器用品。家在乡村的亲戚会在冬天送来粮食和木炭。阿连德政府时期，黑市兴旺，生活在城市的亲戚从事买卖马铃薯、肉类和小麦等农产品活动。

这一时期有许多年轻人长大成人，但他们这些劳务市场上的新人难以找到工作。1960 年至 1970 年间人口增加了 180 万，经济自立人口则增加了 52.3 万。上学就读缓解了新增工人大量涌现的压力，但政府为了提供足够的工作岗位还是得分散使用有限的财力。这十年间提供了 50 多万个工作岗位，数量不少，可实际工资并不高。1970 年至 1973 年加快了提供工作岗位的步伐，光经济领域三年间就提供了 24.5 万个新工作岗位。1960 年，雇用的人员中有近 25 万人加入了工会，而十年后增加到了 53.3 万人；到 1973 年，工会会员人数达到了 60 万，其中有近 20% 是农业工人。1965 至 1973 年间加入工会的工人占工人总数的百分比翻了一番，从 11% 增加到了 22%。

1931 年劳工法规定了成立工会和集体谈判的准则。政府为了控制通货膨胀，往往确定最高工资增长率，这就限止了工会进行谈判时的自由度。为了对付这一附加限制，工会也在其合同建议中提出了雇员（工）的住房、医疗保健和家庭补助问题。集体谈判开始时，工会向雇主递交了一份包括在合同中的要求的正式清单。谈判陷入僵局时，政府代表出面斡旋。工会用罢工为达成协议施压，抑或用罢工表示对合同的支持。罢工是常有的事，但很少令经济瘫痪。例如，1960 年工会举行了 257 次罢工，参加的工人为 8.8 万人，而十年后工会则举行 159 了 1 000 次罢工，参加的工人为 30 万人。同情工人的政府成功地缩短了罢工持续的时间。弗雷执行时期，持续时间平均为七天；而在阿连

德执政时间，则平均仅为3.7天。

弗雷政府时期，农业工人工会的成立为劳工运动增添了新活力。1964年弗雷上任时，只有24个农业工人工会，会员1 658人。六年后他的政府任期届满时，有了421个工会，会员达10.4万人。到1968年时，半数以上加入组织的农业工人都是“农村胜利”这一由基督教民主党控制的工会成员。1968年之后，加入组织的农业工人大多加入了“自由”和“朗基尔”这两个由支持阿连德的共产党、社会党和人民行动统一运动控制的工会。这三个工会组织都帮农民确保已改善的劳动条件和经济权益。

工会组织扩展到了新领域，而政府又支持其经济、社会诉求，所以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取得了重大发展。尚有近80%的工人没有加入工会，这是因为建筑业、零售业和服务业员工加入工会者不多。大多数工会都隶属于工人统一工会，而工人统一工会主要受共产党和社会党的影响。这些工会要的是集体谈判，而控制工人统一工会的政党要的是实现土地、企业和其他经济活动的国有化。1970年这些政党终于赢得了总统职位，工人们有机会亲眼目睹国有化的利弊了。

四、豪尔赫·亚历山德里的总统任期（1958—1964）

豪尔赫·亚历山德里不像他父亲阿图罗那样喜欢以煽动性的演说鼓动民众。他常说自己不是个政治家。他吸引人的地方是他的姓氏、而不是他的风度。保守派对他很放心，认为他不会采取激进措施。然而智利的政治发展使他批准了一些在那比较保守的年代他本应拒绝考虑的政策。

1. 经济规划

他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将困扰着前政府的通货膨胀降下来。为此，他更换了货币单位，将比索改为埃斯库多，并使其与美元挂钩等值。他还敦促智利人将钱汇回国内，准许他们用美元在本国银行开户。他竭力减少政府赤字、控制工资。这些措施类似于克莱因—萨克斯经济代表团向前政府建议采取的那些措施。这些措施体现了这么一种信念，160

即通货稳定和市场开放必将激励私营部门促进经济增长。

2. 瓦尔迪维亚地震

经济规划第一年似乎产生了预期效果，工业生产有了增长，失业率下降了2%。虽说进口增长了30%，但流入国内的资金足以使国际收支保持良好状态。然而两大意外事件严重地影响了规划的落实。第一件事是智利的出口增长跟不上进口的增长，从而出现了贸易赤字。第二件事更为严重，1960年5月智利南部地区遭遇了一次强烈地震——有记录以来的最为强烈的地震之一，数百人丧生，所受损失相当于国家年生产值的10%。水淹地陷，民居、厂房塌陷，大片农田沦为泽国。安第斯山体崩裂，泥石流夹裹着冲倒的树木倾泻而下，其势令当地居民惊恐万状。海啸伴随着地震，吞没了从康塞普西翁到奇洛埃的沿海地区的所有城镇和村庄。

亚历山德里要救助南部地区，就得增加政府开支。而对他落实经济规划影响比较大的，还是贸易失衡问题。外国对地震灾区的援助款加上美国争取进步联盟提供的资金，也填补不了智利的贸易赤字。1962年10月，亚历山德里不得不将本国货币贬值33%，从而不再跟美元挂钩等值、毁了埃斯库多。工商企业估计进口价格要上涨，遂抬高本国产品的物价。通货膨胀1962年一下跳到29%，随后的两年里更到了40%以上。为了增加政府收入，亚历山德里提高税率，将销售税限定在空前的20%高度。到1964年，各项税收总额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4%，给生产者和消费者均造成了沉重负担。亚历山德里的稳定计划失败了，私营部门将促进经济发展的希望也破灭了。

3. 成就

亚历山德里任总统期间并非一无成就。智利如果同意加入争取进步联盟计划，肯尼迪政府就每年向亚历山德里提供1亿多美元。争取进步联盟试图成为类似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援助欧洲复兴的“马歇尔计划”，以促进拉丁美洲的快速发展。肯尼迪的顾问们认为，发展加改革就可以防止古巴革命在拉丁美洲其他地区重演。亚历山德里在实

161

施教育、住房和土地改革方面同争取进步联盟开展了积极合作。他扩建公立学校，使大学生人数翻了一番。他敦促议会对新建住房免征税款，结果是年增新房 4 万套。一部分住房由政府出资兴建，而另一部分则由私人融资兴建。

亚历山德里最激进的行动是实行土地改革。保守派议员通过法案，授权政府没收闲置农田，付给业主其价值 20% 的现金，其余 80% 的钱十年内付清。为了掌控法案的实施，议会成立了土地改革协会和另一向农民提供后续服务，称之为农牧业发展协会的组织。亚历山德里总统任内，土地改革协会只没收了 6 万公顷土地，分到土地的农民只有 1 000 人。然而他开创了政府可以没收私人田产的先例，后来的政府大大推广了这一创举。土地改革协会和农牧业发展协会在后来的政府执政期间也支持激进的、终止智利传统的大庄园制的土地政策。

五、基督教民主党执政

1. 党的组建

基督教民主党的领导层由出身于中产阶级的一些年轻人组成。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在天主教大学就读时相识的。这些年轻人原先不是长枪党党员就是社会保守党党员，但他们感到他们之间有许多共同点，遂于 1957 年将两党合并组建了基督教民主党。这些领导人强调自己的信念是：天主教可以不同于早先那保守的天主教，可以是进步的。他们崇拜法国哲学家、基督教民主运动思想之父雅克·马里丹的思想。马里丹根据两篇教皇通谕，即 1891 年的《新事物》和 1931 年的《第四十年》阐发了他自己的基督教人道主义学说。智利长枪党崇拜这位法国学者的公有社会理想观，同时拒绝接受西班牙长枪党的法西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基督教民主党一成立就宣扬人人共享社会正义。基督教民主党希望实施社会法，为每个人提供基本需求，与此同时加强民主制与人权。该党还希望采用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的研究意见，以加速经济发展。

162

基督教民主党候选人爱德华多·弗雷在 1958 年总统选举中表现很

好，赢得了20%的选票，名列第三。该党在参众两院选举中得票率下降，但在1963年市政会选举中赢得了22%的选票，比领先的两大政党联盟仅差1.5%。基督教民主党人突然意识到，他们只要再有那么一点选票来年就能够赢得总统职位了。因此，基督教民主党领导层在竞选运动中投入了智利历史上罕见的巨大精力。

2. *总统竞选运动*

弗雷在其总统竞选运动中提出“自由之革命”的主张，表示要走一条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据此，他和他的党提出了下列目标。住房，计划六年间每年建房六万套；土地改革，给十万户家庭分配土地；通货膨胀，表示一定要将通货膨胀率降下来，但没有确定具体的比率；铜，目标是实行“智利化”，即政府收购各大铜矿公司的大部分股权；帮助穷人，在农村地区组织农民协会，在城市地区组织居民活动小组；教育，要消灭文盲、发展公共教育、提高入学率；公共工程，提出了包括在圣地亚哥修建地铁在内的宏伟规划。该党确定了经济年增长率为6%的目标，六年后要使智利人均收入增长1/3。

尽管基督教民主党的政纲甚具诱惑力，而极具魅力的领袖爱德华多·弗雷又越来越得人心，但决定选举结果的还是右派政党。在1964年3月举行的一次特别议会选举中左派政党联盟获胜，这促使右派政党和激进党决定让其联合总统候选人胡利奥·杜兰退出总统竞选，转而支持爱德华多·弗雷。他们担心如果投杜兰的票，下届总统可能就是社会党候选人萨尔瓦多·阿连德了。弗雷在右派政党和激进党的支持下获得了56%的选票，阿连德获得39%，杜兰获得5%。

163 弗雷所得的选票有多少出自基督教民主党、有多少来自其他政党？右派政党和激进党上一年共同赢得44%以上的选票，而在1965年议会选举中只获得不到26%的票。这26%的选票接近右派政党投给弗雷的票；如果没有这些选票，1964年当选总统的人会是阿连德而不是弗雷。然而基督教民主党人并未充分意识到这一事实，这部分原因是他们拒绝接受右派政党和激进党要求修改其政纲之故。他们在下届总统

选举前才发现：智利政治活动需要结盟。

基督教民主党人虽然要将总统选举的胜利说成是一种授权，但他们的议案想要在议会获得通过却没有那么多议员投赞成票。然而他们拒绝同激进党人和右派结盟，以免对其法案进行修正。弗雷同大多数20世纪的智利总统一样，得对付一个很不合作的议会。1965年议会改选，众议员全部改选，参议员改选1/3。基督教民主党在竞选运动中四处拜票，宣明若赢得多数议席，就可顺利实施其宏伟规划。智利人接受了这一说法，给了该党85个众议员席位（总议席为147个），将其参议员席位从3个增加到了13个。基督教民主党在参议院里仍属少数党，为了使其重要议案获得通过，他们采用了争取反对党议员支持的策略。

基督教民主党内有两派。一派认为经济增长是发展的先决条件，政府应力促经济增长，同时必须降低通货膨胀率，维持一个有利的国际收支状况。而另一派则主张社会发展优先。这一派认为，住房建造、土地分配和工人的工资跟预算平衡没有关系，通货膨胀是不可避免的，跟这些事无关。

3. 经济计划

为了协调经济发展，弗雷政府成立了统领全局的国家计划署。国家计划署精心筹划，将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以求降低通货膨胀率、增加生产、达到5%—6%的增长、提高储蓄率。在外贸和财政方面，国家计划署力求提高铜价、千方百计促进出口、设法重新就外债问题进行谈判。这些事做起来一点差错都不能出，一件事干不好就会影响全局。

4. 有关铜的政策

1966年，基督教民主党通过议会推行新铜业法。智利政府根据这一新法可以收购大型铜矿公司的股份。政府机构铜业公司利用这一新赋予的权力收购了肯奈科特公司控制的埃尔特尼恩特矿51%的股权，1969年又收购了安那康达公司控制的丘基卡马塔矿和埃尔萨尔瓦多矿 164

25%的股权。基督教民主党将这一行动说成是铜矿“智利化”。智利实行对铜矿的控制，犹如其他发展中国家对石油实行的控制。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经营这些矿，做到既有竞争力又能赢利。

越南战争导致了对铜的需求剧增，同时政府又做出了通过伦敦市场销售铜矿砂的决定，这就增加了收入和投资。然而矿工们要求享有更多的权益；工会同政府的谈判破裂后，矿工们举行了罢工。弗雷担心生产下降会影响到其他计划的落实，逐于1966年3月调动国民卫队到埃尔萨尔瓦多矿镇压罢工运动。矿工们奋起反抗，国民卫队开枪打死了7名矿工。左派政党就矿工之死指责政府，而弗雷则不无道理地回应道：左派为了政治目的而利用这次冲突。

政府还收购了其他跨国公司在智利运营的分公司，从南美电力公司手里收购了智利电力公司，从国际电话电报公司手里收购了智利电话公司。智利电话公司的服务设施太差，智利人希望政府能改善设备、提高服务水平。弗雷政府认为这些企业所获利润足够新投资所需了，并认为国有化将便于经济计划的实施。

5. *教育*

教育是弗雷改革规划中的重点项目。他的顾问们建议他把教育体制改成三个部分：学前教育；初等教育，1至8年级；中等教育，9至12年级。为了提高入学率、改善学生营养，政府向家境贫寒的学生提供奖学金和膳食。政府在大学层面向所有社会阶级开放，用全国入学考试取代中学毕业资格作为入学标准。这些改革还促进了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的发展。

165

为了提高学生入学率，政府开展了一场校舍建造运动，新建了3 000所学校，教室总数翻了一番多。注册入学的学生人数从1964年的184万增加到了1970年的269万。中学和大学的入学增长率最高，均超过了100%。政府认为必须在大学层面加大支持科研的力度，遂成立全国科学技术委员会以资助、管理切实可行的科研项目。

6. *农村发展状况*

基督教民主党人全力投入工作，所以即使是在偏远地区也能够实

现许多既定目标。他们在南部地区修路建学校、组织农民合作社、成立母亲中心。农业发展协会向小农发放贷款，农牧业服务社则提供技术帮助。农牧业服务社雇聘新西兰奶业专家帮助智利农民应用他们的高产方法。像普孔地区的里戈·托伊伯和加夫列拉·托伊伯这样一些列入农牧业服务社计划的奶农，将其土地划分成小块，种植高产牧草，并修建现代化的挤奶室。牛奶增产，南方地区的农民完全能够满足全国对乳制品日益增长的需求了。

弗雷政府时期，有450余名和平队志愿人员在智利提供服务。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往往指控他们为中央情报局特务，但他们确实是协同智利政府广泛地参与了农村发展计划的落实工作。例如，布鲁斯·韦伯和罗伯特·斯皮奇在考廷省协同农民合作社改进了牧草种植、建起了可移动的新式浴羊池。帕特里西亚·所罗门协同普孔地区母亲中心的工作人员组织了一些母亲中心。志愿人员布赖恩·洛弗曼和莎伦·洛弗曼为了使特罗沃尔维村的人们免遭每年春季洪涝之害，帮他们将其住处安置到了较高地段。1965年政府制订了防止水土流失的造林和森林管理规划，以促进林业发展。和平队代表吉米·邓肯协同政府机构和农民合作社在南方地区再造了大面积的森林。农牧业服务社和林业协会就这一规划提供了技术帮助、分发了树苗；志愿人员做工作，赢得了农民们对这一规划的支持。 166

弗雷政府还解决了一些民众的社会需求。卡布尔瓜湖地区居民只有牛车压出的路好走；政府资助村社首领贝尔尼·布拉茨及其邻居们用石子铺路，并开通了公交线。这一地区的孩子们要步行好几英里地去上学。教育部门帮助村社首领阿丰索·维加和塞贡多·纳韦尔修建了一所邻里学校。当地居民成立"集资会"并组织劳动人手，政府提供预制构件。许多农村孩子从未在学校享有过医疗保健待遇，所以比利亚里卡的全国医疗卫生服务局的护士们在学校里开展了一场接种牛痘疫苗运动。

弗雷政府在实施这些社会规划的同时，还实现了许多经济目标。两年间工业生产增长了20%。铜的出口增加，价格上升，从而出现了

良好的国际收支状况。累进税制使政府雇员们的薪金有了增加。农业工人的工资增加了，农产品的价格上涨了。亚历山德里在任的最后两年期间，其他消费品价格的适度上涨使通货膨胀率下降了一半。考虑到建筑业的繁荣和就业率的上升，弗雷的经济团队对其所取得的成就应该感到自豪。

然而弗雷的经济团队有两个方面业绩不佳，一是工资，二是储蓄金。集体谈判和罢工使工人们工资的增长率得以高于通货膨胀率。而私人储蓄金和投资却持续下降，从而使政府负担加重，承担了75%的费用。爱德华多·弗雷批评私营部门储蓄不力。后来11月份财政部长塞尔希奥·莫利纳提出一个强制工人储蓄的计划，反对党社会党和共产党发动全国性大罢工迫使计划流产。

可以肯定地说，弗雷的公共工程规划的目的是使智利实现现代化。他修建了新机场、连接圣地亚哥和瓦尔帕莱索的隧道，并使道路现代化。新水坝、港口设施和圣地亚哥地铁建设等公共工程提高了就业率，使经济年增长率达4%。然而在公共投资增加的同时，私人投资却减少了。外国公司意识到：由于智利正将公司收归国有，大规模投资要冒风险。智利的投资人也深感不安，觉得没收了庄园和外国公司后就要轮到本国人控制的公司了。

1967年4月举行的全国市政选举中基督教民主党的得票率低于 167 1964年和1965年的选举。该党开会讨论这一结果时，左派认为这是由于选民们想要深化变革。在数月后党的另一次会议上，左翼领导人雅克·琼乔尔迫切要求立即将大型矿业公司和银行收归国有。他还再三提出经济由政府而非私人控制的主张。他为了推行自己提出的计划，联合其他一些人从弗雷总统的支持者们手中夺取了对党的控制。该党没有同其他政党结盟加强自己的地位，而是内耗不断削弱了自身。

7. 土地改革

亚历山德里执政时期开始没收土地，但动作有限，只满足了极少数人的需求。1964年弗雷许诺，他如果当选总统，将使10万人拥有土地。为了履行诺言，他的政府在1965年至1967年间平均每年没收

45 万公顷土地，1968 年至 1970 年间则平均每年没收 71.8 万公顷。但分得土地的人很少。土地改革协会决定，农民在分得土地前必须在没收的田地上从事集体劳动。政府担心土地分成小块后会效率下降、农业减产。

弗雷的土地改革法 1967 年获得通过，重新确定了没收大庄园的标准。政府拟没收的不仅限于闲置土地，还规定占有土地的面积不得超过 80 公顷水田或相等数量的土地，超过的部分也要没收。地主们为了破坏这土地改革法，有时将土地划分到子女或亲戚名下。

弗雷土地改革的一项重要工作是组织农民协会。虽明令禁止政府官员插手农民协会的组织工作，但农业发展协会的头头们不管那一套，怂恿雇员们从事组织农民协会的活动。基督教民主党同社会党和共产党竞相从事组织农民的工作，这是因为三党都要谋求政治利益。1968 年，圣米格尔庄园的工资谈判破裂后，社会党发动农民协会举行罢工。然而罢工也未能促使达成协议，农民协会遂用武力占领了庄园。政府派遣国民卫队收复庄园时，农民用枪杆子进行了抵抗。支持智利工人联盟的大学生们举行了多次集会游行声援进行斗争的农民。然而国民卫队在保证其人生安全的情况下逮捕了所有持枪的农民，从而平息了一场极其危险的冲突。

168

对圣米格尔庄园的占领，表明社会党跟另一左派集团左派革命运动采取了一种新的斗争策略。这两个左派集团不再采用合法手段对财产进行再分配，而支持直接行动了。对弗雷说来，不幸的是他自己党内的左派也赞同类似的行动。在他执政的最后两年里，农民协会接管了 400 处庄园，相当于土地改革协会所没收的庄园总数的 30%。这种不合法手段的滥用表明：一场农村革命已然开始。

8. 大学政治活动

直接行动日益成为行动准则、传统的依法行动渐次被弃的另一表现形式，是一次又一次的学生运动。1967 年瓦尔帕莱索天主教大学的学生们罢课达 50 天，要求参与课程设置和学校管理人员的推选工作。他们的运动达到目的后，圣地亚哥天主教大学的学生领袖们效仿他们

提出了类似的要求。学生领袖们同政党亲密结盟，力争决定院、校领导人时拥有发言权和选举权。同基督教民主党结盟的学生们有件比较具体明确的事要干：他们要求撤换天主教保守派校长和各院院长，任命同基督教民主党结盟的领导人取而代之。

1967 年 8 月，学生们占领行政大楼，不让他人进出，直至梵蒂冈的智利人红衣主教劳尔·席尔瓦·恩里克斯出面干预、任命基督教民主党领导人费尔南多·卡斯蒂略·贝拉斯科为天主教大学新校长时才撤出大楼。新校长的任命促使圣地亚哥主教和天主教大学各学院院长先后辞职，学生抗议运动遂告结束。基督教民主党内的一些学生领袖从此渐趋激进，成立了人民行动统一运动；该组织后来脱离基督教民主党自立，而天主教保守派则决定组织自己的教团运动，由法学院学生海梅·古斯曼领导。这一组织 1968 年控制了基督教大学学生联合会，从而成功地从左派手里夺取了领导权。

1968 年 5 月，学生运动蔓延到了智利大学。该校教育学院的左派学生占领行政办公大楼。为了阻止左派采取行动，不那么激进的学生

169

抢先占领了校园内几座大楼。学生跟校方的谈判久拖不决，致使数月停课，学生们不得不利用暑假返校补课。根据新大学管理法，1969 年举行了智利大学校长选举活动。在三人参加的竞选运动中，基督教民主党人埃德加多·博宁格胜出。这一重大胜利加上在天主教大学获得的胜利，表明基督教民主党人当时控制了国内两所最重要的大学。然而这种学生运动还是令大多数成年人困惑不解。他们尽管对学生们的激进行为已习以为常，但对 1968 年发生在智利、欧洲和美国的动乱还是深感茫然。他们难以理解天之骄子般的大学生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从事政治活动而不好好上课学习。

9. 军人的要求

智利政治文化对不同意见具有一种令人惊异的宽容性。基督教民主党人激进的改革措施引起了全国性的大辩论，形成了对立的两大政治派别。军人这一角色在这次大辩论中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但他们有其自身的需求；他们提出要求时冷不丁吓了国人一大跳。1969 年 10

月 21 日，罗贝托·维奥将军控制了驻扎在圣地亚哥市中心的塔克纳团，并拒绝服从国防部长和总统。维奥声称，他之所以造反只不过是对军人工资过低和装备差劲所提出的一种抗议。然而弗雷认为塔克纳团反叛事件是对文官政府的一种威胁。他宣布戒严，派遣忠于自己的军队包围了反叛的团队。暴力冲突发生前，弗雷政府的一些领导人答应在下一个预算案中为军人加薪，从而解决了问题。塔克纳团的士兵们遂放下了武器。弗雷的支持者们为庆祝问题的解决，挤满了智利总统府拉莫内达宫前的广场举行政治集会，激情洋溢地聆听他保卫民主的演讲。

1969 年统治阿根廷、巴拉圭、玻利维亚、巴西和秘鲁的都是军人政府。因此弗雷有理由担心军人会夺取政权。智利保守派的庄园处在被没收的险境，庄园上的农民在组织起来，他们还得交纳高额税款，所以他们公开谈论智利若发生军事政变他们的利益将会得到保护。一本名为《智利的克伦斯基》的书认为，弗雷的改革为马克思主义者们在智利夺取政权扫清了道路。一个称之为"智利传统、家庭、财产协会"的天主教保守集团在其杂志《信仰》上载文指责弗雷在破坏智利的传统价值观。但 1969 年军人并未密谋破坏基督教民主党的改革措施。军队里有许多基督教民主党的同情者，若采取破坏行动势必会导致分裂。万幸的是：谈判解决了问题，从而避免了一场武力冲突。 170

1969 年 3 月举行议会选举。各党均将这次议会选举视为谁将赢得 1970 年总统大选的一种预演。选举结果如下：民族主义党获 20.1% 的票，共产党和社会党为 28.2%，基督教民主党为 29.7%，激进党为 12.9%。以民族主义党为代表的右派政党比 1967 年选举时增加了差不多 6% 的选票，基督教民主党则失去了差不多 6% 的选票，而左派政党比上次选举时少了不到 1% 的票。这次选举表明：曾希望过上好日子而投基督教民主党人票的一些中产阶级人士这会儿将票投给了右派候选人。基督教民主党想要赢得 1970 年总统选举，就得说服激进党和民族主义党支持共同提名的候选人，独自竞选没有希望获胜。

10. 1970 年总统选举

基督教民主党想要在 1970 年总统选举中获胜，就得有个盟友。激进党是个中立派，该是个最合适的选择对象。然而在高度受重视的南部地区选举中，激进党跟共产党临时结盟共同选举了激进党候选人阿尔贝托·巴尔特拉。共产党力劝激进党和共产党恢复 20 世纪 30、40 年代的人民阵线。社会党提名萨尔瓦多·阿连德为总统候选人后，共产党和激进党撤回各自的提名，力挺阿连德，遂再次结盟；这次结盟改称人民团结阵线。人民团结阵线的纲领比人民阵线激进得多，实为一大变化。20 世纪 40 年代以来，智利政府渐次加大了对经济控制的力度，而古巴革命又提供了一个实行国有经济行之有效的范例。因此，人民团结阵线建议将大型采矿公司、银行、大部分工业、外贸和批发销售公司收归国有，在其社会民生事务方面拟发展公共住房、深化土地改革、发展医疗保健事业和教育。

前总统豪尔赫·亚历山德里以独立候选人的名义参选，但得到了民族主义党的支持。他保证要根除基督教民主党人发动的民众运动、恢复秩序。他的支持者们相信他会废止土地改革、整顿大学里的纪律、171 严厉地处理罢工事件。他想要做的这些事显然是受上层阶级欢迎的，但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分子，他们认为基督教民主党的改革代价是通货膨胀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

基督教民主党人推举拉多米罗·托米奇为总统候选人。他是前驻华盛顿大使，曾长期担任党的领导人。托米奇是党内左派代表人物，希望政府加大对经济控制的力度。像弗雷这样的一些党内比较保守的成员担心，托米奇对社会主义的热衷会使基督教民主党跟共产党之间的区别模糊不清，但他们并不想阻止对他的提名。托米奇虽然赞许了弗雷所取得的成就，但认为尚需进行更为激进的变革。他提出的这一迷人主张吸引了党内的青年成员，但其他一些中产阶级选民则认为他差不多同阿连德一样是个危险人物。

亚历山德里及其支持者们确信他将获胜，有些人可能是太过自信了。统计出的选票表明阿连德获胜时，这一结果使他们和其他大多数

智利人感到震惊。选民们在前三次选举中接连让他落选后，这次选他登上了总统宝座。他勉强获胜，只在300多万选票中多得了3.9万张。阿连德得到36.2%的选票，亚历山德里获34.9%，托米奇获27.8%。托米奇很快就祝贺阿连德获得了胜利，但亚历山德里却呼吁民主力量团结起来阻止阿连德登上总统宝座。

由于没有一个候选人获得多数选票，按宪法规定由议会决定获胜者。三四位总统候选人竞选时，很少会有哪位能获得多数选票。然而按惯例议员们会将票投给得票领先者。一些政治权威人士在琢磨对阿连德是否也要循此惯例时，阿连德声称：如果议会不选他，他就要发动工人让全国陷入瘫痪。基督教民主党在议会有足够多的选票决定谁将出任下届总统，拒绝一切阻止阿连德当选的图谋。然而该党坚决要求阿连德支持修订宪法，"保证民主"使武装部队非政治化、政府不得没收新闻媒体。

就在基督教民主党跟人民团结阵线谋求达成协议、使议会选举阿连德的同时，一些右派集团则力图阻止他当选。国际电话电报公司派代表到美国同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和国务卿基辛格商讨阻止阿连德当选的对策。有影响的智利工商业领袖阿古斯丁·爱德华兹也同他俩进行了会晤。谣传美国可能要在智利发动军事政变时，许多美国民权领袖和工商界领导人都反对此举。然而中央情报局依然在寻机绑架智利武装部队总司令雷内·施奈德。此人反对军队干政，因此这一计划认定：除去此人，他手下的军官们就会采取行动。但中央情报局的线人没有绑架施奈德，而是暗杀了他，这使大多数智利人、特别是基督教民主党人惊诧不已。暗杀事件发生两天后，基督教民主党的议会议员跟人民团结阵线的议会议员一起选举阿连德为西方世界首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总统。 172

六、人民团结阵线政府

萨尔瓦多·阿连德明确表示使智利实行社会主义，但不是使用暴力、也不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什么帮助，而是要用"红葡萄酒和

馅饼”来实现。他在演说中保证效忠于多元民主制。阿连德虽然已当了25年的参议员、并效忠于智利的政治制度，但还是建议对宪法进行重大修改，将两院制的立法机构改为一院制。

他在人民团结阵线中的一些盟友并不那么赞赏民主制，讽之为资产阶级民主。他们在讨论实行社会主义经济计划时，认为资产阶级政治制度未必适合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跟阿连德结盟的社会党和左派革命运动均曾在弗雷执政时期用武力夺占过土地。他们虽然在阿连德当选后停止了这类活动，但只是暂时有所收敛而已。而共产党的领袖们则一直反对使用暴力。他们跟阿连德一样认为应该按民主程序办事。他们认为，否则的话可能会引发军事政变。

1. 经济变革

阿连德采取的首批措施之一是向议会提交一份没收所有在智利外国矿业公司的议案。议案获一致通过，规定智利必须补偿公司的损失。总审计长在核算该补偿多少时，发现大多数矿业公司非但不该得到补偿，而且因非法将所获利润调拨回本国而欠智利政府的钱。人民团结阵线的支持者们认为这一结论很正确，但未能预料到铜业公司会利用这一结论以其合法手段使铜在国际市场上停止销售。

173

阿连德选中佩德罗·乌斯科维奇任经济部长处理国内外各种问题。乌斯科维奇制订了增产、保就业、财富分配和现行工业国有化等一系列计划。他认为，智利工业尚未发挥出全部产能。如果提高工人工资的话，需求的增长将促使工业雇用更多的人手并提高生产率。因此他第一步就是将所有工人的工资增加了35%—40%，其中的一部分是补偿因通货膨胀而造成的损失。为了防止物价跟着上涨，他冻结了物价。智利人立即利用这笔新收入大买特买各种商品。其结果是库存减少，商店下新订单。企业接着雇用更多的工人，以应付订单增加的需求。失业率降到历史最低的3.8%，通货膨胀下降到20%以下，经济增长8%以上。成功了，乌斯科维奇欣喜不已，他实现了前三大目标。

1971年3月市议会选举时许多智利人支持人民团结阵线的候选人，以表达其对收入增加甚感满意之情。50%的选民投了人民团结阵

线的票，从而增强了政府领导人们的信心。他们认为这一选举结果表明智利人希望加快实现社会主义的步伐。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选举结果实际上是人们对其消费新水平感到满意并希望这一势头持续下去的一种表现。

然而不久问题就出现了，需求过旺，一些商品短缺。智利供应的各种产品都有限。进口产品更是如此。食糖供应越来越紧张，人们开始抢购囤积，商店里没货了。货一到，人们就排队抢购，有时队伍过长阻碍了交通。1972 年，为了限止囤积，商店开始定量向每位顾客销售。像新鲜蔬菜和鱼类这样的一些商品一直是充足的，像牛肉这样的一些食物，人民团结阵线对之采取了保护措施，规定了无肉日或无肉周，这是因为担心大牧场主们可能会屠宰掉所有牛只，将钱汇往国外。

金钱充盈，一些商品短缺，黑市遂告形成，以高于官方规定的价格出售商品。商店的货架上没有了咖啡和卫生纸，很可能是走了后门，把这些珍贵的物品以高价卖给了一些头面人物。而小商贩们则穿街走巷以大大高出官方规定的价格兜售成袋的马铃薯和蔗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商店货架上空空如也，而饭店却仍能弄到大多数烹饪原料诱使人们下馆子进餐。每晚各家饭店均是食客云集，座无虚席。酒席上，一些人庆贺社会主义的进展，而另外一些人则在讨论如何能使社会主义放慢脚步抑或如何能使其完全停摆。 174

商品分配的传统手段失效后，阿连德的对立面决定公开行动，唤起人们对商品短缺的关注。1971 年 12 月 11 日，一批妇女组织了“空锅游行”。她们敲着空锅穿越中产阶级居住区时，支持者们向她们抛撒糖果。而当她们邻近工人居住区时，左派革命运动的支持者们怒不可遏，抽打了她们。妇女们并未被吓倒，而是采取了一种长期斗争策略，每天夜里敲击空锅，继续举行游行。这一妇女主导的独特抗议活动将阿连德政府弄得措手不及。阿连德虽然指称这些妇女生活优裕，是国际资本主义的爪牙，但一直没有提出能够消除人们对物品日益短缺的恐惧且令人信服的说法来。他曾对智利人说过：他的革命不需要人们做出牺牲，而妇女们这会儿对这一说法提出了质疑。

阿连德准备以一种新方法——一种跟常规商业平行的分配体制——向穷人提供食品。他成立了“供应物价委员会”，筹办食品杂货装袋（称为“人民之筐”），每两个星期向各家供应一次。委员会以低价将这些食品杂货袋分配给穷困家庭。那些得不到食品杂货袋并反对这一分配网络的人，怀疑这是否就是类似于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那种定量分配制的开始。

食品短缺的一大原因是人民团结阵线加快了土地改革的步伐，从而中断了许多农业生产活动。1971 年，土地改革协会在雅克·琼乔尔的领导下，没收的土地比基督教民主党政府整个六年期间没收的还要多。步伐加快后，农民们往往自行决定没收土地。他们单等地产主或经管人外出办事时行动；地产主或经管人回来时，他们持枪站在大门口不让他进家门。南部地区的马普切族群占领一个世纪前失去的祖产。阿连德政府不想为难夺占土地的农民，通常是认可了这种自发的土地改革。然而地主们不干了，他们决定组织治安维持队保卫自家庄园。例如，南部地区有一名为“罗兰多·马托斯”的治安维持队，农民们试图占领庄园时，治安维持队就会出动跟他们交火。谁占有土地一事越来越不取决于政府，而是取决于农业工人跟地产主之间的冲突了。

2. 聂鲁达和卡斯特罗

175 20 世纪 70 年代初几乎没有什么事件能使大多数智利人团结一致，但有件事是例外。1971 年 10 月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将文学奖授予巴勃罗·聂鲁达，以表彰他对诗歌创作所做出的杰出贡献。他的《20 首爱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和《诗歌总集》问世后，许多人认为聂鲁达是 20 世纪西班牙语世界想象力最丰富的诗人。诺贝尔奖使他提高了国际声望。他的获奖加上早先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的获奖，使智利人确信智利是个诗人之邦。

引起较大分歧的事件是菲德尔·卡斯特罗为期三周的到访。菲德尔走访北部矿区和南部农村地区，发表演说、问候民众，十分愉悦。他对智利向社会主义过渡极感兴趣，但当被问及是否认为社会主义可以通过民主道路实现时，则回答道：每个国家必须根据自己的历史发

展行事。在这一问题和其他一些问题上，他极力回避争论。反对派报刊说这么长时间的公务访问实在不像话，而人民团结阵线的支持者们则很乐意能有这么一次同古巴革命英雄见面的好机会。

3. 两极分化

中央谷地有个法西斯式的组织，自称“祖国与自由”，开展了一场极其狂暴的反人民团结阵线斗争。该组织的头头巴勃罗·罗德里格斯·格雷斯竭力鼓吹同人民团结阵线对抗，诱惑了那些认为民主手段已完全失效的人。“祖国与自由”的另一名头头罗贝托·西姆据说是死于一次空难；此人生前最狂暴，曾进行过多次反政府的破坏活动。他曾多次引爆输电塔架，制造停电事故。然而保守派报刊却说这些破坏事件系左派恐怖主义者所为。此人后来还切断输油管道，并同军官们密谋要在1973年6月发动军事政变。

左派的过激行为进一步将具有民主精神的反对党推到了对立面。有个极左组织决定为1969年蒙特港的擅自占房者之死报仇，暗杀了弗雷执政时期的内政部长埃德蒙多·佩雷斯·苏约维奇。对一位领袖人物进行的这种野蛮袭击引起了基督教民主党的反感，进一步使国家分裂为对立的集团。人民团结阵线在1971年选举中取得的重大胜利犹令基督教民主党人十分担忧。50%的选民支持人民团结阵线，其政纲实施步伐又渐次加快，这使基督教民主党领导层认识到不能再孤军作战了。基督教民主党数十年来一直拒绝跟右派正式结盟，这回决定改弦易辙。该党在其执政的六年间一直猛烈抨击特权，这会儿决定阻止一场革命了，该党跟民族主义党组成民主联盟；两党联手在议会中控制了足以阻止人民团结阵线所提法案获得通过的选票。 176

人民团结阵线在出版业从事收购活动，力求对媒体进行更大程度的控制，基督教民主党遂意识到自己作为反对党将会很难起作用。首先是编辑出版发行量很大的周刊《埃尔西利亚》的西格—萨格出版社，因劳动成本持续走高不得不停业。政府接管了这家出版社，很快就开始出版各种反映其思想的书刊。最大的一家造纸厂和《信使报》报业集团也遭遇了类似的经济问题。政府如果也买下这些企业的话，

反对党的话语权可能就要被剥夺殆尽了。于是开展了一场拯救这两家公司、阻止政府收购的全国性运动，就连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参与了这场运动。

就在民主联盟加紧实施其反人民团结阵线行动计划的同时，激进的工人非法占领工厂、农民非法夺地的行动也加快了速度。而工厂主要求归还厂子时，阿连德政府又拒绝了他们的要求。拒绝的根据是1930年的一个法令。该法令准许政府临时接管发生劳资纠纷的工厂。报纸头版头条报道工人们占领一家又一家工厂。民主联盟担心这种任意行为很快就会结束私人企业的存在，遂面见阿连德要求就私有财产国有化制定法律程序。阿连德同意协商解决问题。

民主联盟和人民团结阵线双方代表会谈协商拟定了一份称之为“三种类型”的宪法修正案。第一类为国有化部门，由大型矿业公司和工业企业组成。第二类为公私合营。第三类为私营部门。阿连德接受了这一提案，但像卡洛斯·阿尔塔米拉诺这样一些激进的社会党人则拒不赞同，担心会妨碍工人们持续采取接管行动、中止“正全速前进的革命运动”。议会通过了宪法修正案，但人民团结阵线内部发生了分歧使阿连德又否决了这一议案。民主联盟试图推翻他的否决，但一场宪法大辩论使其努力未获成功。修正案胎死腹中，阿连德跟民主联盟共同解决这一爆炸性问题的良机也就随之消失了。这件事表明，人民团结阵线中的少数派具有使总统达成妥协的尝试作罢的影响力。

尼克松政府密切关注着民主联盟跟人民团结阵线间日趋紧张的关177 系，在未能阻止阿连德当上总统后，转而支持民主联盟跟人民团结阵线作对到底。尼克松和基辛格正在亚洲同共产主义搏斗。他们认为阿连德政权是共产主义在南美洲的滩头堡，一定得打掉。他们将大量资金投入隶属于民主联盟的出版物、智利最大的一家造纸厂和工会罢工基金组织，资助反对党的报刊和工会。为了破坏阿连德争取国外信贷的活动，他们中止提供新贷款，阻止国际组织向智利调拨资助金。但尼克松政府仍继续提供已承诺的贷款，而私人银行也继续向智利提供一些信贷。政府和私人金融机构之所以不想完全封杀智利，部分原因

是还正在谈判旧贷款的还付问题。

人民团结阵线需要增加大量外国信贷向为穷人而进行的消费革命提供资金。为了补充不断减少的美国贷款，官员们转向加拿大、西欧、苏联和中国。这些国家向智利提供了一些新贷款，但苏联提供的短期信贷很少，却提供了 4 亿多美元的长期信贷。智利官员们还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了 8 000 万美元的贷款，并同私人银行和“巴黎俱乐部”成员国达成了新的债务偿还安排协议。因此，从其他地方获得的贷款超过了美国所拒绝提供的新信贷。然而外贸收入的下降和国内消费的增长则使智利需要长期依靠信贷为不断增加的进口产品提供资金。

4. 全国大罢工

1972 年 8 月，民主联盟以人民团结阵线曾用来占领私人财产的同样的“焦土政策”跟人民团结阵线相对抗。8 月 21 日，零售商们关门停业 24 小时。政府试图让各店铺开门营业，开始砸门撬锁，从而引起了骚乱和抗争。10 月 11 日南极地区的货运汽车驾驶员举行罢工，并很快扩及全国。两天后零售商和工业企业资方人员加入罢工行列，医师、律师和建筑师等专业人员组织也跟着行动起来。就连农民合作社也举行了罢工。人人都对物品短缺、通货膨胀和安全无保障深感不满。跟历次罢工一样，参加这次罢工的人们为了长期目标也宁愿牺牲眼前的短期利益了。参加罢工的人都认为私有财产的存在和中产阶级的生存正处于危急关头。

5. 军人内阁

阿连德认为解决罢工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延请军人入阁。他的许多盟友都反对这一办法，但他仍于 1972 年 11 月 2 日任命武装部队总司令卡洛斯·普拉茨为内政部长、其他军官出任了其他一些内阁关键职务。三天后，普拉茨通过谈判结束罢工运动。这一冲突体面地结束后，智利人将其注意力转移到了比较传统的政党竞争活动：1973 年 3 月议会选举。民主联盟广泛开展竞选活动，力争赢得足够多的议席，好将阿连德赶下台，而人民团结阵线则吁求民众投票支持政府。 178

军人在两大联盟间起着缓冲作用，并使国家恢复到一种看似正常的生活状态，从而使竞争激烈的选举运动得以在未发生什么严重冲突的情况下顺利进行。各政党候选人的宣传海报铺天盖地，电线杆、墙壁和栅栏上贴得满满的，往往是一家海报贴上后，另一家就贴在其上方，互比高低。电台成天反复广播支持候选人的短诗和歌曲。“祖国与自由”的巴勃罗·罗德里格斯·格雷斯没有竞选公职，却时不时要预测一下即将做出的最后判决。还有一些人则认为国家已恢复正常。

选举进行得很顺利，只偶尔有舞弊的谣传。民主联盟未能实现其赢得66%选票这一不切实际的目标，只赢得55%，人民团结阵线获得44%。双方均声称取得了胜利，但政治格局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选举过后，军人表示愿意继续留在内阁里，但人民团结阵线里的左派则要他们退出去。他们遂提出辞职，阿连德组建了一届文人内阁。

教育部长宣布计划实行一种称之为“全国统一教学体制”的新教育制度后，引起了新一轮争论。“全国统一教学体制”提出要在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统一教授符合社会主义新社会要求的、国家规定的课程。民主联盟立即表示反对，认为这是要强行灌输马克思主义思想。一直支持人民团结阵线的天主教会也担心这一措施将会剥夺其对教授课程的决定权，遂要求先花点时间讨论一下这一计划。

紧接着第二个月，埃尔特尼恩特铜矿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阿连德提醒工人们注意：矿山已国有化。这就是说，工人们已是矿山的主人，不应该要求提高工资。而民主联盟则支持罢工，这一来可以减少政府的收入、二来是要证明人民团结阵线为工人谋幸福的说法是种谎言。中产阶级专业人士也支持矿工罢工运动，工人们离开矿区向圣地亚哥行进时，对他们表示热烈欢迎。这次罢工持续了77天后阿连德才使其平息下来，他的政府损失了将近8 000万美元。所不幸的是，这类严重破坏国民经济的行为已构成了政治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179

6. 坦克群

尤为严重的是1973年6月29日上午一批下级军官的起事。一群坦克在圣地亚哥的大街上朝国防部方向推进，奇怪的是从不闯红灯。

坦克一到国防部，坦克上的人就密集开火，杀死了22人，伤了32人。发生军事暴动了，报上称之为“坦克突击”。这批人还攻击了政府大楼，但武装部队总司令普拉茨劝说他们放下了武器。与此同时，阿连德发表广播讲话，呼吁工人保卫他们的政府。社会党和左派革命运动的领导人曾组建工厂带，敦促工人接管了300多家工厂。那天晚上，阿连德的支持者们在总统府前举行了一次大规模集会，让人们放心，政府并未失去控制。

7. 和平谈判

“坦克突击”事件提醒民主联盟和人民团结阵线双方注意，政治家们如果不互让和解、维护民主制度，下次军队就要开出兵营接管政府了。这一严酷的现实迫使民主联盟和人民团结阵线接触谈判。7月30日萨尔瓦多·阿连德和基督教民主党领导人帕特里西奥·艾尔文讨论解决双方重大分歧的可行方案。报纸推测阿连德是否会请基督教民主党入阁，但基督教民主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都公开反对这一动议。人民团结阵线中的共产党欢迎内阁中能有一些基督教民主党成员，想以此制止军事政变的发生，但社会党不同意。帕特里西奥·艾尔文建议委派军官担任内阁重要职务、归还被接管的私人财产和实施武装管制法。阿连德有保留地接受了大部分要求，但拒绝归还被接管的私人企业。他知道社会党和左派革命运动的领袖们肯定是要反对这一动议的。180 不久货运汽车司机、商人、大多数企业主和专业人士再次联手举行全国性大罢工，阿连德被迫再次谈判协商解决危机的办法。8月中旬，他跟艾尔文在红衣主教劳尔·席尔瓦家秘密会晤，但商谈未能达成协议。

8. 中产阶级忧心忡忡

紧张局势非但没有缓和，反而加剧了。8月22日，民主联盟议会议员通过决议，指责阿连德违宪、接管私人财产不合法。民主联盟的支持者们不仅失去了其工厂、企业，人民团结阵线还解除了他们中许多人在工厂、企业里担任的管理、技术职务。智利的专业人员面临着

这么一种现实，即要么加入人民团结阵线，要么就失业。其结果是许多工程师、药剂师、会计师和其他一些专业人员纷纷前往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和美国寻找工作。报纸的广告专页上满是专业人员要变卖家具和公寓的标题为“离家出售”的广告。除担心就业外，还担心军队如果要推翻政府的话，工厂一带将会发生威胁到圣地亚哥居民安全的暴力活动。军方高度重视这一威胁的存在，遂开始突击查抄工人控制的工厂，搜寻武器秘藏处。民主联盟的报纸时不时刊登出从某家工厂没收来的枪支和自制武器的照片。

人民团结阵线中的温和派对“人才外流”和中产阶级更形敌视政府感到不安。然而比较激进的那派人却怀疑中产阶级在社会主义的智利能起多大作用。阿连德应反对党提出的确保安全的要求，决定延请卡洛斯·普拉茨将军和其他三名军官入阁。不幸的是，左派革命运动和激进的社会党人设法打入武装部队策动新兵反对他们的长官，这使军方丧失了对政府的信任。8 月 21 日，普拉茨将军和亚历杭德拉·科克斯各自开着自己的车行进在圣地亚哥的一条高速公路上，发生了一场罕见的冲突。据说是她辱骂他，他大发雷霆，猛追她的车。军官们的妻子对他的行为提出了抗议，并要求他辞职。普拉茨深感屈辱，辞去国防部部长一职，并宣布退役。阿连德遂推举奥古斯托·皮诺切特顶替普拉茨，相信皮诺切特会维护宪法。

9. 成就和问题

181 1972 年 10 月以后的紧张冲突妨害了人民团结阵线许多计划的实施，然而在此之前政府改善了医疗、教育、住房和就业状况。婴儿死亡率下降，人们吃得好、寿命长。阿连德政府重视各级教育，增加了经费的投入。进入幼儿园的孩子增加了近一倍，政府新建了 122 所学校。小学和中学入学人数增加了 10%，而大学入学人数则增加了一倍多，从 7 万增加到了 14.5 万。政府动工新建 11 万套住房，但由于种种原因，只建成了 2.9 万套。

1970—1973 年，就业形势好转，增加了 23.5 万个就业岗位，失业率从 6.1% 降到了 4.8%。头两年生产全面增长，但 1972 年 10 月全

国大罢工以后开始下降。罢工、投资减少和原材料短缺导致 1973 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 3.6%。头两年工人收入高于通货膨胀，但到 1972 年底急剧上涨的物价和物品短缺又使工人的收入跟不上物价的飞涨了。为了增加就业和生产，政府积累了大量赤字，导致通货膨胀率从 1971 年的 21% 增加到了 1973 年 9 月的 381%。农业方面，土地改革协会和农民没收土地行动使农民有了更多的土地，但这一变革危害了生产。1973 年农业生产下降 22%，小麦产量更下降了 40%。政府为了保证供应，不得不增加粮食的进口，1970 年花钱 13 500 万美元，1973 年则支付了 51 100 万美元。

阿连德上台一年后，国际贸易和智利的国际收支出现了严重问题。铜的生产和出口下降，这部分原因在于罢工、部分原因在于新管理方式的应用。进口增长，贸易不平衡状况严重，国家财政储备随之枯竭。传统经济学家们提醒人民团结阵线要多多关注国家财政、不要专注于分配和财产所有权问题，但人民团结阵线的许多领导人无视这一忠告，认为这不适于他们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经济。不幸的是，财政形势已然失控，而人民团结阵线各派还拿不出一致同意的政策来。

10. 军事政变

人民团结阵线的一些人曾怂恿工人破坏民主制度，说这种制度袒护社会主义国家的敌人。阵线中怀有民主信念的一些人则愤怒地贬损反对党人为木乃伊、法西斯。三月议会选举过后，民主联盟的支持者们改变了斗争策略，公开鼓动军队推翻政府。民主联盟的支持者们贬损人民团结阵线成员为“社会渣滓”。双方相互泄愤贬损对民主传统的延续不是个好兆头。

182

全国性大罢工持续不已，即将发生军事政变的谣言满天飞。1973 年 9 月 11 日黎明前军队开出兵营，占领了大部分电台，开始广播进行曲，并不时插播新闻说军队正在控制国家局势。军方向阿连德提供一架飞机要送他出国，并宣告上午 11 时开始宵禁。阿连德得到军方提出的要求后，起初呼吁工人上街保卫政府，后来又改变了主意，要他们留守工厂保持警戒。阿连德拒绝投降，中午时分空军轰炸总统府。阿

连德牺牲。一种说法是军队开枪杀了他，另一种说法是他饮弹自尽。军队开始逮捕政府的一些主要领导人，而其他一些领导人则进入外国使馆避难，可能会爆发内战的谣言不实。人民团结阵线的一些追随者进行了零星的抵抗，但在正规军面前纯属徒然。

一场有关智利悲剧所引起的一些关键问题的国际大辩论立即开始，有关人士提出：谁该对军事政变负责？人民团结阵线使智利发生变革所采取的策略合理吗？能够通过民主手段使革命成功吗？许多评论家都就第一个问题指责尼克松政府，认为是尼克松政府破坏了阿连德政府。参议员弗兰克·丘奇领导的一个议会调查组查明：中央情报局曾力图阻止阿连德当选，而后又向反对集团提供了财政支持，但没有证据表明中央情报局曾参与推翻人民团结阵线政府的活动。

阿连德政府内的对立派别流亡国外后经常就军事政变相互指责。激进的左派指责共产党延缓了革命进程，而共产党则指责左派没有支持协商解决问题。其实，所有政治人物都对民主的悲惨结局负有责任。183 人民团结阵线内部、乃至全国的两极分化削弱了阿连德政府。人民团结阵线的阶级政治分裂了国家，引发了影响每个人的暴力活动。为了找个结束暴力活动的调解人，阿连德延请军人入阁。暴力活动暂时平息下来，但他自己党内的左派要求将军人排除出内阁后，暴力活动再次在全国蔓延。9 月 11 日军队推翻人民团结阵线，终止了它的人民革命。评论家们从这一历史经验中得出结论：民选政府难以进行革命，难以保持维护民主所需的一切。

第九章　军人统治与新自由主义（1973—1990）

智利无人预见到军事统治将会如何改变其生活。人民团结阵线的成员昨天是政府领导人，今天就成了流亡者。民主联盟的支持者们都对人民团结阵线被推翻欢欣鼓舞，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其未来的政治作用还抱有天真的想法。基督教民主党的领袖们错误地认为军队将会很快恢复文官政治制度，并认为他们是反对人民团结阵线的，因而有权促进公民社会的重建工作。保守党领导人则不那么想要恢复民主政治，他们担心左派政党再度兴起。而政变后掌权的军事执行委员会则担心选举和公开辩论会引起更大的动乱，将国家危机的发生归咎于传统政治。执政委员会的成员们没有决定掌权的期限，没有说是否将恢复 1925 年宪法，也没有说将如何管理经济。 185

民主联盟内要求尽快恢复 1925 年宪法和文人政府的呼声很快就被要求进行长期军事统治的呼声淹没了。执政委员会及其一些保守派文人盟友决定对国家制度作重大修改。执政委员会下令停止一切民间政治活动，而幕后则有两大亲军方集团在争宠。保守的天主教集团要求军方开展类似于西班牙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开展的那种政治运动，而保守的经济集团则要求军方注重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变革。这两大集团对政府都有影响，但两年内经济集团占了上风。 186

经济学家们都是在国外受的教育，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在芝加哥大学得过博士学位，因此人们给他们起了个“芝加哥信徒”[①] 的绰号。他们竭力将新自由主义原理应用到智利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不仅使被没收的企业和庄园私有化，还使许多以往一直由政府控制的服务行业也私有化了。这些服务行业包括医疗保健、社会保险和教育。全世界保守的思想家们都在注视着智利正在进行的这一私有化实验。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持续繁荣，使智利的那些原本持怀疑态度的人也开始信奉这一新经济模式了。国际上的一些评论家将这一模式推荐给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然而 20 世纪 80 年代初经济严重衰退，人们的看法迅速来了个 180 度大转弯。大多数金融机构破产，政府难以偿还外债，所以就连那些保守的支持者也对经济改革表示了怀疑。

1974 年末开始任智利总统的奥古斯托·皮诺切特成了批评其政权者们的攻击目标。他们联合了形形色色的反对派人士，就公民权的丧失提出抗议，要求皮诺切特下台。他们没有达到目的，但于 1988 年挫败了他谋求连任八年总统的企图。1989 年他们选出了一位新总统和一个新议会，准备恢复文人统治。1990 年新领导上任，17 年的军事统治结束。皮诺切特的影响犹存。新政府承继了欣欣向荣的经济，这有助于其建设一个更为公正的社会。

一、军人政治

跟智利许多机构的成员一样，军队的领导人也有着不同的社会背景和不同的信仰。大多数军官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只有海军军官多半来自上层阶级。军事政变前只有少数高级军官支持人民团结阵线，但许多士兵都支持人民团结阵线。大多数高级军官都支持基督教民主党。保有军职的右翼强硬派不多。所有的军官都怀有深深的爱国主义情怀，忠于职守及其司令官。他们还要力保其职业生涯，如果得不到晋升就得退役。军队等级森严，影响大的集团一旦控制了指挥权，就会有大多数军

187

① 亦译为“芝加哥弟子”。——译者注

官和士兵服从命令——即使他们并不赞同其指挥官的政治主张。

人民团结阵线政府最后的九个月里，阿连德试图恢复人们对其政府的信任，约请了几名军官出任其内阁部长。人们相互攻击，其激烈程度为智利有史以来所罕见，偏执己见，不容他说，公民社会惨遭破坏；阿连德内阁中的军官们对治国理政时的所见所闻至为不满。特别使他们恼火的是人民团结阵线政府内部政见分歧、成天争论不休，这使他们至为茫然，到底谁在主政。

国家陷入一片混乱，一批高级军官经酝酿形成了一致意见：他们必须接管政府。强硬派率先发动政变，推翻人民团结阵线后建立起了他们所说的秩序、而不是重建公民社会。军事执政委员会主席奥古斯托·皮诺切特要智利人放心：武装部队的行动完全是出于爱国情怀。他未提及已逮捕了一些忠于阿连德的军官一事，而是强调了武装部队的团结一致。他将国家纲纪的废弛归咎于政治家们，说他们将自己的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他遂依据这一逻辑中止一切政治活动，他说这一措施是国家重建的先决条件。

军事执政委员会提醒国人：1973 年 9 月国家已濒于内战边缘。军事执政委员会在电视中播出了武器秘藏处，并发表了有关“Z 计划”的白皮书。该文件指称人民团结阵线领导人计划在 11 月 19 日国家独立庆典时暗杀一些肩负重任的军官。一些智利人认为，左派革命运动和一些激进的社会党人曾敦促工人们武装起来，因此这一说法是可信的；而另外一些智利人则认为，军方的这一说法是为推翻阿连德政府而捏造的理由。跟大多数论争一样，人们是根据其政治信仰、而不是根据事实得出其结论的。

皮诺切特像数十年前卡洛斯·伊瓦涅斯上校干的那样，向人们提出了同一个替罪羊——政治家们毁了国家。1973 年人们考虑谁应对社会动荡、物资匮乏负责时，皮诺切特振振有词地对他们说：不仅仅是人民团结阵线的政治家们、而是所有的政治家害了国家。他将政治家同军人作了对比，说前者“谋求私利”、后者富有爱国心，想以此争取民众支持他的政府。经历如此严酷的冲突后，大多数智利人强烈期 188

盼能有一个使他们和平、幸福的领导。民主联盟的支持者们认为军人是不二人选。他们没有料到军人会漠视公民权利，也没有料到军人会实施这样的一种经济政策。

民主联盟的支持者们带头支持军队时，支持阿连德政府的人只在为自己的生命担心。军队搜捕数千名人民团结阵线的骨干分子，将他们关押在全国各集中点，最大的一个集中点是国家体育场。像民歌手维克托·哈拉这样的一些名人被捕后就“失踪”了，哈拉的尸体后来被发现。激进的自由作家查尔斯·霍曼被关进国家体育场后也“失踪”了。他父亲寻找他尸体的不懈努力成了《失踪》这部书及同名电影的主题。失踪者多达3 000人，十多年后才有关于其尸体掩埋地的报导。

人民团结阵线的一些高级官员躲进外国使馆避难。那些未能进入使馆者则被军队逮捕送进了南部地区和南极地区的一些拘留营。军队宣布实行戒严和宵禁。国民卫队队员手持冲锋枪在街头巡逻。军队时不时突击搜查贫民区，随意逮捕人，关上一两天，再无罪释放。其目的是制造恐慌。那些反对军队特别积极的人遭逮捕，受拷打，有的会被处决。天主教和其他一些人权活动家反对这种恣意妄为的行动，而基督教的一些主要领导人还在为是否要公开批评军队伤脑筋。1976年，前总统爱德华多·弗雷决定必须宣布反对政府侵犯人权的行为。他起初曾支持过军事政变，但这会儿提出了恢复民主的要求。皮诺切特立即不失时机地对他进行诽谤，指责他没有爱国心、天真地同左派勾结。政府不断对他施压，以至他1982年1月在做一次常规手术时神秘死亡后，他的家人和朋友们推测可能是军人毒死了他。真巧，一个月后劳工领袖图卡佩尔·希门内斯遭暗杀。他同弗雷一样，也是起初支持军政权但后来对其采取了反对态度。

一些流亡在外的智利人直言不讳地反对军政府。国家情报局惧怕189这些反对言论，策划了使其消失的海外行动。政变一年后，布宜诺斯艾利斯发生了一起汽车炸弹爆炸事件，炸死了智利武装部队前总司令卡洛斯·普拉茨和他的妻子。第二年，基督教民主党领导人贝尔纳多·莱顿在罗马遭枪击，但未死。1976年，一枚汽车炸弹炸死了阿连

德政府驻美国大使奥兰多·莱特利尔。这一暗杀事件发生在华盛顿，所以美国司法部追查了杀手队留下的线索，发现有确凿证据证明是国家情报局指使其特工和古巴流亡者实施的爆炸。美国的调查发现了投弹者的身份，将其引渡到了美国，但未能引渡成批准暗杀行动的国家情报局的头头。国际舆论集中指责国家情报局，皮诺切特遂决定将其解散，但又成立了另一情报局代行其事。

智利国内的一些人甘冒丧失个人生命的风险，坚持反抗军人统治。工会会员在人民团结阵线的温和派和基督教民主党人的支持下参加和平罢工和抗议活动。所不幸的是，他们往往遭逮捕、受拷打、被放逐他乡。与和平示威截然相反的是人民团结阵线中的左派集团（如左派革命运动），他们决定从事武装斗争。他们组织城市游击小组，曾多次同国民卫队交火。1983 年，他们成功地暗杀了圣地亚哥市市长，招致军队进行报复，许多游击队员被逮捕、杀害。著名的左派革命运动领导人帕斯夸尔·阿连德担心会出现最坏的情况，遂到哥斯达黎加寻求避难。在这暴力横行时期，天主教教区牧师团结会向那些被捕者提供法律支援，帮助有关的亲属寻找“失踪者”。这一时期民事法庭仍在运作，但大多数法官不是军队的支持者就是胁从者，因而很少提供人权保护。

军队的反马克思主义运动使其全然不顾国外对其报复行为所引起的普遍反感情绪。智利境外的评论家们认为，这一系列逮捕、暗杀事件证实了先前有关军政权野蛮残暴的传闻。然而皮诺切特认为他是在进行一场圣战，越来越肆意妄为，就是对一起共事的军官也决不客气。他要求军事执政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任命他为总统。空军的古斯塔沃·利将军多次表示反对皮诺切特扩充个人的权势，但却徒劳无益。1978 年 7 月，皮诺切特出手进行报复，强行将利将军免职，致使九名空军将领辞职以示抗议。皮诺切特为了确保军内对自己的支持，遂提升效忠自己的军官、购置新装备、增加军饷和福利待遇。他为了进一步确保武装部队有足够的财力，下令将铜出口收入总额的 10% 划拨给武装部队。 190

他还任命一委员会修改宪法，载入军队有保护国家的神圣职责。这一文献规定：国家如果面临威胁，军队有权为了国家利益进行干预。宪法创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协助军队确认是否存在着威胁。新宪章规定要通过选举组成议会，但最早要到1989年才能举行第一次选举。选举制度确保影响大的少数党拥有代表，这可以阻遏修改宪法的企图。1988年举行全民投票，决定皮诺切特是否将继续任总统至1997年，抑或其他人是否也能参加总统竞选。为了制造这一新宪章得到公众支持的景象，他于1980年举行了一次严密控制的公民投票。绝大多数智利人认可了新宪法，这使军事统治在法律上具有了合法性，同时也确定了军队必须遵守的规则，而皮诺切特在1980年尚未看清这一点。他的政权行使着几乎是无限的权力，而繁荣的经济又使其安然一时，但后来发生了危机，他自己制定的宪法就转而束缚了他的手脚。

二、实行经济私有化

军队在竭力使国家实现和平、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的同时，也着力整顿经济秩序。军队全力恢复市场运作和财产权，放松价格控制，将一些企业还给原先的主人。通货膨胀压力加大，致使物价上涨，商店货架上又堆满了商品，但只有富人才买得起。失业率上升，工人阶级是雪上加霜。公民自由缺失，国内外批评之声不断高涨，将军们想尽快使国家富起来，以求得更大的支持。他们从工程师的角度看问题，认为发展是一个规划和建设过程。他们中没有什么人学过经济学，却认为经济学是一门跟他们自己学过的工程学密切相关的学科。他们没有认识到经济理论的社会内涵。

当芝加哥大学培养出的一批经济学家向奥古斯托·皮诺切特提交了一份国家变革计划时，他立即看上了他们的计划。他们提议邀请他们的导师米尔顿·弗里德曼到智利为决策者和工商企业巨头举办讲座。弗里德曼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世界许多国家的顾问，他的这种地位也能使军政权在国际商贸界的影响有所扩大。1975年3月，米尔顿·弗里德曼抵达智利，受到了热烈欢迎。他在三天的讲座中，扼要

191

地讲述了发展市场经济的方法，即使大多数政府下属机构私有化，大幅度削减政府开支，鼓励对外贸易和外国资本的投入。要实施如此重大的变革，弗里德曼建议不要拖泥带水延缓时间，要大刀阔斧立即行动。他称之为“休克疗法”。他承认这一做法短期内要付出高昂的社会代价。银根紧缩将使需求下降、使失业率上升、使贫困加剧。然而弗里德曼预告，经济将彻底好转，惠及每个人。根据这一观点，智利长期的发展问题就能最终获得解决了。皮诺切特认为弗里德曼的方法可行，遂授权“芝加哥信徒们”编制规划，将国家推上发展道路。

三、工业

皮诺切特的经济部长费尔南多·莱尼斯着手归还人民团结阵线执政时期没收的企业。他的继任者塞尔希奥·德·卡斯特罗加快了归还进程，使25家银行和400多家公司实行了私有化。然而私有化只是天主教大学里一批拥有博士学位的经济学教授编制的规划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要根据新自由主义原则变革整个经济结构。

20世纪里大多数智利经济学家均采用种种政府补贴手段（如关税和信贷等）刺激工业发展。然而天主教大学的经济学家们开始执行任务时，断然摈弃了这种做法。他们认为，保护和补贴致使工业生产效率低下、毫无竞争力。他们为了使本国工业同外国竞争，1973至1980年间平均将关税从100%减少到了10%。他们用取消关税保护的方式迫使工业生产提高效率、改进质量。智利商品的价格如果竞争不过亚洲、欧洲和北美的商品价格，智利的工业行将消亡。

经济班子认为，要实现这一重大变革，智利工业必须降低其生产成本。为此，这一经济班子实行了劳工改革，他们削弱工会职权，允许工厂主减少工资、过多的补助费和就业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没有想到这些削减劳工成本的措施实际上就是对工业的补贴。

人民团结阵线执政期间，厂房和机器严重受损，企业主们极需外部资金。这一经济班子为了使他们能够得到信贷购买新机器、使工厂

192

现代化，遂大力扶持新金融机构的发展，撤销对借贷外资的限制。一批有进取精神的企业家趁机在国内、从国外借贷资金组建大型联合企业。

皮诺切特的经济班子实行这一新模式时，智利工业很难参与国际竞争。军事政变时，国内市场因过高的物价和失业率已严重萎缩。“休克疗法”起初使制造业严重受损，1975 年萎缩了 25%，而 1976—1980 年则开始以可观的 6%—7% 的增长率持续发展。政府的经济学家们认为，这四年的迅猛发展似乎证明了新自由主义工业政策的有效性。

这些政策的理论根据大多源自米尔顿 · 弗里德曼，但他在芝加哥大学的同事阿诺德 · 哈伯杰由于定期前往智利，所以起的作用更大。他支持智利经济班子以适当的汇率使出口多样化、降低对铜的依赖度。他的两个学生豪尔赫 · 卡瓦斯和塞尔希奥 · 德 · 卡斯特罗领导着皮诺切特的经济班子。他们首先削减政府开支，着力使通货膨胀率降下来。1973—1981 年，通货膨胀率从 600% 以上降到了 10% 以下；智利人和外国人都认为这一成就是“奇迹”。他们自以为已克服了这一长期灾难，遂于 1979 年将比索的汇率与美元挂钩。他们忽视了固定汇率可能危害出口、资助进口的程度。不久，以往在智利很难买到的名牌商品就占满了商店，本国产品不见了。民族工商企业拼命谋求生存，但许多企业难以维持。1977 至 1980 年间倒闭了近 1 300 家。

不幸的是，危机不久更加严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为了解决自身的通货膨胀问题，决定提高利率。这使全球出现了银根紧缩的状况，同时又提升了美元的币值。20 世纪 70 年代末容易弄到信贷，智利的企业主们从国外借贷了近 110 亿美元。从而使国家外债从 53 亿美元增加到了 173 亿美元。银根紧缩、美元升值，无论是企业主还是政府就都还不起外债了。

智利大型联合企业压政府不要使比索贬值，否则它们还外债所需要的美元价值就太高了。但到 1982 年，政府扛不住了。经济班子起初只使比索贬值了 18%，但不久就使其进一步贬值了。债务人用以购买美元所需的比索越来越多，他们的债务很快就超过了其资产的净值。

银行受的影响最大。经济学家拉尔夫·吕德尔斯的一篇研究报告揭示了大多数银行均有亏空这一惊人事实。国内金融机构行将全面崩溃，政府遂将其接管。军政权突然发现自己控制的企业比阿连德政府没收的企业还多。世界市场的起伏不定对私人企业的毁灭性打击可能比社会主义还要大。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们已难以调整国家货币政策使之适应起伏不定的世界市场。他们像人民团结阵线那样再次将智利资本主义推向了深渊。

一直反对芝加哥大学经济模式的亚历山德里和弗雷政府时期的经济学家们，这会儿宣告这一模式失败了。他们认为智利应该回到保护主义和提供补贴的时代。皮诺切特急欲寻求解决危机的良方，遂听取了这一评论意见，改组了他的经济班子。新领导人很快即实施高关税和财政控制政策，以扶持本国工业和金融机构。然而在这些措施开始恢复20世纪50、60年代的经济制度时，企业界担心会完全放弃新自由主义政策。所以，经济一显复苏迹象，企业界的领袖们就立马劝说皮诺切特任命埃尔南·布奇为财政部部长。他曾获得过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学位，想要将理论同实际结合起来发展本国的经济。他甚至还发展了私有化政策，将诸如大型公用事业公司这样的国有企业卖给私人。他还允许外国投资人更多地参股智利企业。

新自由主义者们盘算着要将大型铜矿私有化，但皮诺切特坚定地继续实行国有制。他认为这一企业是政府收入和外汇的主要来源。即使是在人民团结阵线大动荡期间，铜产量也有平均每年4%的增长，然而比原定计划要少，罢工和其他动乱使产量难以大幅增长。军队接管后的四年间，铜产量增长了21%，1977年几达99万公吨。十年后铜产量超过140万吨，1990年达158.8万吨。这一增长引人注目，但这是渐进式的增长，而不是突进式的增长。其实到1990年，许多经济领域的增长率均已超过铜。出口产品种类的变化证明了这一发展趋势。1973年铜是出口总量的75%，到1990年则不到50%。智利的农产品、林产品和渔产品这些新出口产品突然间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

194

四、农业、林业和渔业

重新安排自然资源的生产活动，是军政权的经济班子所面临的一大挑战。弗雷和阿连德政府曾先后没收了5 000多家地产，合智利可耕地的60%，但这两届政府均未确定这些地产的法律地位。土地改革协会依法占有了一些庄园，但其他一些庄园是农业工人强占的。土地改革协会没收的地产由身为公社社员的农业工人耕种，但产权属于国家。军事执政委员会的经济顾问们不认可这些国营农场，遂分田到户，颁发地契，使农业工人成为土地所有者。分配给各家各户的土地大约是全部所没收的地产的1/3。另有1/3的地产是土地改革协会未依法没收的，政府将其还给了原先的所有人。其余的1/3则由执法官员在商品市场上销售。

这样一来，不仅完全改变了土地所有制形式，而且也改变了农业投入老观念。政府倡导出口，农业部门遂开始注重国外市场而不那么关注国内市场了。新农民不再像以前那样种植谷物、饲养肉牛，而是发展果园和葡萄园，出口新鲜水果，主要是出口到美国。例如，1973年智利栽种果树6.6万英亩，到1989年扩大到了17.3万英亩。然而要到国外新鲜果蔬市场进行竞争，则需要可观的投资。

许多新土地所有人大笔借贷引进现代技术，像经营企业那样经营农场。他们祖辈与土地没有关系，对土地没有感情，与土地只有经济关系。再者，他们家族与劳动力也没有关联。老式庄园有大批佃农生活在土地上，而新型土地所有人则裁减佃农人数，转而通过劳工经纪人雇用工人。从前的雇农只得流向附近的市镇，到处找工作。他们没有地方栽种果蔬、饲养牛羊。如今土地所有者与工人之间的新关系是临时性的。许多采摘、加工包装水果的季节工人如今四处流动。因此，农民协会的人数从1973年的近12万减少到了1981年的不足3万，工人们也失去了就工资和劳动条件进行谈判的权利。

195

大型加工包装公司出现了，同小果农签订合同，收购他们的水果。智利最大的一家加工包装公司的老板是戴维·德尔库托；他的公司堪

与多尔、奇基塔和戴尔蒙特这样的一些跨国公司相比美。智利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食用葡萄出口国。智利夏季正好是北半球的冬季，这一现实极为有利。而智利的技术、基础设施和低工资又使其对像阿根廷、澳大利亚和南非这样一些南半球的竞争对手占有优势。新型农业综合经营模式甚至改变了传统农产品的生产方法。小麦每公顷生产率从1969—1970 年度到 1990—1991 年度增长了近 3 倍；玉米和马铃薯的生产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

可惜的是，许多新小农没有相关知识和资金使其农田现代化、分享这一出口繁荣。1979 年政府允许他们出卖土地时，他们中的许多人卖掉了自己的土地。他们怀揣换得的一点资金流向城市地区，想找点活干或做小买卖。因此，土地改革的一个间接结果就是加速了农业工人向城市的流动。就业形势好的时候，这新来的劳力促进了发展；但经济衰退时，他们就加入街头小贩大军，沿街叫卖谋生。

皮诺切特政权时期大幅增长的其他两项经济活动是渔业和林业。智利北部沿海洄游的鳀鱼是鱼粉业兴旺之本。1973 年智利渔产品出口总值为 4 800 万美元，1987 年增至 9 亿 3 800 万美元；智利在全世界捕捞总量中位居第四。1990 年渔业部门雇用了 6 万名工人，但过度捕捞和洋流变化使得就业形势和年产量难以预测。安赫利尼家族及其新西兰合伙人控制了 75% 以上的渔业生产，智利渔业也就成了一项高度集中的产业活动。

除鱼粉外，智利还发展了养鱼业。投资人围湖、围海养鱼。智利开始向全世界出口鲑鱼后，人们认为这一新兴产业很有发展前途。鲜鱼出口总值 1988 年增至 8.37 亿美元。但不久人们就注意到鱼饲料和鱼排泄物对水域的污染情况，开始为环境遭到破坏而抱怨不已。为了保护国家水域，生态学家们一再要求对这一产业加以控制。 196

在林业方面，植树造林也成了大买卖。从一开始，栽种的就主要是外国树种。为了大力促进出口，皮诺切特政府资助造林将近 200 万英亩，用的是两个品种。一是生长快的蒙特雷松，特适合造纸浆和纸；二是生长较慢的北美黄杉，供制作优质木料用。头数十年间栽的树为

20 世纪 70 年代造纸厂的发展创造了良机。智利在出口木制品的同时还向一些国家出售预制板房。1970 年林业产品出口总值只有 4 200 万美元，到 1989 年达到了 7.84 亿美元。农、林、渔各业的繁荣兴旺使智利的外贸形势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出口总值从 1974 年的 22 亿美元增加到了 1989 年的 81 亿美元，出口的物品中以新产品为主。皮诺切特的经济班子成功地达到了使外贸多样化的目标，从而克服了长期以来对铜的依赖。

五、工人阶级

军事执政委员会虽然公开宣称不以政治为转移、要为全体智利人谋福祉而治国理政，但很快就颁布了劳工法，撕下了这一不偏不倚的假面具。像铜矿工人这样的一些工人曾反对过人民团结阵线，执政委员会就视其为盟友；而大多数工人曾支持过人民团结阵线，执政委员会就视其为敌人。为了打击这些工人，执政委员会下令禁止政治活动、解散激进的工会组织，想以此肃清共产党和社会党在劳工运动中的影响。资方不顾先前的合同随意开除劳工积极分子、解雇工人时，执政委员会不加阻止。

新自由主义经济班子 1975 年接手后声称要消除对劳务市场的“垄断”。军事执政委员会和总统皮诺切特发布了一系列有违 1931 年劳工法许多规定的法令，以控制劳工。1978 年，任劳工部长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何塞·皮涅拉颁布一部新劳工法。该法虽说认可了劳工组织工会、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但废止了只雇用工会会员的制度、规定罢工不得超过 60 天并允许雇主雇用替补人手，还撤销了劳工法院，允许雇主随意解雇工人，规定只给那些连续劳动 12 小时或超过 12 小时的工人支付加班费。新法还支持雇主将工人转雇他人，以避免对其直接承担责任。

197

皮涅拉说是要实施一种自由市场劳务制，其实是要削弱劳工组织和葬送集体谈判。政府也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成功地将工会会员人数从 1973 年的高达 65 万人减到了 1981 年的 40 万人。1981 年以后工会

会员人数则缓慢增加，1988 年达到了 42.5 万人。要求恢复民主的运动期间，工会会员人数又一下增加到了 60 万人。工会会员人数虽说接近了 20 世纪 70 年代初的水平，但要获得 20 年前享有的那些权利和保障，尚面临着重重障碍。

工人们最困难的时期是政府实施弗里德曼的"休克疗法"那会儿。失业率从 1973 年的 4.8% 猛升至 1975 年的 14.5%；与此同时，经济紧缩了 13%。为了缓解困境，政府实施"最低报酬就业"计划，提供了公共服务就业岗位。政府原想这些报酬低的工作没什么人肯干，但凡有其他就业机会，工人就会走人。然而 1976 年工作奇缺，有 15 万人争抢这最低报酬的活干，第二年争抢的人数增至 18.5 万；1977 年以后经济形势好转，争抢的人数才大幅减少。

六、中产阶级

大多数工人支持人民团结阵线，而中产阶级正好相反。许多中产阶级分子参加了空锅游行、全国大罢工和其他抵制活动。因此军人接管政权后，中产阶级中的大多数人都松了一口气。年龄稍长、具有怀旧情结的一些智利人设想新政府会像卡洛斯·伊瓦涅斯政府那样行事，他们似乎忘了他那届总统任内的一些经济困境。起初，中产阶级中的大多数人对军队出重拳维持社会秩序表示欢迎。前几年不断的冲突结束后，为了局势平定下来丧失自由似乎是应该付出的代价。许多人不愿相信外国报刊报道的发生在国家体育场的那些暴行。他们认为外国记者都是些国际左派阴谋集团利用的工具。国际教会团体谴责智利军队侵犯人权时，同一教派的智利教会往往认为这是智利军队在拯救国家、免受共产主义之害。

虽说是中产阶级中的大多数人支持民主联盟和军事政变，但该阶级中有重大影响的少数人却支持人民团结阵线。人民团结阵线的大多数领导人出身中产阶级，他们中有三人为阿连德政府内阁部长，许多政府部门负责人都获得过学位。相当多的教授和大多数公立学校教师都是人民团结阵线成员。艺术家、作家和演员们也都是阿连德的盟友。 198

1973 至 1979 年间，至少有 2.8 万智利人流亡国外，其中大多数人属于中产阶级。有人估计军政权时期有近 20 万人逃离智利，其中主要是中产阶级成员。瑞典、意大利、加拿大、英国、美国、墨西哥、委内瑞拉、澳大利亚和东欧国家都接纳了大批流亡者。一些支持阿连德的穷人翻山越岭进入阿根廷境内，但大多数支持阿连德的穷人则陪同家人留在国内艰难度日。

流亡者们在国外的日子起初不好过，特别是在东欧。他们面临着失业、语言和文化等问题，为自己的前途忧心忡忡。随着时光的流逝，一些人在其流亡地扎下了根。甚至在皮诺切特政权终结后，他们也只是回国看一看，不在智利长住了。阿连德政府和皮诺切特政府最大的悲剧可能就是家庭的离散了。另一大悲剧则是宽容的丢失。20 世纪 60 年代末之前，智利人爱同持有各种政治信仰的人讨论各种有争议的问题。可当政府以救世主自居、图谋报复、从而危机四伏时，这种开诚布公、宽容大度也就消失了。

中产阶级中的大多数人颇为天真地认为军队会很快恢复繁荣昌盛景象。1973 年 10 月军事执政委员会取消价格控制致使食品价格和租金猛涨时，他们惊呆了。然而人民团结阵线时期的黑市很快消失、商店货架上满满当当了。人们虽然没有什么钱，但误以为消费文化复兴了。而当军事执政委员会将一些地产和企业还给原先的所有者时，人们也以为私有财产又有保障了。然而一年后经济形势恶化、失业率上升时，人们开始犯疑发愁了。

接下来是天主教大学的经济学家们倡导的"休克疗法"。中产阶级中的支持者们认为私有化和削减预算只会影响到人民团结阵线提供的一些工作岗位。事实并非如此。阿连德执政的三年里一直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反人民团结阵线人士突然接到了解雇通知。例如：在公共住房署工作的帕特里西亚·戈伊科莱亚失去了工作，花了两年时间才找到另一份工作。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一直受雇于公路局的胡安·托雷斯受劝辞职。他在巴西找到了一份工作，修筑穿越亚马逊地区的公路。政府敦促他们这些人及其他许许多多的工作人员自动离职接受一笔丰

199

厚的离职金，愿意留职者有遭解雇的风险。

三年困难时期过后的1977年，期望的经济起飞开始了。失业率下降，进口、信贷增多。建筑业大发展，圣地亚哥面貌大改观，居住区高层公寓楼林立。首都郊区向安第斯山扩展，中产阶级上层居住的富人区空地上都建满了房。人们贷款到郊区买房，贷款购车上下班来往于郊区和市区。到1984年有40%以上的圣地亚哥居民利用了消费贷款。1975至1981年，全国汽车拥有量增加了一倍。军政权无疑是给中产阶级带来了一场期待已久的消费革命。军政权及其经济班子大得人心。

源源而来的进口商品有助于这一革命的持续发展，所不幸的是严重损害了本国工业。直到泡沫破裂时，智利人才意识到是国际信贷资助了这场消费革命。这阴晴变幻不定的货币市场使人们失去了田地、企业和房产。这次灾难源自全球金融市场，与社会主义无关。经过一番重大改组、经历一段相当大的困难后，到1985年经济才复苏。这导致了又一轮消费潮，这是一轮比上次更大的消费潮，但这次消费主要的支柱已不是外国信贷了。

七、权贵集团

这一集团的人差不多全都支持军事政变。他们认为军事执政委员会将会恢复他们的财产权和社会主导地位。军事执政委员会掌权的头一年，权贵集团对智利的未来提出了两种设想。一种是同业公会运动，主要领导人是天主教大学保守的法学教授海梅·古斯曼。他建议执政委员会主席皮诺切特创建一种以行会主义为准绳、由军方控制的保护民主制。另一种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所说的市场资本主义。双方争相谋求皮诺切特的支持。前者敦促军方打造政治运动，强化政府对经济的控制；而后者则敦促军方全力重建经济，放松政府对经济的控制。皮诺切特选择后者时，主张前者的一些人傻眼了。然而第一波消费潮到来时，包括海梅·古斯曼在内的许多人都转而支持新自由主义了。他们这会儿确信日益富裕的生活要比群众政治运动更能使人们转 200

而支持军政权。然而大多数人都担心恢复民主制会让基督教民主党重新掌权。他们虽然曾在民主联盟中同基督教民主党人合作过，但反对这些人支持土地改革和褫夺财产权的行径。

权贵集团的人们误以为军队会将其所有被没收的财产全都还给他们。然而政府并未归还依法没收的庄园和企业。许多贵族后裔家庭所有的地产曾世代确保其享有至高无上的社会地位，这会儿发觉寸土全无了。政府出售依法没收的土地和企业时，许多权贵集团成员无钱购买。往往是一些能够弄到贷款的金融机构的头头们成了这些土地和企业的新主人。企业家阶层形成了。企业家不仅购买了本国的企业，还收购了也在实行私有化的阿根廷、巴西、秘鲁和玻利维亚等国的企业。这一新权贵集团比起早先的权贵来要富有多了，活动范围也广多了，但主要依靠的还是外国贷款。他们也得益于军方实施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但一个潜在的重大问题是，皮诺切特政权终结后这一集团是否还能生存、发展。

八、大学改革

军政权整顿大学的第一个目标是根除马克思主义，第二个目标是将新自由主义模式应用于大学。根除马克思主义显然是场意识形态战，而用新自由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同样也是意识形态战，只是军政权的头头们否认这一点。为了达到这两个目标，首先是裁撤院系和减少招生人数，但20世纪80年代高等教育又有了全面的重大发展。

军事执政委员会首先将当时的校长免职，用军官顶替他们。新任校长解聘教授，裁撤一些院系，将其他一些院系迁至新地址。例如，他们将智利大学历史系搬进离校本部和图书馆数英里远的圣地亚哥市内的一栋老楼，而后又将其迁至圣地亚哥市东郊皇后区。他们将收藏在校本部的珍贵图书分散至位于圣地亚哥市区不同地点的院系，搬运过程中丢失了许多书籍。一些保守党人也要求限制基督教民主党对大学的影响。军事执政委员会表示赞同，遂罢免了从冲突不断的人民团结阵线执政时期即任智利大学校长的埃德加多·博宁格的职务，几乎

所有的新任校长都不再让基督教民主党人教授继续担任院长或系主任一职。

大学改革的另一内容是分拆智利大学。1973 年之前，这所历史悠久的大学一直指导着智利的大部分高等教育。智利大学在许多地区设有分校，圣地亚哥的校本部负责对各分校进行终结考核。军方为了削弱智利大学的职权，让各地分校完全自治。因此 1981 年由原来的 8 所大学变成了 17 所。例如，智利大学在特穆科的分校同国立技术大学合并成立了边疆大学。该校作为一所独立大学增加了新课程、新建了校园、制订了研究规划。该校地处马普切腹地，还扩大服务范围，促进了马普切人教育事业的发展。国家提供资金，地方上也提供资金，这就使一所新大学比原先的两个分校更具活力了。这所新大学的人们同其他新大学的人们一样这会儿觉得有了更大的自主权。然而智利大学的教职员们则担心这种自主权会使学术水平下降。

而当皮诺切特的经济班子将其新自由主义政策应用于高等教育时，发生了一场更具争议的大变革。经济班子首先终结了大学不收学费的传统做法，规定每学期学费为 1 000 美元至 2 000 美元，具体数目依学生所在学校和所学专业而定。经济班子为贫困大学生设立了奖学金，然而名额有限。经济班子接着又鼓励创办私立大学，不要国家提供资金。全国、特别是圣地亚哥一下冒出了许多新大学，到 1980 年比原先的数目多了一倍多。只有像保守的天主教神工会这样的一些少数大学与宗教有联系。大多数大学是世俗的、营利性的。这些新大学没有什么专职教授，需要时就从早已存在的正规大学聘请著名教授兼职授课。这些以营利为目的的大学入学要求比正规大学低，其中有些学校很可能会成为“文凭工厂”。

大学生人数从 1973 年的 14.6 万减少到了 1982 年的 11.8 万。但到 1989 年，新开办的大学又使大学生人数增加到了 15.3 万。新型的大专学校和技术培训中心还招收了 7.6 万中学毕业生。大专学校四年制，学生在校学习簿记学、秘书学和销售学等课程。这些学校均以营利为目的，教学质量参差不齐。技术培训中心大做广告进行宣传，但

政府并不认可，所以学生们很难评估其教学质量。对进不了大学的学202生说来，这些新型学校是受欢迎的，每三名中学毕业生中就有一人入学。到20世纪80年代末有了20余所大专学校和150多家技术培训中心。

国家对大学和培训中心的资助是整个教育预算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中学毕业生升学人数增加后，国家的这一资助就减少了。1974年国家公共教育经费的47%给了大学，到1989年这一比例下降了一多半儿，到了22%。跟美国一样，学费抵了减少的国家资助。即使有奖学金可得，工人家的孩子上大学还是越来越难了。

智利大学生有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长期传统。军事执政委员会用军官顶替学者担任大学校长。新校长们的严格控制加上经济的增长，使得公开的政治活动几近停歇。然而1982年经济崩溃时，学生们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反对军政权，抗议活动还在大学校内再次爆发。学生们举行集会，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批评军政权。天主教大学哲学系的一些学生胆更大，占领了系办公大楼，后来国民卫队冲进去才将他们赶走。

20世纪80年代，知识界的重大活动发生在大学校园外。欧、美国家政府意欲支持向民主过渡，遂开始资助独立研究机构。这些机构的成员往往都是些在本校享受不到学术自由的大学教授。拉丁美洲社会科学研究院这一机构进行民意测验，从事研究活动，出版书籍，举行研讨会，大力宣扬民主制。另一机构是红衣主教劳尔·席尔瓦·恩里克斯创办的基督教人道主义学会。该会出版发行了一份名为《替代》的杂志，支持政治变革。该会还经常举办研究班，邀请国内外学者一起探讨回归民主的道路问题。这些机构的学者都跟基督教民主党关系密切，在反对皮诺切特的运动中和向民主过渡的斗争中都起着思想指导作用。

九、公立学校改革

军政权的学龄前至12年制教育改革同大学改革一样引人注目。当

局自然是首先着手肃清课堂上的马克思主义影响，取消人民团结阵线各政党著名成员的教师资格。当局接着调整教育学院这一智利最主要的师范学校。该校原本隶属于智利大学，但当局使其成了一所独立的学校，更名为首都教育大学。起初该校师生都不愿参与任何政治活动；但跟其他大学一样，20 世纪 80 年代经济危机严重影响国民生活时，教育大学的学生们也开始走上街头示威游行了。 203

经济危机爆发两年前的 1979 年，当局对国家教育制度进行了全面改革，将公立学校下放给地方管理，由地方出资办学。为了终结教师终身制，1988 年颁布的一则法令允许地方学区解聘老教师。这些改革的目标明确，即要使地方当局对教育进行更多的管理。然而许多地方无钱办学，中央政府因而继续资助地方学区。而一些富裕的地区有钱，那儿的教师薪金就较高。中央政府也资助不收学费的私立学校。例如，1980 年圣地亚哥只有 22% 的学生就读私立学校，六年后增加到了 47%。这一事实说明：国家出资、私人管理的学校教学成绩优于那些传统公立、公办学校。四年级学生和八年级学生全国统考结果表明，私立学校学生的得分稍高，但最主要的成绩差异是富裕地区的学生与贫困地区的学生之间的差异。父母的收入和学校的财力仍是学生成绩好坏的根本。未受这些改革措施影响的一类学校是私立贵族学校；这些学校通常都是宗教组织创办、管理的，要收取高额学费。

军政权还试图使学校教师非政治化，1974 年解散了全国教师联合会。政府用教师公会接替全国教师联合会，1981 年又以智利教育工作者协会取而代之，这些组织均未能促使 20 世纪 70、80 年代的教育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这些软弱无力的组织也未能有力地为提高薪水、改善工作条件开展工作。教师的薪水太低，影响了职业操守。教室年久失修、教学设备短缺、图书太少，但军政府未能改变这一状况。

1973 至 1980 年，学龄前至 12 年制学校在校学生人数有所减少，起码是没有增加，但其后的十年间有了显著的增加。中等教育入学率历来远远低于初等教育入学率，但这十年间从占适龄人口的 53% 上升到了 75%。另一入学人数显著增加的领域是学前教育。1974 年只有 204

10.96 万儿童入学，而 1989 年人数增加到了 21.32 万。这两个领域学生人数的增加，意味着学生们在进入大学前受到了较好的、较长时间的学校教育。在技术水平较高的智利城市社会，这些成就可使更多的年轻人完全参与到国家现代化的进程。

十、社会保障

智利的社会保障制度 1973 年运转失灵，靠养老金生活的人领到的钱不够糊口。受通货膨胀影响，大多数退休工人要么找活干，要么受穷。即使如此，社会保障金在政府预算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1973 年为 20%，1980 年上升到了 50%。劳工部部长何塞·皮涅拉根据新自由主义模式计划实行社会保障私有化。按照他提出的计划，工人每月向称之为“养老金基金管理公司”的私人公司交一定份额的养老金，公司将其用于投资。工人退休时，公司根据其积存的养老金额度向工人支付养老金。在这一新制度下，雇主不用交一分钱，而工人则至少要交纳其工资所得的 10%。工人可以将其账户从这家公司转到其他公司，但不能参与公司的投资决策。公司收取年度管理费，评论家们认为收费太高。政府鼓励工人转入这一私有化制度，不愿转入新制度的工人可以继续留在原先的公共社会保障体系内。

这一私有化社会保障制度最引人关注的一点是没给工人带来任何好处，倒是公司老板可以将大笔资金用来投资谋利。智利历史上还从未有如此多的资金进入过私人资本市场。这些资金改善了智利的股市，成就了国内一些大型企业集团的组建。遗憾的是，资金管理人未能小心谨慎地进行投资活动。1982 年经济危机侵袭全国，养老基金管理公司纷纷破产，政府不得不将其接管，后来政府又将其拍卖，并制订了严格的管理规则，同时向外资开放。不久外国公司就控制了半数的养老基金管理公司。养老基金管理业出现了高度集中的现象，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两家公司控制了全国养老基金的 60% 以上。智利的这一社会保障私有化模式虽然受到全世界的高度赞赏，但主要受益者是股市、而不是工人。再者，一旦发生经济大衰退，这一模式就运转失灵。还有，

205

这一模式尚需证明其能够给大批量的退休工人支付退休金、能够一直保有支付能力。

十一、医疗保健

智利在军政府上台前就以一种双轨制实施了全民医疗保健计划。双轨制，即公费制与以雇工养老金为依托的有偿服务制。例如：享受公费医疗的孕妇要等很长时间才能看一次护士或医生，分娩时除非出现并发症，由助产士看护。产科病房会有八张或十张床，但接生和住院是免费的。而享受有偿服务的孕妇则每月看她的医生，分娩时由她的医生看护。产科病房只有两张床。然而养老金管理机构只支付总花费的一部分，其余得由产妇支付。

这一制度存在着两大问题：一是不平等问题，一是费用问题。为了解决这两大问题，军政权的经济班子实施了医疗保健改革。为了使公费制满足地方上的需求，经济班子将地方上的诊所交由市政当局管理，中央政府提供经费，让工人通过政府管理的国家公共医疗保健基金会自选医生。有近 1/4 的智利人选择了这一制度。政府还根据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创建了一种称之为“医疗预防学会”的新型私营医疗体制。雇主按月向私人公司交纳一定额度的经费，公司投资股市。雇员就诊时，学会支付部分费用，其余由就医者支付。智利私人公司占据着这一新型医疗保健业的主导地位，两家美国公司——埃特纳公司和西格纳公司——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占有 1/4 的市场份额。

这些医疗保健改革措施向许多人提供了较为完善的医疗保障，但大多数人享用的公费制尚需完善。全国性的规划使所有智利妇女的产前保健、产后保健和婴儿保健得到了改善，从而使婴儿死亡率从 1970 年的 82‰下降到了 1990 年的 15‰，亦即下降了 5 倍。成人预期寿命也有了延长，但延长的幅度不那么大，只是从 1970 年的 65 岁延长到了 1990 年的 71 岁。然而总的说来，中产阶级从国家公共医疗保健基金会和保健预防学会这两种体制中受益最多。那些负担得起的人可以享受到欧美人那样的医疗条件。受过良好教育的医生、护士和进口的

206

药品、技术使智利中产阶级的人们享受到了世界一流的医疗保健。

十二、妇女与政治

妇女在促进20世纪70年代智利的政治变革中起着较为重要的作用。然而促使她们行动的是全国性问题而不是男女平等问题。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有来自不同政党的杰出妇女领袖担任议员和部长。1949年妇女第一次获得选举权，女性选民从此越来越对选举结果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到1964年总统选举时，一半选民是妇女。她们比较倾向于中间派和右派政党的候选人，1970年总统选举也是这样。亚历山德里和托米奇所获选票半数以上源自女性选民，而阿连德所获选票中只有41%源自女性选民。三年后的议会选举中这一倾向更加明显，人民团结阵线获得不到40%的女性选民的票，而反对党则赢得了差不多60%的女性选民的票。

弗雷政府实施“民众动员”计划，争取妇女，特别是工人阶级妇女的支持。弗雷政府开办“母亲中心”，对妇女进行教育，帮她们销售自制工艺品。20世纪60年代，基督教民主党和其他各党派均未提出有关社会和性别这样的重大问题。各政党均相当注重妇女的家庭作用。人民团结阵线持有同样的理念，遂竭力通过无偿劳动、报刊宣传和分发食品等方式帮助工人阶级妇女。人民团结阵线也没有否定妇女的传统作用。

诚如20世纪60，70年代发展中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那样，妇女们在政治争论中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是社会阶级、而不是性别。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妇女通常都受过良好教育，雇用女佣操持家务、烧饭做菜、带孩子、以使自己能够离家外出干工作。她们虽然在工作中都遭受着一定程度的性别歧视，但并不打算结成多阶级联盟跟性别歧视作斗争，特别是在政治气候威胁到其阶级的生存时更是如此。

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妇女之所以反对人民团结阵线，并不是因为

207 人民团结阵线没有向她们的家庭提供丰富的消费品，而是因为人民团结阵线威胁到了她们的工作和财产。她们也以保守的、通常是天主教

的观点反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一些妇女领袖虽然在反对阿连德政权的斗争中赢得了声誉，但她们所关注的仅限于推翻阿连德。

皮诺切特任命了几位保守的妇女进入了他的政府，以对她们在抗议运动中所取得的战果表示嘉奖，但一直没有让她们担任关键性的决策职务，这些职务是要给男性技术专家的。他政府中最有名望的妇女卢西亚·希里亚特成了他老婆。她主管全国妇女秘书处以及 49 个不同的慈善团体。她主管的“母亲中心”最重要，全国有 1 万多“母亲中心”、20 多万成员。其他军人妻子和中产阶级志愿者们帮助工人阶级妇女操持家务、制作工艺品和销售农产品。她们宣扬基督教价值观，反对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名义上说“母亲中心”是非政治团体，但各政党从其成立的那天起就为了各自的政治目标对之加以利用了，军政权也不例外。卢西亚·希里亚特发动“母亲中心”的妇女们投票支持军政权筹划的重要政治活动。皮诺切特 1988 年面临公民投票决定去留时，她跟同她一道的志愿者们敦促“母亲中心”的成员参加投票支持他留任。她们的努力没有白费，妇女们投给皮诺切特的票略多于男性选民的票，他们大多反对他留任。

工人阶级妇女之所以支持皮诺切特，是因为她们不是对阿连德时期的不安全状况感到害怕、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皮诺切特政权的好处。然而还有许多工人阶级妇女的丈夫、子女和亲属被军政权逮捕、受折磨；再者，经济“休克疗法”使家庭成员失业、挨饿。家里干活的人还发现新劳工法实际上减少了工资、使工作没有了保障。

一批新型妇女领袖脱颖而出，她们支持受军政权迫害的人。1974 年被捕、失踪人员家属组织成员，帮着寻找被捕的家庭成员。她们组织引人注目的抗议活动。例如，1979 年她们用链条把自己拴在最高法院大楼的栅栏上。这些妇女中的大多数人从未参加过政治活动，但当她们家庭的完整遭到破坏时，她们成了政治活动积极分子。1978 年，妇女们举行了第一届全国妇女大会，与会人数近 300。对一个妇女团体说来，1982 年经济危机前这一不太多的与会人数应该算是个大数目了。 208

各社会阶级和政治派别的人们突然间失去了工作和财产。这一令人沮丧的形势引起了有女权运动参与的新一轮抗议运动，1983 年 8 月在国家图书馆前举行了一次激动人心的抗议活动。1983 年，妇女们还发起组织了“妇女争生存运动”，动员了一万名妇女齐聚考波利坎体育场反对军政权的政策。

十三、“否决”运动

1980 年公民投票通过的宪法明文规定：1988 年之前将不进行任何选举活动；1988 年举行公民投票决定皮诺切特是否将再执政八年。1980 年，经济在高速发展，反对党又被镇压了下去，很少有人怀疑政府会改变这一时间表。接着发生了 1982 年的经济危机，这时就连那些最最狂热地支持军政权的人也对其执政能力提出了怀疑。军政权对公民权的漠视已引起了基督教民主党和左派的强烈抗议，而这会儿国家的财政困难又引起了右派的抗议。

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由于担心左派再次上台祸害私有财产，默认了军人统治。然而 1982 年的经济危机就像人民团结阵线执政时期那样使许多人失去了财产。庄园主们曾在人民团结阵线执政时期保卫自家土地免遭农民占据，而这会儿银行则取消了他们赎取所抵押的土地的权利。他们原本对军政权心怀感激，而这会儿则感到上当受骗了。他们责怪芝加哥信徒们的信贷政策，这一政策使他们在财务方面比智利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脆弱。

支持军政权的人越来越少，反对党遂开始举行抗议活动，很快就赢得了人们的支持。反对党的领袖们决定每个月 11 日为“抗议日”，举行民众集会抗议军队夺取政权。6 月 11 日的抗议集会声势浩大，媒体据此推断下个月的抗议集会可能会迫使皮诺切特辞职。7 月 11 日的抗议活动规模宏大，使皮诺切特感到要调整一下他的内阁班子了，但他并未被吓倒。8 月 11 日，他动手回击，将全副武装的部队调至许多城市，并下令向不满的游行示威者们开枪。军队在圣地亚哥打死许多参加抗议活动的人，向日后想参加抗议活动的人传递了一则令人惊恐

的信息。皮诺切特除采取直接冲突外，还放话吓唬中产阶级分子，让他们不要同左派结盟。这一两手策略产生了短期效果，抗议运动势头减弱，皮诺切特趁机稳定经济。他还力图分化反对党，任命前民族主义党参议员塞尔希奥·奥诺弗雷·哈尔帕为内政部长。哈尔帕使军政权有了点文官气息，还会使民主联盟的支持者们牢记他曾领导过反人民团结阵线的集会游行。与此同时，卢西亚·希里亚特及其他的将军太太们到工人聚居区开展争取支持军政权的活动。

罗纳德·里根第二届任期内，华盛顿产生了一种无形的、然而较为坚定的反皮诺切特情绪。里根在批评了吉米·卡特的人权政策、捍卫了自己对独裁政权的支持后，思想大转变，认为防御共产主义的最佳手段是民主、而不是独裁。他认识到可以很好地利用人权运动和自由公开的选举解决古巴政权和尼加拉瓜的桑地诺主义政权。里根在阿根廷军队攻打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后又再次考虑了支持军政权问题。时至1985年，南美洲只剩下巴拉圭军政权和智利军政权了。对公民意识强的智利人说来，这一状况实在不光彩。而对美国说来，更为重要的是恢复了民主的南美各国政府不是中间派掌权就是保守派掌权。对20世纪60、70年代左派民主的恐惧已然消退。鉴于政治思想上的这一重大变化，皮诺切特成了美国政策的累赘，不再具有价值。因此，里根政府转而支持赞成民主的党派团体。

1985年，经济复苏，但人们已不信军政权能保障私有财产了。使大多数智利人相信民主最能确保其权利的时机成熟了。1985年，天主教会表示支持并领导了民主运动。红衣主教胡安·弗朗西斯科·弗雷斯诺联合所有非共产主义政党团体签署了“全民争取向民主过渡协议书”。皮诺切特先前曾对教会从事人权活动表示过不满，这会儿又告诫红衣主教要远离政治。1986年9月左派恐怖主义组织“马努埃尔·罗德里格斯爱国阵线”试图暗杀皮诺切特，用机枪和火箭打死五名侍卫，皮诺切特本人乘装甲车逃脱。暴力行动差点儿破坏了探求民主的进程。

1987年4月间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访问智利，和平又有了希望。

210 他称智利政府为独裁政权，要求恢复社会正义。皮诺切特不想放弃权力，但还是根据1980年宪法规定准备举行1988年的公民投票。他的官员们制定了选民登记程序，确定了对政党进行甄别的标准。他接着竭力使智利人相信：让他再任总统八年，他们肯定能过上安定、富足的生活。

为了使基督教民主党能更好地策划反对皮诺切特再任八年总统的运动，该党主席加夫列尔·巴尔德斯引退让位给帕特里西奥·艾尔文。1988年初，艾尔文通过谈判成立了一个称之为“各党一致否决联盟”的中、左政党联合组织。社会党在温和派领袖里卡多·拉戈斯的领导下于运动中起了很大作用。“各党一致否决联盟”创造性地利用电视插播广告和社区组织搞活动，形成了一种使皮诺切特的支持者们惊讶不已的宣传势头。美国和欧洲的民主组织也大力资助“否决”运动。1988年11月，民众用选票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让“各党一致否决联盟”以54%的选票赢得了胜利，皮诺切特获得42%的选票。

要在以前，皮诺切特可能会篡改选举结果，抑或干脆就拒不遵从这一结果，然而这会儿西半球大多数国家都是民主政府了。就是皮诺切特也难以抗阻这一民主大潮。而美国的政策也对军政权极为不利。尽管如此，要让一个军事领袖主动终结自己的政权是罕见的，特别是像智利那样在20世纪80年代末经济大发展的形势下那么做就更不寻常了。皮诺切特可能是过于自负了，总认为反对人民团结阵线的智利会始终在投票时对他表达感激之情。他如果真是这么想的，那就大错特错了。这会儿他必须进行1973年以来的首次公开选举。

各政党选出候选人，开始投入竞选运动。由基督教民主党、社会党和一些左派小党组成的“各党一致否决联盟”推选帕特里西奥·艾尔文为其候选人。国家复兴党和独立民主联盟这两个右派政党结盟，选定皮诺切特政府前财长埃尔南·布奇为候选人。另一右派候选人弗朗西斯科·哈维尔·埃拉苏里斯使保守派的选票发生分流，这在选举尚未进行时就确保了艾尔文的胜利。“各党一致否决联盟”还获得120个众议员席位中的72席、38个参议员席位中的22席，在参、众两院

均占大多数。

“各党一致否决联盟”早在选举前就试图说服皮诺切特修宪了。他同意增加有关民主程序的条文，但拒绝修改有利于政党结盟的议会选举制度。皮诺切特还坚持要保留他的武装部队总司令职务直到1998年，从而拒绝了总统对军队的控制。最后，皮诺切特拒绝保证在他总统任期届满前不再颁布任何法令。这一民主恢复进程虽然不那么完美，但也未妨碍帕特里西奥·艾尔文1990年3月11日举行就职大典。他成了智利17年来的首位民选总统，面临着恢复民主这一艰巨任务。

211

第十章　民主过渡时期（1990—　）

213　帕特里西奥·艾尔文1990年3月11日作为17年来首位民选总统走马上任时，接过了欣欣向荣的经济和陷于分裂的国民。落地玻璃幕墙办公大楼、高层公寓大楼、购物中心和不断扩展的郊区改变了圣地亚哥及各省会城市的面貌。各种车辆来往川流不息的公路、人挤人的超市以及货物充盈的百货公司如今已司空见惯。到巴黎和坎昆度假或到迈阿密和纽约购物旅游已不足为奇。然而还有40%的智利人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许多农村地区尚无饮用水和电力供应。而令人悲痛的则是至今尚有3 000多智利人下落下明。法院拒绝审理任何相关的案子，声称大赦令已解决了所有问题。法院从未就失踪人员和人权受到侵犯的人员进行过正式调查。

尽管许多家庭的悲伤心情尚未平息，但社会并未明显地分裂为富人和穷人这两大集团。大多数智利人的生活水平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末经济繁荣时期都是有所提高的。新政府虽说要解决社会正义问题，但也要保持经济增长。这些相互冲突的目标使社会和经济问题更加复杂。214 此时控制了政府的基督教民主党和社会党并不想进行重大变革，而是要使现行体制承担起更大的社会责任。

一、发扬民主

1. 宪法问题

1980年宪法规定了民主选出的新总统和议会执政所需遵循的法律准则。帕特里西奥·艾尔文及其后的两届总统均曾试图对1980年的宪法进行修改，删除一些不符合民主原则的关键条文，但宪法的制定者们已设定，没有保守的反对党同意，根本就动不了。保守的反对党只同意精简政府机构以提高工作效率的修正条款，反对那些对其权力构成威胁的修正条款。他们所反对的修正条款是：削除未经选举的参议员、允许总统有权任命武装部队总司令和修改选举制度。由于他们的坚决反对，这些修正条款得花上几年时间才能落实。

“各党一致否定联盟”的确是赢得了众、参两院的大多数席位，但除了民选的参议员外，宪法还授权皮诺切特和武装部队指定其余九名参议员。指定的参议员们同其他保守派参议员一道封杀了艾尔文提出的许多议案，人们对此丝毫不感到意外。他们阻挠了他试图修改劳工法、起诉被控侵犯人权的军官和改革司法制度的工作。“各党一致否定联盟”发现自己在受制于一套他人设定的、似乎难以变更的司法程序。而对那些指望新政府废除皮诺切特的那套规章制度的人说来，1980年的宪法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使这项工作做起来极其艰难。

奥古斯托·皮诺切特任武装部队总司令直到1998年。艾尔文任总统的四年间，皮诺切特一直使用恫吓手段阻挠任何可能影响到他本人或军队的措施。在议会就他儿子跟军队所做的幕后交易进行调查时，他命令圣地亚哥驻军假装暴动，智利人后来称这次军队调动为“贝雷帽哗变”（贝雷帽系士兵们戴的帽子）。为了平息皮诺切特的怒火，艾尔文同意暂停调查及其他一些要求。一些记者和政治人物公开嘲笑皮诺切特，为了消除他的怒气，政府以诽谤罪逮捕了嫌疑人。

1998年3月皮诺切特的总司令任期届满，根据宪法规定转任终身参议员。然而由于健康问题，他飞往英国接受治疗。他是参议员，享有外交豁免权，而他还相信：他跟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和英国军

215

官们的亲密友谊会确保他受到优待。智利曾在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战争期间暗中向英国提供过后勤支持，这增进了他同撒切尔和英国军官们之间的友谊。然而令他诧异、愤懑的是，接替撒切尔掌权的工党政府并不认可这种友谊。在西班牙法官控告他犯有杀害、虐待西班牙公民罪而提出引渡要求时，英国司法部将其软禁在家，对案情进行审查。

皮诺切特遭监禁时，智利正在准备进行 1999 年总统选举，国人开展了一场激烈的政治辩论。保守派候选人华全·拉文和"各党一致否决联盟"候选人里卡多·拉戈斯均未突出皮诺切特遭监禁问题，但媒体却将其当回事大做文章。拉戈斯险胜，而就在他上任前夕，英国法院做出裁决：由于皮诺切特健康不佳，不宜对他进行审讯，允许他回国。然而就是在智利他也不安全，智利法院已暂时剥夺了他享有的参议员豁免权。法庭在审理这一智利历史上最棘手的案子时引起了激烈的争论。2002 年 6 月做出了最后决定，智利最高法院跟英国学，也宣布皮诺切特不宜接受审讯。数日后皮诺切特声明放弃参议员席位，这显然是作了一番讨价还价的结果。这位将军从而放弃了威逼民选领导人的最后一个阵地，由于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他极不情愿地离开了国家政治舞台。

拉戈斯跟他的两位前任不同，似乎没有受到过皮诺切特的威胁。武装部队新总司令里卡多·伊尔苏里埃塔·卡法雷纳将军 1998 年 3 月正式就职，全心全意同文官政府进行合作。伊尔苏里埃塔花了四年时间着力使武装部队现代化，使武装部队服从文官政府的指挥。他胜利地完成了这一变革后于 2002 年 3 月下野，胡安·埃米利奥·切雷接替他任武装部队总司令。

切雷在 3 个月后发表的一个令人震惊的声明中严厉指责了 1973 年发动军事政变的那些高级将领，公开承认武装部队曾侵犯人权的事实。这一声明使他跟以前的许多战友疏远了，但却表明了军队在清除全国性的侵权行为方面勇于承担责任的决心。

2003 年 6 月，保守派跟"各党一致否决联盟"一道共同修订了宪

法。他们同意删除军队有权维护智利民主的条款，代之以所有国家机构都必须遵从法规的条文。就在即将完成向民主过渡的当口儿，经济形势的不断恶化和保守政治运动的重新抬头向拉戈斯提出了新挑战。而他所面临的最大麻烦或许是基督教民主党提出的要挟，即如果社会党不做出重大让步，该党将退出“各党一致否决联盟”。 216

2. *发展变化的政治活动*

随着20世纪90年代民主的回归，许多从前领导抗议活动的人都成了议会议员和内阁部长。他们很快就放弃了游行示威和罢工活动，力图在体制内进行变革。就是那些年纪不大的领导人也具有相当深的阅历。他们大多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重要政治人物的家庭。例如：爱德华多·弗雷的女儿伊雷内成了参议院领袖；儿子爱德华多·弗雷·鲁伊斯—塔格莱当上了总统（1994—2000）。帕特里西奥·艾尔文的女儿马里亚娜在拉戈斯政府掌权期间主持教育部工作。奥兰多·莱特列尔的儿子费利佩赢得了众议员席位。里卡多·拉戈斯2002年任命前空军将领阿尔贝托·巴切莱特的女儿米歇尔·巴切莱特为国防部长；她成了首位担任这一职务的女性。同样引人瞩目的是，2003年前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的女儿伊莎贝尔·阿连德当选为众议院议长。智利著名政治家家族成员世代为官不足为奇，但女儿们接父亲的班从政尚属首次。

选举运动跟从前完全一样。附有所属政党首字母组合词的候选人海报贴满了墙壁和路灯杆。电视和电台不断高声播送着拜票顺口溜和歌曲。游行集会上，忠实的支持者们纷纷登台发表激动人心的讲话，不断高呼口号。报刊发表政治评论文章，向选民们阐述相关问题和选举策略。人们在休息喝咖啡、用餐时无不争说候选人的优缺点及其出身背景。民主遭长期遏抑获释后，政治活动使每个人都参与了全国性大辩论。

20世纪90年代里，政治领域发生了大变化，同前军政权沆瀣一气的右翼保守派气势不再，以“各党一致否决联盟”为代表的中间温和派声威大震。极左的共产党和极右的独立民主联盟均以偏激的观点

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但未能引来多少追随者。20 世纪 90 年代里一直有 50% 以上的选民支持“各党一致否决联盟”，保守同盟的支持率不到 40%，而共产党得票率只有近 5%。

217 然而 1999 年选举形势开始发生变化。“各党一致否决联盟”在首轮总统选举中得票率在 50% 以下，第二轮投票中千方百计得到了 51% 多一点点的选票，使拉戈斯勉强赢得了胜利。拉戈斯失去了 3% 女性选民的票；男性选民多给了他 9% 的票，从而使他赢得了胜利。“各党一致否决联盟”掌权十年后，选民们对其所怀有的热情已然消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亚洲经济危机使失业率上升至近 10% 所致。

2000 年美国和欧洲又开始了经济危机，进一步使“各党一致否决联盟”失去了收引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在 2001 年选举中出现的选民两极分化这一令人不安的趋势上。中间派的得票率下降，而右派和左派的得票率则上升。基督教民主党在发现独立民主联盟这会儿已成了智利第一大党时，至为震惊。导致两极分化的原因一定程度上可归之于经济因素。然而智利没有得到解决的历史问题则不断加剧公众的争论，使人们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后看。

不断揭露出的皮诺切特政权暗杀、虐囚罪行使智利分裂成了敌对阵营。在西班牙要从英国引渡皮诺切特的问题上也出现了尖锐的意见分歧。那些要求审讯——即使由外国执行——的人普遍支持西班牙的行动。而那些狂热地支持皮诺切特的保守派则在英国和西班牙驻圣地亚哥使馆门前进行抗议，要求撤销对他的起诉。右派和左派均利用这一问题争取各自的支持者，而夹在这两大敌对派别之间的基督教民主党则希望息事宁人、避开这一问题。

另一令人不安的选举趋势是：智利人在起初的选举热消退后，都不那么想参加投票了。与 1993 年的选举相比，1996 年选举的参加投票人数减少了将近 100 万，1997 年的人数又少了 60 万。然而 1999 年的总统选举却引起了公众的关注，参加投票的人数比 1997 年增加了 130 万。可 2001 年的议会选举又出现了投票人数下降的趋势，比 1999 年少了 85 万。人们根据这一情势有了一个重大发现，即参加总统选举

的选民最多，其次是市政选举，最后是议会选举。

随着拥有电视机和收音机人数的增加，媒体跟公众的距离比以前近多了。媒体很可能是投票人数下降的部分问题所在，这是因为各政党花大钱做广告、不再下工夫从事政治社交活动了。后皮诺切特政治制度（the post-Pinochet political system）也使选民们得到的直接好处减少了。1973 年前高度影响着政治活动开展的庇护制（the patronage system）仍在为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分子提供就业机会，但工人阶级群众则很少得到这样的机会。私有化灭掉了政治家们可以用来酬谢工人的公有企业。而政府这会儿强调的是经济管理，所关注的是有关就业岗位增加的统计资料和数字，但这些数字激发不起一些选民的积极性。智利的消费文化越来越像欧洲和美国的消费文化，选民们的冷漠态度也就与那些地方的状况别无二致了。政治家的棱角已不再分明；他们成了制度的守成人。在像 2001 年那样的经济严重衰退时期，政党开始考虑变革事宜，但参加投票的选民人数并未回升。公民已不再是选民，已变成了消费者，这一令人不安的状况似乎也出现在了智利。

218

3. 知识界动态

20 世纪 80 年代就国家问题进行公开辩论之风再起，然而直到 90 年代政府才真正恢复新闻自由和大学里的百家争鸣。各政治派别和知识分子团体都竞相利用这一重新获得的自由，通过对国家的过去进行饱含激情的描述以争取对其事业的支持。左派的观点越来越受大学生们的欢迎，他们推选左派的头头领导大学生联合会。大学生们所关心的是诸如奖学金的提供和获取这样的一些问题。2002 年 4 月奖学金问题曾引起过一次抗议活动，并同警察发生了冲突。学生运动的目标跟 20 世纪 60 年代大大不同了，不再是要摧毁旧制度，而是要求进行些许改良。

知识界对军队的批判集中在揭露军政权那不为人知的过去和阶级不平等上。人民团结阵线执政时期驻古巴的大使豪尔赫·爱德华兹在其小说《木头人》中揭露了权贵集团在推翻阿连德时所起的作用。军事政变期间过世的诺贝尔奖得主、诗人巴勃罗·聂鲁达临终前对军事

执政委员会进行了指摘。为他送葬的队伍演变成了反对军事政变的示威游行。安东尼奥·斯卡尔梅塔在《坚忍不拔》一书中所描绘的聂鲁达不再是具有反叛精神的诗人，而成了一个极为多情的人。根据此书改编的获奖电影《邮递员》广为人知。伊萨贝尔·阿连德在《幽灵屋》中揭示了根深蒂固的家族紧张关系和社会的不平等之所以引起暴力的缘由。记者帕特里西亚·维尔杜戈在最近出版的《美洲豹之爪

219 击》(英文版书名为《智利、皮诺切特和死亡之旅》)一书中揭露了军队野蛮的暗杀行动。社会学家托马斯·莫利安在《今日智利：对一则神话的剖析》中将攻击矛头直指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非正义性。

支持军政权的保守派担心这些著作会壮大左派力量，再度引起1973年前的那种社会冲突。为了替军政权的行为辩护，皮诺切特和其他一些人发表了他们对过去的看法。皮诺切特在其三卷本巨著中一再强调武装部队拯救国家免遭马克思主义之害的功劳。他的内政部长塞尔希奥·费尔南德斯在其《我为民主而战》中说他是在尽力开创一个切实可行的政治制度。虽然有些人不得不承认军队的确做得有点过分，但拉法埃尔·瓦尔迪维埃索犹在其《拯救记事：智利1973—1988》中声称：军队只有用暴力才能避免内战。

报刊方面，像《信使报》和《第三者报》这样一些传统报纸在全国拥有大量读者，但像《时代》这样一些评论性出版物提出了比较公允的观点。由隶属于基督教民主党的记者们负责、得到天主教会支持的《时代》发表了一些评论侵犯人权和经济不平等的证据充分的文章。这些文章与“各党一致否决联盟”的政治改革任务相契合，起到了相辅相成的作用。

20世纪90年代末面世的讽刺杂志《门诊部》用虚构的访谈和出色的幽默着重讥讽国民的恶习和劣迹。与此同时，在线杂志《公示》则毫不客气地讽刺形形色色的公众人物。

学术刊物虽说不那么耸动视听，但也有助于争取对向民主过渡的支持。政府对研究工作的资助可使学者们写出强化政治中心的著作。克里斯蒂安·加斯穆里的两卷本传记《爱德华多·弗雷·蒙塔尔瓦及

其时代》对基督教民主党人首届总统任期的业绩作了评述。帕梅拉·孔斯塔布莱和阿图罗·瓦伦苏埃拉在《分裂的国家：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中对皮诺切特政权制造的不和进行了透彻的分析，而伊丽莎白·利拉和布赖恩·洛弗曼则在《别让死灰复燃》中强调了智利的止息政争、握手言和的传统。

学者们通盘考虑了阿连德时期和皮诺切特时期大起大落的经济发展情势后，试图客观、历史地对智利经济发展进行一下透析。阿尔曼多·德·拉蒙与何塞·马努埃尔·拉腊因在《智利经济生活之源，1659—1808》中对殖民地时期的经济发展走向进行了颇有新意的研究。爱德华多·卡维埃雷斯在《智利贸易与英国商人，1820—1880》中以同样的研究方法对外贸进行了考察。胡安·里卡多·库尤姆健、雷内·米利亚尔与何塞菲娜·托科纳尔在《圣地亚哥股市史，1893—1993》中对国家发展与股市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这些著作及其他一些著作对经济政策进行了有根有据的、平等切磋式的探讨。 220

4. 成就

“各党一致否决联盟”掌权后有项特定的立法任务要完成，这项任务比具体的工作计划更重要，那就是要赢得对民主制度的长期支持。许多保守的智利人认为只有独裁统治才能确保长期稳定和发展。他们就是1989年公民投票时赞成皮诺切特再统治八年的那43%的选民。“各党一致否决联盟”能使他们相信民主政治比独裁统治更有好处吗？该联盟也许能争取到他们中的一些人，以壮大政治领域内中间派群体。

另一大问题是如何使占人口大部分的智利穷人享受到消费革命的成果。修改劳工法以加强集体谈判，将有助于工资的提高。支持劳工的措施不仅将改善工人们的福利待遇，也可使工会不再支持极左派。对劳工法进行重大修改的问题是：右派在议会中拥有足够多的票数确保修正案得不到通过。因此“各党一致否决联盟”必须通过谈判求得一致。

“各党一致否决联盟”的经济班子同先前的班子一样善于把握经济，不仅取得了最大限度的经济增长，同时也避免了通货膨胀。20世

纪 9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经济增长率等于抑或高于军政权统治时期那些最佳年份的增长率。改善极其贫困者生活状况的规划对智利各地区均有巨大影响。政府出资在乡村地区修建饮用水、电力、道路和电话设施。身处现代化边缘的人们瞬间有了自来水和彩电。

“各党一致否决联盟”的领袖们这么干的时候，不能再用传统的方式动员工人群众了。他们必须用提高生活水平和加强社会服务的方式争取工人阶级的支持。他们在这方面也做得很成功，但结果却是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他们的选票没有什么价值了。

对那些将不能从劳工组织的发展壮大中得到好处的工人，“各党221 一致否决联盟”力图部分恢复福利国家的一些做法以对他们进行保护。政府的经济学家们认为必须小心谨慎地配置资源，以免高速运转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减下速度来。他们坚持预算平衡原则，采用增加税收、而非赤字开支的方式实施福利计划。历任财政部长拒不赞同以通货膨胀为代价的民众主义消费方式。

“各党一致否决联盟”对企业界采取了重要举措，即继续执行军政权的私有化政策，变卖像供水、污水处理和供电这样的一些公用事业单位，鼓励外国资本投资。西班牙资本收购了智利银行和公用事业单位的大量股票，而美国和日本的资本则开办新采矿合资公司。很难判定这些投资的长期后果会是什么样子，特别是这些投资使人想起 20 世纪 60 年代之前外资在智利占有主宰地位时就更难做出判定了。这些投资能在多大程度上将企业所获利润用于扩大再生产、提供就业机会而不是调拨回本国？像乌戈·法齐奥·里加齐所著《智利珍贵的财富现状录》这样的一些书籍提醒智利人关注大型合资企业打入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程度。这些跨国公司使国家政治景象改观的程度更不明朗。

用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读写能力和工资收入这样一些指标来衡量，智利的人文发展领先于其他拉丁美洲国家。智利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也领先于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妇女。为了进一步提高她们的社会地位，艾尔文成立了部级“全国妇女服务局”。拉戈斯任命多位女性担当政府要职。2002 年，他的 16 名内阁成员中有 5 人是女性。她

们努力为妇女寻求经济发展良机、争取法律平等。弗雷·鲁易斯—塔格莱和拉戈斯两届政府力促议会通过离婚法，以取消当时对合法分居的限制，但天主教会向基督教民主党大力施压，要其议员投票反对该议案。

跟其他许多国家一样，20 世纪 90 年代对妇女施暴事件有所增加，据报道强奸发案率从 9.61‰上升到了 10.63‰。然而这一发案率只是美国的 1/3。非婚生儿也持续增多。20 世纪 90 年代里像谋杀和绑架这样一些其他的罪行指标下降了。然而汽车失窃和入室盗窃案件持续上升，促使人们为其车辆和住宅安上更加保险的装置。房主们为了保护 222 自家财产，联手雇用居住小区保安。然而许多人家搬进了高层公寓楼，认为那儿比私家住宅更安全。不管怎么说，智利人还是幸运的，威胁着许多拉丁美洲大城市文明社会的实施极端暴力行为的准军事人员和毒品贩子没有出现在圣地亚哥、康塞普西翁和瓦尔帕莱索。人口的增长也没超过经济的增长。新就业机会和福利计划确然使智利的贫困线下降了。

5. 人权

“各党一致否决联盟”在向民主过渡时期所面临的一个最最棘手的问题是处理军事统治 17 年间发生的侵犯人权案件。南美其他国家试图解决军事统治时期侵犯人权事件时所呈现的令人沮丧的情景表明，将会有重重困难在前头。20 世纪 80 年代阿根廷、乌拉圭和巴西等国的武装部队将政府交给文官时，竭力设限阻挠对其罪责的追究。只有阿根廷成功地起诉了几名军事执政委员会的成员，那主要还是因为武装部队在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战争中遭到了不光彩的失败。

智利的情况不一样。时至 1990 年，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成效可观，西半球其他一些国家也开始采用这一模式。许多智利人仍在意识形态和经济政策方面坚定地支持着军方。就连那些反对军人统治的基督教民主党领导人起初也是支持军事政变的。这些领导人必须小心行事，军方可能掌握着相关的机密情报。因此，文人政治家们在民主过渡时期竭力使谋求正义跟不疏远军方这两者结合起来行事。

皮诺切特预计将来某个时候文人政权会追究军方侵犯人权的责任，遂于 1978 年颁布法令，大赦所有在 1973 年 9 月 11 日至 1978 年 3 月 10 日期间犯有罪行的人。最高法院后来确认了这一法令的合宪性。这更增加了起诉侵犯人权案的难度，因为想修改宪法重建法律程序并非易事。再者，皮诺切特宣称：文人政治家们如果敢“碰他的人”，不会有好果子吃。因此，为了防止再次发生军事干涉事件，文人政治家们都在既定的框框内小心行事。

皮诺切特政权时期，有近 3 000 智利人被处决或失踪，许多人的 223 尸体至今下落不明。另有数千人遭逮捕受酷刑。最高法院决定：政府有权对 1978 年大赦令所免除的罪责进行调查，但无权起诉。为了进行调查，议会成立了“全国真相、和解委员会”，并授权它在有限的九个月内对侵犯人权事件进行调查。阿连德时期的驻外大使、长期担任激进党领袖的劳尔·里蒂格被任命为八人委员会主席。他那尽心尽责的领导作风很快就使人们称该委员会为“里蒂格委员会”而不再用其正式名称了。

里蒂格委员会请求凡知道有人被杀害、受酷刑或曾遭受其他方式虐待的人向其提供证据。数千公民提供了证据，这些证据成了该委员会 1991 年 3 月提出的 2 000 页报告的主要内容。报告所陈述的有关暗杀、酷刑和失踪等内容促使总统艾尔文向所有受害者的家人公开道歉，并要求军方承认给受害者及其家人所造成的痛苦。皮诺切特及其他军官均未表示歉意，却声称他们是执行任务。

温和派想和解，但过激派不干。1991 年初发生的两起政治暗杀事件表明，复仇的欲望依然十分强烈。3 月，一左派团体枪杀了一名军医，据信此人曾参与政治迫害活动。一个月后，马努埃尔·罗德里格斯爱国阵线在天主教大学附近枪杀了 1980 年宪法起草人法学教授海梅·古斯曼。艾尔文迅速做出反应，成立公共安全局，向智利人保证他决不容忍报复性的暴力行为。与暗杀事件关系密切的共产党和马努埃尔·罗德里格斯爱国阵线由于使用暴力受到了相当大的压力，马努埃尔·罗德里格斯爱国阵线内的一部分人放下武器、声明支持民主

进程。

政府为了在制度框架内促进正义事业的发展，继里蒂格委员会后又成立了全国恢复和解协进会。这一机构有两项任务：一是查清侵犯人权的责任人；二是向受害人或其亲属提供若干补偿金。总统爱德华多·弗雷·鲁易斯—塔格莱为了鼓励军事人员提供证据，于1994年承诺不起诉那些作证的人。的确是有些人站出来揭发了有关酷刑和暗杀的新证据。最引人注目的揭发之一是国家情报局的一名前雇员的揭发：他不仅供认自己杀害了劳工领袖图卡佩尔·希门内斯，还指名道姓地说出了命令他下手的指挥官们。

224

新揭发出的一些事实促使一些政治家和记者指摘军方和法官们阻挠正义的伸张。政府阻止这些批评流传，没收可能引起敌对情绪的出版物，竭力对不满的军事领袖们进行绥靖。例如，1996年有位法官判处共产党领袖格拉迪斯·马林入狱两天，说她诽谤了皮诺切特。两年后，政府查禁了亚历杭德拉·马图斯编写的《智利正义黑皮书》，因为该书严厉谴责了武装部队和法官们。

政府在越来越大的公众压力下，不再那么坚持对军人免于起诉了。1995年，国家情报局前局长马努埃尔·孔特雷拉斯因其对奥兰多·莱特列尔和罗尼·莫菲特遭暗杀负有责任被判入狱七年。三年后，孔特雷拉斯宣称皮诺切特直接负责国家情报局的活动。法官于是起诉皮诺切特，但随后又认为他健康状况欠佳不宜出庭受审。2003年总统拉戈斯提议对揭发其指挥官在皮诺切特政权时期侵犯人权的下级军事人员免于起诉时，再次引发了一场大辩论。

侵犯人权案的调查扩展到了国外，就连一些前尼克松政府官员也可能负有责任，他们被指控曾支持过20世纪70年代初智利的暴力行动。最引人瞩目者当是雷内·施奈德将军的后人们提出的案子。他们对亨利·基辛格、里查德·赫尔姆斯和其他一些尼克松政府官员提出民事诉讼，要求赔偿300万美元，认为这些人对施奈德1970年被暗杀负有责任。查尔斯·霍曼的遗孀乔伊斯·霍曼提出了类似的诉讼，指控尼克松政府的官员们在“神鹰行动”中同南美军队的将领们合作清

除左派人士。这些诉讼案提出了一个涉及国际法新准则的问题。西方主要领导人可不可以因其在冷战时期秘密行动中所起的作用遭起诉?

二、经济

1. 微调

1990 年帕特里西奥·艾尔文接管经济时，智利有着一个高增长率，而通货膨胀率亦处高位。他所属的政党联盟在竞选运动中着重指出：尽管经济增长了，但仍有差不多 40% 的智利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会儿他成了总统，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不损害经济的积极面的同时改善这些人的生活。他决定继续推行强调私有化和出口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同时提供就业机会、增加税收和发展公共服务业，努力降低贫困线。他的计划主要之点是用提供补贴而非提高关税的方式促进制造业的发展。制造业则承诺提供更多的、工资更高的就业机会，革新技术。

225

尽管政府有全面的考虑，但财政部长亚历杭德罗·福克斯利认为：如果国家要维持长期增长，首先得将通货膨胀率降下来。1990 年通货膨胀率超过 27%，福克斯利提高了利率、增加了税收，即使这样做可能会短期内导致增长放慢、失业人数增加也在所不惜。他蛮有把握地预言：严格的货币政策将提高储蓄率、鼓励投资和吸引外资。时至 1994 年，他的目标达到了，通货膨胀率下降到了 9% 以下。他又将进口税从 15% 降至 11%，并以有利的汇率促进出口。令人遗憾的是，他那严格的货币政策使 1989 年近 10% 的增长率降到了 1994 年的 4.2%，而失业率也稍有上升。

1994 年爱德华多·弗雷·鲁易斯—塔格莱登上总统宝座时，智利的经济形势很好。然而他那由财政部长爱德华多·阿尼纳特领导的经济班子得继续跟通货膨胀作斗争，使通货膨胀率到 2000 年降到了 4.5%。阿尼纳特跟其前任一样降低了关税，五年间从 11% 降至 6%。他还继续先前开始的私有化运动，甚至将瓦尔帕莱索港也出租给了私家公司。弗雷执政的头两年，经济增长超过 7%，但 1998 年亚洲经济

危机袭来时下降到了3.4%。翌年甚至下滑到了-1%，这是1983年以来的第一次负增长。与此同时，失业率激增至近10%。出口在智利经济中所占的比例较大，而对亚洲的出口又占总出口的近1/3，故而20世纪90年代末的“亚洲型流感”对智利的影响特别大。

2000年拉戈斯政府上台，恰逢亚洲经济正在恢复，而欧洲和北美的经济又进入了一个衰退期。2000年通货膨胀率有所上升，但拉戈斯的限制性货币政策使其在2001年又降了下来。2001年经济开始增长，但增长率不高，为2.8%，不及头十年的一半。是公用事业和生产方面的内需而非外销拉动了经济的恢复。

为了促进外贸的发展，拉戈斯跟欧盟、墨西哥和加拿大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2003年智利同美国签署并批准了经过11年谈判达成的协议。该协议2004年1月1日生效，立马降低了许多商品的关税，而农产品的关税则要分八年逐步下调。两国贸易受此影响有望在2002年88亿美元的基础上大幅增长。然而一些忧心忡忡的智利农场主则要求政府提供补贴，以使他们免受预料中的美国廉价农产品所造成的巨大冲击带来的损失。 226

早在1998年，动荡的国外市场就显示出了智利出口模式易受打击的危险性。然而2002年，阿根廷经济衰退，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也发生了危机。因此比较起来，智利的经济状况还算是相当不错的。经济学家们调整了货币政策，从而成功地化解了来自国内、外的冲击。拉戈斯拒绝用赤字开支刺激经济，但2002年他为了振兴疲软的经济，则同意下调利率。他起初提议修改劳工法，以加强工会集体谈判的影响力；但当企业界领导人声言劳工法的任何变动将影响投资时，他遂将提案束之高阁。

1990年民主已然恢复，经济学家们不再试图谋求短期的应急措施而置国家的长期繁荣于不顾。选民们给了“各党一致否决联盟”广泛的支持，这使政策制定者们得以采取严格的货币政策让通货膨胀率降下来，即使这样做会使增长下降、失业率上升也在所不惜。经济学家们制定政策时用的是技术标准，而不是根据赢得选举的需求。然而，

1999 年和 2001 年保守派联盟实力的增强可能使“各党一致否决联盟”改变了应优先考虑的问题，赢得选举的短期应急措施影响了政策的制定。

2. 采矿业

智利经济中发生的最为明显的巨大变化见诸采矿业。采铜业仍是最重要的产业，但铜已不再是主要出口品了。而私营采矿业的发展也超过了大型的国有矿山。1973 年所有大采矿公司均属国有的铜业公司，然而 20 世纪 80、90 年代复兴的大型矿山是私营新矿。埃斯孔迪达矿 1990 年开业，不久就超过丘基卡马塔矿，成了智利最大的铜矿。像迪斯普塔达矿和科利亚瓦西矿这样的一些私家新矿也增加了生产。227 美国的犹他国际公司和力拓锌公司、日本的三菱公司、日本采矿公司、加拿大的法尔孔布里奇公司和南非的英美公司等这样一些跨国公司组成合资公司开发这些矿山，这表明大大改变了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公司独大的状况。有了这些新矿，这会儿近 2/3 的产品是私家生产的。而私营矿的生产成本比铜业公司的生产成本低，这又引起了一场关于铜业公司是否也应私有化的大辩论。有关铜业公司在国际贸易中财务亏损的丑闻更使公众丧失了对国有部门的信心。

3. 制造业

智利经济坚守出口模式，许多人怀疑智利是否要专门从事原材料生产了。20 世纪 70 年代制造业的生产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时降时趋稳定，80 年代继续疲软，但在 9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工业制造业年增长达 6%，这一比例高于其他所有拉丁美洲国家（两个国家除外）。工业的增长大多发生在金属、纸浆和纸张等出口产品方面。像食品和啤酒这样的一些工业生产主要供本国消费。这些工业生产符合本国人口味的食品和饮料。尽管关税低，但这些工业的产品还是一直在本国人开办的超市商品中占有 90%。

一些经济学家断言：智利如果大力支持制造业，可能成为又一个韩国。然而智利出口的原材料有一多半根本就未经加工。1990 年只有

13%的出口物是制成品，1996 年增加到了差不多 22%。制造业可能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工资和技术，可智利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有竞争力吗？20 世纪 90 年代，智利的领导人们单方面决定下调关税，并跟一些国家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这就意味着智利将不采用保护本国制造业的亚洲策略。“各党一致否决联盟”的经济学家们决定采用加拿大（或曰斯堪的纳维亚）模式，出口自然资源，但要尽可能地加工后再出口。他们靠“出口促进会”促进出口，提高智利基础设施、技术、工人培训和销售的质量，认为这些方面质量的提高就能促进制造业的发展。十分引人注目的是，中、小企业比大企业更重视制成品的出口，它们在南美洲的南锥体共同市场各国找到了最佳市场。经济学家们尚需设法促使大企业向欧洲和美国出口智利的商品。　228

4. 信息技术

时至 2000 年，每十个智利人中就有一个人拥有电脑。政府在大、中、小学校对信息技术进行了大量投资，2000 年国家花费 11 亿美元进口计算机产品。为了帮助不那么富裕的智利人，拉戈斯总统支持发展全国信息中心网络，使人们能免费上网。2000 年 11 月他同微软总裁比尔·盖茨会晤时签署了许多软件协议。智利已是拉丁美洲软件主要出口国，这些协议旨在加强这一地位。

数字经济收入以超过 25% 的年率在增加，2001 年为 57 亿美元，2002 年增至 77 亿美元。电子商务是发展最快的部门，2001 年交易额达 15 亿美元。为了加块电子商务的发展，2002 年拉戈斯政府制定了一个六阶段发展规划。最重要的是，政府制定了法律准则，以保障个人通过互联网谈判达成的契约。政府还倡导私人公司跟政府间的线上交流。为了鼓励智利的中、小企业通过互联网将产品直接销往欧洲市场，政府于 2002 年在其与欧盟签署的贸易协定中规定了这方面的交易指标。

5. 林业

原木、木材和纸浆的出口值迅速增长，1990 年为 8.7 亿美元，2000 年增至 23 亿美元。即使世界上物价持续下跌，2001 年的利

润减少了10%，但这一出口活动所获得的收益仍占智利出口总值的13%。如果少出口原材料、多出口木制品和纸张，就能增加收益和就业岗位；但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是不大可能做到的。

造林是优先考虑的事，2000年智利人植树20余万英亩。这些树的基因均未进行异变，真福生物技术公司打算改变这一状况。真福公司主管着一家由美国、加拿大和智利等国公司组建的合资公司，用基因剪接和克隆技术培育了一种抗病虫害的拉迪亚塔松。此外，该公司还同加拿大塞尔福公司合作，引进了一种纤维素含量高达20%的拉迪亚塔松。真福公司认为，这些引进的松树一旦在智利栽植，两个新品种的松树将会增加林木生产率。看来，该公司要单一栽植拉迪亚塔松了，这种松树已占智利植树造林所用树苗的80%。

229

智利营造商用林时栽植新品种、忽视本土品种的做法很成问题。企业和政府都不栽植本土苗木，但林业部门加强了对国家公园的管理工作，限制农民用火清除天然林木。就这样，1998年长期干旱时还是有20万英亩的天然林被大火烧毁。生态学家们越来越担心国家森林的状况了；他们一致反对美国“特里利厄姆”林木产品公司在南方地区大规模砍伐林木的计划。智利“绿色和平”组织发表了一系列引起公众关注的抗议书，力图阻止这一计划的实施。

6. 农业

智利农业的亮点是水果生产的持续发展。时至1998年，水果出口的价值已占智利出口总值的12%。以食用葡萄出口为主，1984年为17.8万吨，1996年增至51.3万吨。由于生产过剩导致世界葡萄价格下跌15%，20世纪90年代中期暂停了种植。像桃和猕猴桃等其他一些水果价格的下跌有时会超过40%。加利福尼亚的葡萄种植园主们及俄勒冈的梨和草莓种植者们抗议进口的智利水果以低于成本价出售。葡萄价格稳定后，农民们于1998年开始栽种。为了促进葡萄业的发展，2003年政府在肥沃的科尔查瓜谷地实施了新灌溉工程。与此同时，农民们使其葡萄园的生产能力提高到了接近美国的水平。智利跟欧盟签署的贸易协定为智利水果出口商开拓了更多的市场，并确定了

处理贸易纠纷的方法。智利跟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签署的贸易协定也有利于智利水果出口商。

除了新鲜水果外，智利还是个公认的葡萄酒出口大国。像孔查伊托罗、圣卡罗利纳和圣佩德罗这样的品牌常见于世界各地的超市。葡萄酒业发达的另一标志是：一些智利公司在阿根廷购置了葡萄园；一些美国和西班牙的公司跟智利的葡萄园联合组建了合资公司。

低关税和强推销有助于水果种植者，却又害了像谷物这样一些传统农作物的生产者。南锥体共同市场贸易协定下调了对阿根廷谷物征收的关税，致使阿根廷的谷物在智利市场上比较便宜。20 世纪 90 年代末，南部地区的农民对这一协定造成的影响提出了抗议，要求政府支持他们的产业。议会临时决定提高关税。南部地区有些农民悲观失望，遂不再种庄稼，而在其农田里植上了树。政府如果不愿像别的国家那样提供谷物价格补贴的话，南方地区的农民们就不得不将其土地辟为葡萄园和果园，抑或种植其他新作物了。 230

智利农业的另一负面现象是农民人数的减少。世界银行这会儿鼓励这一发展进程，强调大型农场在全球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地位。根据它的估算，栽种食用葡萄和生产优质出口水果的成本大约每英亩 1.4 万美元。小农难以弄到信贷从事这样的投资，只有大型农场才能做到这一点，这就是它鼓励这一发展进程的理论根据。小农竞争失败，遂将土地出售，移居城市。农业工人也离开农村，农村受雇人数从 1992 年的 90.2 万减少到了 1997 年的 81.6 万。由于法律的限制，留在农场上的工人们很难组织起来，农村依然十分贫困也就不足为奇了。

7. 渔业

20 世纪 90 年代里，智利坚持发展鱼类和海产品的出口，出口值近 15 亿美元，占出口总值的 11% 以上。捕获的鱼有国产鱼，也有养鱼场饲养的异域鱼，主要供人食用，喂动物的很少。1999 年鲜鱼和冷冻鱼占鱼类产品出口的 60%，鱼罐头和加工过的鱼及其他海产品约占 24%，鱼粉仅占 16%。仅鲑鱼的出口值即达 62 500 万美元。特别重要的是亚洲市场，智利主要在那儿销售日本鲑和新鲜鳟鱼。尽管有了这

么大的发展，但仍有一层阴影笼罩在渔业的上空。美国卫生官员们担心养鱼场饲养的智利鲑含有杀虫剂残余。海洋渔场经受得起如此大量的捕捞吗？养鱼会影响湖水和海湾的水质吗？环境保护主义者们和旅游业要求渔业部门负起更大的责任，是可以理解的。

8. 电信业

智利的电信业有了大发展，这主要是因为放松了管制。1982 年电信总法在 1987、1994 和 1997 年经过修改后为自由使用电信奠定了基础。然而智利电话公司通过联接其系统的价格政策全力阻止了竞争。1996 年，三家最大的公司收入总计逾 20 亿美元。系统是全数字式的，有相互竞争的有线电视网和手机网。正着手准备将宽带互联网接通智利企业和家庭。手机很普及、很方便，相互竞争的公司在购物中心和通过媒体吸引着智利人。为了向农业地区提供公用电话服务和向公立学校和大学提供互联网服务，政府设立了特别基金。政府不想让一个人在这次电信革命中落伍。

231

三、社会阶级

1. 工人

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起至 9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智利工人的就业机会越来越多。1985 年有工作的智利人近 360 万，到 1998 年增至 540 万。与此同时，失业率从近 12% 下降到了 5.3%。20 世纪 80 年代末工会组织迅速发展，但 90 年代慢了下来。十年间就业人数增加了 90 万，而工会会员人数增加不到 6 万人。皮诺切特政府加诸入会和集体谈判的限制规定仍在抑制着工会组织的发展。连续三届民主政权曾试图修正这种规定，但均未能如愿。

“各党一致否决联盟”的领袖们修改宪法的努力受挫后，遂着重运用经济的不断增长、而非强调利用集体谈判来增加工人的收入。工人们默认这一方式所得到的回报是：十年间国家经济的发展使实际工资增加了逾 25%。

1990年以来收入的增长加上社会开支的增加，使贫困率从约占总人口数的40%下降到了20%。从1989年到1995年，社会开支增加了50%。公共住宅建设、电力和饮用水的发展改善了穷人的生活。

跟大多数发达国家一样，从事服务性工作的智利人人数最多。20世纪90年代，从事服务性工作的人数从占人口总数的55%增加到了59%，从事工业生产活动的人数一直是24%，而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人数从19%下降到了12%。20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建筑业大发展，提供了许多就业机会，但1998年开始的经济紧缩使这一领域受到了最大冲击。规划中的新商场和工业园区建设以及政府打算到2004年拿出150亿美元修建机场、公路、监狱和学校的意向，将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232

2. 中产阶级

20世纪80、90年代的富足导致了一场消费革命，这场消费革命特别有益于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人们买房、购车、享用精制食品。他们到商场购物，通过自动取款机从银行取款，大多在海滨度假胜地或南方湖区有第二个家。他们如果在南方有栋小木屋，不再只是夏天去用一用了，现在每天都有多趟航班往来，他们可以躲到那儿度个长长的周末了。然而1999年经济开始停滞时，信用卡债务和其他便利贷款就使人们被债务托收机构追债、被取消抵押物回赎权了。

即使身处经济衰退期，电缆电报公司仍大力在中产阶级居住区铺线以备日后上宽带。有线电视、互联网拨号线和电子游戏已将电子学带到了家家户户。幸好年青人能拔掉插头去踢球或晚上到迪斯科舞厅去跳舞。教育方面，学生们有了更多的选择。除了一些新开办的中专和大专外，许多大学本科毕业生还到欧洲或美国攻读学位。例如，获得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或威斯康星大学商学院或经济学院学位证书的学生人数越来越多。

专业人员工作日大部分时间是在电脑前度过的。他们向海内外的同事发送电子邮件、访问国际数据库。学术界和其他领域的研究工作越来越方便。图书馆藏书库、政府服务部门和公司档案室可以在线联

系。参加美国或欧洲召开的研讨会、向研讨会提交论文是专业人士期求的事。智利中产阶级的文化快速跟欧美文化趋同。尽管跟远东的贸易占了国家整个贸易的1/3，但由于语言障碍和文化隔阂却没有发生类似现象。

跟先进的国家一样，生活的快节奏使智利人的生活趋于紧张。在家跟家人一道用午餐的传统现在已难以维系。工作到很晚，八九点钟才能回到家，边看电视边就餐，这在现今已不足为奇。许多企业巨头定期来往于圣地亚哥与省会或南美其他国家或欧洲或美国之间。

233

经济富足改变了智利中产阶级，但智利中产阶级仍保留着一些特性。在高档超市里，不仅能在食品制作区买到冷藏的比萨饼和汉堡包，也能够买到嫩玉米糕、海鲜米饭和海贝馅饼。在饮料柜台，像路枯马果和蕃荔枝这样一些本土水果汁同橙汁、葡萄汁和蔬菜汁相映生辉。许多中产阶级智利人不去商场，爱到他们居住区的商店购物。人们仍成群结队地到自由市场购买新鲜水果、蔬菜等农副产品。星期天，全家人仍一起用午餐，招待来访的亲友，聆听老人们讲家史和习俗。

中产阶级家庭通常都要雇用保姆。保姆除了负责打扫卫生和烧饭做菜外，还往往充当替身父母管束小孩。由于妇女们有了更具吸引人的就业机会，找保姆越来越难了。可以找到一些来自南方地区的女孩，而许多偷渡入境的秘鲁人和玻利维亚人填补了这一职业空白。这些流民大多拥入圣地亚哥，致使城市交通拥挤、污染严重，渐渐失去了对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年青人的吸引力。互联网、手机服务和空中往来的便捷，使年青人能够到外省生活、并仍能保持跟外界的联系。外省城市环境整洁、犯罪率低、交通便利，越来越具国际性了。

3. 权贵集团

权贵集团的构成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新自由主义模式允许一些敢想敢干的企业家组建大型联合企业，其发展前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像爱德华兹这样的一些历史悠久的家族依然显赫，而一些新发迹的家族则成了国家经济权力经纪人。这些公司巨头中的许多人都在邻国有大量投资。新近进入秘鲁的外国投资中有1/4是智利的投资，智利资

本也进入了阿根廷。

权贵集团仍享有远远超过其他人群的消费水平。但随着消费革命的到来，该集团的人们不再独享两辆车、第二处住房和国外旅游之便了。权贵集团不再控制文化机构和政府机关。因此权贵集团有史以来第一次不得不承认智利已确然成了中产阶级社会这一事实。 234

四、不断变化着的景观

1. 城乡住宅

20 世纪 80、90 年代的经济发展对智利整个城乡面貌的改观有着深刻的影响。在圣地亚哥，最引人注目的要算是富裕的商业区向东扩展到了普罗维登西亚区和比塔库拉区。栋栋高层玻璃幕墙、钢结构办公大楼使中产阶级居住区变成了银行、保险和房地产业中心。百货大楼、珠宝首饰店、举办重大活动用的超市和高档饭店也使这一地区大变样。多层公寓大楼沿洛斯莱昂内斯和亚美利哥·韦斯普奇等长着埃及榕的林荫大道拔地而起，代替了一家一户的单体住宅。想要保住居民幽静生活的居民协会有时也能成功地制止住高层公寓大楼的入侵。

郊区已向四周扩展，政府为了满足交通需求，花巨资修筑了市郊公路。周末来往车辆稀少时，这些交通线可使人们悠闲地在市郊逛游。工作日上下班时交通拥塞状况跟世界各地的大城市一个样。政府计划拓宽马波乔河北岸那条风景如画的贝利亚比斯塔大道时，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生活在其附近的人们反对为了那些工作在市区但喜欢住在远郊区来回奔波者而牺牲自己的宁静。

镶着砖块状水泥饰条、瓷砖盖顶、灰泥粉饰的豪华住宅占用了圣地亚哥以东绵延起伏的山丘上的牧牛场。开发商们建起像洛斯特拉彭塞斯小区这样的豪华居住区，大道、小径两旁棕榈树成行，西班牙式仿古住宅一直铺排至安第斯山脚下。圣地亚哥以西直至临近国家机场和以南直至靠近圣贝尔纳多是一片数英里的工人居住区，那儿的住房不像 20 世纪 60、70 年代建的低成本公共住房那么单调灰暗了，但还远谈不上什么宽敞舒适。住房周围没有什么绿地。那儿景色单调，对落脚在那儿的一些

乡下人说来，城市生活似乎特别乏味无生气。在比尼亚德尔马，一排排公寓式住房挡住了海景。在特穆科，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只有少数几幢五层楼，80 年代开始兴起多层公寓大楼热，不久就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直插苍穹。就连比利亚里卡和普孔这样一些湖边旅游小镇也因高层公寓大楼和旅馆的出现而具有了一种国际化景象。

235

乡村景观亦大变样。从圣地亚哥到瓦尔帕莱索的公路两旁菜地、牧场变成了绵延数英里的葡萄园，景观整齐划一。通向南方地区的泛美公路两旁也是齐整划一、标准化的成片果园。快速消失的则是那令人怀恋、乡土气息浓郁、静谧宜人的田园风光。在安第斯山湖区，农田上盖起了幢幢避暑别墅，每幢别墅四周都有小片耕地环绕。比利亚里卡与普孔之间 20 世纪 60 年代还是一片片农田和奶牛场，到 90 年代末就到处是避暑别墅了。

尽管时有旱灾发生，但智利大地还是越来越绿了。乡村地区，特别是海岸山脉地带和安第斯山区植被发生了变化。安第斯山一些地区对刀耕火种农业严加管制，使当地林木重生、森林再现。圣地亚哥以东安第斯山区较低的台地上数百年来第一次栽满了四季长青的树，一片翠绿。圣地亚哥以南大面积土地曾是贫瘠牧场，现在成了连片的林场。一行行排列整齐的拉迪亚塔松向天际绵延，一眼望不到头。

2. 环境保护

数十年来，智利经济发展只知道掠夺自然资源，全然不顾及其对环境所造成的影响。1990 年恢复民主后开展了一场关于环境问题的大讨论，但政府首先考虑的仍是如何使皮诺切特执政后期取得的经济增长率得以持续。艾尔文政府倒是成立了全国环境保护委员会，但又不给它什么实权。

刚兴起不久的环境保护运动提出过一些抗议，要求重新考虑一些大型工程的实施。马普切人反对在比奥比奥河上筑坝修建拉尔科水电站，筑坝将淹没掉他们的部分土地。他们曾多次袭击建筑公司，致使比奥比奥省省长埃斯特万·克劳斯动用反恐法对付那些领头闹事者。马普切人还放火烧了一些林场，要求将 19 世纪 80 年代政府从他们手

里强行占取的土地还给他们。为了应付这类要求，总统拉戈斯拨款1.3亿美元资助650个马普切人村社。一大目的是收购私人占有的土地，将其还给马普切人。

加拿大诺朗达铝公司计划在南部地区筑坝修建三座水电站，向一家大型炼铝厂供电。公司拟向这一工程投资27.5亿美元，年产量为44万吨。这一工程要雇用数百名工人，并支付高工资。工会和当地的经济利益集团表示支持工程建设。但环保人士则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工程建设将毁掉一个没有污染的地区。诺朗达公司宣告无限期推迟动工，环保人士似乎获得了胜利。这样的争论使决定更加难作、工程成本也会更高，但自由讨论能使方方面面共同探求既保经济增长又保环境免遭破坏的发展途径。

236

五、未来

智利在向前看的同时也向后看。例如：1990年9月，数千名萨尔瓦多·阿连德的支持者参加了一次17年前军事执政委员会曾禁止他家人举行的公开葬礼。1998年巴勃罗·聂鲁达逝世25周年时，智利大学举办了一次引起公众广泛关注的其著作展览会，以纪念他的业绩。2000年，智利举行里卡多·拉戈斯这名前人民团结阵线成员就任总统典礼时，党、政要员们齐聚圣地亚哥宪法广场参加了萨尔瓦多·阿连德雕像落成式。智利人在附近的报刊亭浏览报纸上有关虐囚和秘密掩埋的标题提要。新成员进入最高法院后，这一司法机构推翻了以前的决定，允许对军官侵犯人权案提起公诉。智利向后看，是要抚慰过去受过创伤的人们，是要舔干血迹，向前看，团结一致奔向未来。

稳健的智利人团结一致合作向前。基督教民主党人和社会党人在“否决”运动期间和连续三届政府中合作共事，携手向前。就连保守的国家复兴党也表示愿意妥协，这才使民主得以安然过渡。

2003年9月11日军事政变13周年临近时，总统拉戈斯在总统府专辟一个房间纪念萨尔瓦多·阿连德。人权斗士们游行至圣地亚哥公墓。为了降低皮诺切特在武装部队内的声誉，现任武装部队总司令胡

安·埃米利奥·切雷取消了军内一切纪念政变的活动。然而一些奥古斯托·皮诺切特的支持者仍在迭戈·波塔莱斯中心门前集会，指责切雷对其前领袖不忠。虽说30年后左派和右派之间的对立情绪依然如故，但温和的语言和选举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暴力行为。

237

以共产党人为主的左派和以独立民主联盟为主的右派依然是针尖对麦芒。出于实际利益和意识形态的需要，共产党高调指摘那些掌权者的劣迹。他们的意识形态所面临的处境可想而知，而他们更为自己跟恐怖主义的关系所困扰、亦为自己的名称——使自己跟瓦解了的苏联制度绑在一起的名称——所累。因此他们对政府的指摘未能赢得多少支持。2003年8月，一些社会党领导人不顾拉戈斯的指示，支持全国性的工人大罢工，以对经济萧条表示不满。

制造分裂的右派政治活动相当成功。独立民主联盟在巴勃罗·隆盖拉的领导下利用皮诺切特的法律地位问题和1998—2002年的经济衰退积聚人气、招徕支持者。隆盖拉认为：2001年议会选举表明，他的党现在有了将于2006年结束"各党一致否决联盟"连续16年把持总统职位的势头。

尽管问题成堆、干扰不断，民主过渡最终还是完成了。里卡多·拉戈斯的当选以及他对社会党同志们所施加的温和行事影响表明，向民主过渡已深得人心。然而认为政治冲突已然结束、不再回潮，那就太天真了。特别是在国际经济衰退使智利经济发展减速时，政治分歧就会扩大。因此，长期的经济衰退极易引起政治冲突。然而智利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在调整政策以应付不断变化着的国际形势方面所表现出的决断和能力，是为人称道的。

智利几乎完全变了样。不仅是城乡的景观变了，连人们的思想也变了。饮茶、用餐时长聊的现象少见了；人们变得讲究实际有抱负，很快造就了具有发达国家水准的物质文明。拉丁美洲其他国家视他们为未来的榜样，这使他们深感自豪。但也有少数人认为，现行的发展模式对其国土构成了一种威胁。为了保护国土，他们必须改弦易辙。他们仍在痛苦回念往事，但也承认有一套世代相传的行为准则（特别是民主传统）维系着他们。他们向后看时往往留恋过去，然而他们的传统使他们有理由对未来感到乐观。

智利历史名人小传

阿吉雷·塞尔达，佩德罗（1879—1941）

1938—1941年任总统。他的当选得益于包括激进党在内的中左政党联盟，这一联盟使他以微弱多数票击败了右派候选人古斯塔沃·罗斯。他在位期间处理了奇廉地震灾害，成立了发展协会，该协会成了促进工业发展的主要机构。

亚历山德里·帕尔马，阿图罗（1868—1950）

由于他1915年在智利最北端的省份竞选参议员时所表现出的旺盛斗志，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塔拉帕卡雄狮”。他曾于1920—1925年和1932—1938年先后担任过两届总统。第一届任期曾两度受军方干扰无法问政。他在第一届任期内曾提出过一系列立法改革方案，但均遭保守派把持的参议院否决。为了扭转议会掣肘态势，他支持强化总统权力的1925年新宪法。他在第二届任期内所要治理的是一个遭受大萧条之苦的国家。他的财政部部长古斯塔沃·罗斯成功地使经济恢复了增长势头，但他的保守政策及其使用暴力镇压工人和纳粹青年的行径引起了许多智利人的不满和反对。然而他在保守阵营里颇得人心，总统任期届满后曾两度当选为参议员。

亚历山德里·罗德里格斯，豪尔赫（1896—1986）

1958—1964 年任总统。1970 年竞选总统，但以微弱票数惜败萨尔瓦多·阿连德。他的政府通过了首部土地改革法，配合实施了争取进步联盟计划，1960 年地震后重建了瓦尔迪维亚地区。他父亲是阿图罗·亚历山德里。

阿连德，伊莎贝尔（1946—　）

智利最著名的、十分活跃的小说家。她的小说《幽灵屋》广受好评，她后来的一些小说同样广受欢迎。她跟许多拉丁美洲的作家一样，采用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生动描述小说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她的父亲是前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的堂兄。

阿连德·戈森斯，萨尔瓦多（1908—1973）

1970—1973 年任总统。此前曾连续三次参选总统均未成功。但 1970 年以略超过 36% 的选票险胜当选总统。结成人民团结阵线的左派政党参加了他的政府。他执政期间，着力实行经济国有化，将大型矿山、大多数银行、数百家工业企业收归国有，实施食品分配制。他的支持者们加速没收大地产进程。就业率上升，入学率提高。他执政的第三年，通货膨胀极度恶化、私有财产朝不保夕、消费品长时间短缺，罢工、冲突不断，政府活动瘫痪。议会又指责他违犯宪法。1973 年 9 月 11 日，军队推翻了他。他的死因至今说法不一。

阿尔马格罗，迭戈（1480—1538）

1535—1536 年他穿过沙漠、翻越安第斯山到智利探险，历尽艰辛。他没有发现要找的财富，但为四年后瓦尔迪维亚的远征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回到秘鲁后，他反对皮萨罗兄弟，引发了一场内讧，被捕处死。可就在七年前的 1530 年他还协助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征服了印卡帝国。

艾尔文·阿索卡尔，帕特里西奥（1918— ）

1990—1994 年任总统。包括基督教民主党、社会党和争取民主派在内的“各党一致否决联盟”推选他为总统候选人。他是皮诺切特政权结束后的第一任民选总统，机智果断地引导了向民主过渡的进程。他先前曾在基督教民主党中担任过一些要职，曾于 1973 年以党的首席谈判代表身份跟当时谋求解决国家政治危机的阿连德进行过对话。

巴尔马塞达，何塞·马努埃尔（1840—1891）

1886—1891 年任总统。他执政期间硝石财富增长，他将其用于公共工程建设，修铁路、建港口、盖公用建筑。然而他在内阁成员的任命和预算程序问题上跟议会发生了冲突。议会反对他的独裁作风，在海军的支持下打败了拥护他的军队。巴尔马塞达到阿根廷使馆避难，但不打算出国，而是选择了自杀。

巴罗斯·阿拉纳，迭戈（1830—1906）

他以 16 卷巨著《智利通史》享有盛誉。加上另外两卷本《智利十年史，1841—1851》，巴罗斯·阿拉纳撰述了从史前时期直至 19 世纪中叶的整个智利历史。他还代表智利跟阿根廷谈判了两国的共同边界问题。然而民族主义者们指摘他在 1881 年条约中将太多的巴塔哥尼亚地区划给了阿根廷。

贝略，安德烈斯（1781—1865）

他出生在委内瑞拉，但帮着创办了智利大学，并任校长长达 20 余年。他是 1833 年宪法起草顾问，编纂了智利民法典，撰写了大量有关语法的文章和专著，并任过议员。他与后来任阿根廷总统的多明戈·F. 萨米恩托就西班牙语的使用问题进行过一场著名的大辩论。

布尔内斯·普列托，马努埃尔（1799—1866）

1841—1851 年连任两届总统。他十年任职期间经济大发展，轮船

运输业兴起，第一条铁路通车。他任职期间还创办了智利大学、在最南端建起了彭塔阿雷纳斯镇。他在当选为总统前曾在跟秘鲁—玻利维亚邦联的战争中指挥过智利军队。

卡雷拉，何塞·米格尔（1785—1821）

独立运动领袖。他对议会的争议不休感到厌烦，遂强行实施他个人的独裁统治，这既加快了独立运动的步伐，同时也使独立运动发生了分裂。不幸的是，1814 年他跟贝尔纳多·奥希金斯之间的争斗帮助西班牙人再次征服了智利。他逃至阿根廷，跟他的两个兄弟一道开始重新组织力量。他的行动跟奥希金斯和圣马丁的行动发生了冲突，导致他的两个兄弟于 1818 年被处死，他自己也在 1821 年遭处决。即使当今，智利人也还是根据各自对当初独立运动领袖们的崇敬分成“卡雷拉派”和“奥希金斯派”两大阵营。

考波利坎（？—1558）

马普切人首领。16 世纪 60 年代他协助劳塔罗打败过西班牙人。1558 年，都统加西亚·乌尔塔多·德·门多萨在一名马普切人告密者的帮助下在康塞普西翁附近打败了考波利坎，并将其杀害。阿隆索·德·埃尔西利亚在《阿劳坎之战》中赞美了考波利坎的超凡力量。

科克伦，托马斯·亚历山大（1775—1860）

1818—1822 年智利海军司令。他在智利和秘鲁沿海消灭了全部西班牙军舰，从西班牙军队手里夺占了瓦尔迪维亚港。他支持解放秘鲁总督区，1820 年将何塞·德·圣马丁统率的大军从瓦尔帕莱索运送到秘鲁南部地区。然而 1822 年他辞去职务，受雇指挥巴西海军。

埃尔西利亚·伊·苏尼加，阿隆索·德（1533—1594）

他只在智利待了不到三年的时间，但他的史诗《阿劳坎之战》却成了殖民地时期最重要的文学著作。诗人以希腊英雄为原型对西班牙

和马普切的战斗者进行了描绘，借欧洲文明使新大陆的人物更形高贵。这部诗作成了智利人自我认同和民族主义的重要根源。

弗雷・蒙塔尔瓦，爱德华多（1911—1982）

1964—1970 年任总统。他当政期间发展教育、促进土地改革、开始实行铜矿国有化、为低收入者建设了数千套住宅。不幸的是，他的党分裂出了两个左派集团，他的经济计划又受挫。他总统任期届满后，领导参议院反对阿连德加快国有化进程。阿连德被推翻后，弗雷・蒙塔尔瓦起初支持军方，但后来成了一名对军政权侵犯人权行为进行尖锐批评的人。1982 年他死于一次普通手术，他的亲属怀疑这是一场谋害。（注：只有可能会跟他儿子弄混时，才使用他母亲的姓）

弗雷・鲁伊斯—塔格莱，爱德华多（1942—　）

1994—2000 年任总统。在他执政的头四年期间，国家经济运作情况极佳。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智利失去了市场。在他任总统的最后两年里，经济增长停滞。弗雷对处理侵犯人权案不那么积极。1998 年奥古斯托・皮诺切特的武装部队总司令任期届满时，他指定里卡多・伊尔苏里埃塔・卡法雷纳将军接任。爱德华多・弗雷・鲁伊斯—塔格莱是爱德华多・弗雷・蒙塔尔瓦的儿子。

弗莱雷，拉蒙（1787—1851）

1823—1827 年任智利领导人。成功地将西班牙人赶出了奇洛埃岛。他赞同自由党人的思想（包括联邦主义），但未能解决国家的财政问题。他依靠商品专卖分期偿还英国贷款。这招失灵后，国家的国际信誉亦随之丧失。1830 年内战期间，他的军队在利尔卡伊战役中被打败，他出逃流亡国外。1836 年，他在秘鲁的支持下试图推翻保守党人政府，但未获成功。

盖伊，克劳迪奥（1800—1873）

法国博物学家。1830 年立约受雇于智利政府，从事对智利的植

物、动物和地理的研究工作。盖伊花了十多年时间收集资料，最终整理编撰出版了 24 卷著作，另加两册图表集。他还撰写了多卷本智利史，这促使智利人加强了历史研究工作。

贡萨莱斯·魏地拉，加夫列尔（1898—1980）

1946—1952 年任总统。包括激进党、社会党和共产党在内的中左政党起初都支持他，可他却于 1948 年促使议会通过《长期维护民主法》宣布共产党为非法。他开罪了这一集团的选民后，签署了授予妇女投票权的法案，以争取新集团的选民。他以一种具有迷惑力的新殖民主义方式提供联邦补贴改建了拉塞雷纳城，那儿的人们对之久志不忘。

格罗维·巴列霍，马马杜克（1879—1954）

1931 年社会主义共和国时期任国防部长，实权人物。这一短命政府试图实行多项改革，但很快即被推翻。1932 年总统选举时，格罗维的得票率仅低于阿图罗·亚历山德里。他后来当选为议员，为社会党总书记，曾帮助策划使佩德罗·阿吉雷·塞尔达和人民阵线在 1938 年总统选举中赢得了胜利。

伊瓦涅斯·德尔·坎波，卡洛斯（1877—1960）

1927—1931 年、1952—1958 年两度任总统。20 世纪 20 年代，他扮演了文人总统阿图罗·亚历山德里和埃米略·菲格罗亚的监护人角色，掌握着实权。菲格罗亚辞职后，伊瓦涅斯在一次特别选举中得到了压倒性的支持。他开始实施行政改革和令人难忘的公共工程建设；可令人遗憾的是，他同时又严厉镇压劳工、钳制新闻传媒。他还组织了国民卫队。国际关系方面，他将塔克纳省——太平洋战争以来一直在智利占领下——还给了秘鲁。1930 年大萧条毁了智利的经济，导致了大规模抗议，致使伊瓦涅斯 1931 年下台。他在第二届总统任内花了大部分时间跟工会作斗争、跟不配合的议会讨价还价。

拉戈斯，里卡多（1938— ）

2000年就任总统，任期六年。拉戈斯属社会党，但在“各党一致否决联盟”的支持下当选总统。他虽然计划促进工会及其他方面的改革，但2000—2002年的世界经济衰退迫使他推迟改革计划，全力使经济复苏。拉戈斯是萨尔瓦多·阿连德政府的一名成员，皮诺切特掌权时期曾在国外流亡过一段时间。1988年他积极领导“否决”运动，拒绝皮诺切特再任八年总统的意图。他在艾尔文政府和弗雷·R. 政府里均担任过不同的内阁部长职务。1999年，拉戈斯在“各党一致否决联盟”举行的初选中击败基督教民主党候选人安德烈斯·萨尔迪瓦尔，因此在问鼎总统时赢得了“各党一致否决联盟”的一致支持。

拉斯塔里亚·桑坦德，何塞·维克托里诺（1817—1888）

法学教授，自由党议会领袖。他在智利大学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指出国家所继承的保守的西班牙遗产已不合时宜，敦促领袖人物们向比较自由的国家看齐。他出版了大量文学和法学著作。他曾在几届政府中任部长。有一次还代表智利参加了外交谈判。

劳塔罗（1534—1557）

马普切人军事领袖，曾在一些重大战役中击败过西班牙人。1553年，他的队伍在图卡佩尔杀了佩德罗·德·瓦尔迪维亚。接连又取得了一些胜利，1556年攻占康塞普西翁城。他计划攻打圣地亚哥，但1557年佩德罗·德·比利亚格拉突袭其营地，将其杀害。阿隆索·德·埃尔西利亚在其史诗《阿劳坎之战》中描述了劳塔罗的英勇无畏，使他英名长存。

米斯特拉尔，加夫列拉（1889—1957）

194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她是获此奖项的第一个拉丁美洲人。她对儿童、大自然及其美洲先祖的热爱成了其诗歌的主题。她还曾任驻一些国家的智利外交代表。她的部分著作，参见参考书目。加夫列

拉·米斯特拉尔是笔名，她原名卢西拉·戈多伊·阿尔卡亚加。

蒙特·阿尔瓦雷斯，豪尔赫（1845—1922）

1891—1896 年任总统。议会起而反对总统何塞·马努埃尔·巴尔马塞达的独裁措施时，蒙特支持议会；他当时是一名海军指挥官。他在打败巴尔马塞达军队的战斗中起了重要作用，当年被选为总统。他执政期间，议会说了算，1925 年新宪法被批准前一直是这样。蒙特对选举制度进行了改革，使总统难以操纵选举。他还拍卖一些硝石矿场，通常是卖给外国公司。

蒙特·托雷斯，马努埃尔（1809—1880）

1851—1861 年连任两届总统。他执政期间电报、铁路和公共工程建设大发展。蒙特促进了公共教育和农业信贷事业的发展，并提高了政府工作效率。然而他同教会和采矿企业家们发生了冲突。1859 年北部地区爆发内战，战火向南一直烧至康塞普西翁。开始时政府军受挫，但最终还是打败了叛军。蒙特声称赢得了胜利，但他的继任者则认为必须宣布大赦令，以消除国内分歧。

聂鲁达，巴勃罗（1904—1973）

20 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之一。1971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他作品的主题包括性爱、美洲本土遗风、工人的权利和与大自然的情感交融。他曾任驻一些国家的外交使节。他还是一名共产党党员，1970 年接受党的提名竞选总统。他去世时正值刚刚发生了军事政变。他的一些忠实追随者将他那位于海滨内格拉岛的家改成了民间博物馆。他的部分著作，参见参考书目。聂鲁达是笔名，原名内夫塔利·雷耶斯·巴苏阿尔托。

诺思，约翰·托马斯（1842—1896）

有抱负的英国企业家。他在太平洋战争期间收购了大量硝石证券。他还获得了铁路专营权，这使他得以向竞争对手索要高价。他创办公

司、出售证券的计谋使他成了当时最富有者之一。

奥希金斯，安布罗西奥（约 1720—1801）

1788—1796 年任智利都督，1796—1801 年任秘鲁总督。他在都督任上建立了新市镇、在圣地亚哥进行了重要市政工程建设、修筑了第一条从首府通往瓦尔帕莱索的大道。他还废除了委托监护制，并促进贸易的发展。他是爱尔兰人，先移居西班牙，而后于 1761 年移居智利。他刚开始时经商，不久参军修筑要塞、平息马普切人动乱。他的战绩使他赢得了西班牙国王的信任，被任命为都督。他儿子贝尔纳多系他跟伊莎贝尔·里克尔梅所生。贝尔纳多从未取得过合法身份，但他父亲为他支付在英国学习的费用，1801 年去世时又立遗嘱将地产留给他。

奥希金斯，贝尔纳多（1778—1842）

1817—1823 年任智利最高执政官，被尊为“国父”。1817 年 2 月 12 日他跟何塞·德·圣马丁一道在查卡布科战役中打败西班牙军队。他接着组建政府，规划解放秘鲁。他制定了许多自由主义的智利法规，特别是自由主义的贸易法，但遭到了顽固的权贵家族的反对。1823 年，这些家族的首领们逼他辞职，他不想引发一场内战，辞职了。他自我流亡到秘鲁，盼望能被召回重新治理智利，但一直没有动静。他死在流亡地。他父亲是安布罗西奥·奥希金斯。

佩雷斯·莫斯卡亚诺，何塞·华金（1801—1889）

1861—1871 年连任两届总统。佩雷斯上台后大赦政治犯，这有助于国家经过 1851 年和 1859 年两次内战后的团结。他还废弃了其前三届政府实行的保守政策，同自由党人结盟。重大的自由主义改革包括两项法案：一为保障宗教自由，一为禁止总统连任。1866 年，西班牙攻打秘鲁，他的政府向西班牙宣战。西班牙为此进行报复，命令其舰队炮击瓦尔帕莱索，严重破坏了港口的贸易货栈。

帕拉，维奥莱塔（1917—1967）

音乐家、民歌手。她为丰富的智利传统音乐增添了新元素。她还创作了不少歌曲，最有名的要算《感谢生活》了。她儿子安赫尔和女儿伊莎贝尔继承母业作曲、演唱，驻唱夜总会。

皮诺切特·乌加特，奥古斯托（1915—　）

1974—1990年任智利总统。1973年推翻阿连德政府时，他是武装部队总司令。推翻阿连德政府后，他任军事执政委员会主席，下令解散议会和各左派政党。至今仍在辩论有关他对侵犯人权应负的个人责任问题。1975年他授权天主教大学的经济学家们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从而根本改变了国家的经济。他还指导批准了代替1925年宪法的1980年宪法。他1990年不当总统后继续任武装部队总司令，1998年卸任。对他侵犯人权案进行审讯的努力未果。英国法院和智利法院均认为他健康衰竭不宜受审。

平托·加门迪亚，阿尼巴尔（1825—1884）

1876—1881年任总统。他遇上了严重的世界经济衰退形势，智利经济全面受到影响。为了防止银行倒闭和国际支付危机，他支持立法，使汇率自由、增加关税、征收遗产税。他领导了太平洋战争，声名远扬。1879年，他向玻利维亚和秘鲁宣战。智利军队尚未作好充分准备即投入战斗，但到1881年1月还是胜利地占领了利马。智利军队在战斗中兼并了玻利维亚和秘鲁的重要硝石产区。

波塔莱斯·普拉萨苏埃洛斯，迭戈（1793—1837）

政治领袖。1830年保守党上台执政在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他。他担任过多个内阁部长职务，而尤为重要的是对总统普列托施加的巨大影响。他是商人，支持发展贸易，却反对自由党进行政治改革。他要确保瓦尔帕莱索作为太平洋沿岸主要港口这一独特地位。为达此目的，他促成了跟秘鲁—玻利维亚邦联的战争。1837年，在瓦尔帕莱索附近

被政敌策动反叛的部队杀害。

普拉茨·贡萨莱斯，卡洛斯（1914—1974）

1969—1973 年任武装部队总司令。他拥护宪政，坚决反对那些要军队推翻萨尔瓦多·阿连德的人。跟亚历杭德拉·科克斯发生了一次不光彩的冲突，导致他的同僚们的妻子群起要求他辞职。他 1973 年 8 月辞职，奥古斯托·皮诺切特接任，此人支持政变计划。普拉茨流亡布宜诺斯艾利斯，与反对军政权的人保持着密切联系。国家情报局特工实施报复，一年后用汽车炸弹将他及其夫人杀害。

普列托·比亚尔，华金（1786—1854）

1831—1841 年连任两届总统。他是受迭戈·波塔莱斯扶掖者，他指挥的军队支持利尔卡伊战役后建立的保守党政权。他的首个任期内，1933 年宪法生效，财政部部长马努埃尔·伦希福开始实行财政改革。新开采的银矿和铜矿使国家经济日益繁荣。他的第二个任期内，智利打败了秘鲁—玻利维亚邦联。而他的后台老板迭戈·波塔莱斯则在瓦尔帕莱索被反叛部队杀害。

伦希福·卡德纳斯，马努埃尔（1793—1845）

1830—1835 年和 1841—1844 年两度出任财政部长。华金·普列托执政期间，伦希福为了使国家预算保持平衡，减免税收，实行合理的关税法，以减少逃税现象和走私活动。他还恢复了国内信贷，制定了债务分期偿还计划。尽管他业绩斐然，但当他想要在 1836 年总统选举中与普列托竞选时，普列托还是撤了他的职。五年后，布尔内斯总统指定他再次担任财政部部长。他的一大功绩是跟伦敦债券持有人重新谈判智利的贷款问题。从而重新确立了国家在国外的信誉。伦希福就像美国财政部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那样，为政府建立功绩和国家发展奠定了财政基础。

圣马里亚·贡萨莱斯，多明戈（1825—1889）

1881—1886年任总统。1884年，他通过协议结束了跟秘鲁的战争。他还挑起跟马普切人的冲突，迫使他们将其祖传地产让给政府。他执政期间最大的政治冲突是因政府控制公墓、婚姻登记和出生登记的提案引起的。这一提案得到了通过，但却大大恶化了跟教会和保守党的关系。

席尔瓦·恩里克斯红衣主教，劳尔（1907—1999）

1961—1983年任圣地亚哥大主教。1963年被任命为红衣主教。教会的这位自由派领导人赞同弗雷·M. 的大多数改革措施。阿连德执政时期，在全国统一教学体制这一全国性教育改革要将政府确定的课程强加给天主教学校之前一直没有批评过人民团结阵线的纲领。1973年萨尔瓦多·阿连德和帕特里西奥·艾尔文试图解决国内政治骚乱时他提供了帮助。军事政变后，红衣主教席尔瓦成立主教区牧师团结会，维护人权；这招致了总统皮诺切特的强烈不满。

托米奇·罗梅罗，拉多米罗（1914—　）

基督教民主党1970年总统候选人，得票率位列第三，次于萨尔瓦多·阿连德和豪尔赫·亚历山德里。此前，他参与创建了国家长枪党及其后继者基督教民主党。爱德华多·弗雷·M. 执政的前半段时间任智利驻美国大使。1970年竞选失败后，他向萨尔瓦多·阿连德道贺。一些保守的基督教民主党人责怪他没有坚持弗雷的观点而是提出了比较激进的改革主张，从而导致了党的失败。军事政变后，他流亡国外，在流亡地强烈批评了皮诺切特政权。

瓦尔迪维亚，路易斯·德（1561—1642）

耶稣会神父。他提出了使西班牙人跟马普切人和平相处的“防御战”主张，得到了西班牙国王的支持。这一政策1612年实施，只准耶稣会士到马普切人中心地区从事传教活动，其他西班牙人不得进入。

为了实施这一政策，瓦尔迪维亚跟许多马普切人首领进行了协商。不幸的是，就在那一年有位发怒的首领于埃利库拉杀害了三名耶稣会神父。不同意这一政策的世俗政府这会儿公开反对这一政策了，然而西班牙国王一直到1626年才正式废止这一政策。路易斯·德·瓦尔迪维亚跟佩德罗·德·瓦尔迪维亚没有血缘关系。

瓦尔迪维亚，佩德罗·德（1502—1553）

探险者、征服者、智利都统。1540年，他经由陆路从秘鲁行至智利中央谷地。1541年2月12日，他在那儿兴建了首府圣地亚哥—德—新埃瓦埃斯特雷马杜拉[①]。市政会推选他为都统，西班牙国王后来确认了这一职位。他向其同伴们分配了土地和为他们服役的印第安人后，遂于1550年向南进入林木密布的马普切人中心地区。他在那儿肆意攻击印第安人，兴建要塞、小镇，实施委托监护制。他低估了马普切人及其军事才能。1553年，马普切人在劳塔罗的领导下起而武力反抗，在图卡佩尔战役中打死了他。

① 通常简称“圣地亚哥”。——译者注

专门词语注释表

Aduana：海关——征收关税、查验出入境人员证件的机构。

Afuerino：外地人——不居住在其劳动所在庄园的农业工人。

Aguardiente：纯葡萄白兰地酒——词的原意为“烈性酒”。

Alacalufes：阿拉卡卢夫人——居住在麦哲伦省北部地区、以捕鱼为生的印第安人。

Alcalde：市长。

Araucanians：阿劳坎人——西班牙人用以指生活在比奥比奥河以南地区的印第安人，现在称他们为马普切人。

Arroz a la Marinera：海鲜米饭。

Audiencia：检审庭（又译检审法院）——殖民地时期的司法和行政机构，审理民事和刑事案件，并对最高行政长官的权力进行制约。

Boleadora：印第安人的一种武器——一些梅斯蒂索人借用来狩猎、作战。这种武器为一条粗皮带上绑着两根或三根细皮条，每根细皮条系块圆石子。狩猎时抛向猎物，作战时抛向敌人。

Bomberos：消防队员——通常都是一些志愿者。

Cabildo abierto：市政会公开会议——cabildo 是殖民地时期的市（镇）政会。独立运动期间，这一机构是公开、开放的，或者称 abier-

to，当地所有头面人物均可出席会议。

Campesino：农民（自耕农），通称乡下人（大地主除外）。

Carabineros：国民卫队——亦被视为武装部队的第四支队。

Casa de la Moneda：原为殖民地时期的铸币厂，现为总统府。

Chamber of Deputies：智利议会众议院。

Chicha：奇恰酒——印第安人用玉米或松子发酸制成的饮料；现在智利人用葡萄或苹果酿制。南方地区的奇恰酒是苹果酒。

Chilote：奇洛埃人——出生在奇洛埃岛的人。

Chonos：乔诺人——美洲土著，生活在艾森地区，大多数居住在艾森群岛上，以捕鱼为业。

Chupilca del diablo：红葡萄酒加火药的混合饮料——chupilca 是一种含酒精的饮料，通常是红葡萄酒加炒熟的小麦粉混合而成。太平洋战争期间，智利士兵添加火药，据说喝下后就会魔性大发，不畏敌手。

Concertación：各党一致否决联盟——基督教民主党、争取民主党、社会党和激进社会民主党组成的联盟，1988 年成立活动至今。

Consejales：市政会成员——旧称 regidor。

Consulado：贸易法庭——殖民地时期的商人同业公会；现在 consulado 一词系指外交使团领事馆。

Cordones industriales：工厂带——特指圣地亚哥的工业区。人民团结阵线曾动员那儿的工人不让工厂主进厂，动员那儿的工人参加政治集会。

Criollo：土生白人——殖民地时期出生在智利的西班牙人。现在这一词系指智利本土的东西。

Cuña：后台。

Curanto：烤海鲜。

Cuyo：库约——今阿根廷西部门多萨、圣胡安和圣路易斯三省。1776 年以前，这一地区归智利管辖。

Dieciocho：《18 日》——指独立日（9 月 18 日）。

Diezmo：什一税。

Empanada：馅饼——用牛肉末、鸡蛋末、橄榄和洋葱做馅。通常在独立日等纪念日食用。

Encomendero：委托监护人——为国王服务获“委托监护”权对印第安人进行“监护”者。但他们往往不顾国王敕令对印第安人进行残酷剥削。

Encomienda：委托监护制——印第安人受“委托监护”为委托监护人服劳役的制度。1542 年西班牙国王下令印第安人不再服劳役，改用实物纳贡；但这一命令很少有人听从。

Escudo：埃斯库多——货币单位，1959 年使用，取代“比索”，1975 年停用，恢复“比索”。比较常用的意思是“盾牌”或“盾徽”。

Estanco：专卖——独立时期政府授予私人公司专卖特许权，私人公司缴纳一定的费用。专卖商品包括烟草、进口的酒类和纸牌。

Fiducia：《信仰》杂志——保守的天主教组织“智利传统家庭财产协会”出版的杂志，反对弗雷政府和阿连德政府，也反对教会上层的自由派。

Filopolitas：走极端者——普列托总统政府中的自由派，支持马努埃尔·伦希福接替普列托任总统。

Fogón：厨房——木板房，泥土地，建有炉灶，马普切人和智利乡下人烧饭、用餐、社交的场所。

Fundo：大庄园——代替 19 世纪智利使用的“hacienda”一词。

Gran Minería：大矿——大型矿。

Gremialismo：同业公会运动——雇主和专业协会发起的保守政治运动，意在跟工人工会相抗衡。

Gremio：同业公会——雇主协会、专业协会，如车主协会、工程师协会。

Habilitadores de Minas：给矿上提供资金者——商人向矿主预贷资金，独享其矿石销售权。

Huaso：牧工，牛仔。

Huilliches：维利切人——马普切人部落，生活在毛莱河与瓦尔迪

维亚地区之间一带。

Inquilino：佃农。

Intendente：郡守——殖民地末期波旁王朝国王设置的地区行政长官。独立后为各省省长，大区建制后为区长，由总统直接任命。

Junta：执政委员会——小型执政委员会，通常为临时政府。

Maloca：突袭——马普切人一氏族对另一氏族的突袭、抢劫。

Mapuche：马普切人——美洲土著，生活在智利中央谷地和南部地区。也称阿劳坎人。分有许多支系。

Mestizo：梅斯蒂索人——欧洲人和美洲土著混血种人。

Navío de registro：商船注册制——跟西班牙美洲殖民地进行贸易的商船必须获得西班牙的批准。

Norte Chico：北奇科地区——矿区，包括阿塔卡马和科金博两省。

Norte Grande：北格朗德地区——沙漠地带矿区，包括智利最北部的两个省：安托法加斯塔省和塔拉帕卡省。

Onas：奥纳人——美洲土著，活动在火地岛地区，以狩猎为生。

Opus Dei：神工会——保守的天主教派；皮诺切特执政期间有影响。

Padrino：教父——俗语“靠山”。

Palita：门路。

Papelera：造纸厂——豪尔赫·亚历山德里为厂主之一；人民团结阵线威胁说要将其接管。

Pastel de Choclo：嫩玉米糕——用牛肉末及其他选料做馅。

Patria y Libertad：“祖国与自由”组织——极端保守的政治组织，密谋推翻阿连德代之以法西斯式的政权。

Pedagógico：智利大学教育学院——以其激进政治主张而闻名。

Pehuenches：佩文切人——生活在安第斯山区的马普切人。“pehuen”（“佩文”）为阿劳坎松；“che”（“切”）的意思是“人”。

Pelucones：老派——19世纪保守派的俗称。该词是“peluca”（“假发”）的指代词，意为“保守的人”。

Peña："民乐会"——通常在夜总会举行。

Peninsulares："半岛人"——出生在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人，以示区别于出生在美洲的西班牙人。

Picunches：皮昆切人——生活在毛莱河地区的马普切人。

Pipiolos："新派"——19 世纪自由派的俗称。

Pisco sour：酸味皮斯科酒——一种开胃酒，由皮斯科酒（纯葡萄白兰地酒）加柠檬汁、绵白糖和其他选料混合而成，特别用以招待外国客人。

Poblaciones：工人住宅区——弗雷政府和阿连德政府时期高度政治化；军政权时期成了搜捕的重点地区。

Promoción popular：民众动员——弗雷着力促使工人组织解决其社区问题、参与政治进程。

Puelches：普埃尔切人——生活在安第斯山东边的马普切人。

Pulpería：杂货店——大庄园或公司自己开的商店，主要出售干货。

Roce de fuego：刀耕火种——毛莱河以南特别盛行的耕作方式。

Roto chileno：智利工人——特指勇于跟逆境作斗争的城市贫困工人。

Situado：津贴——秘鲁总督区每年拨给智利的经费，用以支付同马普切人作战的开销。

Tacnazo：塔克纳团反叛事件——1969 年 10 月 21 日罗贝托·维奥将军率领塔克纳团反叛，要求增加军饷、改善装备。

Tancazo：坦克突击——1973 年 6 月 29 日坦克群突袭圣地亚哥市中心，导致 22 人死亡。是为三个月后军事政变之序幕。

Tierra del Fuego：火地岛——位于麦哲伦海峡以南，西部属智利，东部属阿根廷。岛名源自欧洲水手看到土著人点燃的火光。

Torres：高层公寓楼。

Trapiche：矿石粉碎场，粉碎机；加勒比海地区的榨糖厂，榨糖机。

Tribunal de Minería：矿事仲裁法庭——殖民地末期，处理矿事诉讼、解决矿主问题的法庭、同业公会。

Vicaría de la Solidaridad：教区牧师团结会——天主教教会组织领导的援助团体，帮助受军事政权迫害的人们。

Vin tinto：红葡萄酒。

Viva Chile mierda：智利真他妈的万岁！

Volcán：火山。

Yaganes：雅甘人——麦哲伦省南部地区的印第安人，捕鱼为生。

推荐书目：谨供深入研究参考

下列推荐书目包括研究智利的一些主要著作、互联网资料和各种探讨的问题专著。我列出了英文版和西班牙文版著作，但很少提及杂志上的文章，更没有提及专题论文。这并不是杂志上的文章和专题论文不重要，而是该文篇幅有限，难以一一列出。请注意：许多著作所涉及到的时间要比某一特定章节所涉及到的时间长得多；为了避免重复，我只提及一次。还要着重强调的一点是：用英文写作的学者对殖民地时期和1830—1960年的研究要比对20世纪末的研究少得多。我也要强调：历史研究的成果是一批学者共同努力取得的；没有下文列出的研究成果，要写出本书是不可能的。

一、主要著作

有两部英文版智利史佳作。Simon Collier 与 William F. Sater 的 *A History of Chile, 1808—1994*（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对智利的社会、政治发展提出了独到的见解。Brian Loveman 的 *Chile：The Legacy of Hispanic Capitalism*，3rd e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阐明了复杂的政治发展进程，同时提供了大量统计表格和参考书目。Paul W. Drake et al. 的 *Chile：A Country Study*（Washington，D. C.：Library of Congress，1994）收入了相关领域专家撰写的有关智利历史、社会、经济、政治和安全的文章。Jay Kins-

bruner 的 *Chile: A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3）对智利的历史作了简明扼要的研究。*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Cambridge：Cambridge Univ. Press，1984— ）中有 Simon collier，Harold Blakemore，Paul Drake 与 Alan Angell 撰写的有关智利的章节；他们均发表、出版过大量有关智利的文章和书籍。Julio Heise González 的 150 *años de evolución institucional*（Santiago：Editorial Andrés Bello，1960）对智利政治史作了极具启示性的概述。Luis Galdames 的 *A History of Chile*（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41）是一部较早的研究成果，但很有意思。

最为人称道的智利史著作是 Diego Barros Arana 的 *History general de Chile*，16 vols.（Santiago：Rafael Jover，1884—1902），此书叙述了殖民地时期和独立运动时期的历史。Francisco Encina 的 *Historia de Chile desde la prehistoria hasta* 1891，20 vols.（Santiago：Editorial Nacimento，1948—1955）是部学术上不那么严谨的史书，但在智利人中却广为流传。Alberto Edwards Vives 的 *La Fronda Aristocrática*（Santiago：Editorial Del Pacífico，1928）对智利历史上的权贵集团作了极具争议性的阐述。极具教益的通史著作是 Sergio Villalobos R.，Osvaldo Silva G.，Fernando Silva V. 与 Patricio Estellé 的 *Historia de Chile*，4 vols.（Santiago：Editorial Universitaris，1974）。Villalobos 还出版了多卷本社会史 *Historia del pueblo chileno*（Santiago：Empresa Editora Zig-Zag，1980— ）。最近出版了由 Nicolás Cruz 与 Pablo Whipple 主编、天主教大学的专家 Nicolás Craz 与 Pablo Whipple 编写的教课书 *Nueva historia de Chile desde los orígenes hasta nuestro días*（Santiago：Zig-Zag，1996）。关于智利文学发展动态概述和文选，参见 Hugo Montes 与 Julio Orlandi 的 *Historia y antología de la literature chilena*，8th ed.（Santiago：Editoria Zig-Zag，1969）。

还有一些专著对智利历史上重大问题进行了论述。Markos Mamalakis 的 *The Growth and Structure of the Chilean Economy: From Independence to Allend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6）对经济

政策和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作者的另一部著作 *Historical Statistics*, 6 vols.（Westport：Greenwood Press，1979—1989）对从事人口和经济问题研究的人极具参考价值。关于经济史，参见 Juan Ricardo Couyoumdjian，René Millar Carvacho 与 Josefina Tocornal 的 *Historia de la Bolsa de Comercio de Santiago, 1893—1993：un siglo del mercado de valores en Chile*（Santiago：Bolsa de Comercio de Santiago，1993），书中涉及的问题要比题目所示广泛得多。Claudio Véliz 的 *Historia de la marma mercante de Chile*（Santiago：Universidad de Chile，1961）研究了智利发展本国造船业的尝试。对武装部队卷入政治的情况感兴趣者，可参见 Fredrick M. Nunn 的 *The Military in Chilean History*（Albuquerque：University of New Mexico，1976）。

一些书对智利政治的发展情况作了分析研究。要了解政治制度的发展变化，Federico Gil 的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Chile*（Boston：Houghton Mifflin，1966）是一部重要著作。Germán Urzúa Valenzuela 的 *Historia política de Chiley su evolución electoral desde 1810 a 1992*（Santiago：Editorial Jurídica de Chile，1992）研究了政党和选举的发展状况。Timothy R. Scully 的 *Rethinking the Center：Party Politics in Nineteenth and twevtieth Century Chile*（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对复杂的多党制进行了历史分析。James F. Petras 的 *Politics and Social Forces in Chilean Developmen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9）对政治制度解决重大社会、经济问题的能力进行了评论。Brian Loveman 与 Elizabeth Lira 的 *Las suaves cenizas delolvido：la vía chilena de reconciliación política 1814—1994*，2 vols.（Santiago：LOM Ediciones，1999）使智利人深刻了解了以往大赦对恢复国家政治平静的影响。

Fredrick B. Pike 的 *Chile and the United States, 1880—1962*（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62）对智利的社会政策与美国的社会政策作了比较。Robert N. Burr 的 *By Reason or Forcc：Chile and the Balancing of Power in South America, 1830—1905*（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65）对智利外交作了最全面的分析。Heraldo Muñoz 和 Carlos

Portales 的 *Elusive Friendship*：*A Survey of U. S. -Chilean Relations*（Boulder：Reiner，1991）对美国在智利的影响进行了抨击。

二、互联网资料

智利政府、私人机构广泛应用互联网跟公众沟通。国家、大区、地方政府机构都有网站，向公民告示行动规划。网站也向研究人员提供了大量信息。智利各大学的网站跟欧洲和美国大学的网站一样有教学程序编排和在线图书目录。矿业公司、葡萄园和出版社等大企业都有网站。像工程师协会这样的专业组织和像工业发展协会这样的雇主组织也可以在互联网上找到。

要查有关智利国家政府的信息，网站 www. estado. cl 上有一菜单跟各部及其下级行政机构链接。要查详细统计资料，可上国家统计局的互联网站 www. ine. cl/chile 和中央银行的网站 www. bcentral. cl。还可在 www. Geogetown. edu/pdba/Elecdata/Chile 网上查到有关智利选举的资料。得克萨斯大学互联网站 www. lanic. utexas. edu/la/chile/的拉丁美洲研究程序提供了数百个智利机构（包括大多数大学和许多非政府组织）的入口网站。

有关智利商机情况可在出口促进会的网站 www. chileinfo. com 和美国贸易服务局的网站 www. usatrade. gov/website/ccg. nsf/ccGurl/CCG-CHILE 上查到。美国使馆的网站 www. usembassy. cl 也有重要信息和链接。

智利的大多数报纸、杂志都可部分地或全部地在网上查到。1827 年在瓦尔帕莱索和 1900 年在圣地亚哥创刊的《信使报》在 www. mercurio. cl 和 www. emol. com/noticias 网上发布新闻。智利的在线新闻广播是讽刺杂志《公示》的网站，网址是 www. elmostrador. cl。最受欢迎的网站是报纸《第三者》的 www. latercera. cl。像《伊基克之星》和特穆科的《南方日报》这样的一些地区性报纸也可很容易地在网上查到。杂志《埃尔西利亚》的 www. ercilla. cl、《发生了什么事》的 www. quepasa. cl 和《到此为至》的 www. puntofinal. cl，以及最受欢迎的妇女杂志《请看》和《波拉》的 www. vea. cl 与 www. paula. cl，

均是杂志自己的网站。

智利的一些广播电台有在线广播，还有一些电台发表在线新闻。例如，可浏览“合作电台”的 www. cooperativa. cl、“农业电台”的 www. radioagricultura. cl 和“协和电台”的 www. concierto. cl。“智利国家电视台（即7 台）的 www. tvn. cl 和智利天主教大学电视台（即 13 台）的 www. canal 13. cl 播出网上新闻评论和其他节目。

第一章 奇妙的地理

本章标题源自 Benjamín Subercaseaux 的 *Chile, o una laca geografía* (Santiago: Ediciones Ercilla, 1940)；三年后此书英文版面世，用了一个更加令人深思的书名 *Chile: A Geographic Extravaganza*。Harold Blakemore 在他和 Clifford T. Smith 主编的 *Latin America: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s* (London: Methuen and Co, 1971) 一书的第十章中对智利作了引人注目的描绘。Pedro Cunill 的 *Visión de Chile* (Santiago: Editorial Universitario, 1972) 也对智利作了详细的描绘，而 George Pendle 的 *The Land and the People of Chile* (New York: Macmillan, 1960) 则从历史角度对智利地理进行了描述。*South America, Central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London: Europa Publications: 2001) 中“智利”一章的最新资料很有价值；“The World Factbook—Chile”, www. odci. gov/cia/publications/factbook/的最新资料也很有价值。

第二章 智利人的来源（500—1750）

Stuart Schwartz 与 Frank Solomon 主编的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Native Peoples of the America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2000) 一书的第三卷 South American，对人类早期在智利的活动情况作了概述。Karen Olsen Bruhns 的 *Ancient South Ame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也探讨了最初的居民状况。Tom D. Dillehay 的 *Monte Verde: A Late Pleistocene Settlement in Chile*, 2 vols, (Washington, D. 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87—1997)

对智利南部的一处令人关注而又引起争议的考古遗址作了描述。关于20世纪30年代所做的大量考古工作，参见 Julian Steward 编的 *The Handbook of South American Indians*，6 vols.（Washington，D. C.：Smithsonian Institution，1946—1950）。Grete Mostny 的 *Prehistoria de Chile*，14th ed.（Santiago：Editorial Universitaria，1999）对前哥伦布时期的智利进行了概述。L. C. Faron 的 *Mapuche Social Structure*（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61）和 *Hawks of the Sun*（Pittsburgh：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64），从人类学角度对20世纪的马普切人进行了研究。

一些参加过与马普切人的战争的西班牙人记述了其经历。被俘军官 Francisco Núñez de Pineda y Bascuñán 对马普切人很有好感，写了 *Cautiverio feliz*（Santiago：Editorial Universitaria，1973）。Alonzo de Ercilla 写了一部著名的史诗 *La araucana*（Buenos Aires：Espasa-Calpe，1947）。被逐出智利的耶稣会士 Juan Ignacio Molina 在其所著 *The Geographical，Natural，and Civil History of Chile*（New York：AMS Press，1973）中对殖民地时期的马普切人社会和西班牙人社会进行了描述。Alvaro Jara 的 *Guerra y sociedad en Chile*（Santiago：Editorial Universitaria，1971）探讨了引起马普切人长期敌视的西班牙土地政策和劳动政策。Carlos Aldunate et al. 的 *Relaciones fronterizas en la araucanía*（Santiago：Ediciones Universidad Católica de Chile，1982）着重研究了与马普切人的社会关系和贸易关系。Eugene H. Korth，Society of Jesus（S. J.）的 *Spanish Policy in Colonial Chile：The Struggle for Social Justice，1535—1700*（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探讨了耶稣会士在马普切人中的传教活动。

一些重要著作研究了西班牙殖民地智利的社会发展情况。Mario Góngora 的 *Origen de los inquilinos en Chile central*（Santiago：Editorial Universitaria，1960）研究了大庄园劳动制度的发展情况。Eugene H. Korth 和 Della M. Flusche 的 *Forgotten Females：Women of African and Indian Descent in Colonial Chile，1553—1800*（Detroit：B. Ethridge

Books，1983）概述了殖民地时期受奴役的妇女状况。Marcelo Carmagnani 的 *El salario minero en Chile colonial*（Santiago：Universidad de Chile，1963）叙述了矿工从强制劳动转为领薪劳动的情况。Benjamín Vicuña Mackenna 的 *La edad de oro en Chile*，2nd ed.（Buenos Aires：Editorial Francisco de Aguirre，1968）和他的其他一些论述铜、银的著作均以浪漫主义笔法描绘了采矿传统。Armando de Ramón 和 José Manuel Larraín 的 *Orígenes de la vida económica chilena, 1659—1808*（Santiago：Centro de Estudios Públicos，1982）是部研究价格和贸易的重要著作，概述了殖民地时期经济发展状况。

第三章　独立（1750—1830）

一些重要研究著作阐述了智利独立运动的经济缘由。Jacques A. Barbier 的 *Reform and Politics in Bourbon Chile, 1755—1796*（Ottawa：University of Ottawa Press，1980）强调了政财问题，而 Sergio Villalobos 的 *El comercio y la crisis colonial*（Santiago：Universidad de Chile，1968）则指出西班牙商人垄断贸易招致了人们的不满。Eduardo Cavieres Figueroa 的 *El comercio chileno en la economía mundo colonial*（Valparaíso：Edicioners Universitarias de Valparaíso，1996）探讨了殖民统治末期影响独立运动的贸易状况。Eugenio Pereira Salas 的 *Buques norteamericanos en Chile a fines de la era colonial, 1788—1810*（Santiago：Universidad de Chile，1936）引用资料说明独立前美国在智利的贸易状况。Luz María Méndez Beltrán 的 *Instituciones y problemas de la minería en Chile, 1787—1826*（Santiago：Universidad de Chile，1979）阐述了智利矿主同业公会处理经济、政治问题（往往以失败告终）的情况。

独立运动时期访问智利的外国人留下了一些极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John Miers 的 *Travels in Chile and La Plata*，2 vols.（London：Baldwin，Cradock，and，Joy，1826）对智利社会和采矿状况提出一些看法和建议。作者是个有点怨愤的企业家，他在遇到许多阻碍未能创办铜业后写了些书。John Mayo 和 Simon Collier 主编的 *Mining in Chile's Norte*

Chico：*Journal of Charles Lambert, 1825—1830*（Boulder：Westview Books，1998）述说了他亲自结识的智利最成功的移民矿主。

研究独立问题及其领导人的一部佳作是 Simon Collier 的 *Ideas and Politics of Chilean Independenc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7）。Julio Heise González 的 *Años de formación y aprendizaje politicos, 1810—1833*（Santiago：Editorial Universitaria，1978）着重研究了独立运动时期重大的政治制度建设问题。两部智利独立运动领导人传记是 Stephen Clissold 的 *Bernardo O'Higgins and the Independence of Chile*（New York：Praeger，1969）和 Jay Kinsbruner 的 *Bernardo O'Higgins*（New York：Twayne，1968）。Kinsbruner 在其 *Diego Portales：Interpretative Essays on the Man and Times*（The Hague：Martinus Nijhoff，1967）一书中也对独立运动时期的主要政治首领进行了研究。Alfredo Jocelyn-Holt Letelier 的 *El peso de la noche：Nuestra frágil fortaleza histórica*，2nd ed.（Santiago：Planet，1998）认为精英公民文化缔造了智利国。Donald Emmet Worcester 在其 *Seapower and Chilean Independence*（Gainesville：University of Florida Press，1962）中探讨了科克伦勋爵在组建智利舰队方面所起的作用。

Mary Lowenthal Felstiner 的“Kinship Politics in the Chilean Independence Movement”（*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56，no. 1 [February 1976]：58—80.）一文对豪门望族的政治活动进行了研究。Maria Graham 在其 *Journal of a Residence in Chile, During The Year 1822*（London：Longman，Hurst，Rees，Orme，Brown，and Green，1824）一书中辑录了她跟一些主要领导人谈话的第一手资料。Eduardo Pöppig 的 *Un testigo de la aborada de Chile, 1826—1829*，trans. Carlos Keller（Santiago：Zig-Zag，1960）对智利未来的发展提出了非常乐观的看法，而 Aaexander Caldcleugh 的 *Travels in South America During the Years 1819—1920—1921*，2vols.（London：John Murray，1825）则提出了比较实事求是的看法。

第四章 矿主、商人和庄园主（1830—1861）

Arnold Bauer 的 *Chilean Rural Society from the Spanish Conquest to 1930*（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5）不仅仅论述了智利农业发展史，还全面阐明了智利经济发展状况。Claudio Gay 的 *Historia física y política de Chile：Agricultura*，2nd ed.，2 vols.（Santiago：ICIRA，1973）描绘了 19 世纪中叶农业发展的全貌，对农业发展前途作了过分乐观的评述。

Juan Eduardo Vargas Cariola 的 *José Tomás Ramos Font：una fortuna chilena del siglo XIX*（Santiago：Ediciones Universidad Católica de Chile，1988）对早期商人从事贸易、农业和工业活动的方方面面进行了研究。Ricardo Nazer Ahumada 的 *José Tomás Urmeneta：un empresario del siglo XIX*（Santiago：Dirección de Bibliotecas，Archivos y Museos，1993）也揭示了一些著名矿主从事多种产业活动的情况。想阅读杰出的矿业企业家的日记和信件者，请参阅 Simon Collier 和 John Mayo 主编的 *Mining in Chile's Norte Chico：Journal of Charles Lambert，1825—1830*（Boulder：Westview Press，1998）。Steven S. Volk 的“Mine Owners，Moneylenders，and the State in Mid-Nineteenth-Centrry Chile：Transitions and Conflicts”（*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73*，no. 1［February1993］：67—98）对矿业信贷的重要性作了最好的分析。Pierre Vayssière 的 *Un siècle de capitalisme minier au Chili，1830—1930*（Paris：Editions du C. N. R. S. 1980）研究了采矿业的技术革新和经济发展状况。Leland R. Pederson 的 *The Mining Industry of the Norte Chico，Chile*（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1966）对智利主要矿产区——太平洋战争期间兼并了北格朗德地区之前的主要矿产区——进行了研究。Eduardo Cavieres Figueroa 的 *Comercio chileno y comerciates ingleses 1820—1880：Un ciclo de historia económica*（Valparaíso：Universidad Católica de Valparaíso，1988）根据文献资料阐明了 19 世纪智利的全球贸易关系。John Mayo 的 *British Merechants and Chilean Development，1851—1886*（Boulder：Westview Press，1987）则对贸易公司跟智利经济其他部门的相互影响关系

进行了研究。

对波塔莱斯时期政治史最全面的研究，参见 Simon Collier 的 *Chile: The Making of a Republic, 1830—1865*（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2003）。Maurice Zeitlin 的 *The Civil Wars in Chile, or The Bourgeois Revolutions That Never Wer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认为新型经济权贵政治上的无能导致了革命的发生。Cristián Gazmuri 的 *El "48" Chileno: Igualitarios, reformistas, radicales, masones y bomberos*（Santiago: Editorial Universitaria, 1992）就激进主义及其不同的表现形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James Melville Gillis 的 *Chile; Its Geography, Climate, Government*（Washington, D. C.: A. O. P. Nicholson, 1855）和 Vicente Pérez Rosales 的 *Recuerdos del Pasado, 1814—1860*（Santiago: Editora Nacional Gabriela Mistral, 1973）根据个人看法对 19 世纪中叶的智利进行了阐述。Pérez Rosales 从事过多种活动，其中之一是组织了德国人在智利南部地区的拓殖活动。一个世纪后，Ricardo Donoso 在其 *Desarrollo politico y social de Chile desde la Constitución de 1833*（Santiago: Imprenta Universitaria, 1941）和 *Las ideas políticas en Chile*（Mexico: 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 1946）中对智利政治和发展作了精辟的分析。

第五章　议会的胜利（1861—1891）

Julio Heise González 的 *Historia de Chile: El Período Parlamentario, 1861—1925*, 2 vols.（Santiago: Editorial Andrés Bello, 1974 and Editorial Universitario, 1982）对这一时期智利的种种变革作了概述。而 Francisco A. Encina 的 *Nuestra inferioridad económica*（Santiago: Imprenta Universitaria, 1912）则早早就对智利经济发展的片面性提出了批评。Harold Blakemore 的 *British Nitrates and Chilean Politics, 1886—1896*（London: Athlone Press, 1974）阐述了英国硝石企业家谋求私利的手法，但他们不插手内战。Oscar Bermúndez Miral 的 *Historia del salitre desde sus orígenes hasta la Guerra del Pacífico*（San tiago: Universidad de

Chile，1963）记述了硝石企业家们的发迹史，十分有趣；而 Thomas F. O'Brien 的 *The Nitrate Industry and Chile's Crucial Transition, 1870—1901*（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82）则评述了硝石业抑制发展的状况。Julio Pinto Vallejos 的 *Trabajos y rebeldías en la pampa salitrera*（Santiago：Universidad de Santiago，1998）对硝石业中的劳工组织和劳资冲突进行了研究。Baldomero Lillo 的 *Sub terra, cuadros mineros*，2nd ed.（Santiago：Nascimento，1931）描述了煤矿工人生活的真实状况，而 Eduardo Barrios 的 *Gran señor y rajadiablos*（Santiago：Nascimento，1967）则描绘了大庄园主的生活。

Michael Monteón 的 *Chile in the Nitrate Era*（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2）对 19 世纪末的智利进行了概述。Henry W. Kirsch 的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a Traditional Society：The Conflict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Modernization in Chile*（Gainesville：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1977）阐明了智利制造业的早期状况，颇具新意。而 Arnold J. Bauer 的"Industry and the Missing Bourgeoisie：Consumption and Development in ChILE，1850—1950"（*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70，no. 2［May 1990］：227—254）则提出了智利为什么未能形成强大的中产阶级这一问题。

Robert Mccaa 的 *Marriage and Fertility in Chile：Demographic Turning Points in the Petorca Valley, 1840—1976*（Boulder：Westview Press，1983）对圣地亚哥以北谷地农村家庭发展情况进行了研究。Ann Hagerman Johnson 的文章"The Impact of Market Agriculture on Family and Household Structure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le"（*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58，no. 4［November1978］：625—648）也对这一问题作了阐述。George Young 的 *The Germans in Chile：Immigration and Colonization, 1849—1919*（New York：Center for Migration Studies，1974）叙述了这一有影响的族群在智利南部地区的发展史。William F. Sater 的 *Heroic Image in Chile：Arturo Prat Secular Sain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3）试图通过对智利最得人心的英雄人物进行分析

了解智利社会，而他的另一部著作 *Chile and the War of the Pacific*（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1986）则比较真实地阐述了智利跟其北方邻国的冲突。Sol Serrano 的 *Universidad y nación*，*Chile en el siglo XIX*（Santiago：Editorial Universitaria，1994）对智利大学的发展状况进行了重要研究。

第六章　新兴阶级与矛盾冲突（1891—1925）

Gonzalo Vial Correa 的 *Historia de Chile*，4 vols，（Santiago：Editoral Santillana del Pacífico，1981—　）对 1891 年之后的智利进行了评述。René Millar 的 *La elección presidencial de1920*（Santiago：Editorial Universitaria，1981）着重阐明了阿图罗·亚历山德里当选总统后智利社会的变化。Robert Alexander 的 *Arturo Alessandre*：*A Political Biography*，2 vols.（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1977）对这位重要的国家领导人作了出色的分析，但 Ricardo Donoso 的 *Alessandri*，*agitador y domoledor*：*Cincuenta años de historia política de Chile*，2 vols（Mexico and Buenos Aires：Fondo de Cultura Eco nómica，1952—1954）则对他的政治作用进行了尖锐批评。Pelter de Shazo 的 *Urban Workers and Labor Unions in Chile*，*1902—1927*（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3）对早期有组织的劳工发展史进行了很有价值的研究。Carl Solberg 的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sm*：*Argentina and Chile*，*1890—1914*（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1970）阐释了智利未能像阿根廷那样吸引大量移民的原因。

第七章　民主实验（1925—1958）

这一时期，一代有才干的著作家们开始了创作生涯。Gabriela Mistral 从*Desolación*（New York：Instituto de las Españas en los Estados Unidos，1922）开始了她的诗歌创作生涯，而 Pablo Neruda 的 *Twenty Love Poems and a Song of Despair*，trans，W. S Merwin（New York：Penguin Books，1993）、*Crepusculario*，3rd ed.（Santiago：Nacimento，

1937)，*Canto gen eral*，trans. Jack Schmitt（Berkeley：Univ. of California，1991）与 *Odas elementales*（Buenos Aires：Losada，1954）使之成了最著名的用西班牙语写作的诗人。比他们早且极具革新精神的诗人是 Vicente Huidobro，其诗集是 *Altazor*，*or a voyage in a Parachute*（Saint Paul，Minn：Graywolf Press，1988)。两位具有创新精神的小说家及其作品是 Augusto d'Halmar 的 *Pasión y muerte del cura Deusto*（Berlin：Editora Internacional，1924）和 Pedro Prado 的 *Alcino*，2nd ed.（Santiago：Nascimento，1928)。因对智利史进行了马克思主义阐述而闻名的作家、作品有：Julio César Jobet 的 *Ensayo crítico del desarrollo económico-social de Chile*（Santiago：Editorial Universitario，1955）和 Hernán Ramírez Necochea 的 *Historid del imperialismo en Chile*（Santiago：Editorial Austral，1960)。

Fredrick M. Nunn 的 *Chilean Politics*，*1920—1931*：*The Honorable Mission of the Armed Forces*（Albuquerque：University of New Mexico，1970）对这一时期军队所起的复杂而又矛盾的作用作了研究。而 Paul W. Drake 的 *Socialism and Populism in Chile*，*1932—1952*（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78）则对人民阵线政府的政治联盟作了分析。Ernst Halperin 的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m in Chile*（Cambridge：MIT Press，1965）和 Julio Faúndez 的 *Marxism and Democracy in Chile*：*From* 1932 *to the Fall of Allend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8）研究了共产党和社会党的兴起。Tomás Moulián 的 *El gobierno de Ibáñez*，1952—1958（Santiago：Programa FLASCO，1985）对伊瓦涅斯第二届政府的保守性进行了批判。Germán Urzúa Valenzuela 和 Anamaría García Barzelatto 的 *Diagnóstico de la burocracia chilena*，*1818—1969* 的（Santiago：Editorial Jurídica de Chile，1971）阐述了公共行政机构的长期发展状况，对政府这一课题的研究做出了特殊贡献。

人民阵线执政时期的美国大使、富兰克林·D. 罗斯福在智利的代表 Claude G. Bowers 的 *Chile through Embassy Windows*，*1939—1953*（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58）是一部重要的回忆录。Peter

J. Sehlinger 与 Holman Hamilton 的 *Spokesman for Democracy*：*Claude G. Bowers, 1878—1958*（Indianapolis：Indiana Historical Socciety，2000）的最后几章也对 Bowers（特别是他在智利的作为）进行了阐述。Michael J. Francis 的 *The Limits of Hegemony*：*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Argentina and Chile during World War II*（Notre Dame ，Indiana：Univ. of Notre Dame Press，1977）记述了最终导致智利跟轴心国断交的谈判情况，而 William F. Sater 的 *Chile and the United States*：*Empires in Conflict*（Athens：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90）则对两国的关系进行了透彻阐述。

Felícitas Klimpel 的 *La mujer chilena*：*el aportefeminine al progreso de Chile, 1910—1960*（Santiago：Editorial Andrés Bello，1962）是一部阐述妇女组织及其政治活动发展状况的开创性著作。最近又有两篇相关问题的文章发表，即 Elizabeth Quay Hutchison 的"From 'La Mujer Esclava' to 'La Mujer Limón'：Anarchism and the Politics of Sexuality in Early-Twentieth-Century Chile"和 Karin Alejandra Rosemblatt 的"Charity RIghts and Entitlement：Gender，Labor，and Welfare in Early-Twentieth Century Chile"（*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1，no. 3/4［2001］：519—554；555—586）。

George M. McBride 的 *Chile*：*Land and Society*（Baltimore：American Geographic Society，1936）最先注意到了这一时期农业现代化的缺失。后来，Brian Loveman 的 *Struggle in the Countryside*：*Politics and Rural Labor 1919—1973*（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6）对农业劳动进行了研究；Thomas C. Wright 的 *Landowners and Reform in Chile*：*The Sociedad Nacional de Agricultura1919—1940*（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1982）对农业雇主和农村冲突的根源进行了研究。P. T. Ellswoth 的 *Chile*：*An Economy in Transition*（New York：Macmillian，1945）就大萧条和战争对智利的影响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

第八章　改革转化为革命（1958—1973）

研究豪尔赫·亚历山德里政府的著作很少，但研究弗雷政府和阿

连德政府的著作却很多。有关背景介绍的著作有：Weston H. Agor 的 *The Chilean Senate*（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1971）阐述了 20 世纪 70 年代初危机发生前强力政治机构的运作情况。Alan Angell 的 *Politics and the Labor Movement in Chile*（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对工会与政党间的相互影响作了极详尽的历史分析。James O. Morris 的 *Elites，Intellectuals，and Consensus：A Study of the Social Question and the Industrial Relations System in Chile*（Ithaca：Cornell University，1966）从社会动力学角度对智利的劳资关系进行了阐述。George Grayson 的 *El Partido Demócrata Cristiano chileno*（Buenos Aires：Editorial Francisco de Aguirre，1968）概述了基督教民主党的兴起，而 Michael Fleet 的 *The Rise and Fall of Chilean Christian Democrac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5）则指出了导致执政党 1970 年失去政权的错误。Cristián Gazmuri 的 *Eduardo Frei Montalva y su época*，2 vols.（Santiago：Aguilar，2000）是部基督教民主党首位总统的传记，资料极其丰富。

一些论述这一时期经济的著作非常优秀。Markos Mamalakis 和 Clark Reynolds 的 *Essays on the Chilean Economy*（Homewood，Ill.：R. D. Irwin，1965）就重点发展某些经济部门的政策提出了异议，同时还发表、出版了其他一些文章和著作。Ricardo French-Davis 的 *Políticas económicas en Chile，1952—1970*（Santiago：Universidad Católica，1973）为弗雷政府的经济政策进行了辩护，但 Jere R. Behrman 的 *Macroeconomic Policy in a Developing Country：The Chilean Experience*（New York：Elsevier/North-Holland，1977）则对之做出了比较公正的评价。Theodore H. Moran 的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the Politics of Dependence：Copper in Chil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4）概述了矛盾的铜业政策，而 Barbara Stallings 的 *Class Conflic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le 1958—1973*（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则阐明了阶级矛盾导致传统制度式微的状况。

智利最令人感兴趣的话题是萨尔瓦多·阿连德和人民团结阵线。

阿连德在其 *Allende：Su pensamiento politico*（Santiago：Editorial Quimantú，1972）中阐明了自己的思想主张。Paul Sigmund 的 *The Overthrow of Allende and the Politics of Chile*（University of Pittsburgh，1977）对弗雷政权和阿连德政权作了出色的对比。Nathaniel Davis 的 *The Last Two Years of Salvador Allende*（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5）批评了阿连德的政策，但认为他对被推翻没有责任。Ricardo Z. Israel 的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Allende's Chile*（Tempe：Arizona State University，1989）和 Edy Kaufman 的 *Crises in Allende's Chile：New Perspectives*（Westport：Praeger，1988）认为阿连德的许多问题均出自他自己的政策。文学上的反映，参见小说家 Jorge Edward 的 *Los convidados de piedra*（Barcelona：Seix Barral，1978）和 *Persona Non Grata：A Memoir of Disenchantment with the Cuban Revolution*，tr. Andrew Hurley（New York：Paragon House，1993）。Isabel Allende 的 *House of the Spirits*（New York：A. A. Knopf，1985）述说了她的家族政治活动的悲剧故事，这使她成了智利最著名的小说家。Antonio Skármeta 的 *Burning Patience*，trans，Katherines Silver（New York：Pantheon，1987）将巴勃罗·聂鲁达写成了丘比特。

其他研究人民团结阵线危机的著作有：Stefan De Vylder 的 *Allende's Chile：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Unidad Popula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lan Roxborough 的 *Philip O'Brien* 和 Jackie Roddick 的 *Chile：the State and Revolution*（New York：Holmes and Meier，1977），以及 Arturo Valenzuela 的 *The Breakdown of Democratic Regimes：Chile*（Baltimore：Johns Hopking University Press，1978）。Brian H. Smith 的 *The Church and Politics in Chil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2）阐述了教会渐次卷入政治发展进程的状况，而 Peter Winn 的 *Weavers of Revolution：The Yarur Workers and Chile's Road to Socialis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则记述工人没收一家大工厂的前前后后。Cristóbal Kay 与 Patricio Silva 主编的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Chilean Countryside：From*

the Pre-Land Reform Period to the Democratic Transition（Amsterdam：Center for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and Documentation，1992）提出了有关智利农业危机的各种观点。Heidi Tinsman 的文章"Good Wives and Unfaithful Men：Gender Negotiations and Sexual Conflicts in the Chilean Agrarian Reform，1964—1973"（*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1，nos. 3—4［2001］：587—619）从妇女视角对土地改革进行了研究。

阐述人民团结阵线失败的两部论著是 Robert Moss 的 *Chile's Marxist Experiment*（Newton Abbot，England：David and Charles，1973）和 Mark Falcoff 的 *Modern Chile，1970—1989：A Critical History*（New Brunswick：Transaction Publisher，1991）。Joaquín Fernandoes 的 *Chile y el mundo 1970—1973：la poltica exterior del gobierno de la Unidad Popular*（Santiago：Ediciones Universided Católica de Chile，1985）阐明了人民团结阵线时期的国际信货问题。其他一些根据文献资料对这一时期的变化作了论述的重要著作是 Kathleen Fischer 的 *Political Ideology and Educational Reform in Chile，1964—1976*（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1979）、Hannah W. Stewart-Gambino 的 *The Church and Politics in the Chilean Countryside*（Boulder：Westview Press，1992）、Dale L. Johnson 编的 *The Chilean Road to Socialism*（Garden City：Doubleday and Co，1973）、Edward Boorstein 的 *Allende's Chile：An Inside View*（New York：Internationnal Publishers，1977）和 Sergio Bitar 的 *Chile：Experiment in Democracy*（Philadelphia：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Human Issues，1986）。

第九章　军人统治与新自由主义（1973—1990）

论述皮诺切特时期的著作涉及到了三大主要问题：侵犯人权、制度改革和回归民主。Pamela Constable 和 Arturo Valenzuela 的 *A Nation of Enemies：Chile under Pinocher*（New York：W. W. Norton，1991）、Lois Hecht Oppenheim 的 *Politics in Chile：Democracy，Authoritarianism，and the Search for Development*，2nd ed.（Boulder：Wesview Press，1999）

和 Genaro Arriagada 的 *Pinochet: The Politics of Power*（London: Unwin Hyman, 1988）对军人统治的整个时期进行了批判；而 James R. Whelan 的 *Out of the Ashes: Life, Death and Transfiguration of Democracy in Chile 1833—1988*（Washington, D. C, Regnery Gateway, 1989）、Rafael Valdivieso Arstía 的 *Crónica de un rescate*（Santiago: Andrés Bello, 1988）和 Sergio Fernández 的 *Mi lucha por la democracia*（Santiago: Editorial Los Andes, 1994）则相信军队将会重建公民社会。Helen Mary Spooner 的 *Soldiers in a Narrow Land: The Pinochet Regime in Chile*（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4）详述了军队统治时期的腐败和对人权的侵犯。Cathy Lisa Schneider 的 *Shantytown Protest in Pinochet's Chile*（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es, 1995）和 Pamela Lowden 的 *Moral Opposition to Authoritarian Rule in Chile, 1973—1990*（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6）记述导致公民社会回归的历次抗议活动。Nancy E. Morris 的文章 "Canto Porque Es Necesario Cantar: The New Song Movement in Chile, 1973—1983"（*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21, no. 2 (1986): 117—136）研究了一种用音乐进行抗议的方式。Larissa Lomnitz 和 Ana Melnick 的 Chile's *Middle Class: A Struggler for Survival in the Face of Neoliberalism*（Boulder: Reinner, 1991）阐明了新自由主义改革对中产阶级造成的意想不到的影响。Clodomiro Almeyra 的 *Reencuentro con mi vida*（Santiago: Ediciones Ornitorrinco, 1987）是一部反对军政权的社会党领导人的自传。

对新自由主义变革智利经济的概述，参见 Sebastián 和 Alejandra Edwards 的 *Monetarism and Liberalization: The Chilean Experiment*（University of Chicago, 1991），Javier Martínez 与 Alvaro Díaz 的 *Chile: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Washington, D. C.: UNRISD, 1996）。Joseph Collins 与 John Lear 的 *Chile's Free Market Miracle: A Second Look*（Oakland: Institute for Food and Development Policy, 1995）对医疗保健、住房和社会保险等领域的改革进行了批判。Lovell S. Jarvis 的 *Chilean Agriculture under Military Rule: From Reform to Reaction, 1973—198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对农业方面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也进行了批判。Joseph L. Scarpaci 的 *Primary Medical Care in Chile: Accessibility under Ruel*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1988）根据文献资料对医疗保健改革作了深入分析。

描绘从军人统治通向民主的著作有 J. M. Puryear 的 *Thinking Politics: Intellectuals and Democracy in Chile, 1973—1988*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和 César N. Caviedes 的 *Elections in Chile: The Road toward Redemocratization* (Boulder: Rienner, 1991)。论术政治变革机遇的其他一些文章收在 Paul Drake 和 lván Jaksié 主编的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Chile, 1982—1990*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1991）中。

第十章 民主过渡时期（1990— ）

许多作者分析了民主政权对新自由主义所作的修正。持有批判观点的论著是 David E. Hojman 的文章“Poverty and Inequality in Chile: Are Democratic Politics and Neoliberal Economics Good For You?” (*Journal of Interamerican Studies and World Affairs* 38, no. 2/3 [1996]: 73—97)，而此前一部做出比较肯定评价的书是 Hojman 的 *Chil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in the 1990 s*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1993)。Kurt Weyland 的文章“Economic Policy in Chile's New Democracy” (*Journal of Interamerican Studies and World Affairs* 41, no. 3 [Fall 1999]: 67—97）对民主政权采行新自由主义模式是否能真正解决突出的社会问题提出了质疑。Hugo Fazio 的 *La transnacionalización de la ecnomía chilena: Mapa de la extrema riqueza al año 2000* (Santiago: LOM Ediciones, 2000）阐明了全球化与外国公司在智利新经济中的作用。Marcus J. Kurtz 的文章“Free Markets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Chile: The National Politics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Politics and Society* 27, no. 2 [June 1999]: 275—302）对新自由主义主张的出口农业作了评述。Jorge Rosenblut 的文章“Telecom-

munications in Chile：Success and Post-Deregulatory Challenges in a Rapidly Emerging Economy"（*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51，no. 2 [Spring 1998]：565—582）和 R. A. Baeza-Yates et al 的文章"Computing in Chile：The Jaguar of the Pacific Rim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38，no. 9 [September 1995]：23—28）对智利电信业和软件业的发展持乐观看法。

网站 www. derechoschile. com/coronologia 提供了有关人权问题和重大人权事件的资料。对军队迫害行为描述得最生动的著作是 Patrcia Verdugo 的 *Chile，Pinochet ，and the Caravan of Deen*（Coral Gables：North-South Center Press，2001），而 Alejandra Matus 的 *El libro negro de la justicia chilena*（Santiago：Planeta，1999）则谴责了法官们的不作为。Luis Roniger 的文章"Human Rights Violations and the Rashaping of Collective Identities in Argentina，Chile and Uruguay"（*Social Identities* 3，no. 2 [June 1997]：221—247）对南锥体国家处理人权问题的状况作了比较研究。Tomás Moulián 的 *Chile actual：anatomía de un mito*（Santiago：LOM，1997）对根据 1980 年宪法行事能否实现民主提出了质疑。Ana Cecilia Vergara 和 Jorge Vergare Estévez 的文章"Justice，Impunity and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A Challenge for Human Rights Education"（*Journal of Moral Education* 23，no. 3 [1994]：273—285）担心：公立学校课程如果不教授人权问题，公民社会将健全不了。

David Carruthers 的文章"Environmental Politics in Chile：Legacie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Third World Quarterly* 22，no. 3 [2001]：343—358）呼吁共同采取更为坚定的政治行动解决数十年来的环境恶化问题。Philip D. Oxhorn 的 *Organizing Civil Society：The Popular Sectors and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Chile*（University Park：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1995）研究了处理地方问题的新组织兴起状况。David R. Mares 和 Francisco Rojas Araverna 的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le：Coming in from the Cold*（New York：Routledge，2001）从国际层面对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民主为改善美智关系提供了机会。

索 引

C

D

E

F

H

I

J

K

L

M

T

V

Y

Z